

学术研究

郭沫若题

Academic Research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主 编：叶金宝

副主编：郭秀文 罗 苹

学术研究

(1958 年创刊)

2022 年第 12 期

总第 457 期

出版日期：12 月 20 日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

中国式现代化的宪法保障

吴家清 向金波 1

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形态的建构与创新

冉杰 12

特稿

“训诂阐释学”构想

张江 17

哲学

•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 •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基本问题

——重读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

王荫庭 24

马克思关于特殊性—普遍性的辩证法

——兼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

陈广思 30

从道德无序到美德统一：麦金太尔道德叙事的构思逻辑

张永刚 38

STS 视角下逻辑研究的三种进路

臧艳雨 44

经验世界中交互主体性的本原性思考

——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阿伦特

高燕 李美娟 51

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

国际化社区基础设施与文化适应的互动机制

李俊良 59

政法社会学

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文本挖掘及量化评估

蔡立辉 戴胜利 马王荣 64

人口结构变化对美国政治格局的潜在影响探究

——基于多数据源的考察

陆杰华 王笑非 72

流动人口医疗卫生服务利用影响因素研究

——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李燕 79

• 中国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研究 •

多重机制协同减贫模式：政策工具与逻辑机理

——广东减贫治理成功的一种解释范式

张开云 邓永超 84

乡村振兴背景下韧性乡村的影响因素与示范带耦合分析	曲霞 文晓巍 90
--------------------------	-----------

经济学 管理学

制造业升级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作用与推动途径	张杰 宋宜航 96
全球价值链嵌入、汇率变动与出口产品价格	
——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盛斌 吕云龙 107
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研究	陈卫平 余乐 梁舒培 115
近代中国财政分权的历史框架与当代启示	毕学进 马金华 许晖 124

历史学

晚清官员印章散论	
——以《杜凤治日记》的记载为中心	冷东 邢思琳 沈晓鸣 133
“自我史”初探	陈茂华 145
内藤湖南的中国古史研究	
——兼论内藤湖南古史观念与同时期中日疑古思想之异同	郭露凝 154

文学 语言学

中国古代“海丝之路”的文学镜像	纪德君 165
中国文学研究的图像史学实践及趋势	龙其林 175
17—19 世纪欧洲中国戏曲题材画的“真”与“失真”	陈雅新 184
朱熹《诗集传》的阐释思想	刘思宇 193

学术与教育

清末民初报刊对美育的关注与介入	
——以《时事画报》和《真相画报》为中心	许洪林 201
“艺术生命”理论视域下儿童艺术教育的内涵与特征	包玉姣 206

英文摘要	211
------	-----

Academic Research

CONTENTS

No.12, 2022

The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Wu Jiaqing and Xiang Jinbo (1)
The New Patter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Ran Jie (12)
A Blueprint for "Exegetical Hermeneutics"	Zhang Jiang (17)
On som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t Philosophy	
—Rereading G. V. Plekhanov's <i>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i>	Wang Yinting (24)
Marx's Dialectics on Particularity-Universality	
—With Discussion on Marx's "Reversal" of Hegel's Dialectics	Chen Guangsi (30)
From Moral Disorder to Virtue Unity: MacIntyre on the Logic of Moral Narrative	
.....	Zhang Yonggang (38)
Three Approaches of Logic Studies in STS Field	Zang Yanyu (44)
The Original Thinking of Intersubjectivity in the Experience-World	
—From Husserl, Heidegger to Arendt	Gao Yan and Li Meijuan (51)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Also on the Year of Kumarajiva's Death	Li Junliang (59)
Text Mining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Smart City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olicies	
.....	Cai Lihui, Dai Shengli and Ma Wangrong (64)
An Exploration of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Demographic Change on the Two-Party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ased on Multiple Data Sources	Lu Jiehua and Wang Xiaofei (72)
The Behavior of Utilizing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Services of Urban Migrant Popul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Li Yan (79)
Poverty Reduction Model of Multi-Mechanism Synergy: Policy Tools and Logical Mechanism	
—A Paradigm for Poverty Reduction Success of Guangdong Province	
.....	Zhang Kaiyun and Deng Yongchao (84)
Coupling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emonstration Belts in Resilient Rural Are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Qu Xia and Wen Xiaowei (90)
The Basic Role of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the Ways to Promote It	Zhang Jie and Song Yihang (96)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ment,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and Export Pric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a	Sheng Bin and Lv Yunlong (107)
Effect of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	Chen Weiping, Yu Le and Liang Shupe (115)
The Historical Framework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Modern China	
.....	Bi Xuejin, Ma Jinhua and Xu Hui (124)
Officers' Seal Management in Late Qing Dynasty Based on <i>Du Fengzhi's Diary</i>	
.....	Leng Dong, Xing Silin and Shen Xiaoming (133)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Ego-Histoire	Chen Maohua (145)
The Studies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of Naito Konan,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His Conception and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Theories of Doubting Antiquity of the Same Period	Guo Luning (154)
The Literary Mirror Image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 Ancient China	Ji Dejun (165)
The Practice and Trend of Image Historiography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ong Qilin (175)
"Truth" and "Untruth" of the European <i>Xiqu</i> Theme Paintings in the 17 th -19 th Century	
.....	Chen Yaxin (184)
Hermeneutic Thoughts of Zhu Xi's <i>Shi Ji Zhuan</i>	Liu Siyu (193)
The Concern and Intervention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n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aking <i>The Current Affairs Pictorial</i> and <i>The True Record</i> as Examples	Xu Honglin (201)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Art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 Life" Theory	
.....	Bao Yujiao (206)
English Main Abstracts	(211)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

中国式现代化的宪法保障^{*}

吴家清 向金波

[摘要]现代化不是抽象的绝对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现代化具有不同的性质、特征和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所作的科学阐释，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一个根基两个特质”的根本性质，这一根本性质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现代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宪法的价值选择，在我国宪法变迁中呈现出规律性的“轨迹”。现行宪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及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提供了根本法律依据和根本法治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为现行宪法发展提供了价值引领，现行宪法应适时进行必要的修改完善，从根本法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全面的依据和更加有力的保障。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宪法 依据 保障

〔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2)12-0001-1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并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系统阐述和全面部署。我国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是党和人民意志最集中的体现。现行宪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法律依据和根本法治保障。

一、现代化：我国宪法的价值选择

现代化可以从动态、静态两个角度来理解。动态地看，现代化是指以“现代的”为价值目标的发展过程；静态地看，现代化是指业已存在的“现代的”进步状态。以“现代的”进步状态为主、“现代的”发展过程和进步状态相统一即为现代化。所谓“现代的”，就是世界进入现代以来一定时期发展最好的那些国家所具有的进步状态。

全面或完整的现代化，是“一个本位六个方面”的现代化。现代化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本位，并且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国防现代化为领域的全面或完整的现代化。

现代、“现代的”、现代化，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甚至不同群体，对现代化的理解都存在差异。我国现代化的进步状态是“中国性”的，其

^{*}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比较研究”(20BFX0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吴家清，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向金波，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510655)。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2版。

实现过程是“中国化”的，总体来说，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阐释的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2035年远景目标”，可以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标准体系和总体进步状态。

现代化一直是我国宪法的重要价值选择。现代化在我国宪法变迁中呈现出规律性的演变轨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这个起“临时宪法”作用的纲领性文件中，没有直接把现代化作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目标，但也有相关的表述和规定，一处提到“现代化”，两处提到“工业化”。在总纲第一条就提出了新中国“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的宏伟目标。第三章“军事制度”第二十二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设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第二十七项规定：“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第三十五条关于工业的规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①可以看出，《共同纲领》尽管没有从全局上直接把现代化作为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和根本任务，但从局部的角度确定^②了陆军现代化，确定了与现代化紧密相连的工业化，为确定现代化奋斗目标和根本任务奠定了基础。

五四宪法是我国第一部正式宪法。五四宪法的序言确定，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③将工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结合起来推进。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制度即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五四宪法同时也使用了与现代化密切相关的价值性概念，如“繁荣”“幸福”“进步”等。

七五宪法坚持了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它是在“文革”期间公布施行的，自然带有浓重的“左”的色彩。七五宪法只是在序言最后一段，以“充分的信心”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④没有提及甚至有意避讳“现代化”及其相关的“富强”“富裕”“民主”“文明”“发达”等价值性概念。

七八宪法是我国处在“徘徊时期”^⑤的宪法。七八宪法的序言第四段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我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此基础上，规定了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⑥这一表述，在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路径或重大举措上突出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现代化的界定不够全面，预计的实现期限不切实际、过于乐观。尽管存在上述缺点，但毕竟将“四个现代化”作为全国人民的总任务提出来了，是我国宪法变迁史上第一次从人民的总任务、从国家全局的高度提出了现代化，反映了全国人民长期的夙愿，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七八宪法还在现代化的一些具体方面作出了规定，如第十九条规定“国家大力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⑦其他条文规定了国

① 孙谦、韩大元：《世界各国宪法》（亚洲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第11-13页。

② 为了体现宪法文本中的序言和条文之间的差异，笔者主张在谈到条文时主要应使用“规定”，而在谈到序言时，则以使用“确定”“确认”“明确”“表述”等词语为宜。

③ 孙谦、韩大元：《世界各国宪法》（亚洲卷），第14页。

④ 孙谦、韩大元：《世界各国宪法》（亚洲卷），第20页。

⑤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称之为“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5页。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页。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页。

家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规定大力发展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等。^①不难发现，与七五宪法一样，七八宪法仍然没有提及“富强”“富裕”“文明”“发达”等与现代化密切相关的价值性概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国从此进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个宏观历史背景下，八二宪法即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了。八二宪法原始文本，加上五次修改形成的五十二条修正案，构成了我国现行宪法。现行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表述，既承续了七八宪法提出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并进行了外延扩充，扩充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②的现代化。这是从现代化的范围和领域角度说的。在现代化实现路径和举措上，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贯彻新发展理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现代化的水准上，把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提升为四个现代化加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后进一步提升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实现的期限上，把20世纪末的固定期限修改完善为不固定期限，通过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重要文件来具体明确实现期限，坚守了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积极稳妥，便于实现。现行宪法对现代化的全面、深入、科学的表述，形成了完整的现代化的宪法理想、原则，这样，就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法上的依据和保障。

从我国宪法关于现代化的表述和规定的变迁过程看，呈现出如下规律性的“轨迹”：从间接的规定到直接的规定，从部分的规定到整体的规定，从不够全面的规定到全面的规定，从较低要求的规定到较高要求的规定，从明确具体实现期限的规定到没有明确具体实现期限的规定。

二、现行宪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奠定了根本法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③这一论断包含三个基本要义：一是“基于自己国情”，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总的根基或根本立足点；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明确中国式现代化“姓社不姓资”的性质。三个基本要义相互关联、高度统一，构成了现代化的“中国式”。这一论断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根基两个特质”的根本性质。

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在现行宪法中已经有了充分依据。现行宪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奠定了根本法基础。

首先，现行宪法对中国国情作了总体一概括性表述。中国式现代化根基于我国国情。关于我国国情，可以从地理、人口、民族、文化、历史、传统等多方面进行说明。现行宪法序言第一段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④这显然是从历史文化传统的宏观角度说明中国国情的。第二段至第四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历史的角度说明中国国情的。第五段至第六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历史的角度说明中国国情的。这样依循时间维度纵向地叙说中国国情，是为概括地界定1982年修宪^⑤面对的或所处的中国国情做铺垫的。宪法关于国情的界定，应该从总体上进行宏观的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10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页。

③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2版。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页。

⑤八二宪法属于立宪还是修宪，法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笔者取修宪之说。

概括,尤其是要从所处社会形态的性质及发展阶段去说明基本国情。五四宪法曾这样说明中国国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七五宪法曾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来宏观概括当时的基本国情,显然是不正确的。七八宪法说明我国国情:“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①本来1956年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国就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限于种种条件,尤其是“左”的观念影响,不可能对我国基本国情作出正确的判断。现行宪法的原始文本并没有从社会形态的性质和发展阶段的角度总体地概括我国基本国情,1993年第二次修改形成的第三条修正案,才增加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99年第三次修改形成的第十二条修正案进一步修改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关于我国基本国情的总体宏观概括是科学、准确、长期适用的。尽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但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并没有改变。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②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指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③可见,现行宪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立足点——我们自己的国情已经奠定了根本法的基础。

其次,现行宪法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了原则—制度性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根本性质的第一个特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符合并落实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本质要求。现行宪法的序言和总纲从原则和制度的层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方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法律依据。

我国的前三部宪法,都在序言中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中有的还在条文中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现行宪法主要通过序言中确定原则与条文中设立制度相结合的方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现行宪法的序言进行宏大历史叙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接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通过20世纪三件大事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成为人民和国家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更重要的是,现行宪法进一步从根本制度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五次修改形成的第三十六条修正案,在总纲第一条(规定国家性质、政权归属的“国体条”)第二款,在“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后增写“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① 孙谦、韩大元主编:《世界各国宪法》(亚洲卷),第14、20、23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2版。

征”。^①这一款相应修改成：“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虽然七五宪法、七八宪法都在总纲第二条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甚至都规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公民的基本义务，^②但都没有从国体这一最根本制度角度作出规定，而且带有明显的立宪技术缺陷。现行宪法的上述重大修改，史无前例地将中国共产党领导融入我国国体，与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机结合，并且成了我国国体的最本质特征所在。

现行宪法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根本性质的第一个特质奠定了根本法基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再次，现行宪法对社会主义作了层次一体系性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根本性质的第二个特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符合并落实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现行宪法的序言和总纲从不同层次系统地确认和规定了社会主义原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根本性质的社会主义特质奠定了根本法基础。

现行宪法序言从1993年第三条修正案的“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到2004年第十八条修正案的“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从思想、原则上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特质奠定了根本法基础。

在根本制度层面，现行宪法总纲第一条对我国的国家性质进行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③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最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毛泽东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对人民民主专政作过精辟的论述。^④人民民主专政反映了我国社会农民阶级比重远大于工人阶级的阶级状况，这种阶级状况决定了工农联盟对政权的基础性作用。人民民主专政有着广泛的政治基础，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人民民主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是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的统一。人民民主专政集中反映了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特点，具有广泛性和适应性的特征。宪法确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但不完全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其特殊性，是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的具体化。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⑤现行宪法规定的以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以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根本性质的社会主义特质奠定了最高法基础。

在基本制度层面，现行宪法设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序言第十段确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多党派合作的政党关系、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多党派参政的政权运行方式、维护国家人民利益和照顾同盟者具体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充分协商和广泛参与的民主形式。现行宪法设立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制度，第四条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七五宪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5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七八宪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2页。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75页。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页。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页。

现行宪法设立了基层群众自治的基本制度，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内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① 现行宪法不仅设立了上述政治方面的基本制度，而且也设立了经济方面的基本制度。第四条规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② 现行宪法规定的这些基本政治制度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根本性质的社会主义特质奠定了根本法基础。

在其他重要制度层面，现行宪法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③ 这些重要制度以及宪法规定的其他重要制度，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根本性质的第二个特质奠定了最高法基础。

三、现行宪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提供了根本法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现行宪法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提供了根本法依据。

（一）现行宪法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方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法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根据就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 GDP 居世界后列；十亿多人，八亿在农村，基本上是手工工具搞饭吃。党的十四大报告再次强调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第一次将其写入党章，1993 年宪法修改时写入宪法。现行宪法的序言对国情做出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宏观概括，最主要因素就是人口规模巨大，超过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尽管经过了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少方面居世界首位，但因为 14 亿多人口，我国直到 2020 年底才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现行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④ 这说明宪法已经高度关注人口问题，并把计划生育作为了一项基本国策。尽管现在普遍放开了生育限制，但按照文义解释，生育不能没有计划，也不能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所以这一条仍然是正确的，应当继续坚持。

现行宪法尽管没有直接表述我国人口规模巨大，但明确了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就已经涵盖了人口规模巨大的问题。上述关于基本国情的总体宏观概括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规定，同样为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法的依据，也为我们始终从基本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法保障。

（二）现行宪法在共同富裕方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法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必须符合并落实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现行宪法尽管没有直接使用“共同富裕”的概念，但整个宪法文本多处直接体现共同富裕的原则规范或间接蕴含了共同富裕的精神。

从现行宪法确立的理念看，第五次修改宪法形成的第三十二条修正案，增加了“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中的“共享”发展，是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这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基础的，目的在于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这一发展理念就是要求发展经济、做大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6-7、69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10 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10-11 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19 页。

蛋糕，调整收入分配，逐步缓解和解决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共享发展理念与走共同富裕道路本质上是一致的。

从宪法规定的制度看，首先，现行宪法建立了劳动就业制度。劳动就业是我国必须长期面对的重大民生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劳动是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各国都把就业人数和就业率作为最主要的经济社会指标之一。现行宪法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少数民族地区一般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①在这样的制度下，劳动者根据自己勤奋优质的劳动，提高自己的收入，勤劳致富，改善自己的生活。其次，现行宪法设立了非公有制经济和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宪法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就为人们经营致富提供了根本法的依据和前提。2004年修改宪法，对第十三条进行了全面的修改，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②再次，现行宪法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对公民特殊群体进行特殊保障，而且就一般公民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2004年第四次修改宪法形成的第二十三条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为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和生活需要制定了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和社会安置的原则规范体系。

从现行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看，第四十二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第四十五条确认了公民特殊群体的物质帮助权。一是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享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二是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三是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残疾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显著优势之一。上述相关规定，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法的依据，也为通过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法保障。

（三）现行宪法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法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③也就是说，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和精神层面的现代化相统一的全面现代化。

现行宪法的序言明确了“科学技术现代化”，明确了“精神文明”及其和其他四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并将“文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根本任务的基本价值要素。第一，现行宪法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对精神文明的指导作用。现行宪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4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3版。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

第二，现行宪法规定了思想道德建设。第二十四条为精神文明条款，规定：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①现行宪法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道德方面所作的规定，为两个文明建设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法基础。

第三，现行宪法规定了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体育建设。在科学、教育方面，宪法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宪法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②不仅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学前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而且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对工人、农民等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

在文化、卫生、体育方面，宪法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等文化事业，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街道组织举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

在人才培养方面，宪法规定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扩大知识分子队伍，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及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国家给以鼓励和帮助。

宪法关于科技教育文化和卫生体育的上述规定，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提供了根本法支撑，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法的依据，也为通过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法保障。

（四）现行宪法在生态环境方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法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③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符合并落实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要求。

在宪法序言中，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绿色”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最高认知理念和根本价值观念。第五次修改增加了“生态文明”及其和其他四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容，并将生态文明的价值主旨“美丽”作为国家根本任务的奋斗目标的的基本价值要素，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一起构成了国家任务奋斗目标的价值组合。这是宪法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的理念导向和原则遵循。

在宪法条文部分，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作了具体的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18-19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16 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26 日第 3 版。

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①第八十九条把“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生态文明建设”^②作为国务院行使的职权，同时也是国务院的宪定职责。所有这些规定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法的依据，也为通过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法保障。

（五）现行宪法在外交国际方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法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必须符合并落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③“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④

我国的四部宪法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写入宪法序言，作为我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⑤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形成的第三十条修正案，对序言第十二段关于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表述进行了重要完善。这条修正案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修改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拓展了成就的领域和世界人民支持的范围。改革开放以来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升华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并将其写入宪法，特别是增加“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所有这些，都凸显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现行宪法的这些规定，对于我国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奠定了国内根本法基础，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法保障。

四、现行宪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提供了根本法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中国特色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现行宪法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提供了根本法的依据和保障。限于篇幅，这里仅就下列三个方面的本质要求进行论述。

（一）现行宪法保障实现高质量发展，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⑥

现行宪法的序言确定的“贯彻新发展理念”，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价值引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是针对世界经济复苏低迷、我国经济发展进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11、12、19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54 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26 日第 3 版。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26 日第 3 版。

⑤ 五四宪法在序言中的相关表述略有不同。该表述为：“我国根据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同任何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策，已经获得成就，今后将继续贯彻。”

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26 日第 3 版。

入新常态的形势提出来的治本之策。新发展理念中的创新发展的价值指向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的价值指向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协调发展的价值指向不仅指向经济内部的协调发展，而且也指向宪法序言所确定的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之间的协调发展；绿色发展的价值指向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的价值指向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的价值指向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新发展理念是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导向，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宪法规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对于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根本法保障作用。

不仅如此，现行宪法在条文中还有关于生产率、经济效益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国家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责任制，改进劳动组织，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发展社会生产力。”^① 宪法也关注到了国家机关的工作质量和效率问题，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实行工作责任制，实行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② 这些规定为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提供了根本法支撑。

（二）现行宪法保障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要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现行宪法的序言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举措，提出政治文明及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强国的基本价值要素。

在序言的民主价值引领下，现行宪法在国体、政体、原则和方法四个层次上对社会主义民主作出了规定。一是对作为国体的民主进行了规定。作为国体的民主，直接涉及民主性质的国家政权的归属问题，是宪法人民主权基本原则的直接体现，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③ 如前所述，宪法序言第六段明确了我们国家的根本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总纲第一条就是从国体的角度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二是对作为政体的民主也进行了规定。作为政体的民主即民主性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④ 现行宪法第二条规定了我国的政体，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民主性质的国体和民主形式的政体的统一构成了我国的民主制度。三是对作为原则的民主进行了规定。作为原则的民主即民主性的组织和工作原则。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⑤ 相对上述民主根本制度，民主集中制是我国国家机构实行的一项基本原则。四是宪法对作为方法的民主进行了规定。作为方法的民主，就是民主性的具体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在国有企业、集体经济组织中也要实现民主。相对上述国家民主制度和基本原则而言，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民主，就属于方法上的民主。现行宪法规定，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⑥

现行宪法关于民主的四个层次的规定，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法基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宪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14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19 页。

③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 2 月 21 日第 1 版。

④ 关于政体与政权组织形式的关系，一说是不同概念，前者侧重结构，后者侧重形式；一说是同一个概念，笔者取此说。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6 页。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15-16 页。

法规定的民主制度、民主原则、民主方法在新时代的具体化和创造性升华。

(三) 现行宪法保障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要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两个方面。如前所述，现行宪法分别在第二十四条和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三条规定了思想道德方面的精神文明和教育科技文化方面的精神文明。所有这些都是总纲中规定的，作为精神文明方面的制度，为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写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不仅确认公民享有平等权，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等政治权利，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享有人身、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不受侵犯等人身自由，也规定了公民享有科学研究的自由、文学艺术自由、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等文化权利，为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基本权利保障。

人民的精神世界是多元、多层次的，既有认知性的（如反映客观对象等），也有价值性的（如达善、审美等）；既有消费性的，也有积累性的；既有传承性的，也有创造性的；等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具有不同的精神世界。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说：“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①主要是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多样性和充足性成果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需要。国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文化事业、提供更多精神食粮，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让人民享有更为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深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了更加主动的精神力量。

现行宪法的序言确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总纲中的精神文明条款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条款以及第二章相关的基本权利条款，都是为坚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既提供了根本法依据，也为其实实现奠定了根本法保障。

现行宪法是一部符合国情的好宪法，已经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法依据和保障。现行宪法毕竟于40年前公布施行，它的最后一次修改也已过去三年之久，为了更好地发挥现行宪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依据和保障作用，需要根据党的二十大精神适时对现行宪法适时进行修改完善。现行宪法应当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完成国家根本任务的现实路径，将社会主义民主具体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③这样，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有了更加全面的根本法依据、更加有力的根本法治保障。

责任编辑：王 冰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71页。

② 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页。

③ 吴家清、邹欢艳：《党的二十大精神对宪法变迁的价值引领》，《南方日报》2022年12月12日第A11版。

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形态的建构与创新^{*}

冉 杰

[摘 要]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形态建构探究涉及两个基本层面。一是以时空为维度，从纯粹的逻辑建构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结构性界定，并通过“生产”“民主”“法治”三重基本向度的有机统一，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形态化地展现出来。二是立足于历史实践，将具备同一性的治理现代化规律从单纯的逻辑形态变化呈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同历史时期差异化的国家治理实践形态。这一逻辑形态与历史实践样态之间的叠加、融合、转化，表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样态既是逻辑的，也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而逻辑变革与历史现实再造得以统一的关键就在于党坚持自我革命、自我审视的高度政治自觉，其以治国理政能力建设为现实依托，促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同一性与其实践的历史性的辩证共生，并开辟了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形态、新境界。

[关键词] 国家治理现代化 逻辑形态 历史实践形态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2)12-0012-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做出了深刻总结，并立足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方略，以稳中求进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总基调，以切实有效回应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制度革新导向，向全世界表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大历史性成就。这些论述直接点明了在党的全面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创造性地生发出“社会主义制度革新”“国家治理效能”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型逻辑关联。这一逻辑关联至少有双重意蕴：一是从权力架构着眼，以制度现代化为依托，通过体系革新和治理能力提升强化社会治理效能，进而推动社会主义国家职能的发展完善，并在民主政治层面构建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二是以时间为标尺，不仅把新时代的重大变革作为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历史节点，而且将这一系列变革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加以考察，进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际发展变化，展现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及其民主政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样态和差异，从而勾勒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得以守正创新的演进图谱。不难发现，第一重涵义是结构性的，第二重涵义则是形态性的。这双重内涵的叠加互促将结构性的制度革新置于时空延展中加以呈现，进而结合历史现实的再造，将党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体系与权力架构展现为一个在历史演进中不断发生“样态”变化，且在逻辑上得以不断“形变”的动态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8BKS110)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GD22CMK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冉杰，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006)。

过程。由此来看，新时代以党治国理政引领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已经促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变革逻辑与历史实践的统一，并在应然层面与实然层面实现了逻辑形态与实践样态的耦合、互促与转化。本文致力于从逻辑形态与历史实践样态的契合转化，透析国家治理现代化得以开创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驱动，并结合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及其民主政治新形态得以成型的内在动因，从而凸显“中国之治”所独有的制度优势与机制张力。

一、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逻辑形态

聚焦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构建与实践创新，不难发现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新形态至少具备双重复合性。一方面，政治文明以形态来展现是哲学乃至拓扑学意义上的，即形态或“形态变化（形变）”是一个纯粹的逻辑演变过程。这一形态化的纯粹逻辑性意味着以制度理性为准绳的政治现代化，在相当程度上具备非主体性趋向。由此来看，这一纯粹逻辑层面的形态界定是以时间为第一标尺，并在空间延展中不断进行结构性变化，即以时空为维度的形态变化。另一方面，政治文明毕竟与人相关，难以摆脱人本意义上的历史构建和知识谱写，不仅仅是单纯时空性或结构性的，而是同时作为历史现象不断呈现在现实之中，并通过实践展现为（非）建构性和（非）连续性的具体样态差异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转化演变。

上述的双重复合性同样适用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样态。从结构性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新形态得以构建是以时间为横轴，而促成这一形态构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则需要以时间为标尺，在空间维度上确立不同却彼此紧密关联的基本向度，以在时空范畴内，从权力性质、价值取向与现实关照等多路向、多层面对多角度出发，为制度体系革新与治理能力提升等一系列发展变化提供可界定和可衡量的标准或规范，从而勾勒出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与演进趋势。

具体而言，从逻辑形态上展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变革方向与演进趋势存在三个基本向度。一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生产向度，呈现科学社会主义以解放生产力为指向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党通过治国理政来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与国家治理效能提升这一变革进路的重要前提。如在有效发展生产的现代化视域下审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不难发现其构建的重要指向是在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基础上，始终致力于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即在夯实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基础上，如何在注重发展效率又兼顾公平正义中，不断革新完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二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民主向度，即通过人民民主不断彰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关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阶级统治”属性与其所谓的普遍民主权利是始终相矛盾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驱们则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伟大探索，超越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民主政治的历史局限性，建构了新型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与人民民主制度。人民民主道路的确立，不仅改变了现代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而且从现代主权国家及其权力构建形态的逻辑演变中，开辟了一个与资产阶级政治形态迥异而又并行的新向度，即由共产党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模式。人民民主作为新向度的出现，意味着阶级专政只是手段。这凸显了人民民主道路的开辟，在就如何治理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民主社会这一新的时代命题上，对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三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法治向度，即从人民主权的历史正当性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合法性上阐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理基础。人民民主专政所内含的国家权力属性已从“实现全人类的最终解放”的崇高价值理性出发，凸显了通过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消除阶级压迫这一不公正现象的历史正当性。以解放为目的的人本价值取向确实在道义上保障了人民主权的公正性，但要在政治现实中真正落实人民主体地位，还需要合理且制度化地将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正当性呈现为一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纪必严、违法必究”的合法性建构，并通过具体的法治实践，切实有效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生产向度、民主向度与法治向度有机统一、相互关联，在时空维度上，将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现实改革进路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全方位地展现出来，并形成了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核心，以人民为中心，以法治为准绳，以妥善处理社会主要矛盾为治理取向的独特的逻辑形态构建。这一逻辑形态构建具备“超历史”的内在同一性，即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进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一以贯之的核心要义是不断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始终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

二、我国国家治理的历史实践形态建构及其演化

仅仅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变革进程进行逻辑形态的构建是不够的。纯粹的逻辑变革及其核心要义，能以理性为介质从诸多差异的历史发展时期，凝炼出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最为一般且具备同一性的“内在规律”，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具备同一性的发展规律在不断地直观地表现为不同历史时期内多样化的改革现实。如从历史实践角度来审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变革进程，会发现以时空为维度的纯粹逻辑形态构建与中国化时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史发生了叠加交合，而结构性的逻辑形态变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则呈现具体多样的治理样态变化。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国家治理形态

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高度组织化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及其相应的政权组织形式与社会管理机制。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展，立足于有效处理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历史性地提出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并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领导人民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由此，从结构要素与改革内涵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国家治理样态的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其一，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是国家权力主体。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其实也是强调党的领导，因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人民通过民主方式治理生产活动和构建制度机制。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特殊历史背景，相对于后续的发展时期，更强调对社会主义敌对势力的专政。其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以及相应制度机制的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改造是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制度机制，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并完善相应的制度机制。这一时期的制度机制建设尚处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初期，法律制度建设相对于之后而言，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其三，这一时期的国家治理主要偏重专政与治安，包括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以在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政权安全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科教文卫和国防事业亦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家外交政策和党的建设制度也逐步建立和发展，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①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国家治理形态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党准确地认识到这一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着眼有效化解这一主要矛盾，国家治理围绕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②其治理样态创新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治理主体的执政能力。创造性地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作为主线，着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力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和党治国理政的能力，使党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①其二，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发展活力，大力提升了经济建设水平；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强调国家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体制改革，并通过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实现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重大转型。其三，历史性解决了全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温饱问题。这一重大成就为国家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形态的创新性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于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的历史任务，准确把握了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及其本质属性和形态特征，首次在现代化视域下，针对“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这一重大历史命题，进行了系统探究、进路谋划和策略安排，从而为逻辑形态与历史实践样态之间的统一转化开创了一条守正创新、继往开来的实现机制。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主体地位，并大力提升党的治国理政能力

新时代党以自身治国理政能力建设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变革，这彰显了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革新的关键枢纽作用，即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为内在驱动，以不断自我审视为政治自觉，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现实依托，促成了社会主义制度革新与国家治理效能提升在逻辑形态与历史实践样态之间的统一。其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巩固提升党的国家治理领导主体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政治保证。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国家治理一直坚持并不断加强党的领导，但仍然存在着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等问题。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及其民主政治与治理实践的最高原则，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要求党的领导干部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完善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制度，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②其二，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大力提升党的治国理政能力。针对管党不严、治党不力、党员干部信仰动摇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③要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④其三，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人民的主体地位和民主治理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通过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宗教工作方针、统战和群团工作格局，保证了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过程民主主体权利，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民民主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二）推动构建高质量发展格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形态得以创新发展的关键要素也包括社会主义经济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93页。

④《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及其相关的制度机制改革。其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生产发展能力。高质量发展是对以生产总值增长率为唯一标准的经济发展理念和模式的超越，并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对于高质量发展而言，创新始终是源动力。党和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新型举国体制支撑科技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问题，是实现科技自主自强，将我国建设成科技创新强国的关键举措。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则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其二，深化制度机制改革，提升制度优势向治理能力转化的实际效能。面对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日益显现的现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识到必须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以破除各种体制机制弊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与国防和军队改革等方面全面发力、多点突破，促成了诸多领域的历史性变革，增强了国家制度机制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法治化，在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的同时，也提升了“中国之制”转向“中国之治”的实际效能。

（三）针对未来社会发展将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注重在技术策略上促成科学治理、依法治理与智慧治理的融合互促

其一，注重科学与民主治理相结合。在制度现代化指向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在深刻把握“三大规律”基础上，依靠科学思维、科学方法不断提升社会主义国家切实有效处理社会事务和民众日益多样的利益诉求与价值认同的实际能力。这意味着新发展阶段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要遵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而且要不断创新治理理念、完善治理制度、优化治理策略，进而在不断革新国家制度体系的过程中，注重权衡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现实博弈，在平等参与、理性协商、求同存异的民主机制构建中，最大限度地兼顾多方诉求，防止社会主义民主内涵被空心化、表象化、形式化，从而在国家治理与民主政治的互促样态构建中，充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内涵，以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叠加转化的新格局。其二，继续深入推进依法治理。在新发展阶段持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以法治建设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实际上是基于经济发展现实中各利益主体的实际差异，尽可能从政治权利的赋予及其保障出发，从法律制定、实际执行与条文解释上既兼顾利益博弈中的多方诉求，又对公民义务进行合理界定，从而有效协调民主政治参与过程中各主体间的复杂关系。这种以法治建设推进的民主协商与基层治理，尤其体现在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政府与市场、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利益关系处理中，以形成“各得其所、各尽其责”的公平共享的经济发展格局，从而满足多方有序有效参与公共政治的热切愿望。其三，契合新技术革命，全面推进智慧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立足新时代，展望未来社会发展新动向，不仅需要将传统的管制、维稳思维转变为民主化、多路径的“善治”理念，而且要在技术策略上与时俱进，契合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当下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与云计算技术日渐成熟，智慧化在国家治理中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构建国家治理的智慧样态的理论可能性与现实可行性与日俱增。这深刻影响着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新格局的彼此联动，即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向智慧治理样态的转型，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新技术背景下重申主权政治重要性，并创新提升主权国家对内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其既能在当前全球产业链重组的不确定境况下，满足我国对内治理的现实需求，又能彰显中国之治的新技术新方案对构建全球治理新秩序的世界意义。

责任编辑：许磊 王冰

特稿

“训诂阐释学”构想

张江

【摘要】“训诂阐释学”是学科建构方向的新设计。其目的是，充分发挥训诂学与阐释学各自的优势，互为根基，互为支撑，互为动力，为阐释学的发展奠定可靠的中国基础，为训诂学的生长开辟广大的现实空间。训诂阐释学起点于训诂，通达于阐释，构建于学科，即以训诂为起点和方法，以真理性、可靠性、融贯性为准则，坚持由训而阐，由阐而训，反复循环、螺旋上升的正当路径，最终达致根基牢靠、创造新知的尚意之阐。训诂阐释学在学科方向上，提倡训诂为先、通达义理、体用兼备；在系统方法上，既注重训诂，也注重义理，同时更注重两种方法的相互融合与提升；在学科素养上，提倡训诂精神、公共自觉、范式意识。如此努力，训诂阐释学将以系统完备的新学科形态，位列人文领域，为文、史、哲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提供新示范。

【关键词】训诂 阐释 学科方向 系统方法 学科素养

〔中图分类号〕B08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2)12-0017-07

“训诂阐释学”是学科建构方向的新设计。其目的是，充分发挥训诂学与阐释学各自的优势，互为根基，互为支撑，互为动力，为阐释学的发展奠定可靠的中国基础，为训诂学的生长开辟广大的现实空间。如此努力，训诂阐释学将以系统完备的新学科形态，位列人文领域，为文、史、哲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提供新示范。

一、缘起

训诂学与阐释学，本是两门功能与目标相近的古老学问。前者由古代东周萌芽初长，及至当代已成为与计算机科学深入结合，释读古代典籍的一般方法。后者滥觞于古代希腊，及至当代已成为立足于人文与社会科学之上的本体论学说。长期以来，两学科各自独立，相互疏离，特别是在中国古代，阐释方法体现为义理方法，两者在各自独立的发展中，遇到诸多困难和问题。其核心一点是，训诂学的阐释能力需要提高，阐释学的训诂约束需要强化，两者洽切会通，训诂阐释循环出新，训诂方法为阐释提供可靠基础，阐释方法为训诂开辟可能空间。由此，两个学科的独立优势可为共同优势，不同的困境皆可纾解。更重要的是，训诂学优势恰是阐释学弱势，阐释学优势恰是训诂学弱势。两者有机融合，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相得益彰。一加一远大于二。此为设想建构训诂阐释学的出发点。

训诂学的优势是，就文本理解而言，训诂由字词考证入手，识本字本义，得文本之真相。这是一切文本阐释的根基。训诂学立足于此，话语建构的确定性、可靠性强。训诂方法是中国古代经解

作者简介 张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与阐释学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2488）。

的基本方法。两千多年的实践，虽有起落，甚至大起大落，但训诂的基本精神贯穿至今，方法不断丰富，特别是由清初至现代，经过乾嘉与章黄学派对训诂理论的改造与提升，训诂学本身有了重大进步。训诂的弱势是，自训诂发生，全力集中并停留于字与词的专门考究，由此而生出释义离散及碎片化倾向。如汉末魏初学者徐干言：“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务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①此言虽有偏颇，但大致不错。至于今天，因时代变化，世情移易，训诂之学虽有进步，但在西方话语为主导的当代阐释学理念冲击下，缺失应有的阐释能力，无法挺进人文学科前沿，影响难以扩大。

阐释学的优势是，开放、多元、创意取向积极，随历史与语境演进，集中义理创见，生产超越文本的阔大意义。中国古代的义理之阐，自先秦始，经前汉今文经学再起，至近代康有为、廖平，发扬和发明文本义理，传统浩大，成就非凡。无超越训诂的义理之阐，就无今天面貌的中国思想史、文明史。阐释的弱势是，对经典文本的阐释，轻视和放弃本义之识，放任阐释者生产任意话语，其确证性与可靠性遭致怀疑。就西方阐释学的主流观点说，张扬阐释的主观随意性，认为文本意义由读者决定，文本意义由读者赋予，读者强制文本和作者说读者想说的话。譬如，费什坚定地认为，“作品中的一切——其语法，其种种意义，其种种形式单位——都是解释的产物，它们绝不是‘实际上’给定的”，^②“意义的产生与否都取决于读者的头脑（思考），并不是在印成的篇页或书页中寻找”。^③尤其是文学文本阐释上长期流行的读者中心论，主张作者、文本与阐释无关，一切阐释皆无确定性可言，以阐释者的主观理解为据，任意生产与文本无涉的私人话语，作者死了，文本死了，理论家、批评家却作为读者活着，无边界、无约束的阐释，是阐释的最高形式，是唯一合理与正当的阐释。更进一步，这种以文学为对象的阐释观，与哲学、史学等其他领域的同类话语相杂揉，以文学的理解和阐释方法解构颠覆历史，否定历史事实的确定性认知，否定对任何哲学思想确当可靠的理解，成为当代阐释学的主流。如此倾向，使当代阐释学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防止和克服无正当约束的阐释，及必然发生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神秘主义，成为阐释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读者理论，走得比西方更远。所谓“六经注我”，以本己之意重构经典，史上早有评述。更值得注意的是，以现代版权意识为衡准，断言诸如文本的版权不仅是书写者的，同时也是读者的。苏轼直接将杜诗引为己诗，“爱国志士文天祥则不仅赞同这种诗歌文本的产权共享，甚至怀疑原作者享有产权的合法性”。^④如此阐释理念，与训诂精神对立尖锐。

出路在哪里？就克服当代阐释学的弱势而言，出路在强化训诂意识，引进训诂方法；就克服古代训诂学的弱势而言，出路在强化阐释意识，引进阐释方法。阐释学与训诂学相融相合，择优会通，使训诂成为受到阐释学精神浸润的训诂，阐释成为汲取训诂学精神的阐释，两者浑然一体，为训诂学开拓当代阐释空间，为阐释学扎牢训诂基础。

训诂阐释学基本构想由此而缘起。

二、学科方向

学科建设，首要任务是定位方向。训诂阐释学的发生基点何在，方向和目的何在，这是必须优先解决的问题。要依据训诂与阐释两个学科的各自优势，约束和阻碍其发展的的问题，以及会通融合之后的整体功能与作用，确定训诂阐释学的学科方向。我们的设想是，所谓训诂阐释学，其基本路线起点于训诂，通达于阐释，构建于学科。即以训诂为起点和方法，以真理性、可靠性、融贯性为准则，坚持由训而阐，由阐而训，反复循环、螺旋上升的正当路径，最终达致根基牢靠、创造新知

① [魏]徐干：《中论》，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附录，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63页。

② 参见[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3页。

③ [美]斯坦利·费什：《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文楚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50页。

④ 周裕韬：《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0页。

的尚意之阐。经过长期实践和理论统合，建立起学科特色鲜明，具有广泛应用意义的训诂阐释学。由此而区别于以阐释为起点，回归于训诂的阐释训诂学，以及流行于今的各类阐释之学。

训诂不同于阐释，要害在哪里？所谓阐释之阐，《说文》引《易》曰：“阐幽”，^①意在明隐幽之理。《玉篇》：“阐，大也。”^②《易·丰卦·彖》孔颖达正义：“阐者，弘广之言，凡物之大，其有二种，一者自然之大，一者由人之阐弘使大。”^③阐为义理之阐，无大歧义。所谓训诂，孔颖达定义：“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然则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④如此定义，明显区别于阐。辨于形貌，通于异辞，足于解释，流于表面，非究义理，非穷大道，此为训诂之要，亦为解释之要。^⑤由此看，阐释与训诂的区别是清楚的，无需引经据典，再作常识性的话语堆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训诂与阐释的关系。可集中为三点。

第一，从根基说，训诂为先。训诂本身的性质与功能决定，无论是具体的阐释活动，还是阐释的整体过程，当以训诂为先。训诂是解释。解释的本义是以分析之法，从破解对象细微之节上手，庖丁解牛式地分裂文本，一字一词地说明并实证字词本义，所谓“解释之义尽归于此”，就是训诂及训诂学为自己确定的根本任务。孔颖达为什么用解释一词说明训诂，而不用阐释说明训诂？我们可以将其阐发为孔颖达自觉区别解释与阐释的表现。他清醒认知，训诂以解释为宗，赋予训诂以特殊功能和作用。人类的文字运用及辞义理解永无止境。旧词自不必说。尤其是新的字词，譬如，网络上不断产生并流行的新词，如无严谨训诂，如何认知，如何流行，如何进入历史？人类生产言语，进而制造文字，是为了表达、说明，且记录对自我、世界，以及他人的理解，是基本的阐释形式。没有文字词语的确切表达与把握，如何表达自我？阐释如何实现？训诂以文字之形、音、义为标的，为求意、识理、循道，提供基准和前提。训诂信仰言可尽意，重在字词精准。这是人类所以造字、用字的基本精神。此精神由古至今，从岩上简划到甲骨刻痕，从先秦统一文字，到五四白话改革，一以贯之，训诂千年坚守，使阐释成为可能。无论从历史，还是从逻辑，我们都可以认定，不识字无书文，无训诂无阐释。阐释的起始，训诂为先。

第二，从目的说，通达义理。训诂是阐释的基础，是阐释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但阐释绝非训诂一途，不可停留于训诂。训诂方法繁多，基本取向是经典本义。在知识论意义上，是说明和实证已有知识。阐释本图大义，且先不论其真假对错，其核心取向是创造和发明没有的知识，并由此而区别于训诂。皮锡瑞说：“王弼《易注》，空谈名理，与汉儒朴实说经不似。”^⑥郭象本人也明确，阐释之目的在大义而非小节。注《庄子》鲲鹏之意时便说：“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夫庄子之大意，在乎逍遥游放，无为而自得，故极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适。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耳。”^⑦如简单以今古文学比照，古文经学认定“六经皆史”，当以整理古代史料为首要任务，偏重名物训诂，证明孔子是之所长；今文经学认定“六经致用”，当以通经致用为首要任务，偏重微言大义，发明孔子应为所是。两者虽有相互渗透，但阐释以义理发扬为本，非囿于字义训诂和形貌说明。当然，此类尚意之阐，不受阐释对象的束缚，一定会对原有经典之本义有所曲解甚至歪曲，但是，它创造新哲学概念和命题，赋予经典以新的时代性和生命力。义理通达乃阐释最高目的。

①[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十二篇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88页。

②[梁]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376页。

③[清]阮元校刻：《周易正义》卷六，《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7页。

④[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卷一之一，《十三经注疏》，第269页。

⑤参见张江：《“解”“释”辨》，《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期。

⑥[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63页。

⑦[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一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页。

第三,从具体操作说,体用兼备。在完备的阐释学体系中,训诂与阐释不可偏废,但就具体的阐释活动而言,阐释主体不必是全面的,每一次的阐释活动更不必求全责备。或偏重训诂,或偏重阐释,以至穷极一生,均无不可。前者如许慎、段玉裁,后者如王弼、康有为,都可为阐释学发展有大贡献。但是,完备的阐释学体系不可偏废任何一方。一种观点认为,当代西方阐释学已是本体论形态,方法论的追求应该淘汰。此论有失公允。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相互关系无需在此讨论。作为完备体系的阐释之学,方法论是必须具备的核心要素。以知识论的观点看,任何一种知识体系能够被广泛接受,一要可靠,二要能用。它要有本体论的表达,即此知识所表征的对象为何物,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如此本源认知相对清晰,此为可靠。它要与方法论适洽,以方法论所赋予的路径、规则、范式为准,获得更广大的新知识,此为能用。作为完备体系的阐释学,之所以完备且能成其为学,从大的框架说,本体论与方法论当应皆备。古今中外,史上由训诂而义理,由诠释而阐释的成功范例很多。由此路径,为训诂开辟广阔道路,为阐释扎下可靠根基,训诂阐释学的建构意义正当合理,学科方向定位明晰恰切。

三、系统方法

训诂阐释学之为学,应该具备学科自身的方法论基础及相对完备的方法体系。阐释立足于训诂,训诂达及阐释,既要有训诂的方法,也要有阐释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两种方法的交叉融合与合理运用。中国古代的训诂方法丰富多样。在字词本义的认证上,以形索义、因声求义一类的方法早已成熟,至于作为诠释或解释的基本方法,古代学人多有创造,诸如说解、传注、章句、注疏,以及由此而涉及的文字学、考据学、文献学、金石学等等,为后世所标举。诸多经典体式,譬如“诂训传”体,以毛亨《毛诗诂训传》为代表,后人总结:“《毛诗》在解释体式上,既有‘诂训’二体,可以从文本出发,作语言解释,使整个解释建立在可信可靠的基础上;又有‘传’体,可以从现实出发,作心理解释,使整个解释能阐发出文本所蕴含的义理。而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毛诗诂训传》的作者们还努力使‘诂训’体与‘传’体有机结合,形成新的‘诂训传’解释体式。”^①总体上说,中国古代训诂或诂训的方法比较丰富和完备,为训诂阐释学奠定了深厚基础。阐释义理的方法总结,似乎比较薄弱,起码未如训诂方法那样多样完整,但实践经验及其累积同样丰富而深厚,为阐释方法的一般概括和提炼,准备了充分条件。从基本理念上说,所谓“诗无达诂”“得意忘言”,为无源头、无标准、无约束的义理阐释提供了强大辩护。在具体方法上,以下几点可资讨论。

第一,立旨为先。义理之阐,立旨在先,寻证为后。旨主其证,证从其旨,亦可谓旨为证之领,证为旨之仆。如此路径,优长在阐释主体有明确、清晰的理论标的,意向坚定,路径简洁,可以作超越文本的广大判断。此为阐释扩张的基本纲领。所谓创造,立旨既是方向,亦为动力。王弼、郭象,二程、朱子,康有为、廖平,皆因此道而独立一方。

第二,不任其辞。阐释非训诂,不拘一辞一句,为求大道,可脱离字辞,“出于其外”,达于至理。此为阐的基本手段。同为《春秋》释本,左丘明以史说经,重在本事。董仲舒志在“大一统”,破《春秋》通辞,从变而移,于定辞之外生出辞句未有之意,“然后可与适道”,^②为义理之阐另辟新途。

第三,弃言悟意。始如《周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③再如《庄子》“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④于是,阐释不可尽信于言,弃言悟意,便是正理。至于佛学,“故知圣道幽通,言诠之所不逮;法身空寂,见闻之所不及。即文字语言,徒劳施設也”。^⑤由此,抛弃文本,面壁顿悟,便

① 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84-185页。

②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1页。

③ [清]阮元校刻:《周易正义》卷七,《十三经注疏》,第82页。

④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五中,第495页。

⑤ [唐]净觉:《楞伽师资记》,《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册,第1286页。

可生意。其意在脱离文字，任从顿悟。

第四，时情交移。理解是时情框架规定的理解。经典文本生于前代，前代世情决定文本为此文本。著者为世情所染而言而文，自有其定向之意。后来者阐释，借文本立旨，将此时情交移于彼时情，将此时情规约之感悟赋予彼时情之生成，并以此为彼时情文本之意，达及阐释目的。用当代语言说，交移时情乃变换语境。文本意义是确定语境下的意义。语境确定，意义确定。变换语境，意义必有改变。文本的广义理解，意义的生成，由语境决定。义理之阐，旧文新理解，皆为语境变换所起，由此新意成为可能。时情交移，是阐可为阐本根之法。

第五，诗史共意。此处称史代表文学以外的其他各科，譬如，经、史、子部，包括以《诗经》证史及尚意。孟子言：“《诗》亡然后《春秋》作。”^①于是，诗与史互为表里而利用，史、诗共意，进而以诗史互证，以诗证理，便为正途。以史证诗，为诗的理解与阐释提供历史背景与证据，可视为大的训诂手法。以诗证史则为另途。诗及一般文学文本，与经与史有本质差别。以诗证史，诗歌不再是虚构的文学文本，不复是想象与情感的艺术载体，而被当作真实的历史事实与记录，为史、诗共意开辟新途径。如此，以诗为史，即以想象虚构历史；以诗证理，为义理之阐敞开大门，以至成为传统。著名者有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为后妃之德。^②

上述训诂与义理方法各有长短。训诂阐释学力主将两者之方法系统组织起来，实现两种方法的互补互证。此种取向，历史上多有成绩。经学大师郑玄就是一例。郑玄本于古文经学，遍注群经，是为训诂之“诂”；与此同时，他贯通天人古今之道，阐发礼乐文明要义，又是义理之“阐”。郑玄经学的历史价值，源于对训诂与阐释的融会贯通。朱熹既重训诂更重阐释：“若不从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处；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论，不于身心上著切体认，则又无所益。”^③朱熹强调并践行了二者结合且由训诂而入阐释的正当路径。至于戴震，于此更是大进一步。其言：“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离词则舍小学故训无所藉，辨言则舍其立言之体无从而相接以心。”^④此论已是方法论层次的总结与提炼，当为训诂阐释学系统方法的可靠参照。

由此看来，训诂阐释学系统方法的建构，首先要全面客观地总结中国古代训诂与义理两者的思想与思维方法，在深厚广大的实践经验中，找到具有一般意义的规则或规律。同时，要比较西方古典学、阐释学的经验，学其优长，在比较和借鉴中不断有所成就。主张训诂，不是要简单回到训诂，也不是停留于戴震，而是要推进训诂的现代化及其有效应用，为训诂发展注入活力。

四、学科素养

学科建设，以学科为中心展开研究、培养专业人才，必须注重学科素养的培育和养成。所谓学科素养，是本学科学习和研究者应该综合理解把握的学科主旨与学理品格。有此素养以至素养丰沛，学习和研究方有动力基础和进步可能。训诂阐释学的学科素养，除了包含普通的古代文学、史学、经学，以及必要的哲学和逻辑素质外，我们特别强调此新学科应当具备的三个特殊素养。

第一，训诂精神。训诂是一种精神。其基本构成是，真理性、确证性、创造性的不懈追求。上千年的训诂史，一切进步皆以此为动力，皆因此而有所作为。其一，真理性。此为认识论问题。训诂由求真而起。孔颖达对训与诂的定义，就是求真。所谓“通古今之异辞”，就是寻求异词同义，异形、异音同义相符，与符合论的真理论一致。所谓“辨物之形貌”，就是说解文献中名物词的真实样貌，使人之认识与对象形貌一致，亦为符合论的真理性追求。对古代典籍的诂训，“以意逆志”的指归，求的亦是立言本真。如此真理性追求，在哲学认识论上以可知论为基点，即接受和相信世

①[清]阮元校刻：《孟子注疏》卷八上，《十三经注疏》，第2727页。

②[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卷一之一，《十三经注疏》，第273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35页。

④[清]戴震：《沈学子文集序》，《戴震文集》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5页。

界是可知的，人类有能力充分展开自己的理性，实现或趋近对世界包括精神世界的确当认知。这是训诂之所以有，之所以在的根本。坚持真理性认识，以实事求是而自律，此为训诂精神之第一要义。其二，确定性。此为语言观问题。两种不同的语言观，“言尽意”与“言不尽意”一直对立相抗。训诂者相信，言能尽意，古字异音皆可考证认知，并由此而知字、音之本义。多义之字，在确定语境下，有确定之义，在整体章句中，确定之义的字词，有确定之意。这看起来似乎有些偏执。但训诂学认为，文字创造本身，其目的和作用皆以确定性可能为基准。我们为什么造字？造字的目的就是要将确定的意义确定地表达出来。因为理性能力限制，原始文字简单粗陋，历史进步了，文字丰富多义，但多义的本质和生成动力，亦是为了确切表现和传达确定的认知。确定性精神，是文字内蕴的本来精神，从于此事业的训诂，当然执着并成就于此。其三，创造精神。一般认为，在意义阐释上，训诂落于本义再现，且常常陷于破碎繁琐，少创造精神。但此仅为一面。整体上衡量，训诂自有其创造，且因为创造，训诂才有今天。回头看训诂历史，训诂的方法不断地有所进步发明。训诂学的萌芽，最早生成于东周。其训诂不过是古代文献中偶然出现的训释形式。而至战国秦汉，可以《尔雅》《说文》为代表，系统的、完整的注释书和训诂专书出现，训诂方法已渐丰富。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及至清代，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派，将训诂方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理论化、体系化进步明显。20世纪初，章黄学派确定了训诂学以形训、声训、义训为主要内容的训诂学框架，训诂学以汉语语文学的面目走进现代。新世纪以来，在训诂及语言学界的努力下，古老的训诂学发生巨大变化，新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出现，特别是对大数据方法的采用，使训诂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创造精神当是训诂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训诂阐释学应该坚持和发扬光大的精神。训诂精神的养育，是新学科建构与展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

第二，公共自觉。阐释是公共的。阐释以实现其公共性为目的和价值标准。训诂是阐释的重要方式，其有效与合理性，同样以公共性实现程度为鹄的。如此，公共自觉当是训诂阐释学的基本学科素养。阐释之公共性内涵丰富而广大。^①从学科建设的意义说，公共自觉重在方法上的相互汲取。其一，就训诂学说，自觉的方法公共，既将训诂方法更广大地推向原有领域以外，为一般的阐释行为所接受，并逐步成为阐释的基本思维方式，又掌握和运用义理方法为训诂所用。义理方法第一条就是“立旨为先”，诸多阐释经常因此而陷入“强制阐释”而难为共识。乾嘉学派对汉学承继与兴盛贡献甚大，其代表人物戴震，训诂考据以“实事求是”为纲。然而胡适却另外指出：“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②这与立旨为先的义理方法一致。由此启发，自觉方法的公共，就是各种有助于“使人信仰”的方法都要尽力采纳，不应该偏执地独为一统，拒采其他有效方法，对最终达及阐释的训诂而言，此尤为重要。其二，就阐释学说，特别是因当代西方阐释学之影响，阐释对训诂的疏离，阐释落于无根据的概念推演，注重汲取训诂的理念和方法就显得更加重要。清代训诂力求“公论”，主张“不以一己之意为是，而必求诸古今之公论”。^③在钱大昕及乾嘉学派看来，所谓“公论”与“私意”区别甚大。欲求公意，戴震主张“十分之见”，即“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反对“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④以此而保障其阐释为公共接受。义理或阐释应该汲取和融汇训诂理念和方法，使阐释建立于可靠的训诂基础之上。其三，就训诂阐释学而言，训诂与阐释方法非完全对立，而是相互依存且相互转化。如何转化？训诂与阐释的循环是转化

① 参见张江：《公共阐释论》，《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

②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74页。

③ [清]钱大昕：《虞东学诗序》，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9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359页。

④ [清]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戴震文集》卷九，第141页。

并促进提高之正途。从起点与终点的关系看，训诂是起点，阐释为终点。清代有人表述为训诂一义理一得道。这只是一个具体阶段的描述。实际的阐释过程，是三者总体相互渗透，循环往复，螺旋上升，不会停留在某一环节而不前。阐释的循环，是西方阐释学的核心概念。中国古代的训诂循环，由字而辞，由辞而句，由句而章，循环往复，互文互证，已是惯例。扩而张之，由训诂而义理，由义理而得道，同样是循环往复的无限过程。每一次回复不是简单地回到原点，而是由道看义理，由义理看字辞，新的理解不断生产，阐释不断上升，阐释的公共性得以实现和扩大。重要的是把握循环的本质意义，自觉地推进循环。

第三，范式意识。范式有多种表述。此处就学科共同体一致认可和接受的模型或模式，对训诂阐释学的范式意识作简单讨论。训诂阐释学，作为以方法为主要取向的新学科，范式建设就显得特别重要。针对学科基本建构讲，共同认可的范式，是散漫理论集中为学科的重要标志。没有可靠的范式起点，就没有学科建构的完成。针对学科本身的进步能力讲，可以引导学科以正确的方向稳步前进，而少犯路径错误，增强解决学科重大问题的核心能力。进一步的难题是，训诂阐释学既要解决两个学科本来需要解决的问题，也要解决学科融合以后共同面对的问题，没有新的共同范式，以及从理念到方法的系统建构，就难以发挥新学科的作用，训诂与阐释依然各行其道。学科交叉融合，首先是新范式的建立。其一，基本理念的整合。训诂和阐释均有本学科的习惯理念。训诂偏好于向内集中思考，找到事实证明的确凿点，把握片断本真。阐释倾向于向外发散思考，放弃片断及细节，抓取义理可能的爆发点，扩张精神可能。两者融合一体，共用所长，由此而既有训诂的扩大，又有阐释的可靠，此类理念应为曾经各自远离的学术共同体所一致接受。其二，一般性方法。诸如，前面提到的立旨在先，认证在后的思维与运作方式，胡适定义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前者为义理阐释的上手方式，后者为训诂的中心方法，如此结合，可否成为共同接受的一般方法？同是《春秋》释本，左丘明与董仲舒显著不同，训诂阐释学如何综合与归纳，形成具有一般意义的模式与方法？其三，核心概念的归纳与证明。学科话语框架以自己完整的概念体系为支撑。这有两个问题。一是，概念的提炼。中国古代训诂与阐释经验丰富，但独立的概念，尤其是义理阐释的概念，总结归纳不多，需要下功夫梳理和再建。二是，古代概念的现代化。最基本的是，如何以现代汉语无歧义地清晰表达。很多概念，譬如，“坐忘”“虚静”“涵泳”“浹洽”，等等，都是极具当代阐释学价值的概念，但在现代汉语中很少出现，对当代人而言极为陌生，简单用来，很难推广。

训诂阐释学还是一个初步的学科概念，其完整建构与有效应用道路漫长。我们能够把握的一点是：这是一个有前途的设想。它是一个综合性学科，是人文学科，即哲学、历史、文学，完型一体的新理念、新方法。分类研究当然重要，但人文研究，其基本理念和方法的交叉、渗透、融合，是当今人文学科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根本出路。当代阐释学本身就以此优势为长，与具有传统优势的训诂学相互支撑融合，打造新的训诂阐释学，其合法性可靠，其实践性可能，其成功性可期。

责任编辑：王法敏

哲 学

·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 ·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基本问题

——重读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

王荫庭

[摘 要]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史上，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最重要的理论成就是以完整的形式提出了有名的五项式论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普列汉诺夫关于五项式各项之间相互关系以及构成五项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论述，极大地扩展了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同时，五项式论为唯物史观社会结构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可以作为未来社会结构学的总纲。普列汉诺夫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唯一正确的名称，其理论依据来自黑格尔的广义辩证法。

[关键词]普列汉诺夫 《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 五项式论 辩证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2)12-0024-06

列宁写过一篇文章叫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以下简称《基本问题》)一书谈马克思主义只涉及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得也远不周全，就是对辩证法少数几个重要问题略做论述，对认识论则点到为止。如果把普列汉诺夫这本书的书名改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基本问题》，就切题了。

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史上，《基本问题》最重要的理论成就是以完整的形式提出了有名的五项式论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唯物史观按现在的学科分类是由两个学科，即作为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唯物史观和作为历史哲学的唯物史观组成的。一般社会学理论由社会结构学、社会发展学和社会发展动力学组成。而历史哲学则是由适当的一些哲学范畴在历史中的运用所构成的一个严谨的系统。一般社会学理论三个组成部分中，现今发展得相对充分的是社会结构学。

一、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式论

我国现行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有一个明显的矛盾。教科书一开始将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为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而全书的内容基本上讲的是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规律几乎没有讲什么。比如对生产力是怎样发展的、政治制度是怎样发展的等等未置一词；对国家的发展也只讲了一头一尾：国家的起源以及国家的消亡，而中间一大截国家是如何变化发展的没有讲。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首次提出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

作者简介 王荫庭，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系教授(江苏 南京，210003)。

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

1893年，普列汉诺夫在《唯物主义史论丛》中发展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上述原理，提出了五项式，但他觉得这个五项式并不很完美。他在1908年发表的《基本问题》中正式提出完整的“五项式论”。他把影响历史发展的各种社会力量概括为五项公式：（1）生产力的状况；（2）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3）一定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4）部分由经济直接决定、部分由生长在经济基础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5）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他提出这个公式时特别做了三点重要说明。第一，这个公式十分广泛，对于历史发展的一切因素都可以给予相当的位置。第二，这个公式只从起源方面对五种社会因素做了规定。其所以如此，目的在于反对折中主义，强调唯物史观的一元论性质。第三，这个公式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见解的进一步“说明”。^②普列汉诺夫提出的这个五项公式，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容的完整的理论。在他前后写的许多哲学论文中，都对这个理论做了各式各样的补充和说明。

笔者在拙著《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第六章中用六万多字的篇幅对这个完整的理论做了比较详细、系统的转述。这里仅就普列汉诺夫有独特见解的地方以及在现今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没有得到反映的要点概述出来。普列汉诺夫认为，在五项公式中，在先的一项对在后的一项有起源关系；在后的一项对在先的有派生关系，也有反作用和相对独立性。每两项之间甚至多项之间都会发生相互作用，而且各项内部诸构成要素之间也都会有相互作用。当两种要素或多种要素相互作用同时发生，有同一项要素叠加时就会产生有名的中介环节理论。如经济关系影响政治上层建筑，同时政治上层建筑又影响社会心理或思想体系。这时经济关系通过政治制度这个中介影响社会心理或思想体系。这种影响与经济关系直接影响社会心理或思想体系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这就是有名的中介环节理论。中介环节论，是以五项式中两项或多项之间相互作用，以及派生项对起源项之反作用和相对独立性为前提的。

生产力的作用。生产力在马克思社会结构体系中始终占着中心的位置。它不仅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是一切社会关系或社会的一切方面的基础，而且是人类历史过程的原动力和形成力，是一切社会因素发展变化的最终决定力量。关于生产力本身的构成要素，普列汉诺夫继恩格斯之后认为，除了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之外，还应加上生产动力。

两种生产关系。普列汉诺夫认为，在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的不止是一种生产关系，即通常所说的所有制关系或财产关系，还有一种劳动组织关系，即与所有制关系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联系最直接最紧密。它一般是与生产力的发展并行发展，与生产力的变化并行改变。它不会长期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不会像所有制关系那样可能长期落后于生产力的变化，以致引起社会的变革与革命。这种生产关系在马克思《资本论》中也有论述，在马克思那里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普列汉诺夫讲的这种生产关系是作为唯物史观的范畴。

两种经济基础和两种上层建筑。普列汉诺夫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出经济关系作为社会的基础。而把其他社会设施、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意识归结为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上层建筑。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还有另外一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写道：“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的基础”。^③这就是说有两个“基础”，一个指全部生产关系的总和，另一个则进一步包括生产力。普列汉诺夫认为，这两个定义都是对的、有益的。前一种经济基础可以认为是狭义的，后一种可以认为是广义的。在前一种经济基础上耸立的上层建筑都具有阶级性。建立在后一种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其特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②《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195-19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0页。

点有的有阶级性，有的没有阶级性。在所有属于上层建筑的社会制度、社会设施中，普列汉诺夫认为起决定作用和主导作用的是政治制度。

普列汉诺夫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理论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社会意识分成两种基本形式和两个发展过程。两种基本形式是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普列汉诺夫所谓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是指特定时期特定民族或特定阶级、阶层广大群众中间普遍流行的、自发产生的、没有经过系统加工整理的精神状态，包括现实社会生活使他们产生的以及从传统中获得的各种感觉、情绪、理想、愿望、要求、信念、观点、习惯、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等。简言之，社会心理就是人们的日常意识。而思想体系则是或多或少概括了的、系统化了的社会意识。即由思想家、学者、文艺家等一些特殊阶层的人物加工改造过的社会意识。

两种心理。一种作为自然科学的心理学上的心理，另一种是作为一般社会学的唯物史观上的心理。普列汉诺夫对此做了明确的区分。他说：“就人的心理是生物进化的结果而言，它是生物学的研究对象，而不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学同这个心理发生关系，只是因为它的发展是在人类历史进化过程中实现的。”^①可见，他把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人的心理同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人的心理明显区分开来了。他所谓社会心理学和今天作为自然科学的“普通心理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学科。后者所研究的人的心理，基本上是超阶级、超民族、超时代、超历史的。这种研究当然也有意义，也是必要的。但历史哲学所要探讨的并非这种超时空的一般心理，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心理或社会人的心理。

作为社会意识的两个基本过程：一方面由适合心理“系统化”“纯化”“概括”“蒸馏”或者说“氩氦化生”为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则由思想体系“灌输”“普及”“扩展”或者说“凝冻积淀”为社会心理。而且无论在前一过程或后一过程中，由于社会分工不同，知识分子都起着决定性的“霉菌”作用。

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本身都有三个要素，即认识因素、价值因素和职能因素。

普列汉诺夫认为：“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②当普列汉诺夫提出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共同根源这个思想的时候，完全是就一定的有限的范围说的。这个范围便是人类精神现象。他从来不认为社会心理是“最后的根源”。对于黑格尔和泰纳等人把“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当作“最后的原则”，或者把“环境”当作“最后的靠山”，他总是坚决地加以驳斥。他始终不渝地论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包括思想体系和社会心理在内的一切意识现象都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或者说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普列汉诺夫最大的功绩之一就是根据西欧和俄国思想史上大量的事实材料，具体而深刻地研究了适合存在决定思想体系这一原理起作用的范围、性质、程度和规律性。

普列汉诺夫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了经济对思想体系的这种作用。第一，思想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和前提。社会必须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才能抽出一定的人手从事各种科学工作，任何一种新体系的出现都要求某种程度的知识积累，这种积累必须以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前提。第二，思想体系的内容和性质。为什么以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为代表的古代希腊经济科学如此不同于以亚当·斯密或李嘉图为代表的近代资产阶级经济科学呢？因为古代生产关系不同于近世生产关系。第三，社会内脑力工作的方向。某个思想家、艺术家或某一流派正好对这些概念、问题、方法、倾向发生浓厚的兴趣，而对另一些概念、问题、方法、倾向则漠然置之或予以抨击，其原因只能到社会状况，特别是生产关系状况中去寻找。“思想体系的历史，大部分要以观念结合的发生、变更和崩坏来解释，而观念结合的发生、变更和崩坏则是受一定的社会力量结合的发生、变更和崩坏的影响。”^③

总之，普列汉诺夫关于五项式各项之间相互关系与构成五项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是十分丰富和详细的。它极大地发展了唯物史观社会结构学，也极大地扩展了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①《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4卷，第240页。转引自王荫庭：《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311页。

②《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96页。

③《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第290页。

二、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贡献

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式论，虽然也有缺陷，有待进一步发展。但它为唯物史观社会结构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可以将五项式看成未来社会结构学的总纲。普列汉诺夫在社会结构学方面的另一个功绩是，他揭示不能停留在社会平面结构的分析上，而必须进一步分析社会的立体结构。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中大部分内容都是讲唯物史观的，而在讲唯物史观的著作中很少不提及地理环境对社会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对地理环境在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有许多卓越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中相对完整的理论系统。这些论述应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发展过程中重要的里程碑。首先普列汉诺夫把地理环境对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成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是地理环境作为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外在条件，另一方面是地理环境诸要素作为不断参与各种社会变化的内在要素而影响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在前一方面普列汉诺夫根据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把地理环境作为“人类历史的地理基础”，并把它分成三类：1. 干燥平坦的高地，连同它广阔的草原和平原；2. 大河流经的低平谷地；3. 直接毗邻大海的沿海陆地。^①例如，第一，高地，蒙古民族在蒙古高原千百年来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狩猎游牧生活；第二，平原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居民长期都过着农耕生活；第三，海岸区域，英伦三岛等以及沿海岸居民则以经商为主。普列汉诺夫认为，地理环境的某个或某些要素对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影响，取决于该要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定社会结构的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所处的位置不同，其作用也就两样。所以，地理环境诸要素对不同时代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要么决定社会发展，要么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这么简单的作用。在这里，他提出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一条基本原则，即地理环境是在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过程中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这种作用的性质、方向、范围、速度、复杂程度等等都是由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决定的。换句话说，“地理环境对于社会人类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被地理环境的特性所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人类控制自然的权力，因而使人类对于周围的地理环境发生了一种新的关系。”^②简言之，地理环境的这种作用是生产力的“函数”。这是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基本原理。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首次明确地提出了这条基本原理。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唯物史观的著作中对地理环境作用的论述是相当充分的。首先，他经常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经典论述作为依据。其次，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大量引证已出版的民族学专家和旅行家们的专著，记述某某民族在某个历史时期遇到怎样的地理环境，所处的地理环境发生什么样的作用，并对作者的论述进行点评。在《基本问题》中普列汉诺夫引证前人和同时代人的专著非常之多，在论证地理环境的作用时，他从不抽象地、一般地议论地理环境的作用，说什么地理环境不能决定社会的发展，只能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因为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发展和作用是多种多样的，即使就一般观点而言也远不止是决定、加速或延缓三种作用。普列汉诺夫对地理环境的分析也有缺点和不足之处。首先，他没有注意到今天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恶化问题。这也由于他没有看到当时尚未公开发表并对这个问题已有许多论述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普列汉诺夫著作对环境恶化问题丝毫没有提及，这是一大缺点。其次，他也没有注意到，地理环境构成要素之一的动植物区系中微生物对人类的伤害。鼠疫（即黑死病）在人类历史上曾发生三次大流行，死亡的人数以千万计。黑死病流行期间，许多城镇和农村居民大部或全部死亡，余下居民也逃离家园，城乡空无一人。这里的社会也就从地球上消失，或者这个社会的发展就会处于停滞状态或倒退若干年（中国历史上某朝某代在某些地区曾发生严重的天灾如旱灾、水灾或虫灾等造成粮食绝收，当地居民生存环境恶劣，也会产生上述情况）。

^① 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132页。另外，参见普列汉诺夫：《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普列汉诺夫文集（第3卷）·唯物主义史论丛》，王荫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309-311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70-171页。

普列汉诺夫在《基本问题》中谈到，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斯宾诺莎主义。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权威哲学家米丁曾写了一篇文章，专门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斯宾诺莎主义”。后来，普列汉诺夫这个观点，一直受到许多苏联哲学家的攻击，对我国理论界也有影响。笔者在《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第三章详细地分析了这个问题，强烈地批判了米丁们的攻击。普列汉诺夫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斯宾诺莎主义，其实质指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唯物主义”。我们肯定普列汉诺夫上述命题的正确性，并不意味着要求现在的我们仍然必须保留他的这种表达方式。因为任何一种表达方式，不仅有它的时代性，有它的特殊语境，而且也取决于表达者个人的一些特点。

三、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哲学的正式命名

最后，谈一谈表面上似乎与《基本问题》一书内容无直接关系，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即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唯一正确的名称。19世纪90年代中，正当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声名鹊起时，他就提出马克思哲学正式命名的问题。他说：“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它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①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提出以后，很快就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并在全世界流行开来，几乎没有人表示异议。但普列汉诺夫提出的“唯一正确的”说法却没有人再提及了。更没有人进一步追究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名称的理由，普列汉诺夫本人也没有公开的解释。也许他认为这个说法是自明的；也许他认为既然辩证唯物主义迅速地为广大读者接受，也就没有必要再谈“唯一正确的”道理了；也许他认为把黑格尔用唯心主义语言说的那个道理用简明通俗的话表述出来，一时感到有些麻烦。

实际上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有广狭二义的。而普列汉诺夫关于“唯一正确的”道理就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广义上。如果问中国的大学生何谓辩证法，他们差不多都回答：辩证法就是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小册子中讲的那四条，即与形而上学相反的那四大特征。如果再问：还有没有呢？回答也都会是：没有了。因为，教科书里没有多写，老师在课堂上也没有讲更多的东西。这些回答对不对呢？也对，也不对。说对，因为斯大林的辩证法观点来自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也来自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参见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与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第四章“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哲学篇”中所论述的这些辩证观点又完全来自黑格尔的《逻辑学》。而且，恩格斯把《反杜林论》写成后，曾经从头到尾念给马克思听，得到马克思的首肯。说它不对，是因为斯大林的观点只涉及黑格尔辩证法的狭义，另外还有一种广义没涉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和西方哲学史上，从来没有人说黑格尔哲学辩证法有广狭二义。大家都不知道辩证法还有什么广义和狭义。

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完全由于偶然的機會——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著作，并把它们当做礼物送给了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能够理解。”^②马克思这里说的科学研究方法就是辩证法。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研究方法。很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在《逻辑学》一书中用较长篇幅阐述的那个辩证法用简明的语言转述出来，让大家都充分了解。

后来，列宁在《哲学笔记》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在一定程度上完成马克思未完成的写作任务。为什么说在一定程度上呢？因为如果马克思写成了这篇文章，跟列宁的十六要素是完全一样，还是大体一致，或者相差远一些呢？现在很难说。也许有更多的要素如十七、十八要素或者是较少的要素，也可能具体要素的内容不完全相同，因为马克思毕竟没有写成该文，这就只能靠猜测了。黑

^①《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76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0页。

格尔的《逻辑学》并不容易解读清楚，但列宁的解读大致不会错，即使有些出入也错不了太远。有一点可以肯定：马克思和列宁对黑格尔辩证法广狭二义的理解基本上应该是一致的。列宁的《哲学笔记》出版以后，十六要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流行开来，但是从来没有人指出这十六要素包罗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广义和狭义。首先，列宁的十六要素比斯大林的四大特征从数量上说多了三倍，从内容上说十六要素中许多要素与四大特征完全不同。四大特征讲的是与形而上学相对立，而十六要素中有好几条则是形而上学者与辩证法家共同赞成的。就第一要素“考察问题的客观性”来说，比如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是辩证法家和形而上学者都承认的，并不对立。列宁的《哲学笔记》公开发表半个世纪以来，黑格尔辩证法有广狭二义，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得到学术界的确认。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黑格尔广义辩证法：“由于它〈环节〉，最初的一般性（一般概念）从自身中把自己规定为自己的他物，——应当叫作辩证的环节。”^①

《苏联哲学百科全书》以及张世英主编的《黑格尔辞典》等书中的“辩证法”条，对黑格尔“辩证法”概念的内容做了非常详尽的论述，既有广义辩证法的内容，也有狭义辩证法的内容。就广义辩证法而言，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辩证法自我发展中的概念。”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所谓的“概念”，用唯物主义语言说就是客观世界。苏联著名哲学家约夫楚克曾把黑格尔的这个辩证法定义用唯物主义语言解读为：辩证法是客观世界的相似物。可以说，约夫楚克的解读是正确的。可惜约夫楚克的这个观点在苏联哲学界似乎没有任何影响，在笔者阅读过的所有苏联哲学著作中既没有人表示同意，也没有人反驳。对约夫楚克的这种说法，我们认为：客观世界有什么规律、原理或基本特征，辩证法就有什么规律、原理或基本特征；客观世界有多少规律、原理或基本特征，辩证法就有多少规律、原理或基本特征。客观世界发展了，对原有的某些规律或基本原理进行了某些修正，辩证法也就进行同样的修正。换言之，任何时候客观世界有什么，有多少规律、普遍原理或基本特征，这些规律等都是辩证法的要素或“辩证的环节”，都是辩证法的。总之，辩证法就是同客观世界一样的东西。

普列汉诺夫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唯一正确的名称，其道理就是建立在黑格尔辩证法的上述这个广义之上的。这样，普列汉诺夫就合乎逻辑地声称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唯一正确的名称。

再讲一件真实的、非虚构的故事。列宁在批判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政论时说过：普列汉诺夫有一个习惯，老说他提出的策略都是合乎辩证法的，实际上许多都是违反辩证法的典型。笔者翻译过普列汉诺夫几乎全部受到列宁严厉批判的反面政论文章。翻译时总记得列宁的这句话，翻译过程中一直注意普列汉诺夫在政论文章中什么地方说他的文章是辩证法的，结果一无所获。难道列宁说错了吗？难道他会无中生有地说这句话吗？不可能。列宁这句话的来源，估计应该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旧《火星报》编辑部共同工作的三年多中听普列汉诺夫口头说的。每当列宁或编辑部其他工作人员对普列汉诺夫的策略提出疑问时，他就会说：我的策略符合辩证法。普列汉诺夫为什么说自己的策略是辩证法的，而不说是正确的、科学的？因为如果说正确的、科学的，就会显得粗俗和直白，缺乏格调；而辩证法一词显得委婉、高雅，有学者风范，并使对方一时难以反驳。这也符合普列汉诺夫特有的性格。再者，他特别欣赏黑格尔对广义辩证法的理解，认为很宏伟、很气派。所以他经常在谈话中用辩证法代替正确，代替科学，代替真理。这个故事表明，普列汉诺夫对广义辩证法和黑格尔有着同样的理解。

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②如果我们确信、牢记并在实践中坚定地贯彻黑格尔广义辩证法这个观点，经过一百多年来科学的演进，辩证唯物主义一定会不断逐步实现恩格斯这个预想的结果。最后，再说一遍黑格尔广义辩证法观点：过去、现在、未来科学确立的一切一般规律、普遍原理、基本特征或都是辩证法的要素，都是“辩证的环节”，都是辩证法。

责任编辑：罗 苹

^①《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4页。

马克思关于特殊性—普遍性的辩证法

——兼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

陈广思

[摘要]如果说黑格尔辩证法具有“普遍性—特殊性”（以普遍性为原则支配特殊性）的结构，那么马克思辩证法则具有“特殊性—普遍性”的结构。它从特殊性、历史性和具体性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事物，以此批判现实的虚幻普遍性，揭示其特殊性的根源和对现实“有害的统治”，并结合历史运动的规律寻求真正的普遍性。马克思辩证法的这种结构，通过剥去黑格尔辩证法“普遍性—特殊性”结构的神秘外壳，提取它的合理内核的方式，实现了对它的“颠倒”。

[关键词]特殊性 普遍性 辩证法 颠倒 黑格尔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2）12-0030-08

特殊性（Besonderheit/particularity）和普遍性（Allgemeinheit/universality）是一对富有辩证关系的哲学范畴，它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构成了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要素。区别这对范畴在这两种辩证法中的不同地位和含义以及对它们的内在结构的影响，对于理解马克思辩证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可以为我们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一、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普遍性—特殊性

黑格尔辩证法给人的深刻印象之一是：“黑格尔的普遍概念似乎总是‘主宰着’特殊性、行动能力和偶然性，同质的精神由于把差异和物质性逼到历史的幽暗深处，才得以创造了一个辩证法。”^①这句话不甚确定的话表达了黑格尔辩证法以普遍性支配特殊性（“普遍性—特殊性”）的结构。在黑格尔辩证法中，相比于特殊性来说，普遍性是绝对第一性和优先性的，它同时包含着同一性逻辑和观念性逻辑。关于同一性逻辑，黑格尔说：“普遍性，这是指它在它的规定性里和它自身有自由的等同性。”^②普遍之物是单纯的东西在自己的否定性中保持着自身的存在。绝对精神使自身对象化为外物，进而又扬弃这些作为它的否定物的外物，将它们当作自身的内在规定收回自身。这样，它在它的否定物（也即它的规定性）之中也就是在自身之中。这是一种同一性的关系。关于观念性逻辑，黑格尔说：“普遍性就其真正的广泛的意义来说就是思想”，^③“每一个观念都是一种普遍化，而普遍化是属于思维的。使某种东西

^{*} 本文受到中国人民大学 2021 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 陈广思，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北京，100872）。

^①〔加〕罗伯特·阿尔布瑞顿：《政治经济学中的辩证法与解构》，李彬彬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05 页。

^②〔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331 页。

^③〔德〕黑格尔：《小逻辑》，第 332 页。

普遍化，就是对它进行思维。”^①对黑格尔来说，只有思想才是唯一完全符合普遍性概念的东西，绝对精神是被客体化的思想，思想意味着对它的对象的观念化。凡是被思想所“思想”到的东西，都会转化为观念进入思想之中。思想因此对它的一切对象都具有普遍性。普遍性范畴的绝对同一性逻辑只有以它的观念性逻辑为前提才是可能的。绝对精神如果不是因为能够将它所有的否定物转化为观念，它就不能在它们之中保持自身，就不能实现绝对的普遍性。

在黑格尔辩证法中，普遍性范畴以它的同一性和观念性逻辑支配精神在运动过程中所有的特殊环节和特殊产物。特殊性既被观念化，也被同一化，成为绝对精神内在的多样性规定，与它保持着同一性关系：“特殊性，亦即规定性，在特殊性中，普遍性纯粹不变地继续和它自身相等同。”^②这是黑格尔辩证法“普遍性—特殊性”结构的必然结果。在涉及现实领域时，黑格尔往往将特殊性范畴与个人的感性冲动和主观需要联系起来讨论，认为“各个人的特殊性首先在自身内包含有他们的需要”，^③“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作为各种需要的整体以及自然必然性与任性的混合体来说，他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④黑格尔十分警惕这样一种“独立特殊性原则”，即主体的特殊性无限制地发展，甚至影响到社会秩序，使之转变为一种非理性的秩序。他说：“特殊性的独立发展是这样一个环节，即它在古代国家表现为这些国家所遭到的伤风败俗，以及它们衰亡的最后原因。”^⑤正因为特殊性原则意味着非理性的原则，因此无论在哪个场合，黑格尔都主张用普遍性原则来限制特殊性。如果特殊性没有被“吸取”到国家这样一些普遍性之中，那么它就没有得到合法化、伦理化，因此而作为“罪恶”出现。^⑥虽然黑格尔也强调不能压制或摒弃特殊性，认为理念的发展需要赋予特殊性“全面发展和伸张的权利”，^⑦但是特殊性的这种权利是在它们受制于普遍性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更根本地说，是在特殊性本身受制于绝对精神的同一性逻辑和观念性逻辑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特殊性并没有摆脱被支配的性质。

黑格尔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这些理解深刻地影响着早年马克思的思想。但在马克思逐步确立了他自己的哲学立场之后，他不仅不像黑格尔那样根据普遍性来理解特殊性，反而是从特殊性的角度来理解普遍性，并寻求作为特殊性之全体解放的真正普遍性。这是一种完全颠倒的做法。马克思这方面的思想富含辩证法的因素，并且本身就构成了他的辩证法的本质内容。

二、马克思：特殊性、普遍性及辩证法

马克思没有从思辨的或抽象的层面来讨论过特殊性和普遍性，对他这方面的思想的理解，我们需要结合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语境来进行。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一个重要的思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非普遍的，也不是永恒的，它只是人类历史中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它所具有的各种普遍性（资本的、政治权力的、上层建筑的或意识形态的）都不是真正的普遍性。进一步而言，每一种生产方式都具有历史性和特殊性，由此决定了每一个社会中现实的人与物都是历史的和特殊的，没有什么现实之物是真正普遍的。马克思的这些思想是我们理解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重要语境，从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他对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理解不仅在整体语境上区别于黑格尔，而且持一种完全不同于黑格尔所警惕的“独立特殊性原则”的特殊性原则。

（一）马克思：特殊性原则

关于马克思的特殊性原则，我们将从他在1868年致恩格斯的一封信说起。在这封信中，马克思说：“德文和北欧文中的Allgemeine[普遍](原译中的“普遍”为“一般”——引者注)不过是公有地的意思，

①[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2页。

②[德]黑格尔：《小逻辑》，第331页。

③[德]黑格尔：《精神哲学——哲学全书·第三部分》，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3页。

④[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97页。

⑤[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99页。

⑥[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83页。

⑦[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98页。

而 Sondereigen [特殊] 不过是从公有地分离出来的 Sondereigen [私人财产]”。^① 根据这段话来看, 公有地并不会因为它的一部分被分割出去成为私有地而丧失其属性, 因为公有地并不是因为是共同体(村庄、部落等)的全体土地才是公有地, 而是因为它代表了共同体才成为公有地, 它具有普遍的属性。公有地代表共同体这个事实的背后, 是它剥夺了诸多的私有地代表共同体的同样权力。公有地其实与被分割出来的那些私有地一样, 都是不完整之物, 都是构成全体土地的特殊性要素。但是, 其中一种特殊(公有地)通过在其他诸多的特殊(私有地)中发挥支配性的影响力而成为普遍, 而其他的诸多特殊(私有地)则在这种被支配的关系中将自身保持为特殊。由此可见, 普遍性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特殊性, 就其是通过支配其他特殊性的方式来获得这种普遍性而言, 它是一种支配性的普遍性, 而特殊性在其中则是被支配的特殊性。如马克思所说: “一切特殊的事物……本身都是受限制的。因此, 必须把它当作一种受限制的东西来对待, 也就是说, 受一种凌驾于它的普遍力量的限制”。^② 日本学者见田石介针对上述马克思的话也得出类似结论: “德语中所谓一般, 既不是特殊环节特性的平均或折中, 也不是指各方面的共通性, 同时, 更不是指这些特殊环节的质料和实体。从根本上说, 它是指实际存在的, 在特殊环节里赋予支配性影响的东西。”^③ 正因为我们能够认识到每一块土地的特殊性属性, 我们才能够揭示公有地的普遍性的虚幻性和它与私有地之间的支配关系。这里包含着从事物的特殊性出发来理解现实事物的原则。从这个原则出发, 我们也能够很快发现, 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普遍性也是一种支配性的普遍性, 而且他所警惕的“独特特殊性原则”本质上也是一种支配性的普遍性原则, 因为它主张的不过是一种独特的特殊性通过支配其他特殊性来获得解放和伸张的权利。

那么, 当我们通过马克思认识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之后, 怎么理解那种真正的, 以及既不支配其他特殊性也不被其他特殊性所支配的特殊性? 我们从黑格尔下面这句话说起: “特殊性的东西也正是使自己同在自己之外的他物相关联。”^④ 换言之, 如果一种特殊性要始终保持自身的特殊, 那么它既需要在自身的实存中始终中介着这种作为它的否定物的“他物”, 但同时也要时刻保持着与“他物”的差异或区别, 既要避免被“他物”所支配, 也要避免支配“他物”, 总之就是要避免它与“他物”的区别性发展成新的同一性(黑格尔的特殊性概念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此而言, 真正的特殊性的概念要义是一事物在自身的实存中始终中介着自身的否定物, 它的存在本身是被他物所中介的存在。

马克思虽然没有从纯粹概念分析的角度讨论过真正的特殊性的概念, 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包含着一种能够反映这个概念的特殊性原则。马克思在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来批判资本主义时, 确立了这样一种深刻的哲学立场: 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是特殊的, 即都是在特定的生产力的具体发展程度中, 一个社会的各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综合产生的结果。它在它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不包含与其他生产方式完全相同的形成要素, 因此与其他生产方式必然是相区别的。如马克思在提到作为生产关系的本质内容的所有制的历史形成时说道: “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制(Eigentum) (“所有制”原译为“所有权”——引者注)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⑤ 生产方式的这种历史性反映了它的特殊性。在一个社会内部, 一种生产方式哪怕被另一种生产方式支配或支配另一种生产方式, 但就其本身的形成过程而言, 它仍然是特殊的。

马克思从两个方面推进了他的这种特殊性原则。一方面是对现实个人的理解。马克思说: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⑥ 这表明人的现实本质不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年, 第2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343页。

③ [日] 见田石介: 《资本论的方法研究》, 张小金等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年, 第168页。引文中的“一般”应理解为“普遍”。

④ [德] 黑格尔: 《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30年版)》, 薛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 第6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年, 第63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第501页。这句话后半段的原文是 “In seiner Wirklichkeit ist es das ensemble der

单一的、纯粹自我关联的，它要获得现实性，就必须与他物——各种物质生活资料——相互中介。由于这些他物和这种中介活动本身又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所以它们共同将现实个人的本质规定为特定社会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使他成为特定的、一定的和特殊的人。另一方面，马克思进一步把这种特殊性原则推进到对社会本身的理解之中。他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特殊的以太”表明了一种特殊的普遍性，即一个社会主导性的生产方式将自身的特殊性普遍化，以此赋予这个社会及其内部要素同样性质的特殊性。如从事定居耕作的民族，由于农业耕作是主导的生产方式，因此连这个民族中的工业、工业组织以及与工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带有土地所有制的性质。^②一个社会作为一个总体，是一个特殊的总体，其内部每一层次的要素都存在“特殊的以太”，但所有这些层次的“特殊的以太”，归根到底又是由生产方式层面的“特殊的以太”所决定的。因此，在这层层的支配关系中，整个社会被组织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由内而外地散发着自身的特殊性和历史性。

总之，与黑格尔所警惕的“独立特殊性原则”只是一种被他的普遍性原则所限制的原则相区别，马克思的特殊性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现实事物的视平线。根据这一原则，一切现实事物都呈现出它历史性和特殊性的一面，哪怕它们本身总是受到凌驾于它们的普遍力量的限制，也不能消除它们的现实存在的特殊性。但是，上述“特殊的以太”除了表达历史的特殊性原则之外，其实也表达了支配性的普遍性概念，因为“特殊的以太”恰好是一种通过支配其他特殊性来获得自身的普遍性的特殊性概念。实际上，我们总是处于这样一种困境中：当我们在讨论现实事物的特殊性存在时，总不可避免地讨论到凌驾于它之上的某种普遍力量的限制，现实中的特殊性都是被普遍性所“污染”的特殊性。这恰好彰显了马克思的特殊性原则所具有的否定性或批判性一面：以特殊性为原则批判虚幻的普遍性。

（二）否定：以特殊性为原则批判虚幻普遍性

在理解和接受黑格尔辩证法的过程中，马克思最为强调的内容之一就是它所包含的否定性环节，并在自己的辩证法中也着重包含这一环节。但是，如果说黑格尔辩证法是以普遍性来“否定”特殊性的，那么马克思则完全反过来：他从特殊性出发来“否定”普遍性，当然这种普遍性是虚幻的普遍性。

从马克思的立场来看，支配性的普遍性的产生，归根到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不够，人与人之间需要通过各种分工形式，以及形成各种共同体、等级或阶级的方式来垄断社会资源，由此产生政治对立关系而导致的。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还无法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普遍利益，现实的普遍利益在形式的普遍性与内容的普遍性方面总是存在错位（即在其形式具有普遍性时，其内容不具有普遍性；或者在其内容具有普遍性时，其形式不具有普遍性），导致其与特殊利益总会形成相互对立和斗争的关系。^③这些内容的进一步表达就是，现实领域不存在真正意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所存在的都只是各种不同形式的特殊性及其相互之间为了争夺形式的普遍性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产生了支配性的普遍性和被支配的特殊性，以及特殊性—普遍性的辩证法：被支配的特殊性总在自身中包含着作为自己的否定物的另一种特殊性，即支配性的普遍性；支配性的普遍性则总试图在每一种被支配的特殊性上与自身保持着“自由的等同性”，它受制于自身的特殊性性质而无法成为真正的普遍性，只能成为虚幻的普遍性。阿多诺说，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直译是“在其现实性上，它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并无中译本中的“一切”一词（此词的出现应是为了对应“关系”在这里的复数形式）。“一切”一词在这里可能会给人带来一种误解，即认为个人的现实本质是一切社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根据马克思的总体思想，他在这里想表达的应是人的现实本质是他所处的特定社会的内部诸社会关系的总和。前一种理解会把个人的现实本质理解为一种超历史的普遍本质，后一种理解则把人的现实本质理解为一种具有历史性的特殊本质。澄清这一点对我们理解个人的现实本质的特定性和特殊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1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6-537页。

我们不能过分热忱于把这种普遍性当作“肥皂泡”来对待，因为这样“不能把握普遍在现状中有害的统治地位”。^①这也是马克思敏锐意识到的一点，他坚持从特殊性原则出发来批判虚幻的普遍性，揭示其特殊性的根源。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对阶级社会中的虚幻普遍性做了归纳，指出：“普遍性符合于：（1）与等级相对的阶级；（2）竞争、世界交往等等；（3）统治阶级的人数众多；（4）共同利益的幻想，起初这种幻想是真实的；（5）意识形态家的欺骗与分工。”^②这几方面内容所对应的普遍性显然都是由于分工、社会利益的对立和政治对立而产生的虚幻普遍性，我们只有从特殊性原则出发，才能够揭示它们的虚幻性质。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情况无疑是阶级统治和阶级斗争。马克思说：“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③我们可以从这段话中解读出多方面的内容：国家作为一种现实普遍物，总是由特定的特殊阶级所掌控的，所以它只具有形式的普遍性，不具有内容的普遍性，因此只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是各种特殊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去争夺国家这种形式的普遍物的斗争，当某个利益集团争夺成功时，它就将作为统治阶级为自身的特殊性附魅上普遍性的形式，宣称自身即国家；因此，特殊性与特殊性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为了一种并不真实存在的普遍物而进行的斗争。如果说现实国家是由于其普遍性的形式无法获得普遍性的内容而无法成为真正的普遍物，那么生产力的情况则相反。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发展起来的世界性的市场竞争和交往是一种发达的生产力，它们作为人类财富本身是“物质的伦理实质”，^④应当具有普遍性。但由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生产力只是资本的生产力，由资产阶级所掌握，并不归全体人民所有，因此它在形式方面不具有普遍性。内容与形式的错位导致这种生产力同样也不具有真正意义的普遍性。同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自身同一性时所具有的普遍性，建立在它用自身的特殊性来支配和统治其他一切特殊性的基础上，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有特定的历史性规定和技术规定，所以资本终究不能摆脱自身的特殊性根源的限制，为自身的普遍性创造出同样普遍的内容。就此而言，资本的普遍性也不是真正意义的普遍性。

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否定虚幻普遍性的历史合理性。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暂时的适应性，是阶级统治获得自身的合理性的条件。在此范围内，一种现实普遍性即便是虚幻普遍性，也包含着一定的真正普遍性的因素。因此，在一个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最初获得自身的统治地位时，人们关于共同利益的想象可能是真实的，即在这个社会的范围内这种共同利益最初的确是一种普遍利益。这是由于统治阶级获得统治地位的条件是“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⑤它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最初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所以这个社会存在真实的共同利益，统治阶级将自身提升为社会普遍阶级具有历史合理性。不过，统治阶级自身的特殊性根源为它的统治设置了历史的限度，当它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却由于在这个过程中它所代表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逐步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它的统治地位和权力将会慢慢遭受到否定，附魅在它身上的普遍性也会慢慢地暴露出其特殊性的面目。这样，最初的共同利益以及各种意识形态范畴（法、哲学、宗教等）的虚幻普遍性也就像泡沫一样被戳穿。统治阶级的历史合理性消失，甚至转变为一种反动性，等待它们的就只有暴动或革命。因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不适应性，并非虚幻普遍性被简单“还原”为最初的特殊性的条件，而是它将被新的特殊性所击败和取代的时刻。可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不仅为特殊

① [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6页。

④ George E. McCarthy, *Marx and the Ancients: Classical Ethics, Social Justice, and Nineteenth-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0, p.158.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2页。

性—普遍性不断地变换它们的形式和内容提供了条件，而且其本身还产生了一种关于虚幻普遍性的辩证法：虚幻普遍性不断地被自身的特殊性所否定，而这种特殊性在成为自身的过程中不断地错过自身，它的形象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不断切换，但始终无法成为自身。

总之，当我们从特殊性原则出发来“否定”现实普遍性时，实质上是把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这种对立和分离“还原”为各种形式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关系，进而把这种矛盾关系的根源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本身的矛盾运动。那么如何解决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这种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最终意味着什么？

（三）对立统一：社会总体的转型和真正的普遍性

贺麟在介绍黑格尔的矛盾概念时说：“矛盾就是统一体分裂为二和对立物之合而为一。”^①在他看来，黑格尔的矛盾关系是“统一体”将自身一分为二产生的，因此矛盾双方也将通过对立统一的方式回归这个“统一体”，以此解决双方的矛盾。阿尔都塞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矛盾关系任何时候都来源于一个“简单的本原”，而且也通过这个本原得到解决。^②

马克思在根本上改造了黑格尔的矛盾概念。在他看来，现实事物的矛盾关系并未预设任何的“统一体”，它随着以这种矛盾关系为条件的社会总体的形成而形成，因此也通过这种社会总体的发展而发展，并随着这种总体的转型而消失。对于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矛盾关系来说也同样如此。我们以商品的特殊性（使用价值）和普遍性（价值）的矛盾为例来进行说明。马克思说，在这种矛盾关系中，“一个条件的实现同另一个与它对立的条件的实现直接结合而出现一个相互矛盾的要求的总体。”^③商品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矛盾是由于商品交换的出现才出现的，随着由商品交换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和现实总体不断发展，这种矛盾关系才不断发展起来。这种社会总体越是发展出复杂的内部结构，越是成为一种特殊的总体，商品内部的这种矛盾也就越是随之发展出复杂的表现形式（例如货币与商品的矛盾、资本与劳动的矛盾等），越成为这个社会总体的主要矛盾关系的根源。正因为现实的矛盾是与产生这种矛盾的社会条件和社会总体一起发展起来的，所以矛盾关系阶段性的对立统一或初步解决依赖于它所在的社会总体的发展或转型。马克思说：“商品的交换过程，应该既是这些矛盾的展开，又是这些矛盾的解决”，^④“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实际矛盾赖以得到解决的方法。”^⑤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发展矛盾，商品交换带来了商品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矛盾，但这种交换本身又使双方的对立关系得到缓解，当人们在商品交换中寻找等价物，并最终发明货币时，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就可以借助这种一般等价物在一定程度上并行不悖地存在。商品的交换过程本身就为“解决”由这种交换所产生的矛盾提供了条件。当商品社会由于它所包含的各种具体矛盾的不断发展而最终发生彻底转型时，这些内含的矛盾也都将消失，或者过渡为新的矛盾形式。

在阶级统治中所出现的特殊性—普遍性的矛盾关系的形成和解决也同样如此。一个社会的阶级统治本身直接产生这个社会内部各种形式的特殊性—普遍性的矛盾关系，这个社会本身也是以这些矛盾关系为主要条件而形成、发展和运动的。当这些矛盾关系的发展促使阶级统治发展到最极端的形式直至崩溃时，那么整个社会将会实现一次转型，旧的特殊性—普遍性的矛盾关系将因此消失，产生新的特殊性—普遍性的矛盾。因此，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矛盾关系的阶段性的解决，总是以这种矛盾关系的具体内容以及它所构成的社会总体的消失、矛盾关系的形式获得新的内容为结果。

那么如何理解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矛盾关系的最终解决？根据前面的思路，这种矛盾关系的最终解决，取决于这些矛盾的充分发展，促使以之为条件的社会总体发生彻底转型，即人类社会向未来共产主

① 贺麟：《黑格尔的同一、差别和矛盾诸逻辑范畴的辩证发展》，贺麟：《黑格尔哲学讲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43页。

②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91-97、189-19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义社会彻底转型。在这种转型中，充分发展的和社会化的生产力积极地扬弃了私有财产，使社会生产、社会交往和人本身都实现了最充分的社会化，国家、阶级、阶级统治以及所有狭隘的政治对立关系都消失不见，人与人在充分的相互联系中形成自由人联合体。由于虚幻普遍性被彻底消除，因此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关系也被彻底消除。马克思称这样一种社会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①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而来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继续得到发展的生产力，不再被特殊的阶级所掌握，而是归全体人民、归社会本身所有，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力，由此产生的社会财富也由全体人民所支配。普遍性的内容获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就此而言，共产主义社会现实地包含着真正的普遍性。

不仅如此，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还全面解放了特殊性，使每一种特殊性都成为真正的普遍性。它通过消除支配性的普遍性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彻底消除了这种虚幻的普遍性，赋予每一种特殊性真正的“全面发展和伸张的权利”。如果每一种特殊性都能够与其他特殊性充分的关联中获得这种权利，那么每一种特殊性就成为普遍性。尤其要注意的是，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单独一种或少数的特殊性孤立地或者通过支配其他特殊性获得了“全面发展和伸张的权利”（这是黑格尔所警惕的“独立特殊性原则”），而是在与其他所有特殊性的充分关联中，每一种特殊性都获得这种权利。在这种普遍的关联中，单个特殊性的主观任性和无节制性都被消除了，每一种特殊性都按照它同时能够成为普遍性的方式行动。这是马克思的特殊性原则区别于黑格尔所警惕的“独立特殊性原则”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后者只是追求一种或少数特定特殊性的解放，但前者追求的是全体特殊性在一种普遍的维度中的普遍解放和持存。以个人的感官感觉为例，个人的感觉和感官是完全内在于个人的，在黑格尔那里是标志着特殊性范畴的东西。在前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的感觉既没有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也囿于狭隘的社会关系。但在共产主义社会，个人的感官不仅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而且“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②“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③个体的感觉和感官充分社会化，每一种最内在的、特殊的、感觉都具有充分的普遍性，社会的、普遍的、共同的东西内在地沉积成每一个个人最内在、最个别和最特殊的感觉，使之具有充分的普遍性。这样，特殊性本身就是普遍性，普遍性本身也是特殊性，特殊性和普遍性在本质层面达到辩证的统一。这既是特殊性的全面解放，也是真正的普遍性的生成。

由此可见，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矛盾关系的解决以及真正的普遍性的生成，是一个与人类历史运动相呼应的过程。实际上，马克思对特殊性—普遍性的思考本身就是对人类历史辩证的运动过程的思考，表达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最内在的一种结构，即以特殊性为原则来理解现实事物，批判虚幻普遍性，追求真正的普遍性（“特殊性—普遍性”结构）。从这个层面来看，黑格尔和马克思有关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法都各自表达了他们自己的辩证法思想最核心的内容和结构，只不过这两种结构相互颠倒，因此他们的辩证法之本质也截然不同。

三、余论：马克思如何“颠倒”了黑格尔辩证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④一直以来人们都围绕着这段话，讨论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问题。

我们在前面的阐述本身就包含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既表明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普遍性—特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

殊性”结构，也具体交代了马克思辩证法“特殊性—普遍性”的结构。这样，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就显得直观了：他把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位置“颠倒”过来，使特殊性从被支配的地位转换为第一性和原则性的地位，使普遍性从第一性的位置转变为被批判和否定的位置，并以此指出真正的普遍性的生成方式。这样一种颠倒，解释了马克思是如何剥去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无疑是包含着同一性逻辑和观念性逻辑的普遍性对特殊性的支配，是绝对精神局限在纯粹的观念世界之中统治着关于特殊事物的观念，形成“普遍的东西对特殊的东西的帝国主义”。^① 马克思的辩证法坚持从特殊性原则，也即区别性、现实性和历史性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事物，揭穿现实虚幻普遍性的特殊性根源，批判“普遍在现状中有害的统治地位”，通过把握社会历史的运动规律来寻找使得一切特殊性获得解放的真正普遍性。以此，辩证法被黑格尔笼罩上的神秘外壳在马克思那里就无处遁形了。

同时，剥去神秘外壳的过程还是“提取”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的过程。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是对辩证法的基本形式的系统化描述。马克思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② 当我们否定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普遍性原则及其对特殊性的支配力量，确立了特殊性原则后，辩证法的基本关系——如矛盾、否定性、总体和对立统一等——就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内容。它们不仅摆脱了曾经笼罩在它们头上的神秘外壳，而且它们自身就包含着对这种神秘外壳的彻底批判，使辩证法从黑格尔面向精神世界的“观念”辩证法转变为面向现实社会历史的历史辩证法。在这里，剥去神秘外壳的过程“提取”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提取合理内核的过程则彻底消除了辩证法的神秘外壳。这两个过程是随着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普遍性—特殊性”结构的颠倒同时实现的。这样，我们就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阿尔都塞曾经迷惘的“颠倒”“剥去外壳”和“保留内核”三个步骤是如何同时实现的这个问题。^③

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就真正摆正了特殊性和普遍性在理论上和现实中的位置。他以“特殊性—普遍性”的结构颠倒了黑格尔辩证法“普遍性—特殊性”的结构，使我们意识到这两种辩证法可能还存在着诸多我们尚未真正触及的隐蔽张力。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对辩证法的讨论多次涉及特殊性，^④ 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也多次讨论到特殊性，并暗示一种面向特殊的辩证法或“特殊的辩证法”（der Dialektik des Besonderen）的可能，^⑤ 这可以说是为我们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指出了一条充满可能性的新路向。

责任编辑：罗 苹

① [加] 罗伯特·阿尔布瑞顿：《政治经济学中的辩证法与解构》，第 11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第 280 页。

③ [法]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 78 页。

④ [法]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 93-97、214 页。

⑤ 参见 [德] 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第 171、328 页。

从道德无序到美德统一： 麦金太尔道德叙事的构思逻辑^{*}

张永刚

[摘要]以叙事方式破解现代道德冲突乃至现代性问题，构成了麦金太尔哲学思想的核心议题。麦金太尔通过道德叙事方式破解道德无序，以实现美德统一。具体来说，现代性道德冲突产生的根源在于对欲望与善乃至实践推理等原初问题的差异性理解，恰当思索欲望与善的内在关系，须让实践理性回归实践并转向对现代性问题本身的反思。现代道德分歧生源自特定的社会背景，关涉理性主体本身及其社会关系。实践推理必须结合现代政治经济框架，以回溯冲突的根源所在。当实践推理面向实践生活本身时，叙事就成为关键所在。麦金太尔的道德叙事体现出的整体方法论与现实关照性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有待商榷的实践空间。

[关键词]麦金太尔 欲望 实践推理 道德叙事

〔中图分类号〕B8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2)12-0038-06

以叙事方式破解现代社会道德无序甚至现代性问题，是麦金太尔哲学关注中的核心议题，且贯穿其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始末。从早期围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徘徊构思，到之后对美德伦理的追寻构建，以及新近关于叙事理论的全面呈现，都体现出他以叙事方式解决道德冲突的现实指向和方法论意蕴。过往学界较多从美德伦理的总体视域探究叙事方法的意义与价值，争论和质疑也聚焦于此。在麦金太尔新作《现代性冲突中的伦理学：论欲望、实践推理和叙事》中，其直面并回应关于道德叙事问题的批判和质疑，从而全面厘清其理论体系。总体把握麦金太尔道德叙事的构思逻辑，厘清其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逻辑理路，对全面把握其从道德无序到美德统一的呈现思路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欲望与善：现代性道德冲突的原问题

现代道德哲学将个体道德行为从目的论范式中抽离出来并赋予其至高权威，承继已然剥除了“原初语境”的道德规则，成为“一套关于责任和义务的规则、理想、判断”^①的道德修辞，继而频生严重的“无序状态”。殊不知，现代性道德本来归属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一定程度上具有早期和晚期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独有特征，现在却呈现为一种世俗的信条和实践模式，即要求用一种绝对标准来评价所有人的信条和行为。而且这种约束力具有绝对普遍性，无论理性主体生活在什么样的文化秩序和社会秩序

^{*}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麦金太尔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现实意义”(GD18XMK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永刚，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东 广州，510631)。

^① [美]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现代性冲突中的伦理学：论欲望、实践推理和叙事》，李茂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59页。

之中，以及扮演何种职业角色或处于何种社会地位，都将纳入这种规定中来。正因如此，现代性道德在叙事呈现中遮蔽掉了人之欲望以及人们的共同利益，过于强调对原则或规则的绝对服从，从而忽略了日常实践中的具体规定性问题。

由此导致作为表现主义范式的元伦理学理论的复现，麦金太尔将其界定为一种关于评价性表现和规范性表现的二级理论，情感主义就归此范畴之列。他认为，“一种道德的评价性判断和规范性判断根植于其特定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是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所做出的判断，而表现主义者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错误地主张这一判断能够适用于任何时空的任何一个评价性判断和规范性判断。”^① 现代性道德观念的维护者之所以坚持捍卫这一理念，缘于视之为唯一的标准答案，由此其陷入无休的分歧和冲突。作为推崇复兴美德伦理的重要代表人物，安斯库姆（G. E. M. Anscombe）将此称为“巨大的鸿沟”，并认为“这个鸿沟需要通过一种对人类本性、人类行为、一项美德的特征以及首当其冲的人类‘繁荣发展’的解释来予以填补。”^② 实际上，安斯库姆主张回归古典传统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后来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构建受此影响。美国学者贾·加西亚（J. L. A. Garcia）通过《现代（主义的）道德哲学与麦金太尔的批判》一文指出，麦金太尔承袭了安斯库姆的思路，但他“对现代主义道德哲学的批判根本就不是简单地重复安斯库姆的批判”。^③ 总结下来，麦金太尔主张现代性道德回归亚里士多德的缘由包括三点。第一，遵守道德戒律的真正价值在于获得人类追求的普遍利益，现代性道德却将此忽略。第二，个体利益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反观现代道德，却是单纯抽象性和概括性的高度体现。第三，现代性道德的拥护者和实践者认为，道德有别于政治、法律、审美、社会和经济等；反观亚里士多德主义，则主张每个领域的活动只有在相互关系中才能得到正确乃至充分的理解。

进而推之，麦金太尔认为现代性道德话语冲突的产生根源在于对欲望与善乃至实践推理等原初问题的差异性理解。他认同并秉持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论伦理学》中的相关阐释，主张万物向善，“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④ 推及善与欲望、利益的内在关系，必然关涉到什么是真正的“值得拥有”和“最佳选择”。需要厘清的是，欲望不同于需要，也不是所有的欲望都一定是“值得拥有”的善，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欲望的历史不仅与我们的情绪、品位、喜好、习惯和信念的历史分不开，而且与我们生物化学和神经生理学发展的历史分不开。”^⑤ 而所谓反思自己的欲望，就是考虑自己当前的任何欲望是否有充分良好的理由，“只有当我们要达到的欲望目标能够成就某种善时，我们获得这种欲望目标的行为才具有合理性。”^⑥

由此，追溯冲突根源的关键在于反思欲望是否符合善好，以及是否影响其他善的问题。而索思关于欲望合理理由的不同缘由，也就构成了对欲望之善的不同理解，这也正是麦金太尔破解现代道德冲突的起始逻辑。理解与依据不同，自然会导致推理不同，这就更加印证了实践推理的重要地位。对此，麦金太尔进行比较阐释道：“表现主义者的历史确实也是判断和推理的经历，但这些经历表现的是情感。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历史确实也是情感和欲望的经历，但他们强调这些情感和欲望是否经过了严谨的实践推理。”^⑦ 由此，实践推理的关键环节在于理性主体的选择，而不同依据就成为选择差异的主体性显化。“我在选择满足欲望的行为时，需要合理地思考，从而在这个行为方式和那个行为方式之间做出选择，这就证明我是理性主体，能够自主选择。”^⑧ 能自主选择符合善的要求，就是一种“明智的行为”。

① [美]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现代性冲突中的伦理学：论欲望、实践推理和叙事》，第 111 页。

② [英] 伊丽莎白·安斯库姆：《现代道德哲学》，邓安庆编：《当代哲学经典·伦理学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53 页。

③ [美] 马克·C·墨菲编：《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胡传顺、郭沙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10 页。

④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3-4 页。

⑤ [美]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现代性冲突中的伦理学：论欲望、实践推理和叙事》，第 3 页。

⑥ [美]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现代性冲突中的伦理学：论欲望、实践推理和叙事》，第 7 页。

⑦ [美]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现代性冲突中的伦理学：论欲望、实践推理和叙事》，第 55 页。

⑧ [美]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现代性冲突中的伦理学：论欲望、实践推理和叙事》，第 8 页。

当理性主体的欲望既明智又合理时，那么其前提自然是理性主体拥有良好理由去满足其欲望。这实际上也是亚里士多德一再宣称的道德意志，亦构成了麦金太尔坚持这一立场的重要依据。

道德冲突的解决关键在于理性审视欲望的问题，即要明确欲望与需要的区别，厘清只有符合善之要求的需要方能成为追求的欲望，并坚持以良好理由去衡量何为“值得拥有”和“最佳选择”，从而为道德行为做出合理解释。按此推演，现实中的诸多道德矛盾和现实困境，实际上都可回溯到这一根本理论问题中，如若学会反思，就会思考理性与欲望的关系，思考什么是欲望选择的良好理由或不良理由，学会进一步思考善与利益的关系，这便是麦金太尔叙事语境中的实践推理。如果说欲望之善是现代道德冲突的原初问题，那么实践推理则是麦金太尔解决道德冲突的关键基点。

二、实践推理：面向现代性问题的转向致思

针对上述理论分歧，麦金太尔采用转换研究方法的策略，意在索思“哲学争论”背后的“实践缘由”，以探究理论对峙背后的实践根源。由上已知，现代性道德存在于既定的社会秩序和思想体系之中，社会秩序和思想体系也必然影响着欲望的变化以及实践理性新形式的生成。因此，只有深入探究社会秩序和思想体系的内在生成和具体呈现，理性主体才会在反思与选择过程中形成合理认识和正确行为，从而理解现代性道德的具体指向。

一方面，既然现代道德分歧源自特定的社会背景，那么实践推理须结合现代社会独有的政治经济框架以回溯冲突的根源所在。道德理论的任何概念都根植于道德实践的特殊性，脱离这些特殊性则无法理解其原义，然而这一点在现代道德哲学研究中却被忽略，从而成为现代道德冲突不断的缘由之一。故此，麦金太尔认为道德研究要从现实实践开始，只有如此，才能把捉生活文化中的道德实践及其独特性。法国著名历史学者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认为，“理解活生生现实的能力是历史学家最基本的素质。”^① 贾·加西亚（J. L. A. Garcia）在评介麦金太尔时专门指出：“道德推理和道德概念本来就是历史的人造物，他们需要一种确定的社会背景。”^② 现代道德冲突表面看起来似乎是欲望本身或者欲望之间的问题，然而其深层次是历史本身或社会内部的冲突，即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断层和冲突。毕竟在不同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中，人们满足需要的方式贯穿于具体生活和社会背景之中。如要了解欲望的正当理由与合理性，就必须探究欲望在那些生活方式中所起的各种作用，以及内嵌于生活之中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特质。麦金太尔一再指称：“现代性道德是现代性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的道德，使主体在行为和判断中符合现代性的需要，有其应运而生的历史进程。”^③ 由此，只有透析现代性道德的社会基础，理解其构建历程，才能理解历史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和道德冲突。

进而言之，现代道德冲突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现代社会本身的问题，唯有深入揭示现代性病症，方能破解问题所在。提及现代性，尽管存在着多种不同版本的叙事样态，但其前提内容基本一致。这些叙事版本都源自共同的前提，即现代社会独特的政治与经济框架。麦金太尔指出：“现代政治的故事核心讲述了如何制造和维护现代国家，现代经济的故事则讲述了如何制造和维护现代市场，这些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20世纪出现的利维坦式‘国家和市场’，这种利维坦比较新颖，但实际上经常是病态的。”^④ 因为国家与市场的分离必然带来国家伦理与市场伦理的分解，它们只会最大限度强调遵守律令和规则，而不考虑结果。在这种分离之中，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欲望活动由大量的规范建构起来，包括国家伦理要求的规范、市场伦理要求的规范和法律条令强制的规范等，而这些规范对人们的许多欲望、态度和期望起着形塑作用。尤其是，这种现代性道德的戒律不同于甚至独立于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从而造成了现代性文化中的欲望多样性与多重性，但却脱离了其真实依托的社会生活。最为明显的就是层出不穷的

① [法]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6页。

② [美] 马克·C·墨菲编：《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第115页。

③ [美]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现代性冲突中的伦理学：论欲望、实践推理和叙事》，第132页。

④ [美]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现代性冲突中的伦理学：论欲望、实践推理和叙事》，第120页。

“欲望制造”，各种消费广告不断诱导甚至“改造”人们的欲望，造成真实利益与虚假利益的迷乱混淆，更让理性主体无法辨别哪些利益的对象才有良好理由追求。对此，麦金太尔指认：“在现代性的文化中，欲望对象的数量和种类大量增加，人们的欲望随之增长。但随着欲望的大量增加，人们需要做出选择，需要决定优先选择哪些欲望，需要弄清楚哪些欲望是现实的愿望、哪些是徒劳的空想，需要知道应该如何应对冲突的欲望。”^① 现代性道德本应该有效限制欲望并在某种程度上使欲望变得文明，而现实却背离了对于欲望和需要的最初理解。

另一方面，现代性道德冲突关涉理性主体本身及其社会关系，这构成了理解“我”和“我们”的必要性所在，也是实践推理必须面对的问题。只有将主体置诸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才能真正实现实践选择以及实践推理。按照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观点，任何一个理性主体按照实践理性行事，都会为其欲望寻找合理理由，并对各种利益进行等级排序，根据现实情况寻找更为高级的欲望，并使其成为对现实利益的实际关照。麦金太尔指出：“我们通过学习使用 good（好）及其同源词，能够在判断中理性地比较诸多欲望对象哪一个更好，能够在论证中理性地比较哪一个结论对我们最有利，如此这般，我们就成了实践推理者。”^② 此处的“实践推理”实际需要关照两个问题。其一，以“统一的自我”明确作为理性主体的“我”。作为“实践推理”者，人们按照理性指引来处理欲望，在善和最佳利益之间选择最佳行为方式。在此过程中，人必须有“高度的自我认识”，成为一个完全理性的主体，养成较高层次的欲望和较高层次的品性，从而使得自身能够作为一个主体去行为并实现这种主体的最终目的。其二，以“关系叙事”明确作为理性主体关系性存在的“我们”。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多元且复杂，必须将其放置于群体、时间序列中，才能完成对其的理解以及真正理解。因此，麦金太尔才强调：“善于反思的主体越来越多地从某种叙事的角度来理解自己和他人，他们在这种叙事中作为主体去确定目的或未能确定最终目的，他们最初在活动中并通过活动对最终目的的本质有所理解，这意味着他们是理性的主体。”^③ 也就是说，我们不但可以讲述我们生活过的故事，而且能够对事情的失败做出真正的评估。只有实现可解释性与可理解性，欲望才能最终被合理满足，“关系的叙事”中的实践理性才能得以实施。

由此，面对纷繁复杂的欲望关系和道德冲突，实践推理要厘清其中关键并做出正确预判，唯有回归实践并关照在实践中的具体生成，才能更好思索这一冲突的深层致因，继而明晰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方式。当然，在实践推理面向实践生活本身，将理性主体与社会关系串联起来，并构思其中的内在关联之时，统一性叙事也就成为实现美德统一的关键路径。

三、统一性叙事：现代美德统一的实现路径

英国学者彼得·哥尔迪（Peter Goldie）指出，叙事不是简单的编年史呈现或系列事件堆砌，而是以特定时间序列、明确的主题构成和有意义的情感输入整体呈现的完整结构。^④ 叙事将事件秩序、意义价值、因果逻辑等置诸经验现实之中，把生活中看似无序和偶发的情境场景作为一个具有内在意义的整体，从而以叙事中的时间连续性和现实具体性来阐释蕴含于其中的逻辑理路，以现实世界中的生命实践体验来表现概念体系中的理性和规则。在此基础上，麦金太尔理解的叙事形式“是一种以亚里士多德主义关于人类活动的概念为前提的叙事形式”，^⑤ 属于一种目的论范式，内含了三重意蕴。第一，叙事不仅是一个独立个体的生活叙事，而且是处于人际关系中的个体的生活叙事，所以这种关系模式关注的不仅仅是“我”，而且还是“我们”。第二，叙事尤其注重每个个体如何从过去的失败与错误中吸取教训，因此叙事属于一个时间序列，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串联起来，体现了叙事的整体性。第三，叙事融合了各

① [美]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现代性冲突中的伦理学：论欲望、实践推理和叙事》，第 128 页。

② [美]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现代性冲突中的伦理学：论欲望、实践推理和叙事》，第 33-34 页。

③ [美]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现代性冲突中的伦理学：论欲望、实践推理和叙事》，第 49 页。

④ Peter Goldie, *The Mess Inside: Narrative, Emotion and the Mi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

⑤ [美]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现代性冲突中的伦理学：论欲望、实践推理和叙事》，第 158 页。

种个体利益和共同利益，这就从根本上将叙事的内生逻辑清晰破解。这样的叙事内含目的论结构，旨在思考是否可以实现这样的目的，达成理想的结果。这种整体性的叙事体现了叙事在解决道德冲突中的基本框架，即为何叙事以及如何叙事。

一方面，在“统一性自我”中确立叙事主体。叙事的复杂性在于，叙事的主体同时是叙事的对象和叙事的作者，或者是共同的叙事者，“行为者不仅是演员而且还是作者。”^①在这种关系性叙述中，如何通过解释主体行为的动机和理由让行动得以理解，如何通过证明这些理由具有足够合理性来论证行为的正当性，是叙事需要思考的问题。作为讲故事的人，如何正确对待理性主体过去、现在以及即将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并以恰当理由合理解释这些行为的正当性，在讲述过程中思考自己行为的意图、目的、利益等问题，从而达到自我反思和自我理解的效果。作为听故事的人，在接收叙事的过程中，也在“学会反思故事中的因果联系，知道如何思考和回答这样的问题”，毕竟“每一种文化的故事资源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道德意义”。^②由此可见，叙事之所以可以成为麦金太尔解决道德冲突的关键，也取决于这一叙事方式对于解释和理解道德主体和道德冲突的意义。按照麦金太尔的阐释，“许多理性主体在实践中虽然对自己的具体情况有所反思，但却从未找到机会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或者可能没有资源讲述这些故事。人生总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可讲，让这个故事去捕捉他们人生的叙事结构，但理性主体的属性并不要求人们总是能够根据这个故事的思路来思考他们自己。”^③

叙事通过反思动机和寻找理由，来论证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然而实际生活和叙事逻辑并不统一，经历也不是叙事本身，生活本身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叙事，而叙事本身总有一个目的与结构。甚为明显，麦金太尔理解的人生就是一个故事，我们将故事实现于我们的生活中，又按照实现出来的故事来解释我们自己。因此，他不仅是一位历史主义者，也是一位整体论者。^④在此过程中，需要深刻理解，一个个人的概念就是一个历史中抽离出来的角色概念，“人格同一性正是角色统一性的先决条件，而角色统一性又是叙事统一性所必须的。没有这种统一性也就不存在任何可被讲述的故事的主体。”^⑤麦金太尔把那些有助于我维持我的故事的部分特征看作美德，并将另一些特征视为阻碍。我的生活故事始终穿插于我获得身份的共同体的故事中，个人的身份总是以整体的身份为前提的，我会成为别人故事的一部分，正如别人也会成为我的故事的一部分。由此，麦金太尔认为，美德就是这样一些特征，它们不仅能够维持实践并使我们能够实现实践内在的善，而且还能支持我们对相关的善的探求，帮助我们克服在此探求过程中的危险、诱惑和分心，增进我们的自我认识和对善的认识。当然，麦金太尔阐释的“叙事的自我”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将个人的各种实践活动统一起来，二是以整体故事来解释具体的行为。叙述只可以指向已经发生的事情，却不能叙述还没有发生的事情。^⑥

另一方面，统一叙事和生活的关系实现内容的可理解性。按照萨特的理解，每个人从生命之初就开始叙事。这也影响了麦金太尔。然而，“人生叙事”实际生活是一回事，讲故事是另外一回事。“孤立地看待故事，不考虑规则或普遍的道理，不考虑实践指导的来源，也是一种危险的做法。”^⑦阿奎那和马克思“都提供了让我们了解自己的方式，这要求复述我们生活的故事，复述意味着不断地进行更恰当的叙事。”^⑧叙事的目的在于实现可理解性。“人是讲故事的动物，叙事是这种探求最理想的手段，因为

① [美]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70页。

② [美]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现代性冲突中的伦理学：论欲望、实践推理和叙事》，第227页。

③ [美]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现代性冲突中的伦理学：论欲望、实践推理和叙事》，第53页。

④ 姚大志：《麦金太尔的善观念批判》，《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⑤ [美]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第276页。

⑥ Peter Johnson, “Reclaiming the Aristotelian Ruler”, J. Horton, S. Mendus (eds.), *After MacInty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58.

⑦ [美]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现代性冲突中的伦理学：论欲望、实践推理和叙事》，第227页。

⑧ [美]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现代性冲突中的伦理学：论欲望、实践推理和叙事》，第228页。

只有在叙事的语境中，孤立的事件才能成为有意义的和有目的性的行动。”^① 麦金太尔解决统一性问题的方式是“生成性叙事”，他认为，必须把握好叙事和生活的深刻关系，以此实现主体及其行为的可解释性。

一方面，叙事来源于生活，它不能脱离生活和历史。叙事不是单纯讲述，而是通过叙事方式达到可理解的目的。麦金太尔主张：“在成功地确认并理解他人的行为的过程中，我们总是趋于将特定的事件放到一系列叙事性历史的语境中，这些历史同时包括所涉及的各个个人的历史和他们在其中活动与经历的背景的历史。”^② 叙事之所以可以理解他人行为，是因为我们全部经历了“我们生活中的叙事”，而且我们会依据我们所经历的叙事来理解生活本身。另一方面，叙事在复述生活过程中形成了主体意识和判断，并以此更好地理解生活和自我。在不断的生活叙事中，这种自我认识会以叙事的形式出现，叙事其欲望和判断的历史，形成对问题思考的基本判断。从最初在主体叙述欲望形成和审视欲望内容的同时对其进行反思，其后主体在诠释过程中审视过去和现在的自我，最后主体通过道德训练形塑自我意识，体现出一个完整的过程。也正是基于这种整体性叙事的方式，麦金太尔以历史叙事的思路构建其美德概念以及整个道德理论，这种建构不是采取了一种加属差的方式，而是采取了一种辩证叙事的方式。^③

四、结语

道德叙事作为解决现代冲突的重要思想，不仅为全面理解麦金太尔思想提供了重要内容角度，更为从现实方面思考叙事对于理解人自身，以及解决道德冲突甚至有效做好道德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视角。第一，麦金太尔的道德叙事体现的是一种整体方法论。他以道德叙事方法将理论与现实方法有机统一，有别于传统的哲学研究，形成其独特的美德伦理整体建构。这种整体视角不仅拒斥道德碎片化，而且反对道德相对主义。通过叙事将人的现实生活勾画为一个统一整体，以目的论的构建模式，试图从古典哲学中吸收思想资源，以解决现代道德冲突，具有一定合理性。第二，道德叙事强调现实关照性，对道德实践与道德教育有启发意义。道德叙事意在阐清理解现代道德是独特的现实生活，而非脱离现实实际的逻辑推演。叙事通过叙事方式将个体生活与其生活环境密切相连，在叙事中赋予现代社会独有的价值关联。与传统的道德教育方式对比，道德叙事源自现实生活的构思方式，更容易达到良好的道德教育效果，通过构建道德场景、树立榜样示范、整体道德叙事等具体形式，更能让受教育者整体感知道德理论背后的力量乃至现实的引导。

然而，麦金太尔美德伦理视域中的道德叙事方式也存在值得商榷的空间。第一，麦金太尔的道德叙事富有文学色彩，并牵涉到心理机制，这给道德叙事在实施层面带来一定难度。按照利科（Paul Ricoeur）的分析，叙事作为一种道德叙事方法，具有较明显的文学色彩，叙事统一性无力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本身。^④ 尽管麦金太尔针对上述批评给予了有针对性的回应，从根本上阐释了其整个道德叙事理论，并最大限度融合了文学叙事与现实叙事的现实基础，然而也必须承认，道德叙事的各个实施环节都存有一定理想性。第二，麦金太尔道德叙事的理论基础和阐释立场均属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也给其增加了诸多不现实色彩。道德叙事难以与现实结合，这种兼具情境依赖和形而上学双重品质的叙事特质，难以在现实中落地生根并有效实施。借用皮特·约翰逊（Peter Johnson）的评价，麦金太尔以“叙事的自我”统一各种实践活动，以及以整体叙事解释具体行为。然而叙事只可呈现已经发生的事情，却无法叙说还未到来的事情，由此，这种目的论意蕴也就没有彰显出来。^⑤

责任编辑：徐博雅

① 张容南：《叙事的自我：我们如何以叙事的方式理解自身》，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5页。

② [美]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第268页。

③ 张言亮：《论麦金太尔对道德分歧的解决——基于〈追寻美德〉的分析》，《伦理学研究》2021年第2期。

④ [法]保罗·利科：《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余碧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34-237页。

⑤ Peter Johnson, “Reclaiming the Aristotelian Ruler”, J. Horton, S. Mendus (eds.), *After MacInty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p.58-59.

STS 视角下逻辑研究的三种进路^{*}

臧艳雨

[摘要] STS 在反思科学的进程中形成了逻辑的社会学研究，研究较少，其主要原因一则在于逻辑的特殊状态，二则在于“两种文化”的影响。促进“两种文化”的融合，有效借鉴逻辑学的研究进展，推动逻辑的社会文化研究，至少可在三种进路上加以扩展。

[关键词] 逻辑的社会文化研究 STS 广义逻辑

[中图分类号] B81-09;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2) 12-0044-07

尽管“什么是逻辑”已经构成了逻辑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自亚里士多德以降，逻辑，尤其是现代逻辑，通常被视为客观的、必然的、分析的、自明的、先验的、普遍有效的。和其他知识类型相比，逻辑代表了那些最客观、最必然的真理，几乎很难想象其与社会文化有什么关系，与社会学等经验科学有什么关系。20 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兴起的 STS (科学技术与社会)，经历了科学社会学、SSK、后 SSK 等阶段，渐成一研究思潮，对科学知识、科学实践进行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分析，探讨其与社会文化之关系。这其中，逻辑既作为科学知识的一种，又是科学以及科学哲学的方法论基础，针对逻辑的反思就成为 STS 研究的应有之义。

在 STS 视界中，无论是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默顿，SSK 的代表人物布鲁尔，还是后 SSK 的代表人物拉图尔、皮克林等，逻辑都是其无法回避的话题。但相比于对于经验科学的关注，学者们对于逻辑(和数学)的关注整体上较少，SSK 的麦肯齐 (Donald MacKenzie) 探索了数学的社会学，曾感叹：“和自然科学相比，数学的社会学成果是稀少的，而形式逻辑的社会学，几乎是不存在”。^①究其原因，一则在于逻辑的特殊状态。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形式科学与经验科学传统二分，认为经验科学才可能与社会打交道，而形式科学(逻辑与数学)是纯粹理性的推导，不涉及经验与社会文化。二则在于斯诺 (C. P. Snow) 所称的“两种文化”的影响仍然存在。“哲学家和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学者之间还没有经常阅读引用彼此的著作，即使两个学科的发展是互补的”。^② STS 学者需要关注逻辑学的理论进展。而事实上，20 世纪后半期以来逻辑学自身的一些研究取向已为 STS 反思逻辑提供了有利的理论与案例资源，如借助逻辑新类型以及由此引发的逻辑哲学讨论重新思考逻辑建构主义论题，^③重新思考逻辑与实践的关系等。本文正是基于此而作，借助逻辑学研究成果扩展 STS 的逻辑研究进路，以深化 STS 研究，推动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科学、技术与社会视角下的逻辑研究”(15BZX03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臧艳雨，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090)。

① D. MacKenzie, *Mechanizing Proof: Computing, Risk, and Trust*, MIT Press, 2001, p.2.

② [美] 约瑟夫·劳斯：《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科学实践》，戴建平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年，中文版序言。

③ 臧艳雨：《审视逻辑建构主义：从 STS 视角看》，《广东社会科学》2022 年第 6 期。

逻辑哲学与科学哲学基本问题研究,促进“两种文化”融合。

一、默顿范式的逻辑社会学进路

STS 视角的逻辑研究,在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可称作逻辑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logic),或逻辑的社会文化研究(social studies of logic)。^①它关心的是逻辑如何受到社会或文化背景的影响以及逻辑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里的逻辑,依照 STS 的研究范式,指向社会建制、逻辑知识、逻辑活动,而这也预示了逻辑的社会学研究的三种进路。

默顿范式的逻辑社会学关注作为社会建制的逻辑。坦率地说,默顿并没有提出逻辑社会学概念,也没有对逻辑展开专门的探讨。作为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默顿将科学视为一种社会事业,整体上考虑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而逻辑作为科学中的一种(和数学一起归于形式科学)而被他讨论。他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探讨科学技术中研究兴趣的转移与研究问题的选择如何受到社会背景及文化价值的影响。他发现在 17 世纪的英格兰,人们对文学和宗教的兴趣在衰落,对科学的兴趣在持续增长。而在科学中,人们对物理学、数学、生理学、化学、植物学等的兴趣都有持续的增长,而同时,人们对逻辑的兴趣并没有增长。以 17 世纪英格兰出版的唯一科学杂志《伦敦皇家学会哲学汇刊》的文章分类表为例,在 1665 年至 1702 年间,涉及逻辑学与认识论的文章只有 2 篇(1668—1670 年有 1 篇,1674—1676 年有 1 篇),而数学有 99 篇,物理学 685 篇,生物学 366 篇,解剖学与生理学 226 篇,医药科学 257 篇,地学 186 篇。^②

默顿认为,科学兴趣的短期转移是由单个科学家的贡献所推进的,但是,发生在 17 世纪英格兰的大规模研究兴趣转移的现象,就不再完全是由科学的内在发展决定的,影响因素一定在其他方面。默顿受韦伯的影响,认为科学家通常总是选择那些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和兴趣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人们科学兴趣的增长与选择的“先决条件已深深扎根在哺育了它并确保它进一步成长的社会文化之中,它是长时期社会文化孵化生长的一个娇儿”。^③默顿由此将其溯源到文化与社会背景中,如新教伦理以及英格兰资本主义的发展等。“逻辑,却被降到从属的位置,因为逻辑被认为不能增加任何新的知识,但却可能使谬误长存,虽然逻辑是思维中的一种有用的因素,但对实在的检验并不来自学究的逻辑,而是来自事实的观察。”^④同时,经院哲学衰落,因为它充满虚假的教义,让人们远离上帝;而中世纪逻辑学也受到拒斥,它被认为是伪亚里士多德哲学,由于使用了严格的三段论推理而以假乱真。当然,默顿也并不认为它们完全是由社会所决定的,或完全是理性因素或内部因素单方面决定的,而认为它们是内部与外部综合作用的结果。默顿由此探讨了科学的精神气质,以及科学运行的社会结构、科学的社会功能等,强调通过构建恰当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来保证科学研究的进展以及科学精神气质的实现等。

STS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传入我国后,逐渐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张建军较早在我国提出了开展逻辑社会学研究的设想。他指出:“逻辑哲学学科早已与科学哲学学科并架齐驱,而与科学社会学并驾齐驱的逻辑社会学却并没有问世”,^⑤并由此提出为了探索如何走出我国逻辑学发展的困境,要借鉴长足发展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建立作为逻辑学与社会学发展之边缘学科的逻辑社会学,利用社会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逻辑学的发展,把逻辑的产生与发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把逻辑教学与研究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和社会活动,把逻辑组织和逻辑学派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和社会系统来加以考察和探讨。因此,他建议,依照科学社会学的范例,逻辑社会学的研究可沿着两条思路进行:“界内研究和界外研究。界外研究主要是逻辑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的研究,可分为逻辑的社会功能和逻辑发展的社会条件两个方面;而界内研究则是作为一个社会系统的逻辑界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研究,它关系

① STS 在后期,其研究已经逐步摆脱了狭义的社会学范畴,这里为了术语的方便,仍然使用这两个字眼,不做区分。

② 数据摘自 1665—1702 年《哲学汇刊》文章分类表。参见 Robert K. Merton,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Howard Fertig, 1993, p.81。

③ Robert K. Merton,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Howard Fertig, 1993, p.55.

④ Robert K. Merton,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Howard Fertig, 1993, p.71.

⑤ 张建军:《关于开展逻辑社会学研究的构想》,《哲学动态》1997 年第 7 期。

逻辑学家、逻辑组织和逻辑学派的行为模式与行为规范研究，逻辑教学与科研的社会分层与发展战略研究等等”。^①在此思路下，我国的一些逻辑学学者进行了探讨，内容主要集中于探讨逻辑的社会功能，逻辑与科学、教育、文化、社会发展等的基本关系。如刘培育组织编写的“逻辑时空丛书”，晋荣东的《逻辑何为：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王习胜、张建军的《逻辑的社会功能》，台湾学者的《中国大陆现代逻辑系统之观察》，等等。

这种基于科学社会学范式的逻辑社会学研究，可视为 STS 视角下逻辑研究的进路之一，将之称为默顿范式的逻辑社会学。而张建军所提倡的逻辑社会学的界内研究和界外研究两条思路，由于逻辑的社会功能属于界内研究的第一个方面，除可在此继续深入（如探讨智能社会对逻辑教学和研究提出的新需求）以外，对于逻辑发展的社会条件研究，以及逻辑界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研究，逻辑学家、逻辑组织和逻辑学派的行为模式与行为规范研究，逻辑教学与科研的社会分层与发展战略研究等，仍有较大的可扩展空间，对于推动当前我国的逻辑学学科发展等仍有重要意义。

二、逻辑知识的社会学进路

逻辑知识的社会学关注作为理论形态的逻辑。逻辑知识，顾名思义，即关于逻辑的知识，也即作为理论形态的逻辑。它指一套必然地保真的推理规则，如分离规则（modus ponens，从 p 和 $p \rightarrow q$ ，推出 q ），或者一套有效的图式或真命题，如排中律（ p 或非 p ，记作 $p \vee \neg p$ ）。这条进路可以扩展出两条子进路。

（一）逻辑知识的争议案例

爱丁堡学派提出的科学知识的社会学（SSK）要对所有知识（包括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其中，爱丁堡学派的代表人物布鲁尔对于逻辑知识（和数学知识）给予了专门的讨论和关注（尽管他没有提出逻辑的社会学或逻辑知识的社会学这些概念）。他将逻辑（和数学）作为“知识社会学中最难克服的障碍”，^②认为它们代表了圣物中的圣物，这些圣物所具有的光环阻止了人们对其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尝试。如果这两部分无法得到社会学分析，那么知识社会学的论断就没有任何说服力。爱丁堡学派由此开启了对逻辑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进路，以社会利益作为解释资源，找出其背后的社会、文化等背景因素。

早期爱丁堡学派主要使用宏观利益的解释资源，针对历史争议案例进行分析。这条进路后期经过巴斯学派的科林斯的进一步细化，在研究对象上不但关注历史案例，也关注当代案例。在研究方法上不但采用了历史分析，也引入了经验研究，如访谈、参与观察等。在解释资源上扩展了利益的内涵，不但包括宏观的社会利益，也包括认识、专业、职业等利益。在案例分析上细化了三步的分析步骤：1. 分析实验数据解释的弹性；2. 展示解释的弹性所带来的争论以及争论结束的机制；3. 把这个工作与更广泛的社会与政治结构联系起来。^③依照这一模式，在逻辑学的争论案例研究过程中，当选择一个争论案例进行研究时，首先展示双方就某问题争论的观点，其次展示在这一争论过程中共识如何达成、双方采用了哪些权宜之计、诉求于哪些解释资源、争论如何结束，最后把这一过程与更为广泛的职业的、哲学的、政治的、社会的等背景联系起来。

由爱丁堡学派所开创并经科林斯所细化的这一进路，可以谓之逻辑知识的争议案例研究进路。在这一进路下，布鲁尔分析了 20 世纪早期发生在逻辑学家莱维斯（Lewis）与贝尔纳普和安德森（Belnap & Anderson）之间关于是用严格蕴涵还是用相干蕴涵来解决实质蕴涵怪论的一场争论，^④库什（Martin Kusch）分析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胡塞尔与弗雷格、罗素等关于逻辑反心理主义的争论，^⑤普尔克奇宁（Jorma Pulkkinen）分析了弗雷格和施罗德无法说服德国的哲学家接受数理逻辑的原因，揭示了其

① 张建军：《关于开展逻辑社会学研究的构想》，《哲学动态》1997 年第 7 期。

② Davi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2n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83.

③ H. M. Collins, “Stages in the Empirical Programme of Relativism”,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11, no.1, 1981, pp.3-10.

④ David Bloor, *Wittgenstein: A Social Theory of Knowledge*, London: Macmillan, 1983, chapter 6.

⑤ M. Kusch, “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cal Knowledge: A Case Study and a Defense”, M. Kusch (ed.), *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cal Knowledg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2000, pp.15-38.

背后的哲学的、社会的与政治的影响^①等。这一模式不但可以分析逻辑历史上的争论案例，也可以分析当代发生的争论案例，展示这些争论中社会因素始终存在，尽管它不一定是决定性的。

（二）逻辑知识的社会史

该进路的主要贡献在编史学上。20 世纪 80 年代，受到数学社会史^②的影响，德国的学者发起了一个项目：建立逻辑社会史的案例研究。^③以逻辑史学家为主的学者致力于对 19 世纪与 20 世纪早期发生在德国与英国的现代逻辑的出现进行历史的分析，试图找出影响现代逻辑出现的外在的因素，如在现代逻辑的起源与发展中，制度与个体之间的互动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主要聚焦于制度因素、性别影响（女性）、^④教育的影响等方面。^⑤该研究主要属于情境主义编史学。逻辑的社会史旨在找出影响逻辑史的社会政治条件因素等，因此，从编史学角度关注社会因素的介入，也就成为逻辑知识的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可能进路，可以扩充逻辑的社会学研究。如布伦伯格·乔蒙特（Julia Brumberg-Chaumont）以社会史的视角分析了中世纪逻辑理论与实践的状态：被作为一种人类学规范与社会规范，用以区分那些“逻辑上不能的人”（logically disable people），逻辑（和语法）从而成为欧洲教育系统的基本课程。^⑥罗森塔尔和布伦伯格·乔蒙特编写的《逻辑技能：社会历史视角》则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角度探讨逻辑的两种观念：一种作为内在的人类能力，一种作为可以训练和掌握的技能，关注历史上的逻辑使用所具有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动态。^⑦

在逻辑知识的社会史这一进路下，现有的 STS 研究大多是关于经典逻辑演绎系统的，而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兴起的逻辑新类型（如非形式逻辑等当代论证理论、非经典逻辑等）则为该进路贡献了有利的案例资源。如非形式逻辑的提倡者、逻辑学家布莱尔（J. Anthony Blair）曾于 2009 年在我国做过一个系列讲座——《非形式逻辑的社会史》，详细论述了非形式逻辑起源及成长的社会背景，即它如何从 20 世纪史格鲁—美国的分析哲学传统以及北美的社会及政治背景下发源及成长起来，^⑧可谓贡献了一个逻辑社会史研究的案例。

而女性主义的逻辑社会史则亦是一条可能的进路。如安德烈·奈（Andrea Nye）曾提供了一个逻辑史的女性主义的视角，贡献了逻辑的社会史研究。她重读逻辑史，发现这个工程排除了特定的群体，让部分人保持沉默。比如，亚里士多德逻辑被设计来排除非希腊人，中世纪逻辑排除了非基督教人，弗雷格逻辑排除了非印欧语系人。三段论是为职业论辩家而生的，以便他们能够在法庭或政治集会上抛出论证。弗雷格逻辑是和他的反自由主义、反犹太主义、超保守主义相一致的。^⑨

此外，学界关于中国古代逻辑（及佛教逻辑）的研究既为逻辑知识的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案例

① J. Pulkkinen, “Why Did Gottlob Frege and Ernst Schröder Fail in Their Attempts to Persuade German Philosophers of the Virtues of Mathematical Logic?”, M. Kush (ed.), *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cal Knowledg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2000, pp.39-60.

② H. Mehrtens, et al (eds.), *Social History of Nineteenth Century Mathematics*,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Business Media, 1981.

③ V. Peckhaus, “Case Studies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cial History of Logic”,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Logic*, vol.7, 1986, pp.185-186.

④ Karin Beiküfner, Andrea Reichenberger, “Women and Logic: What Can Women’s Studies Contribute to the History of Formal Log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vol.6, 2019, pp.6-14.

⑤ C. Thiel, “Some Difficultie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Logic”, V. M. Abrusci, E. Casari, M. Mugnai (eds.), *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di Storia della Logica*, San Gimignano, 1982, pp.175-191.

⑥ Julie Brumberg-Chaumont, “The Rise of Logical Skills and the Thir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the ‘Logical Man’”, C. Rosental, J. Brumberg-Chaumont (eds.), *Logical Skills: Social-Historical Perspectives*, Birkhauser, 2021, pp.91-120.

⑦ C. Rosental, J. Brumberg-Chaumont (eds.), *Logical Skills: Social-Historical Perspectives*, Birkhauser, 2021.

⑧ J. A. Blair, “A Social History of Informal Logic”, the manuscript of the lectures by J. A. Blair at the Institute of Logic and Cogni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2009.

⑨ A. Nye, *Words of Power: A Feminist Reading of the History of Logic*, Routledge, 1990.

资源,^①而反之,逻辑知识的社会史进路亦为中国逻辑史的书写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如何塑造了中国特定的逻辑理论(名学和辩学),三大逻辑传统(印度、中国、古希腊)所受的社会限制以及文化制约如何造成了不同的三大逻辑知识体系,逻辑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如何,这是逻辑社会学可以深入探讨的地方。

三、逻辑实践的社会学进路

逻辑实践的社会学关注作为实践活动的逻辑。这种活动既包括了逻辑学家构造逻辑知识的活动,也包括了特定文化群体的实践推理与论证活动。

(一) 逻辑学家构建逻辑知识的实践研究进路

STS 在 SSK 之后出现了实践转向,即后 SSK,其所关注的重点也从静态的科学理论知识转向动态的科学实践。后 SSK 相比于 SSK,对于逻辑的关注则更为稀少。由于后 SSK 所关注的实践大多是自然科学的实验与实验室实践,是实验、仪器、设备、实验室内外的社会技术网络的建构等,^②在面对这些高度理论化与形式化的学科时,逻辑的实践似乎并没有类似于这些实验室、仪器、设备等的对应之物。后 SSK 的代表人物拉图尔认为,对于形式科学,目前还没有人有勇气对之进行一种仔细的人类学研究,而这项工作应该是应该做的。^③皮克林探索了建构四元数概念的实践,却没有对逻辑展开探索,但他认为这是一个亟待开发的领域,^④“我们仍然对理论的、概念的实践知之甚少”。^⑤后 SSK 尽管没有专门针对逻辑实践进行系统研究,但在后 SSK 的视域中,仍可发现其逻辑实践主要指向逻辑学家构造逻辑知识的实践。在这一“发现的语境”中,后 SSK 研究逻辑学家如何构造和选择逻辑定理、规则、理论等,故皮克林对于数学概念实践的探索,拉图尔设想的对于形式科学的人类学探索,都属于此类。进入 21 世纪后,罗森塔尔(Claude Rosental)受拉图尔的影响,结合实验室研究和争论研究,以人类学的参与观察的方式,分析了 20 世纪 90 年代关于模糊逻辑的一场争论,^⑥其成果被称为“第一部系统地经验地探索形式逻辑的社会学研究的著作”。^⑦而罗森塔尔也是在 STS 领域明确提出逻辑的社会学概念的学者,他的著作《编织自明:逻辑的社会学》的副标题明确地使用了“逻辑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logic)这一字眼。这些研究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考察逻辑学家在构造逻辑系统、逻辑知识时所进行的实践活动,揭示在这一动态实践过程中各种异质性因素的影响等,这也由此成为逻辑社会学的一个可能的进路。

(二) 另一种实践活动:人们的推理论证实践的研究

这是基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兴起的当代论证理论(非形式逻辑、广义逻辑、语用论辩术等)而提出的一种新思路,可将之纳入逻辑的社会文化研究,并借鉴 STS 研究方法扩展这种研究,使之成为逻辑的社会文化研究的一个可能进路。它主张探讨不同文化群体的推理和论证的具体实践,由此展开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分析等等。这种扩展基于以下几点思考。

1. 逻辑学中的自然转向。自然转向在这里用来指逻辑学对于经验世界的关注所带来的转向,关注逻辑的实践性和经验性。加拿大逻辑学家约翰·伍兹(John Woods)在 2013 年出版的《推理之谬:将推论逻辑自然化》中曾用过这个术语,这里用它概括 20 世纪中期以后逻辑学研究的动向,可以把它分

① 布鲁尔曾在其《知识与社会意象》中设想了可供替代的数学与逻辑。

② A. Pickering, "From Science as Knowledge to Science as Practice", A. Pickering (ed.),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1-26.

③ B. Latour, *Scientific in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46.

④ A. Pickering, *The Mangle of Practice: Time, Agency, and Science*,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114.

⑤ A. Pickering (ed.),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140.

⑥ C. Rosental, *Weaving Self-Evidence: A Sociology of Logic*,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⑦ C. Greiffenhagen, "A Sociology of Formal Logic? Essay Review of Claude Rosental's 'Weaving Self-Evidenc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40, no.3, 2010, pp.471-480.

为“认知转向”与“实践转向”^①两个取向。逻辑更多关注人类高级认知活动，以及人们具体的论证实践。在经典逻辑之外，陆续出现了认知逻辑以及非形式逻辑、广义逻辑等逻辑新类型。这种取向为思考逻辑与社会、文化、实践等的关系提供了有利的背景。

2. 自觉逻辑与自发逻辑的划分。逻辑哲学家苏珊·哈克曾将逻辑划分为自发的逻辑（*Logica utens*）与自觉的逻辑（*Logica docens*）。^②自发的逻辑指向人们实际推理和论证的实践，自觉的逻辑指向人们对于推理和论证实践的理论阐述，从自发逻辑到自觉逻辑，是一个从非形式论证经过符号化表达，而形成形式论证的过程。STS 对于逻辑的反思主要针对逻辑学家构造逻辑系统的实践，即针对自觉的逻辑实践，探讨这一动态过程中社会的、文化的、认知的以及物的等因素的影响，而对自发的逻辑实践需要加以关注。

3. 形式化的目的与限度。苏珊·哈克曾将非形式论证与其形式化表达之间的符合问题视为逻辑哲学的中心问题。人们的具体论证实践作为非形式论证，其评价既有逻辑的方面，也有修辞的、论辩的方面，而形式逻辑只发展了其逻辑的方面，即保真的方面。哪怕在形式演绎系统中，经典逻辑是最核心、应用范围最广的部分，但也有其特定的限度，如它不能表达时态、模态、道义等，因此才通过添加具体算子或修改基本公理等方式形成各种非经典逻辑。而对非形式论证中修辞、论辩维度的关注也促使了逻辑学“实践转向”、当代论证理论等的出现。

4. 广义逻辑等当代论证理论对于具体论证实践的关注。当代论证理论挑战了形式逻辑在刻画日常论证与推理方面的局限性，强调关注人类社会生活具体论辩实践。形式逻辑不能完全刻画人类的具体论证实践，在形式化过程中，论证的各种丰富信息被忽略掉。如把形式演绎逻辑应用于当代社会与政治论证领域，一些问题就会开始出现。比如当把命题逻辑或谓词逻辑应用到日常论辩时，在把自然语言翻译为符号表达的过程中，经常会存在争议。又比如，翻译完成以后，会出现如下情形：一个论证在形式上是演绎无效的，但实际论证却是令人信服的；或者一个演绎有效的论证，实际论证却可能是前提真而结论假的结论。演绎逻辑对于有效性和无效性的评判标准并不适用于区分日常论证中的好论证与坏论证。基于此，北美兴起了非形式逻辑运动，荷兰发展了语用论辩术，试图对于日常生活领域中的非形式论证重新进行分析和评价，着重关注当代社会日常论证中——那些发生在报刊和杂志上的公共领域中的社会的、政治的论证——语用的、情境的、论辩的和修辞的维度，进行论证的识别、分析和评价，找出它的论证类型、论证结构、论证图式和论证规范。进而，如果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等出发进行考虑，关于阿赞德逻辑的争论历史也表明，形式逻辑不是一个合适的文化比较的工具，尤其是面对非西方人的论证，需要一个更为丰富的逻辑概念。^③由此而出现的广义逻辑主张关注不同文化群体的论证规则，将逻辑视为说理和论证规则的集合，并由此展开对于不同文化群体论证实践的社会学、人类学等经验科学的研究。^④

逻辑学中这种对具体论辩实践的关注以及由此形成的逻辑新类型，可视为对于自发的逻辑实践的关注，可以将其纳入 STS 研究视角中，由此扩充实践的概念，使之既包括自觉的逻辑实践，也包括自发的逻辑实践，从而扩展 STS 的研究进路，使之既包括针对逻辑学家构建逻辑系统的实践活动的研究，也包括不同群体具体论证实践的研究。目前 STS 学者主要发展了前者，后者正是需要扩展的领域。

5. STS 学者对于自发逻辑实践的关注。从自发逻辑实践探讨逻辑的社会学，这条进路尽管没有展开，但从布鲁尔到拉图尔等 STS 学者对此都有关注。如果回溯布鲁尔的研究，早在他的《知识与社会意象》中，他就曾根据阿赞德逻辑的案例对此有所探讨。面对阿赞德逻辑显然（apparently）包含有

① J. Woods, Ralph H. Johnson, Dov M. Gabbay, et al., “Logic and the Practical Turn”, Dov M. Gabbay, Ralph H. Johnson, et al. (eds.), *Handbook of the Logic of Argument and Inference: The Turn Towards the Practical*, Amsterdam: Elsevier, 2002.

② S. Haack, *Philosophy of Log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16-17.

③ C. Greiffenhagen, W. Sharrock., “Logical Relativism: Logic, Grammar, and Arithmetic in Cultural Comparison”, *Configurations*, vol.14, no.3, 2006, pp.275-301.

④ 鞠实儿：《广义论证的理论与方法》，《逻辑学研究》2020 年第 1 期。

矛盾的推理，布鲁尔提醒我们直面这种论证实践，启示我们跳出现有的形式逻辑知识框架去重新思考作为论证实践的逻辑。布鲁尔通过分析阿赞德人具体的论证实践，指出这里并没有矛盾，在阿赞德逻辑的案例中，既存在人们集体共享的推理模式，也存在与这种模式相关的各种理论阐释，后者即是各种逻辑理论和逻辑系统。布鲁尔指出，这种理论阐释在有些社会中得到高度的发展，而在阿赞德社会中，这种理论阐释达到的程度最低。依据布鲁尔对于知识的社会学定义，知识是集体共享的信念，那么逻辑知识既包括演绎逻辑知识体系，也包括人们集体共享的推理模式。因此，阿赞德逻辑是阿赞德人集体共享的推理模式，具有其合理性，它在阿赞德人的实际论证中建构起来，需要我们深入其论证实践中去考察。

可以说，布鲁尔是在对于演绎逻辑的反思中重建他的逻辑社会学分析框架，探求社会文化因素对于逻辑的影响的。这种探求由此发展出一个二分进路：通过对演绎逻辑知识体系（如对逻辑规则）的社会学分析，他指出演绎逻辑知识体系所具有的社会本性，指出可能存在可供替代的逻辑，如三值逻辑与二值逻辑处于同一个水平面；而通过对阿赞德逻辑的讨论，他又指出一个特定民族的推理规则可能因社会文化而不同，阿赞德人亦是这样一个可能拥有不同推理模式的民族。因此，无论是对前者，还是对后者，都要纳入社会学分析中。殊途同归的是，拉图尔将形式系统视为计算的中心，认为其是行动者网络系统中建构网络的一个重要因素和手段。他对于阿赞德逻辑对称性的思考，也彰显了他对于逻辑实践的关注。

以上思考构成了本文主张的一种逻辑社会学研究的新进路：基于当代论证理论。一方面扩充实践的概念，使之包含人们的推理论证实践，即自发的逻辑实践；另一方面持大逻辑观，^①针对的研究对象是特定社会文化群体的论证实践与论证方式。在这一进路下，罗森塔尔对公共游行作为一种劝说与修辞工具所具有的政治与文化维度的探讨，^②克斯（W. Keith）等引入论证理论开展的针对科学政策的论证与对科学理论的批评研究，^③鞠实儿等针对中国古代论证实践的分析，^④以及利伯曼（K. Liberman）对于西藏辩经活动的人类学观察等，^⑤都是针对特定论证领域（政治论证、科学论证等）以及特定文化群体（中国古代、佛教）的论证实践和论证规则的探讨，这都是在此方面的有益尝试。

四、结语

STS 视角下的逻辑研究整体上较少，但这确实是一个从社会文化角度理解逻辑的非常显著的尝试。而“逻辑的社会文化研究试图表明，逻辑也是社会学探索、人类学观察以及历史学分析的对象，是探索智识活动的物质与社会形式的有效的数据对象，可以纳入社会文化研究的范畴”。^⑥通过从逻辑学中借鉴其研究成果，扩展 STS 的逻辑研究进路，由此形成逻辑社会学的三条研究进路，探讨逻辑与社会文化之互动关系。三条进路各有其优势所长，彼此又有所交叉，可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逻辑。因此，逻辑的社会学这一概念包含了一套基于理论的经验研究，是对逻辑进行理论与经验研究的逻辑学与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的一个交叉分支，是逻辑学与 STS 的交叉分支，它拓展了 STS 的逻辑研究进路，也拓宽了逻辑学的研究视野，对于推进 STS 研究、逻辑学研究以及逻辑史的编写方法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徐博雅

① 根据张建军老师关于基础逻辑与应用逻辑的划分，演绎逻辑属于基础逻辑，推理模式属于应用逻辑。参见张建军：《走向一种层级分明的“大逻辑观”——逻辑观两大论争的回顾与反思》，《学术月刊》2011年第11期。

② C. Rosental, “Toward a Sociology of Public Demonstrations”, *Sociological Theory*, vol.31, no.4, 2013, pp.343-365.

③ William M. Keith, W. Rehg, “Argumentation in Science: The Cross-Fertilization of Argumentation Theory and Science Studies”, E. J. Hackett, O. Amsterdamska, M. Lynch, J. Wajcman (eds.), *The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3rd e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8, pp.211-239.

④ 鞠实儿、何杨：《基于广义论证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以春秋赋诗论证为例》，《哲学研究》2014年第1期。

⑤ C. Rosental, “Certifying Knowledge: The Sociology of a Logical Theorem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8, no.4, 2003, pp.623-644.

⑥ C. Rosental, “Certifying Knowledge: The Sociology of a Logical Theorem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8, no.4, 2003, pp.623-644.

经验世界中交互主体性的本原性思考

——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阿伦特*

高 燕 李美娟

[摘 要]与胡塞尔、海德格尔一样,阿伦特重视对“本原”问题的现象学研究。但由于胡塞尔、海德格尔和阿伦特三位思想家各自的思想旨趣不同,他们对现象学“本原”的解释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又进一步集中地呈现在他们对“主体”的把握上,使得他们奠基于各自“主体”观的对交互主体问题的分析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与胡塞尔把交互主体性奠基于“先验自我”、海德格尔把“共在”视为“非本真的”不同,阿伦特对日常经验世界中交互主体性之本原地位的说明,拓展了现象学在交互主体性问题上的解释视域。

[关键词]本原 自我 此在 行动者 交互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2)12-0051-08

克劳斯·黑尔德曾在其《世界现象学》中指出,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对人类的世界开放性的分析中,有一个特殊类型的世界并没有作为世界而得到认识,那就是作为政治生存向度的世界,而阿伦特的政治思考是弥补现象学中这一维度之缺失的努力。^①这种从政治的生存向度所展开的世界即是阿伦特的日常生活的经验世界,它既不是胡塞尔意义上的被悬搁起来以便发现其真正本质的自然状态的世界,也不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作为沉沦之域的非本真的世界。日常生活的经验世界是阿伦特运用现象学方法所开出的一个基本的“政治实事”,与这一实事根本相关的就是经验世界中的交互主体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使得其思想一方面呈现出类似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考的特质,另一方面又区别于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发展出了关于交互主体性的一种新的解释类型。

一、现象学的三种旨趣

诚然,对胡塞尔、海德格尔甚至阿伦特来说,现象学的基本精神都是其运思基础,但是这三位思想家对现象学方法的运用却有着不同的旨趣。

作为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指出,现象学要“回到”本原(实事)上去,“面向实事本身”,以能够对人的经验的本质结构进行描述。现象学本质上是一种“还原”,是从经验对象本身转向它们与经验主体的相关性,因此现象学从根本上来说是要回到意识的意向活动中去。胡塞尔的全部工作都可以被看

*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现象学交互主体性的世界性问题研究——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阿伦特”(GD22CZX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高燕,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美娟,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 510006)。

① [德]克劳斯·黑尔德:《世界现象学》,孙周兴编,倪梁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作一种摆脱哲学的历史混乱，从而严格地依赖于“本原的”直观。海德格尔把存在的“日常状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尤其重视哲学术语在古希腊时的本原意义，就此而言，他同样想回到“本原”中去，现象学对他而言，是让生活经验本身从其本身所是来显示其自身的方法，是对生活把其自身揭示为“何所为”的存在论追问。这种强调“本原”之重要性的做法对阿伦特的思想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她注重把握某些观念在古希腊人用法中的本原意义的巨大价值。当阿伦特考察在古希腊人的日常理解中政治领域如何从本原上不同于人的生活其他领域，进而希望复兴古希腊人对政治行动的原初表达和澄清“积极生活”的基本内容时，她的现象学思考的兴趣指向“我们的存在和经验的最基本的素材”。^①

正是由于对本原的这种强调，胡塞尔、海德格尔和阿伦特都极力规避对传统哲学解释的依赖，基于各自的研究旨趣去澄清本原性问题。胡塞尔致力于寻找在现象学上自明的“始基”，而世界作为一种在经验上自明的根基必须要被悬搁掉，“这种以自然的经验明见性为根据的世界存在不应当再是对我们不言而喻的事实”。^② 转向作为所有判断的自明基础的“我思”（ego cogito），意味着真正自明的是“我思”的意向结构，而非其经验内容。在胡塞尔看来，“在这反思的生活中所经验到的那个世界，在这里仍然像以前那样以某种方式继续精确地与它每次都具有的内容一道被我所经验到的。它继续像它以前所显现的那样显现着，只是我作为哲学上的反思者，不再贯彻对世界经验的自然而然的信仰，不再保持这种信仰的有效性，尽管与此同时该信仰还在那里，并为注意的目光所同时把握。”在此，重要的是在事物的被给予中去描述（而不是解释）事物及其对自我的意义。这样，“自我”就摆脱了任何“设定”或立场的携带，“我就可以把我自己纯粹地把握为我”。^③ 换句话说，虽然自我是沉浸于世界之中的，持续地经验着世界和对世界感兴趣，然而一旦我们把自我的这一兴趣置于括号中，自我就把其自身构建为“无兴趣的旁观者”。

海德格尔认为，哲学的历史产生了许多混淆和误解，因此必须通过重新考察关键性的术语在古希腊的“本原”意义，才能真正敞开“存在”的问题域。就海德格尔在现象学上的旨趣来说，他所感兴趣的是“像事物本身所是的那样观看事物”，而非诉诸哲学的历史。在他看来，现象学特别意味着“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④ 就此而言，海德格尔把现象学解释为“解蔽”或“揭示”隐藏着的东西。与胡塞尔把对世界的解释与对世界之存在的接受在现象学的悬搁中括起来，在括号外剩下的“剩余”就是纯粹描述的对象的想法不同，海德格尔认为，“现象学描述的方法论意义就是解释……此在的现象学就是诠释学。这是就诠释学这个词的源始含义来说的，据此，诠释学标志着这项解释工作。”^⑤ 可以说，海德格尔在胡塞尔把世界的存在加括号起来是否有效的问题上背离了胡塞尔，“解释”成为海德格尔思考的一个方法论工具。

阿伦特的现象学思考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都有差别，但一般来说，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更为接近。在现象学研究的旨趣方面，如果说胡塞尔关心的是如何通过哲学为所有科学提供一个基础，海德格尔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此在的生存论分析让存在的意义自行显现的话，那么阿伦特的特殊目的就是去解释和批判“政治”领域，对“政治”生活进行现象学解释。如扬·布鲁赫所指出的，“如果海德格尔主要关注和关心的是存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的话，那阿伦特主要关心的就是行动——观看人们的话语和业绩。”^⑥ “她的理解的概念，作为摆脱偏见的达到‘实事本身’的方法，以及她对政治现象的本质的关注把她显示为一个‘胡塞尔式的’思想家，因此我们可以在她的著作中找到关于政治生活的解释学现象

① Hannah Arendt, “What Is Existenz Philosophy?”, *Partisan Review*, vol.13, no.1, 1946, p.51.

② [德] 埃德蒙德·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张廷国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③ [德] 埃德蒙德·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第27-28页。

④ [德]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41页。

⑤ [德]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4页。

⑥ Elizabeth Young-Bruehl, *For the Love of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26.

学。”^①

正因阿伦特的主要关切点是政治的问题，她对现象学的变更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最初胡塞尔对纯粹意识或先验（超越论的）意识的抽象研究。在她看来，现象学思考应该更多地强调描述经验和某些事情的显现的任务，描述它们如何“显现”和它们如何“被给予”的任务。例如，当描述古希腊政治领域时，阿伦特指出，它是人的生活中唯一一个可以被视作“公共的”领域。成为“公共的”一个维度就意味着“去显现”（to appear）、“去被看到”。在此意义上，“公共的”被理解为一种构造现实性的显现：“某些东西在他者面前的在场保证了这个东西的现实性”。^②

在阿伦特看来，“世界中的所有事情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即它们显现，且因此会被赋予相应感觉器官的有感知能力的生物看到、听到、触摸到、品尝到、闻到和被感知到”。^③“显现”界定着世界和世界性的存在者，更进一步而言，对象和存在者的去显现的倾向指示了对作为一个接收者的旁观者的需要：“在其自身的存在不预设一个旁观者的情况下，在这个世界中就不存在任何东西和任何人……就其显现而言，没有任何东西是独一无二存在的；所有存在的东西都必然要被某人所感知”。^④因此，成为活生生的存在者，就意味着被自我展示的迫切性所占据。

可见，对于阿伦特而言，不仅现象具有首要性，而且现象的显现还意指着一种交互关系的维度。就是说，活生生的存在者的显现的基本目的包含着与作为另一个感知者的人的相互关系。“所有活生生的东西都有着一种去显现的迫切性，使其自身与显现世界相适切且不是去显示其‘内在的自我’，而是作为个体的它自己的迫切性。”^⑤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为阿伦特所独具的倾向——对“差异性”（distinctness）和“关联性”（connectedness）的重要性的强调。这种特属于人的“差异性”以及其必然配对的“关联性”对阿伦特而言即是政治领域的真正标志，具有本质重要性。

那么，阿伦特的现象学思考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推进呢？海德格尔曾指责胡塞尔把自我在一个实际存在的世界中的经验也置入括号中，因而在他自己对“此在”的构造中，世界与此在这个主体在根本上是相关的，它不能被加入括号中。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不同，在阿伦特的思想中则隐含了这样一种洞察：她注意到，重要的是保留“实事本身”对我们的意义和从“日常状态”来“看待实事本身”的态度，而不是把像世界的实际存在这样的基本经验置于括号中，从而牺牲了这些基本经验。对阿伦特而言，这些基本经验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即是日常生活中的多元行动者，他们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性质就是具有与他者交往的倾向和要求。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虽然试图避免在胡塞尔那仍然残存的唯我论倾向，但是正如《存在与时间》中显示的，海德格尔把日常生活的某些基本的方面看作“非本真的”，而这在阿伦特看来是一幅不充分的，以及有时甚至是扭曲了的世界理解图景。可以说，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忽略了“此在”的全部可能的政治维度和交往维度，如伯恩斯坦（Bernstein）所言：“我认为海德格尔没有阿伦特用‘多元性’所意味的那种深刻意义——这是她的政治思想中的最基本的概念”。^⑥

当然，海德格尔可能会说，政治是一个存在者层次上的关切，而不是存在论层次上的关切。但对阿伦特而言，政治和交往内在地是个体人的交互主体和存在论的方面，是最基本的政治“实事”，故不可轻易地将之视为“非本真的”。就此而言，阿伦特看到了现象学方法——从实事本身对我们的显现去看待实事本身和它们如何对我们是有意义的这个观念——的主要价值，同时却没有陷入胡塞尔和海德格

① Mildred Balkan, “Hannah Arendt’s Critical Appropriation of Heidegger’s Thought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Don Ihde and Hugh Silverman (eds.), *Descriptions*, Albany: Sunny Press, 1985, pp.226-227.

②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50.

③ Hannah Arendt, *Life of the Mind*, 2 Volumes (Thinking), Mary McCarthy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78, p.11.

④ Hannah Arendt, *Life of the Mind*, 2 Volumes (Thinking), p.19.

⑤ Hannah Arendt, *Life of the Mind*, 2 Volumes (Thinking), p.29.

⑥ Richard Berstein, *Hannah Arendt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London: Cambridge Press, 1996, p.191.

尔现象学所引发的困境。也许，她在《精神生活》中的这段话就是针对胡塞尔与海德格尔而说的：“所有的唯我论理论——无论它们是从根本上断言只有‘自我’存在，还是更加温和地认为，自我以及它对它自身的意识是可证实的知识的主要对象——都是与我们的存在和经验的最基本素材相矛盾的。”^①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说，阿伦特在《人之境况》中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Who are we？）——在很多方面都是对“自我是谁”，尤其是“此在是谁？”的回答与反击，^②因为恰恰是在如何理解主体的问题上，胡塞尔、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现象学思考呈现出了更深刻的根本性差异。

二、“自我”与“此在”

在胡塞尔那里，主体被解释为“自我”（Ego），这是所有现象学的真正自明的基础。他赞同笛卡尔的“我”只有作为“自我”“我思”才是自明的观点，哲学上的所有其他问题都是围绕这一点而构建起来的。世界的存在由于其自己是非自明的而必须被置于括号中。结果就是，“自我”在他的先验的（超越论的）现象学中是“非世界性的”（worldless），这一转向之所以对胡塞尔是必然的，原因在于他的哲学尝试以典型的笛卡尔式的不带任何先入之见为开端。就此而言，胡塞尔的“自我”具有“不感兴趣的”“中立”的特征，这是与沉浸于世界中具有自然“兴趣”的个人相对立的。

胡塞尔对主体的上述理解与其哲学研究的旨趣——建立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相一致，而要建立为所有科学奠立基础的哲学，就必须以现象学还原为基本方法，找到问题的始基。通过本质还原，排除了任何有关存在之客观存在性的设定，排除了任何有关个别存在和个别意识的判断，从而把握本质，进而使科学知识成为可能；先验还原则排除了对意识的一切人类学、心理学的外部说明，从而转向对内部的纯粹直观及其相关项的意识分析。在这个基础上，世界被归结为先验自我的意识的构造活动，“只有通过还原，对象的内涵才能得到如实的分析，就像它原本地、不加缩减地展现给意识的那样，并且只有通过中止判断和现象学的还原，反思才能无成见地对原本的被给予方式进行分析。”^③

现象学经过先验还原后留下了“现象学的剩余”，即“先验自我”或“先验意识”，一切客观知识的构建乃至世界都是这个先验自我构造的产物。在此意义上，“先验自我”是“独一的”。然而，胡塞尔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去证明这样构造起来的客观世界与其他人构建的世界乃是同一个世界？先验意识所构造的客观知识、真理等如何获得他人的认同？正是为了摆脱“先验还原”后剩下的“先验自我”所可能导致的唯我论指控，胡塞尔开始研究自我与其他自我的相互关系，并提出了交互主体性的观念。因为作为严格科学的现象学要真正实现其“面向实事本身”的要求，就必然要说明客观世界的构造如何具有普适性，超越论的现象学要真正从超越论上为世界的构造奠基，就必须考虑到世界是交互主体地构建起来的，世界对一切人来说都是同一个世界，否则“这门不仅是由我独自一人‘唯我论’地来从事的、而且还应当与许多人一起共同来从事的先验现象学就始终还悬在空中”。^④

基于此，胡塞尔描述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交互主体关系。在他看来，“自我”内在地就有一种对“其他自我”的把握，即使在悬搁的还原中，对我们而言明白无疑的是，我是作为“世界”的一个成员而存在的。“‘在’我之‘中’我经验并认识到他人，在我之中他人得以构造出来——共现地映现出来，但并不作为原本的东西”，^⑤由此而被揭示的是一个“自我的共同体”，一个向着他者和与他者一起的“单子共同体”（community of monads）。这转而间接地揭示了一个客观世界的存在，在其中，我们都是以经验着彼此的方式存在。然而，无论是在动机联系的指引下以同感为基础去把握陌生意识的可能性，还是力图通过结对一意向重叠、共现—相似性统觉来澄清对他者的经验，在胡塞尔对他者的描述中，他者始

① Hannah Arendt, *Life of the Mind*, 2 Volumes (Thinking), p.46.

② Jacques Taminiaux, *The Thracian Maid and the Professional Thinker*, Albany: SUNY Press, 1997, p.15.

③ [德] 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31页。

④ 转引自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143页。

⑤ [德] 埃德蒙德·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第203页。

终只是由自我出发去设定和被经验到的。究其原因，在于胡塞尔把自我与他者的交互主体关系奠基于先验的“自我我思”，在他看来，世界的全部意义，包括他人的意义，只有在自我我思活动中才有可能，对他人经验的澄清也必须在此意义上展开。因此，他者并不具有他的本己性，而只是先验自我的一种变体，即“他我”。交互主体关系只是意识领域中自我意识如何影响陌生意识的“思想游戏”，无法通达日常的现实交往。^①

海德格尔并不认同胡塞尔把主体等同于“自我”的这种描述，他批判胡塞尔的自我，尤其是先验自我“把人定义为统一到一个自我中的经验的凝聚、行为的核心”，是对笛卡尔主义残余的保留。在他看来，“这种传统把人划分为理性和感性、灵魂和身体、内在和外在的定义，缺乏一种把这些现实结合为一个整体的意义”。^②为了超越这一传统，海德格尔以基础存在论中对“此在”的描述来诠释他对主体问题的把握。在他看来，现象学首先是一种解释学现象学，应该被理解为“（生活经验）对实际生活的一种基本运动的明确把握”。^③因为生活有着通达和“前反思地”反思其自己的经验的能力，因此，现象学与有着这种能力的存在者（此在）相关。

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这个术语避免了关于这种存在者是什么的预设，解释把人的事实性视作它所指向的对象，^④“事实性（facticity）是我们用来指示‘我们’‘自己的’此在的存在特征的名称”。^⑤此在不是某种在手之物，它不是一个“什么”，而是一个“谁”。对此在之“谁”总是“用我自己、用‘主体’、用‘自我’来回答的。这个谁就是那个在变居不定的行为体验中保持其同一性的东西”。^⑥以这种方式来回答“此在是谁”的问题虽然避免了像对待其他任何实体那样看待“此在”，但仍然可能会误导我们，把我们指向笛卡尔的“不容置疑的我”，指向由于它的孤立而“是谁”的主体。对此，海德格尔强调：“在世的澄清曾显示出：首先‘存在’的或一直给定的从不是无世界的单纯主体。同样，无他人的绝缘的自我归根到底也并不首先‘给定’”。^⑦“他者”总是已经与我们一起在那儿了。从“此在”的“谁”出发，在世存在的世界就是一个“共同世界”（Mitwelt），“在之中”是“与他者共在”。^⑧作为在世存在的此在，我们原初地就处于像我们自己一样的其他此在之中，由此，胡塞尔的先验交互主体性与日常交往之间的鸿沟得到消解。

“此在的世界所开放出来的有这样一种存在者：它不仅根本和用具与物有别，而且按其作为此在本身的存在这样一种存在的方式，它是以在世的方式‘在’世界之中的，而同时它又在这个世界中以在世界之内的方式来照面”。^⑨这个存在者既不是上手存在的事物，也不是任何现成的东西，而是“它也在此，它共同在此”。他人与我们没有什么区别，而我们也是其中一员。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是我的“此在”与其他人的“此在”所共同拥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在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此在“本质上是在共在”。即使他人没有实际在场，没有面对面的照面，“共在也在生存论上规定着此在。此在之独在也是在世界中共在。”“独在”恰恰是以共在为背景才可能去“独”，因而“独在”恰好证明了“共在”。^⑩

① 高燕、王国栋：《交互主体性的“世界性”基础》，《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② Theodore Kisiel, *The Genesis of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49.

③ Martin Heidegger,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with Respect to Aristotle: Indication of the Hermeneutical Situation(1922)", *Man and World*, vol.25, 1992, p.359.

④ John van Buren, *The Young Heidegger: Rumor of the Hidden K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94.

⑤ Martin Heidegger, *Ontology: The Hermeneutics of Facticity*, John van Buren (trans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

⑥ [德]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33页。

⑦ [德]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35页。

⑧ [德]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37页。

⑨ [德]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38页。

⑩ [德]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38页。

然而海德格尔在讨论“在之中”时，又把日常的共同存在视为“沉沦”，因而是“非本真的”，从而使得他在“在世共在”层面对交互主体性问题的表达变得模糊不清。海德格尔把日常生活等同于“公众性”，在他看来，沉沦于日常生活中的“此在”在其中发现自身的世界是人们日常关注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暗淡无光的”：是对自身的占有。“此在”消散于它的日常生活中，不仅错过了世界，而且忽略了它“自身”。其结果就是“此在”“向着存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实现其自己的可能性的能力——消散于“他们”的自身中。就此而言，只有逃离日常生活世界才能称为“本真的”，基于此，海德格尔转向了此在的内在性，倾听良心的呼唤，本着“向死而在”去筹划最本己的可能性，才能超越此在的“日常性”。

可见，海德格尔把“共在”作为此在“在世存在”的基本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胡塞尔把交互主体性奠基於先验自我，从而有可能造成世界中的自我与他我割裂的问题。但他把日常的“共在”不加区别地贬低为“沉沦”状态、“平均”状态，又使他的分析禁锢于存在论的领域内，忽略了日常经验世界中主体间交互关系在政治维度上的本原意义。

三、经验世界中的“行动”者们

在阿伦特看来，海德格尔严格地把“无兴趣的”“中性的”“此在”置于世界中的做法是相对于胡塞尔的主体描述的一种进步。当然，胡塞尔的“自我”从未丧失“作为意义境域”的世界，而是失去了“这样存在着”的世界，海德格尔的“此在”则总是把其自身理解为“在那里”、展开的、世界性的和有兴趣的——这些性质是不能轻易地置于括号中的。

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不同，阿伦特的“主体”主要是一个“政治”主体，从根本意义上讲是在日常世界中与其他主体处于交往关系中的主体。就此而言，虽然海德格尔摒弃了胡塞尔的“自我”的“彼世性”而提出一种“世界性的”“此在”，但因其不彻底性，阿伦特最终拒绝了这两个思想家对主体的描述，因为他们都把主体的特征描述为“过于单一性”。如巴罗（Barnouw）所言：“海德格尔把现代原子化和孤立的经验公式化为自我（自身）的有意义的唯一性和单独性对青年阿伦特有着吸引力。但是阿伦特马上又看到了这是德国精英们未能成功应付现代社会发展的失败征兆”。^①

阿伦特认为，海德格尔“对这种自我的最本质的特征描述就是海德格尔的绝对自我主义，它从基本上与它的所有同伴分离”。通过“把现实带回到自我中……关于存在的意义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问题（显然对这种哲学更加基本的）是关于自我（Self）意义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事实上显现为不可回答的，因为带入其绝对的孤立中的自我是无意义的”。^②因此，她批判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此在”诠释是自我中心的和宏伟的（“使人成为之前存在论中的神之所是”），是具有欺骗性的（“人只是显现为存在的诸样式的凝聚”），是与对人的关切的传统相对立的。^③

阿伦特自己通过她对日常经验中“积极生活”的解释来展现她对主体的思考。在她看来，日常经验世界中的人有三种基本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其中，“行动”优于劳动和工作，是唯一需要他者或他人在场的活动。“行动”由言说和行动构成，必然是相互交往的和最属人的活动。如她在《精神生活》对“显现”（appearance）的讨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言说需要听者，行动和业绩需要见证者。思考活动本质上也是交往活动，因为它是与一个人自己的无声对话。因此，思考被包含在言说中。“我们的精神活动……是在言说中——甚至是在交流之前——构建起来的，因为言说意味着被听见，话语意味着能被其他同样能去言说的诸他者所理解、没有言说的思考是不可想象的。”^④我们内在的精神生活与我们外在的

① Bagmar Barnouw, *Visible Spaces: Hannah Arendt and the German-Jewish Experi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65.

② Hannah Arendt, “What Is Existenz Philosophy?”, *Partisan Review*, vol.13, no.1, 1946, pp.49-50.

③ Elizabeth Young-Bruehl, *For the Love of the World*, p.219.

④ Hannah Arendt, *Life of the Mind*, 2 Volumes (Thinking), p.32.

言说生活必然是相互关联的：“精神活动，其本身是不可见的……只有通过言说才能彰显出来……思考的存在者——仍然属于显现的世界（the world of appearance），即使他们从精神上撤退出世界中——有着一种去言说的迫切性，且因此使得那些否则就不能作为显现的世界的一部分彰显出来”。^①

回到阿伦特对行动的讨论上看，行动区别于其他活动的标志就是“主体的多元性”，每一个主体都是不同的。行动是政治领域的活动，通过行动，主体显示出了它最属人的性质，因为充分表达的自由使得人成为人——一种言说和行动的能力。一个人只有通过政治活动去展示和塑造这个人是“谁”（即他或她的个体性），才可以获得他（她）自己的完全的自我，而要把这种个体性塑造为他或她是“谁”，在他或她独自一人时是不可能的，必须要依赖于与诸他者的交往。与他者一起言说和行动发展和揭示了每一个主体的独特性（distinctness）。因此，行动优先于劳动和工作就在于它能“出离于”孤立状态。这是与海德格尔所描述的“此在”之“谁”相对立的。海德格尔认为，“生存论性质和范畴乃是存在性质的两种基本可能性。与这两者相应的存在者所要求的发问方式一上来就各不相同：存在者是谁（生存）还是什么（最广义的现成状态）”。^②阿伦特则表示，人不能仅仅通过降生为人而获得“谁”的身份，某人是“谁”需要终其一生来塑造。

阿伦特在这点上所显示出来的独特性是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思想中所没有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那里，纯粹地提及的“他者”必然是空洞的和抽象的，未能把握住在她看来具有基本的重要性和意义的（其本质是多元性的）交互主体性。本哈比伯就曾指出：“尽管海德格尔——通过他把此在的世界性描述为一种共在形式——使得人的多元性的经验成为人之境况的构成性因素，但是他的生存论分析的基本范畴，并不是在阐明人的多元性，而是为个体的不断增长的原子化、孤独和日益高涨的无世界性进行辩护。”^③

不可否认，海德格尔的确看到了其他“此在”、其他主体并不仅仅是像家具在世界中那样存在，这些“此在”不是对“此在”而言的“在手存在”或“上手存在”；相反，当遭遇其他此在时，“此在”发现自身是其中一员。就此而言，海德格尔对“此在”的描述不能独断地被贴上“唯我论”的标签，因为他从根本上把“此在”置于其他“此在”之中。然而，对海德格尔做这种辩护并不意味着笔者赞同海德格尔的交互主体性理论和阿伦特的交互主体性理论是同质的。这样说的根据是，如前所述，海德格尔在阐释“此在”在日常状态中如何与他者联系时明确表明，“此在”被“他们”“常人”所包围，并消散于其中。尽管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贬损或蔑视，但海德格尔对“他们”“常人”和“沉沦于他者中”这些短语的使用却确实是用来界定“此在”生存的“非本真”样式的。与之相对，阿伦特认为，当主体是交互主体时，就主要地和必然地是最“本真的”，这是与海德格尔的“此在”几乎相反的看法，此在的“本真性”等同于它的“本己性”。“在海德格尔那最终显现为‘沉沦’的东西，是所有立足于人与他的同伴生活于世界中这个事实上的人的那些存在样式。”^④海德格尔的思想更多的是“一种关于死亡、罪责、决心和沉沦的存在主义。后者的最显著的方面就是它们在方法论上的彻底的唯我论：它们只与一个人的自身相关。并不是那些哀悼一个人的东西，也不是我所留下的重要的东西，而是我，这个独一的个体，必须死亡”。^⑤

此外，对阿伦特而言，交互主体性本身是脆弱的，是最值得人们去努力维护的东西，也是使一个人成为完整的“人”的东西。这个表达所蕴含的张力是，没有他者的在场，一个人就不可能成为他的本己、自己。因此，虽然海德格尔在他对“此在”的理论化中的确尝试去反思人的这种“在一起”（togetherness），

① Hannah Arendt, *Life of the Mind*, 2 Volumes (Thinking), p.98.

② [德]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3页。

③ Seyla Benhabib, *The Reluctant Modernism of Hannah Arendt*,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6, p.56.

④ Hannah Arendt, "What is Existenz Philosophy?", *Partisan Review*, vol.13, no.1, 1946, p.50.

⑤ Seyla Benhabib, *The Reluctant Modernism of Hannah Arendt*, p.106.

但阿伦特呈现了关于这种“在一起”的更优越的解释。其对海德格尔的推进之处在于她对人之“一起”的处理方法和态度是海德格尔没有意识到的，即“此在是谁”的问题只能通过对每一种言行的共享从存在论上加以拒斥才能回答，这种总是牵涉他者的主体从根本上不同于海德格尔的主体概念。

同样，胡塞尔关于交互主体性的描述，也没有达到阿伦特从我们对他者的经验中所想要达到的理想。阿伦特关于在日常经验世界中从事政治活动的行动者们的“在一起”，所反映的并不是胡塞尔建立在“先验自我”基础上的“单子共同体”。事实上，当胡塞尔用莱布尼茨的“单子”（monade）这个术语来指涉与他者联系的主体时，对阿伦特而言这恰恰是对主体的封闭性的、冷酷的和抽象的描述。虽然胡塞尔也表达过，“我们不仅个人地、而且是与彼此一起去看、去听”，^①但他并没有承认和重视“多元性和行动现象之间的一种本质的联系”。^②这意味着胡塞尔从未注意到政治生活或积极生活的优先性问题。

由此可见，阿伦特的“主体”非常不同于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主体”，其原因就在于阿伦特的“主体”为了完全地成为它自己、表达它自己和实现它自己，就必然要牵涉和需要日常经验世界中的其他主体。她在“他者”问题上推进了对“主体”概念的讨论，从而更加充分地发展了一种对主体的相互依赖性和相互交往的解释。在此，不再是一个独一的唯我论的主体，或一种对“他者”的纯粹“经验到”，或非本真的“与他人共在”，这些对主体的任何孤立的、疏离的描述，都或多或少是对诸主体的真实的日常交互依赖性和交往性，以及主体的真实的日常生活经验的误解。

四、结语

阿伦特也许会控诉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只是象征性地把他们的主体停留在劳动和工作的层面上，在此，他者、其他主体的在场或缺席是无关紧要的。然而我们在劳动或工作的层面上并不是真正的“人”，只有在行动上来考虑主体，即“摆脱对物的依赖而更多地关注人自身存在的丰富性和价值所在”，^③人才能得到最大程度上的实现，而这就需要与诸他者相互交往。这里的他者不是大写的他者，而是作为具有差异性的独一无二的主体。阿伦特认为，“人的差异性并不等同于他者性……他者性只是多元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为什么我们的所有界定都是有差别的原因……他者性的最抽象形式只有在无机对象的纯粹重复中才能找到……但是只有人才能表达这种差异性且把他自己区别开来，并且只有他才能作为他自己，而不是作为纯粹的某物去交流。”^④在此，可以说，在这三个思想家中，只有阿伦特抓住了日常经验世界中每一个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不可置疑的、不能还原的交互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对海德格尔来说，此在是共在，那么对阿伦特来说，就是共在是此在。人的经验本原是与他人一起的。而胡塞尔自我—他我模式最终仍奠基在自我—理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上，因而仍然置身于西方传统哲学之中，无法摆脱这个传统本身所具有的严重问题。^⑤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阿伦特对待主体的态度比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更具优越性，她对主体的解释呈现了最具体的和最少抽象的主体描述。

责任编辑：罗 苹

① Jacques Taminiaux, *The Thracian Maid and the Professional Thinker*, p.30.

② Jacques Taminiaux, *The Thracian Maid and the Professional Thinker*, p.30.

③ 赵中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属性与形态特征》，《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2期。

④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76.

⑤ Mildred Balkan, “Hannah Arendt’s Critical Appropriation of Heidegger’s Thought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Descriptions*, p.227.

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

国际化社区基础设施与文化适应的互动机制^{*}

李俊良

[摘要]田野调查发现,族群关系发展相对平稳的国际化社区,按国际移民文化适应策略差异,可分成“自我区隔”“主动融合”“平行适应”等类别。其中“主动融合”“平行适应”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区隔中有融合”,其内在核心要素是“基础设施”与“文化适应”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政策性工具的社区融合项目,在族群融合方面产生引导和催化作用,使族群关系不断发展变迁。为此,基础设施与文化适应策略应当是相匹配的,须完善社区基础设施,提高国际化社区的“组织完整性”,才能构筑和谐的社区族群关系。

[关键词]国际移民 文化适应 基础设施 国际化社区 治理

[中图分类号] D66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2) 12-0059-05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维度

据联合国移民署发布的报告,全球移民过去50年不断增加。尽管新冠疫情造成干扰,但2020年仍有2.81亿人居住在非出生国,比1990年的1.53亿人多出约1.28亿人。^①移民增加使我国不同城市先后出现一些国际移民聚居社区,这些社区的产生对城市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挑战,也成为学术研究热点。回顾文献,近年来学术界对国际移民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论证,产生了如下解释移民问题的理论工具和学说观点。一是描述移民动因的“理性选择论”。如列文斯坦(E.G.Ravenstein)提出的“推拉理论”,及之后美国学者提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新古典主义移民经济理论”等。^②二是描述移民过程的“社会网络论”。移民的流动不单单是个体或群体的单独行为,而是整个社会网络的迁移结果。^③三是描述移民结果的“文化适应论”。如古典同化论、多元文化论、分层同化论、多元文化适应模型等。^④四是描述移民双向流动与社会发展的“跨国主义论”。^⑤该理论认为,移民在移居地建立起新家庭、新社区的同时,与祖籍地保持着频繁有序的金融、产业、贸易、文化、政治等联系。^⑥五是过去十年间出现的“基础设施论”。有学者将移民基础设施定义为推动或约束个体流动的一系列彼此相互连接的制度因素、技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粤港澳大湾区外国移民聚居社区治理的比较视野与本土构建研究”(19BMZ09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俊良,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副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180)。

①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22,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world-migration-report-2022>, Dec 6, 2022.

② 傅义强:《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述略》,《世界民族》2007年第3期。

③ Charles Tilly, “Trust Networks i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Sociological Forum*, vol.22, no.1, 2007.

④ 周敏、黎相宜:《国际移民研究的理论回顾及未来展望》,《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6期。

⑤ 周敏、黎相宜:《国际移民研究的理论回顾及未来展望》,《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6期。

⑥ Alejandro Portes, “Introduction: The Debates and Significance of Im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Global Networks*, vol.1, no.3, 2001.

术力量、社会主体和关系网络,并且对移民基础设施进行了分类。^①上述理论分别从不同学科的角度描述国际移民问题。

国内与现有对移民基础设施的表述最接近的概念是“服务与管理”。但其适用主体是政府等监管机构对移民的研究,不能涵盖如跨国移民中介、移民社会支持网络、移民人道主义救助等问题。而基础设施理论能扩充移民研究的表述空间,能更深层次对移民问题进行探讨,有利于移民实践问题在中国的话语展开。此外,现有对移民文化适应理论的分析多从文化冲突与调适并结合文化适应测量等方法进行。聚居社区研究则着重于治理方式与模式分析。现今存在的各种理论,缺少关于国际化社区、移民、国家治理三者之间关系的理论表述。为此,本文通过田野调查提出基于中国实践的移民基础设施与文化适应分析框架,即国内族群关系发展平稳的国际化社区,按国际流动人口文化适应策略差异,可分成“自我区隔”“主动融合”“平行适应”等类别。其中“主动融合”与“平行适应”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区隔中有融合”,其内在核心要素是“基础设施”与“文化适应”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围绕“基础设施”与“文化适应”阐释以下问题。第一,基础设施与文化适应的相互关系是国际化社区族群关系治理的重要适用基准,作为政策性工具的“社区融合项目”^②是如何促进移民文化适应的。第二,变化中的移民文化适应类型如何反作用于社区基础设施的转型升级。第三,透过基础设施与文化适应的互动实践,探寻构筑和谐社区族群关系的分析路径。

二、田野点概述与分类

本文的一手资料来源于参与观察和访谈,二手资料来源于政策文本、媒体报道、学术研究文献等。田野点包括:广州(越秀区B社区、番禺区Q社区、白云区W社区、天河区X、P社区、南沙区M社区)、深圳(南山区S、Z社区);佛山(南海区R镇H社区、南海区K镇J社区、顺德区L镇A社区、禅城区Y社区);东莞(东城区D社区);武汉(东湖开发区T社区、江夏经济开发区E社区);义乌(稠城街道G社区、江东街道F社区)。其中,国际流动人口较多的社区有2000人以上,较少的有300—500人。呈现数据来源于社区所在地出入境、治安管理部门及外国人在华商会组织等。

国际化社区可按移民来源国、肤色种族、经济发展水平分类,同样也可以按移民在当地的文化适应策略分类。其一,自我区隔型。大多由外国企业和工厂组成,形成一个闭环封闭生活圈,类似于制造业的“超级工厂”。社区中所有的生活设施都相当完备。移民透过内部自我的组织和文化维系机制即可以得到满足,对外无过多接触,基本处于封闭区隔状态。如东莞D社区周边日资工厂企业。其二,平行适应型。移民采取“和而不同”的社会适应策略。^③个体组织自己的生活并形成相对固定的生活方式。不能简单认为平行适应的移民不能融入本地生活,而是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即社区基础设施的构建,使他们对“主流族群”和社会有更积极的心态。整体来看,广州天河区X社区,深圳南山区S、Z社区,义乌稠城街道G社区属于这类型。其三,主动融合型。移民非常积极主动融入当地,社区构建的语言学习平台、文化活动都踊跃参与。移民希望能对主流文化有更多的认知乃至相互认同。整体来看,广州越秀区B社区、义乌江东街道F社区属于这类型。一般而言,精英化程度较高的移民在获取主动融合资源方面的能力比普通移民群体更强,因而不需要改变原有平行适应的文化整合策略。这解释了在社区融合方面,来源于第三世界移民的主动融合意愿更大,而来源于经济发达国家移民的主动融合需求更小。

三、基础设施促进移民的文化适应

(一) 人道监管设施建立的边缘群体互信

^① Lin Weiqiang, Johan Lindquist, Xiang Biao, et al., “Migration Infrastructur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Migrant Mobilities”, *Mobilities*, vol.12, no.2, 2017.

^② 林淑仪、李迎生:《1990—2020年西方国际移民社区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基于CiteSpace的图谱量化分析》,《社会建设》2021年第5期。

^③ 吕红艳、郭圣莉:《和而不同:组织化高层次移民的社会适应策略——以上海日韩移民为例》,《中国第三部门研究》2021年第21卷。

公安部门是移民监管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实践中,出入境管理部门管理签证,地方治安管理部门管理实有人口,派出所对外国人进行住宿登记并走访核查。社区执法中,偶尔会发现“三非”、难民等“边缘群体”。对边缘群体除了直接适用遣返政策外,近年来部分国际组织在中国社区提供了人道主义救助方案。如国际移民组织开展的“协助自愿返回与重新融入计划”,联合国难民署也为难民提供帮助。Mohamed 是索马里人,2011 年 10 月在武汉某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中文学习,2012 年其父亲被杀害,他失去经济来源无法继续学习。居住在武汉江夏经济开发区 E 社区的 Mohamed 向联合国难民署申请难民身份,得到每月 1200 元人民币的经济援助。(2020 年 10 月 23 日访谈)这些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对“边缘群体”帮助很大,使他们在过渡期内减少危害社会的风险,使社区、监管机构和边缘群体之间建立良好的互信关系。

(二) 社会商业技术设施营造的平行适应环境

完善的社会商业技术设施有利于移民保持自身的文化边界。其一,“互补共生”的餐饮生态。这种生态一般由国际社区自身具有的族群多样性逐步发展起来。如广州越秀区 B 社区、白云区 W 社区的商业配套,是在国内清真餐饮、朝鲜餐饮基础上逐步发展并形成独具特色的餐饮街区。其二,不断完善的商业配套。广州番禺区 Q 社区约有 2000 名国际移民。新西兰男教师 Adam 来华多年,居住在这里的最大原因是喜欢这里的环境,空气新鲜非常干净。但他认为刚来社区的时候商业设施不足会觉得不适应,如果有更完善的社会环境和商业设施,能帮助他与中国人更好相处。(2019 年 11 月 27 日访谈)其三,多样且完备的宗教设施。广州越秀区 B 社区非洲、中东人聚居的重要原因是周边 3 公里有多个清真寺和基督教堂。同样,深圳南山区 Z 社区也聚居大量移民。社区除了外国人管理服务工作站外,还有小型天主教堂。外籍教友多来自欧洲、美洲。据李神父介绍,来这里做礼拜的以 40 岁以上女性居多。(2021 年 9 月 4 日访谈)除每周的外文弥撒外,其他环境下移民和本地居民交流比较少。近年来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外国人跟中国人的交流明显增多。但总体而言,Z 社区外籍居民融入本地心态并不强烈,停留在平行适应状态。其四,开放的网络社交与完整的生活指引。Z 社区教堂活动的公告都依靠互联网技术,中外教友不需刻意交流即能获取完整信息。外国人管理服务工作站有网络公众号,定期发布社区融合项目信息、外国人招聘信息等。借助信息技术,移民和本地居民的交流变得更少。信息技术成为移民继续保持其传统文化和身份倾向性的基础。

(三) 社区融合项目促成的主动融合

“主动融合”表现为移民不满足于平行适应,选择“整合”的文化适应策略,参与社区社交、互助乃至社区治理。社区融合项目对移民的文化适应策略产生引导和催化效应。其一,社区语言平台促进了文化接触。深圳南山区 Z 社区经常举办多元文化主题活动,语言类活动包括:“文化碰撞”“专题聚焦”“初识深圳”“语言交流”等。广州部分大学周边社区开设了汉语培训班,很多韩国人都报读了相关课程。通过大概半年的学习,大多数韩国人都能掌握一些简单的中文。(2022 年 7 月 24 日访谈)其二,社区志愿者项目增强了移民对中国的归属感。移民在中国不单满足于衣食住行和金钱,也需要精神层面的依赖,希望在异国融入族群,更深融入中国文化。深圳运作多年的外国志愿者项目,为移民的主动融合创造了条件。志愿者 Francis 把深圳当作了第二故乡,“我特别喜欢深圳,也适应了这里的气候和饮食,当你在一个地方有归属感时,你就会把它当作自己的家。”(2022 年 3 月 4 日访谈)其三,文化参与项目帮助移民在中国构筑新的社会维系机制。跨国主义论、社会网络论认为,移民迁徙不只是人的流动而是网络在流动。移民在异国主动融入主流社会,不但是对主流社会的一种逐渐形成的认同,还是一种组织结构的维系方式。这种主动融入为移民在非祖籍国带来了更多机会,继而维系着相同族群内部文化、信仰、生活方式、经济财富和权力声望。维系的方式不只是网络的自我完善,而是期望原有的组织结构或网络得到更大的发展。Francis 除了当志愿者,还担任加纳驻中国社团深圳分团副秘书长,为分布在深

圳周边的加纳人提供防疫信息。其四,社区防疫应急支援,促进移民对中国社区治理工作的理解,有利于文化的交往融合。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武汉东湖开发区T社区生活用品紧缺,社区工作小组接到留学生默罕默德的救助信息,家中几个月大的宝宝奶粉告急。社区联系下沉党员沟通确认宝宝所需奶粉后,及时送到家中,当晚苏丹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发来感谢信。(2020年10月23日访谈)此类事件为我国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增强了外籍居民对中国社区工作的理解,促进了移民在社区的主动融合。

(四) 完善监管和持续投入重塑社区关系

顶层设计使执法监管更完善。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后,监管基础设施有了主导部门,使管理更科学高效。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外籍违法人员清理工作开展艰难:“我们执法都是很多部门一起,街道、社区、出租屋管理中心、物业、出入境、治安、城管、工商、外管等十几个部门。有的外国人当着执法人员把护照国籍撕掉,当年制度不完善,识别处理他们需要公安、外管部门花很大的力气,制度完善后比当年好多了。”(2022年7月13日访谈)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重塑了居民对移民的评价。多年前“三非”非洲人很多,对非洲人在华形象造成负面影响。近年来社区本地居民对非洲人的心态有所变化。佛山禅城区Y社区有很多非洲人,居委会主任认为:“我眼里面没有白人、黑人、有色人种区分,更多是时间问题。”(2020年8月13日访谈)广州越秀区B社区的一线社工也认为:本地居民对外国移民的观感和排斥并不单纯是肤色、种族、文化问题,最重要的是有没有持续做好社区融合工作。

四、新的流动性聚集:迁徙与基础设施变迁

(一) 新的流动性聚集

移民正不断迁徙,并形成了“马赛克式”^①新的流动性聚集点。以佛山为例,外国人口排名前7位来源国是日本、印度、美国、韩国、马里、也门、尼日利亚。日本人和韩国人主要分布在日资韩资化工企业。美国人主要集中在禅城区东瑞路的公寓以及环球国际公寓、岭南尚苑。印度人分布在顺德乐从,以开设代表处贸易公司为主。马里、也门、尼日利亚人主要聚集于广佛交界的恒大御景湾以及里水与金沙洲交界的楼盘,部分散居于禅城区佛山宾馆、百花商务酒店和附近公寓式酒店。^②里水一带的楼盘是非洲人聚集区域,如金名都、时代糖果等。他们平时在广州活动,从事商贸旅游和短期石油工作。迁徙动因方面,有学者对广州非洲人的迁徙做过研究,证明非洲人正从广州往外迁徙,并且政府的管控力度加大会明显提高非洲人的迁居频率。^③此外,有学者比较了广州的非洲移民和较晚出现的义乌的非洲移民与当地融入程度的差异,认为国家行政部门的专业化程度、执法效率和对移民的态度,对非洲人在当地生活的难易程度有相当影响。^④由于治安问题,多年前广州对国际社区进行了专项整治,导致了移民的迁徙,周边地区的移民服务管理机构应运而生,社区融合项目也快速发展起来。

(二) 移民文化适应转变促进新的基础设施构建

1. 新冠疫情下的基础设施变迁。其一,疫情期间移民从平行适应变得更趋向主动融合,带动基础设施变迁。佛山南海区H社区有1000多来自乌干达、尼日利亚等国家的外国人,^⑤是典型的“候鸟型”社区,非洲人早上在广州批发市场,晚上回H社区居住。疫情期间,公安部门专门搭建一些应急融合项目,包括德语、阿拉伯语、缅甸语翻译。还专门设工作组在H社区开展对外服务。村居配备了流动外语工作人员,派出所下设外国人服务站。基础设施的快速投入一定程度上对族群间的相互理解产生积

① [加]奥古·弗莱克斯、常永才等:《加拿大多元文化治理模式在后民族国家时代的革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② 数据来源于出入境部门2020年8月13日的统计。

③ 柳林、梁玉成等:《在粤非洲人的迁居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广州、佛山市的调查》,《中国人口科学》2015年第1期。

④ Adams B. Bodomo and Grace Ma, “From Guangzhou to Yiwu: Emerging Facets of the African Diaspora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Renaissance Studies*, vol.5, no.2, 2010.

⑤ 数据来源于公安部门2020年8月13日的统计。

极影响。其二，基础设施从临时转化成常态。H社区外国人管理服务工作站原来是临时机构，疫情后成为当地派出所的常设机构，翻译也由临时工作变成了长期工作，重要的是社区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被完整保存，这些监管性基础设施成为今后社区治理的重要基础。

2. 移民久居异地的文化适应转型与基础设施升级。其一，移民在中国落地生根，文化适应方式转向主动融入。佛山南海区K镇有外国人472人，9人拿到绿卡，17户19人次已自购房，66户66人通过中国配偶自购房，基本是事实婚姻，并非单纯为护照假结婚。^①很多移民越来越融入本地生活，因应移民需求，该镇J社区周边开办了K镇伊顿御景半岛双语幼儿园、南海双语实验学校、K镇和顺元耕山语湖双语国际学校3所国际学校。K镇吸纳了来自喀麦隆、马达加斯加两名外国志愿者，^②为社区移民提供服务。其二，商业需求和移民的文化适应转向衍生了民间基础设施。顺德L镇每年有外国客商5万多人次。“L镇外国人管理服务中心”前身是“外国人俱乐部”，由L镇家具城商会自行组建。商会常驻单位会员120个，涵盖来自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沙特阿拉伯等国的300多个自然人。^③L镇外国人主要从事商贸流通业，有很多与本地居民通婚。L镇外国人中心服务齐全，如子女入学、求医、来华申请延期居留等。中心与外事部门有前置的审批协调，根据外国人在华的长期评价表现和积分给会员一些优先的服务，费用完全由家具城商会承担，不收会员费用。社区配备了一站式行政服务，每年都举办联谊活动。（2022年7月15日访谈）此外，周边2公里内有L镇A社区礼拜殿，主麻日大约能容纳100多人，附近有伊斯兰特色餐饮一条街，相关设施非常完备。

3. “国际化街区”蓝图与新的基础设施构建。为吸引全球资金和人才，近年来深圳出台了《关于推进国际化街区建设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的实施意见》，广州也在“十四五”期间选定10—15个社区进行国际化试点，我国自上而下的国际化社区创建已驶入快车道。广州南沙区M社区作为试点，从零开始以移民主动融合的文化适应类型打造社区基础设施。首先，做前期准备。摸查社区人口情况，引入深圳南风社会工作服务社、香港现场管理学会等专业团队；到天河区X、P社区参观学习完善社区工作制度、居民公约，为社区创建提前奠定基础。其次，逐步完善监管设施。在M社区增加2名工作人员，负责社区创建工作，对接联络居民，收集和解决居民各类诉求。再次，提升商业设施的基建配套。与区外办、执法局、街道、碧桂园集团开展座谈，引入大企业，结合全域治理规范社区绿化、亲水休闲、道路整洁等工作；整合资源，落实社区内标识中英双语改造。最后，高标准构筑社区融合项目。联合组建各类志愿者队伍开设英语培训班，结合辖区居住地党员组建中文培训班等。M社区是“国际化街区”蓝图的一个缩影，全国各地正全面铺开此类跨越式发展的社区建设。但M社区负责人坦言，他对构建“国际化街区”不了解且心里没底。据统计，社区内实际居住的外国人非常少，社区配备的数字化设备在实际运作中使用的人很少。为此，是否需要如此扩张式地投入主动融合型的移民基础设施尚存疑问。

五、结语

现有国际化社区基础设施构建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考虑国际影响和移民的需求，迁入地财政承受巨大压力。二是防疫期间基础设施增长需特殊手段，衍生了很多临时基础设施，如语言、餐饮、心理疏导、外管协调机制等。三是未成型的基础设施与族裔经济导致“候鸟”“马赛克”现象。从国家治理立场看，移民维持主动融合或平行适应的文化适应策略有利于族群关系稳定，因此基础设施的构建需以达致这一平衡为基准。基础设施与文化适应策略应当是相匹配的。因此，应契合社区经济文化发展和移民文化适应策略配备适合的社区基础设施。此外，除因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外，外国人管理服务工作站覆盖面不能铺得太大。一方面对社区的管理作用不明显，另一方面也会产生更多碎片化的“马赛克式”的移民聚居社区。因而有的非洲社团提出“非洲街”的倡议，或许也能成为将来研究的备选项。

责任编辑：许磊 王冰

^① 数据来源于佛山南海区K镇派出所外国人管理部门。

^② 数据来源于佛山南海区K镇派出所外国人管理部门。

^③ 数据来源于佛山顺德区L镇外国人管理服务中心。

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文本挖掘及量化评估^{*}

蔡立辉 戴胜利 马王荣

[摘要] 利用内容分析法对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文本进行挖掘,结合政策文本主题词构建政策评估变量体系,通过PMC指数模型对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成效进行量化评估,进而探究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特征及成效,有助于为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参考。研究表明:38项政策中,1项政策评估结果为优秀,30项为良好,7项为可接受。政策发布、政策受众以及政策时效成为政策的主要特征;政策工具需要组合发挥效力;政策内容的全面性以及政策激励措施亟待优化和完善。

[关键词] 环境治理 智慧城市 政策评估 PMC指数模型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2)12-0064-08

截至2021年5月,中国智慧城市试点建设总数已达290余个,^①智慧城市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环境污染,^②促进了环境保护进程,逐渐进入深水区。在后智慧城市时代,智慧城市生态环境已成为人工生态系统,随着人口、资本、信息、技术的波浪式涌入,智慧城市的生态环境发生变化,环境破坏和污染频发,如城市通风不畅,热岛效应增加,步行空间破碎,光污染、噪音污染加剧,电磁辐射等。传统的城市环境治理以人机监管模式来运行,已无法适应智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需要,通过科学合理的政策来协同治理城市环境污染势在必行。因此,中央及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等政策,使依靠政策工具来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城市环境问题成为可能。^③智慧城市环境治理作为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一个新问题,逐渐演变为智慧城市发展需要面临的社会公共问题,亟需通过政策工具来予以有效实现。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综述

第一,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方式研究。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方式对智慧城市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城市环境治理。有学者介绍了智慧城市智能环境治理和社区管理,通过设计与智能城市环境治理相一致的环境资源管理系统,加强智能社区的环境资源管理能力。^④有学者探讨了城市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环境可持续以及社会凝聚力来支撑,以动态和图形化的方式展示出西班牙智能城市战略在环境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跨域生态环境整体性协作治理模式研究”(18AZD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蔡立辉,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戴胜利,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632);马王荣,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①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97个城市入选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中国建设报》2015年4月14日。

^② 石大千、丁海等:《智慧城市建设能否降低环境污染》,《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6期。

^③ 时和兴、雷强等:《提升新时代城市环境治理能力——广东佛山破解工业城市环境治理困局的探索》,《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5期。

^④ T. M. Vinod Kumar, *Smart Environment for Smart Cities*, Singapore: Springer, 2020, pp.1-53.

管理方面的发展状况。^①有学者以共享经济为契机,探讨绿色出行以及低碳出行在智慧城市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发现共享单车和地铁相结合能够促进环境有效治理。^②有学者分析了“文明城市”品牌评选活动对城市环境治理的作用,从实证的角度论证了“文明城市”评选对智慧城市污染治理和改善具有一定的作用。^③

第二,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模式研究。有学者探讨了城市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分析了城市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行为及过程。^④有学者分析了雄安新区与京津冀智慧城市圈的环境治理,通过构建智慧城市圈环境协同治理目标管理体系,促进水系、大气污染的有效治理。^⑤有学者分析了物联网和互联网+等智慧环保技术在智慧城市环境治理中的预警和监测功能,构建出城市环境治理的新模式及解决方案。^⑥此外,还有学者就数字新技术在智慧城市环境治理中的趋势进行了预测。^⑦

第三,智慧城市环境治理规划研究。有学者认为智慧环境是智慧城市的空间维度,分析了智慧城市特定区域下的智慧环境战略,通过AHP设计了智慧环境的评估标准,探讨了智慧城市在自然灾害下的天气恢复能力。^⑧有学者提出印度政府施行的智慧城市战略能够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环境指标主要包括景观、地理、气候、大气污染、水资源、能源和城市绿地等,依靠大数据监测和评估促进智慧城市管理。^⑨有学者研究了政府颁布的“智慧城市”“低碳城市”以及“环境保护法”等政策法规对城市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作用,发现这些法规对城市环境治理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⑩此外,有学者利用定性研究法分析了万隆市政府智慧环境政策的发展实践,认为智慧环境具有三项核心策略,即创建主题公园作为公共开放空间、恢复和振兴河流及其河岸、建设城市园艺或城市农业。^⑪

综上所述,国内外已有文献在研究智慧城市环境治理的方式、模式和规划的基础上,还从现代城市环境治理的效率、^⑫治理技术、^⑬治理主体、^⑭治理措施^⑮等方面进行研讨。在智慧城市环境治理工具方面,公共政策则是智慧城市环境治理的一项重要工具。现有的智慧城市环境治理相关政策是否科学?政策内容是否适当?政策效力如何?政策是否能满足智慧城市建设以及环境变化的需要?上述问题皆不得而知。因此,对于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有效评估势在必行。同时,当前鲜有关于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的相关研究。因此,本文参考学者彭向刚在评估养犬规制政策时所运用的内容分析法,^⑯构建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PMC指数模型,对国家及地方层面发布的智

① Neus Baucelt Aletà, Concepcian Moreno Alonso and Rosa M. Arce Ruiz, “Smart Mobility and Smart Environment in the Spanish Citie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rocedia*, vol.24, 2017.

② 肖倩冰、陈林等:《智慧城市之共享经济与环境治理——以共享单车低碳出行为例》,《中国软科学》2021年第9期。

③ 逯进、赵亚楠等:《“文明城市”评选与环境污染治理:一项准自然实验》,《财经研究》2020年第4期。

④ 张建伟、谈珊:《我国城市环境治理中的多元共治模式研究》,《学习论坛》2018年第6期。

⑤ 司林波、吴振其:《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践逻辑与运行模式——基于协同学理论的分析框架》,《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⑥ 周博雅、徐若然等:《智慧环保在城市环境治理中的应用研究》,《电子政务》2018年第2期。

⑦ 陈晓红:《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融合与应用创新趋势分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⑧ Ateş M, Önder D E., “A Local Smart City Approach in the Context of Smart Environment and Urban Resili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esilience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 2021.

⑨ R. Dwevedi, V. Krishna and A. Kumar, “Environment and Big Data: Role in Smart Cities of India”, *Resources*, vol.7, no.4, 2018.

⑩ 逯进、赵亚楠等:《“文明城市”评选与环境污染治理:一项准自然实验》,《财经研究》2020年第4期。

⑪ Tutik Rachmawati and Priska Diah Pertiwi, “Smart Environment Program, Smart Way to Smart City”, *Policy & Governance Review*, vol.1, no.1, 2017.

⑫ 张雅博、孙钰:《基于智慧城市理念的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提升研究》,《城市》2019年第12期。

⑬ 段妍婷、胡斌等:《物联网环境下环卫组织变革研究——以深圳智慧环卫建设为例》,《管理世界》2021年第8期。

⑭ 刘悦美、田明:《嵌入与转换: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环保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7期。

⑮ 梁浩贤、杜伟明等:《澳门智慧城市建设与降低环境噪声的进展(英文)》,《声学技术》2020年第5期。

⑯ 彭向刚:《城市养犬的政府规制效果评估——基于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学术研究》2021年第6期。

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进行量化评估和比较分析,探索当前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优劣势,以期揭示当前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不足,为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与优化提供理论支撑。

基于此,本文试图探讨以下问题:中央及地方政府发布的有关智慧城市环境治理的政策有哪些?这些政策的核心语义内容是什么?政策发布机构针对智慧城市环境治理的政策设计是何种架构?智慧城市环境治理的政策工具运用情况及成效如何?应采纳何种措施来调整和优化当前的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

二、研究设计

(一) 数据获取

为保证研究数据的完整性及科学性,在搜集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文本过程中,遵循下述策略展开:首先,分别以“智慧城市环境”“生态智慧城市环境”“生态城市环境”“城市环境治理”“智慧城市环境保护”等为关键词,通过中国知网政府文件数据库进行检索;其次,访问“北大法宝”专业数据库,检索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方面的政策文本进行补充;再次,访问中央人民政府、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国家部委门户网站以及逐一人工访问省市级政府机构网站,检索有关政策文本;最后,借助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进行检索,以补充遗漏政策。

(二) 样本选择

通过数据获取方法,共搜索到智慧城市环境治理各种文本条目共 1222 条,对获取的政策文本进行筛选。首先,依据政策文本发布的内容及时间,剔除 2010 年以前城市环境治理方面的政策,^①保留与智慧城市有关的政策文本;其次,利用人工筛选的方法,删除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方面的公示、函件、标准、通报、案例以及新闻等,最终得到有效政策文本 38 份(表 1)。

表 1 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文本统计

政策名称	发布时间	发文号	发布部门
1.“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2022/1/24	国发〔2021〕33 号	国务院
2.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指导意见(试行)	2021/11/19	环环评〔2021〕108 号	生态环境部
3.“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2021/11/15	工信部规〔2021〕178 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
4.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	2021/11/10	国办发〔2021〕40 号	国务院办公厅
5.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2021/11/2		中共中央、国务院
6.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2021/10/24	国发〔2021〕23 号	国务院
7.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	2021/10/21		中共中央、国务院
8.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4/8/27	发改高技〔2014〕1770 号	发改委 8 部门
.....			
34.重庆市深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方案(2015—2020 年)	2015/9/2	渝府办发〔2015〕135 号	重庆市政府办公厅
35.关于加快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	2020/10/11	鲁政办字〔2020〕136 号	山东省政府办公厅
36.深圳率先打造美丽中国典范规划纲要及行动方案(2020—2035 年)	2021/2/8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37.北京市污染防治攻坚战 2021 年行动计划	2021/3/3	京政办发〔2021〕3 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
38.关于统筹加强“油、路、车”污染治理的通知	2021/11/30	黔环气〔2021〕7 号	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

(三) PMC 指数模型

PMC 指数模型(Policy Modeling Consistency)是指政策一致性指数模型,用于量化评估政策效果。PMC 指数模型方法能够衡量政策文本的优劣势,并通过 PMC 曲面图直观展示公共政策各维度的优劣效果,成为国际上比较先进的政策评价方法。PMC 指数模型目前已经被用于产业经济政策、^②科技服务

① “智慧城市”的概念由 IBM 公司于 2010 年才正式提出。
② 蔡冬松、柴艺琳等:《基于 PMC 指数模型的吉林省数字经济政策文本量化评价》,《情报科学》2021 年第 12 期。

政策、^①人才使用政策^②等方面评估，而鲜有将该模型用于环境政策定量评估的研究。故而，本文选择 PMC 指数模型方法对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进行量化评估。

1. PMC 指数模型计算过程。按照 Mario Arturo R. Estrada 的计算过程和步骤，^③

$$X: N[0 \sim 1], \text{ 其中 } X \text{ 为一级变量;} \quad (1)$$

$$X = \{XR: [0 \sim 1]\}, \text{ 其中 } X \text{ 为一级变量;} \quad (2)$$

$$X_i \left[\sum_{j=1}^n \frac{X_{ij}}{T(X_{ij})} \right], i = 1, 2, 3, 4, 5, \dots, \infty, j = 1, 2, 3, 4, 5, \dots, n; \quad (3)$$

$$PMC - index = \sum_{i=1}^m (X_i \left[\sum_{j=1}^n \frac{X_{ij}}{T(X_{ij})} \right]), i = 1, 2, 3, 4, 5, \dots, m, j = 1, 2, 3, 4, 5, \dots, n \quad (4)$$

其中 i 为一级变量, j 为二级变量取值, t 为每个一级变量下属二级变量的数量。

2. PMC 指数模型一致性等级。构建 PMC 指数模型的多投入产出表, 依据 PMC 指数模型计算结果, 结果划分为“不良”“可接受”“良好”和“优秀”四个等级(表 2)。

表 2 PMC 指数一致性等级

一致性等级	可接受	良好	优秀	完美
PMC 指数	0~4.99	5~6.99	7~8.99	9~10

3. PMC 曲面图构建。根据 PMC 计算结果构造矩阵, 绘制 PMC 曲面图。PMC 曲面图能够立体直观且根据不同颜色区域来反映政策不同测评维度的得分高低, 凹凸不平的不同曲面区域代表着每个政策得分的高低程度, 从而来区分不同政策的优劣程度。依据政策评估的 9 个一级变量, 来构建一个 3*3 的矩阵, 然后绘制 PMC 曲面图。

$$PMC\text{-曲面} = \begin{bmatrix} X_1 & X_4 & X_7 \\ X_2 & X_5 & X_8 \\ X_3 & X_6 & X_9 \end{bmatrix}$$

三、实证研究

(一) 文本挖掘

1. 高频词统计。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文本进行挖掘, 能为智慧城市环境治理变量设计及参数设定提供参考。本文利用主题词语义网络分析方法, 对 38 项政策内容进行文本挖掘。首先, 对 38 份政策文本进行整合和数据清洗, 将清洗后的数据借助 ICTCLAS 软件对智慧城市环境政策文本进行分词; 其次, 通过 ROSTCM 软件统计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高频主题词, 过滤连接词、形容词、地名词等无实际意义词语。经统计, 得出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文本高频主题词(表 3)。

通过对 38 项政策内容进行文本挖掘, 发现在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文本内容中, 不同的政策维度呈现出不同的规律和特点。故而, 本文从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文本中的政策形式、治理主体、治理技术、治理手段、治理对象以及治理机制等方面进行挖掘和分析。在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形式方面, 在词频挖掘中出现“方案”“制度”“标准”“规范”“政策”“措施”等高频词, 可以反映出当前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形式较为全面, 能够为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提供不同的政策方向选择, 并以多种不同的政策形式来组合发挥政策效力。在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治理主体方面, 参与的主体覆盖

① 杜宝贵、陈磊:《基于 PMC 指数模型的科技服务业政策量化评价: 辽宁及相关省市比较》,《科技进步与对策》2022 年第 1 期。

② 施杨、赵曙明:《高层次创业人才政策工具挖掘及量化评价研究——基于江苏 6 个典型地区的调研》,《科学管理研究》2021 年第 5 期。

③ Mario Arturo R. Estrada, “The Policy Modeling Research Consistency Index (PMC-Index)”,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vol.1, no.13, 2010.

表 3 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文本有效主题词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生态	1262	质量	488	市场	248	能耗	156	回收	120
绿色	881	治理	482	减排	221	考核	155	分类	120
保护	817	监测	416	生活垃圾	199	方案	153	科技	111
生态环境	810	污染	361	协同	189	措施	152	排污	110
环境	776	制度	360	环境保护	178	防治	152	执法	110
管理	755	标准	353	清洁	176	合作	146	健康	107
能源	717	低碳	350	废物	176	协调	142	智能	103
技术	618	社会	327	管控	172	布局	142	绿色发展	98
排放	530	工业	319	环境监测	160	补偿	139	行为	89
企业	525	数据	315	污染物	158	处置	127	公众	89
设施	522	环保	314	监督	158	污水	126	智慧城市	88
节能	489	政策	302	规范	156	信息化	123	人民政府	86

“企业”“社会”“公众”“人民政府”等，其中，“企业”“社会”“市场”三个关键词词频较高，“公众”“人民政府”的词频较低，说明在当前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考虑的参与主体集中于企业、社会、市场，主要依靠非政府组织以及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参与，公众和政府智慧城市环境治理中参与程度有限。在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技术方面，高频词主要集中于智慧城市的“环境设施”“信息化”“科技”“智能”，政策文本中尚未出现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5G 等词，表明现有的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鲜有将新一代信息和通讯技术手段高度融合应用于智慧城市的环境治理。在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手段方面，高频词集中体现为“环境保护”“环境管理”“环境监测”“企业节能”“企业绿色发展”“低碳排放”“政府管控”，可知实施上述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手段的初衷在于对城市环境予以保护及预防。在智慧城市建设规划阶段，如何有效预防和减弱智慧城市环境污染问题以及如何加强公众参与环境有效治理的相关政策文本内容则鲜有出现。在智慧城市环境治理对象方面，高频词主要为“生活垃圾”“废物”“污水”“污染物”，证明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所发挥的工具作用依然拘泥于传统的城市环境治理对象之中，对于智慧城市新兴环境问题的政策管理范围和治理维度目前还不够健全，亟需对智慧城市治理对象进行政策维度的革新。在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机制方面，高频词主要为“合作”“协同”“协调”，证明当前的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已然考虑到对多元治理理论的运用，即通过合作和协调的方式解决智慧城市环境问题。

2. 高频词语义网络分析。利用 ROSTCM 软件抽取高频主题词，调用 Netdraw 模块，通过数据可视化获得高频主题词的语义网络。在高频主题词语义分析网络图中，高频主题词用节点表示，主题词中心节点越大，主题词的词频数量越多，主题词就越重要；用带箭头的直线来表示高频主题词之间的关系，连接线越多表示主题词之间的联系越多；用线条的粗细来衡量主题词之间的关系强度，线条越粗，关系越紧密，主题词之间的相关关系越强。通过分析可知，高频主题词“生态”“资源”“生态环境”“管理”“机制”的中心节点最大，主题词连接的线条较粗且多，表明其为环境治理文本的核心关键词，可见搜索的政策文本均与环境管理以及生态管理相关；次关键词为“企业”“技术”“保护”“绿色”“系统”，表明智慧城市环境治理的政策文本包含环境治理的信息技术以及绿色保护意识，且有待企业进行参与；“治理”“制度”“设施”“创新”“质量”等高频主题词呈现于核心关键词的周围，说明智慧城市环境治理尚需制度创新以及协同治理来实现，同时还需从完善智慧城市环境设施着手。

（二）政策评估

1. 变量设计。借鉴现有研究成果，参考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文本挖掘的高频主题词语义分析结果，依据 PMC 指数模型构建方法，设“发布主体”“执行机构”“政策受众”“政策性质”“政策内容”“政策

工具”“政策时效”“政策激励”“政策保障”为一级变量（表4）。

表4 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评估变量体系

一级变量	二级变量	评价标准	变量来源
发布主体 X1	国家级 X1.1	发布是否为国家级机关	施杨等，人工筛选
	省市级 X1.2	发布是否为省市级机关	
	区县级 X1.3	布是否为区县级机关	
执行机构 X2	国务院各部委 X2.1	是否为国务院各部委执行	蔡冬松等，主题词统计
	各直属机构 X2.2	是否为各直属机构执行	
	各级人民政府 X2.3	是否为各级人民政府执行	
	城市管理委/局 X2.4	是否为城市管理委执行	
政策受众 X3	各级政府 X3.1	各级政府是否参与	T. M. Vind Kumar 等、Neus Baucells 等，主题词统计
	企业 X3.2	企业是否参与	
	社会组织 X3.3	社会组织是否参与	
	社会公众 X3.4	社会公众是否参与	
政策性质 X4	监管 X4.1	政策是否有监管性	杜宝贵等，主题词统计
	指导 X4.2	政策是否有指导性	
	预测 X4.3	政策是否有预测性	
	建议 X4.4	政策是否有建议性	
政策内容 X5	环境治理信息 X5.1	是否涉及环境治理信息	周博雅等、R. Dwevedi 和 T. Rachmawati，主题词统计
	环境大数据 X5.2	是否涉及环境大数据	
	工业绿色生产 X5.3	是否涉及工业绿色生	
	绿色生活 X5.4	是否涉及绿色生活	
	固体废物处置 X5.5	是否涉及固体废物处置	
	大气污染治理 X5.6	是否涉及大气污染治理	
	水污染治理 X5.7	是否涉及水污染治理	
政策工具 X6	供给型 X6.1	环境治理政府供给	R. Rothwell 等，主题词统计
	需求型 X6.2	环境治理需求政府支持	
	环境型 X6.3	环境治理的外部环境	
政策时效 X7	长期 X7.1	政策时效为 5 年以上	Morio Arturo R. Estrada
	中期 X7.2	政策时效为 3 年到 5 年	
	短期 X7.3	政策时效为 1 年到 2 年	
政策激励 X8	财税支持 X8.1	政策是否有财税支持	肖倩冰等、蔡冬松等
	金融扶持 X8.2	政策是否有金融扶持	
	生态补偿 X8.3	政策是否有保护补偿	
	价格收费 X8.4	政策是否有价格收费	
政策保障 X9	组织领导 X9.1	政策是否有组织领导	T. M. Vind Kumar 等、M Ateş 等、逮进等，语义分析网络
	管理机制 X9.2	政策是否有管理机制	
	资金支持 X9.3	政策是否有资金支持	
	标准规范 X9.4	政策是否有标准规范	
	管理制度 X9.5	政策是否有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 X9.6	政策是否有法律法规	
	信用体系 X9.7	政策是否有信用保障	
	信息安全 X9.8	政策是否有信息安全保障	
	宣传机制 X9.9	政策是否有宣传机制	

2. 多投入产出表。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评估的多投入产出表是 PMC 指数模型计算的重要依据。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评估体系由一级变量和二级变量组成，所有的二级变量权重值相同，参数值采用二进制，若该政策文本符合二级变量评价标准要求则取值为“1”，否则为“0”。由此，得出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多投入产出表（表 5）。

表 5 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多投入产出表

变量	P1	P2	P3	P4	P5	P6	P7	...	P36	P37	P38	均值
发布主体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执行机构	0.75	0.75	0.25	0.75	1	0.25	0.75		0.25	0.25	0.25	0.62
政策受众	1	1	1	1	1	1	1		1	1	1	1
政策性质	0.75	1	1	0.25	0.25	0.25	1		0.25	1	1	0.70
政策内容	1	0.86	0.71	0.43	0.86	0.57	0.57	...	1	0.86	0.71	0.68
政策工具	0.67	1	1	1	1	0.67	1		1	0.67	0.67	0.81
政策时效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政策激励	1	0	0.75	1	0.75	0.75	0.5		1	0.25	0.25	0.54
政策保障	0.89	0.78	0.78	0.89	0.78	0.78	0.78		0.89	0.56	0.56	0.73
PMC 指数	6.72	6.05	6.15	5.98	6.3	4.93	6.26		6.05	5.25	5.1	5.72
等级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可接受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注：因篇幅所限只列出了部分政策的多投入产出数据。

3. PMC 指数计算及等级划分。依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出 38 项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文本的 PMC 指数，同时参考表 2 的 PMC 指数一致性等级，可知这些政策的结果等级。

4. PMC 曲面图构建。依据一级变量的计算结果，根据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由 9 个一级指标构建 3*3 的矩阵。囿于篇幅，仅呈现 PMC 指数得分最高的政策 P23，PMC 指数得分最低的 P13。P23 政策为国家层面颁布的政策，说明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首先需要国家层面颁布宏观指导方针，各部委、各级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公众全面积极参与智慧城市环境治理之中。此外，智慧城市环境治理的政策工具涵盖了供给型政策内容、需求性政策内容以及环境型政策内容，依靠三个政策工具组合发挥政策效力。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激励措施较为健全，囊括财税支持、金融扶持、价格收费以及生态环境保护补偿。P13 政策的内容覆盖面较窄，只涉及固体废物处置、大气污染治理以及水污染治理。同时，该项政策激励措施比较少，在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方面缺少地方财政资金以及税收方面的支持，政策的福利性欠缺。此外，该项政策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应制度保障欠缺，保障措施和保障机制亟待完善，信用监督以及宣传方式尚需调整。

（三）结果分析

通过对智慧城市环境治理的 38 项政策进行文本量化评估可知，PMC 指数总体平均得分为 5.72，整体处于良好水平。按照 PMC 指数评估结果的等级划分，发现 1 项政策评估结果为优秀，30 项政策评估结果为良好，7 项政策评估结果为可接受。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政策对于智慧城市环境治理存在一致性和可行性，政策的实施效果良好，在促进智慧城市环境协同治理方面作用明显。就国家层面而言，政策发布主体主要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以及国家直属机构，共颁布 29 项智慧城市环境治理相关政策。根据 PMC 指数模型的计算结果，其中 1 项政策为优秀，22 政策为良好，6 项政策为可接受，政策优秀率为 3.6%，良好率为 79%。就地方层面而言，政策颁布主体为省级人民政府、市级人民政府以及个别省级直属机构，共颁布智慧城市环境治理相关政策 9 项，其中 8 项政策评估结果为良好，1 项为可接受，政策优秀率为 0%，良好率为 89%。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对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进行了文本挖掘及主题词可视化，通过 PMC 指数模型实证分析 29 项

国家政策和9项地方政策文本,发现1项国家政策评估结果为优秀,30项政策为良好,7项政策为可接受。就政策主体维度而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文的共有6项,占国家层面发布政策的20.69%,说明我国尤为重视智慧城市环境治理的顶层设计和宏观调控。在地方政策层面,北京市政府连续4年(2018—2021年)出台了北京市污染防治攻坚战行动计划(平均PMC指数=5.48),重庆市政府发布了《重庆市深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方案(2015—2020年)》(PMC指数=6.15),除深圳、山东、贵州、河南等地方政府外,其他地方政府出台的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较少。因此,智慧城市环境治理作为智慧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亟需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城市的地方政府及时制定并优化环境治理政策。就政策性质维度而言,当前颁布的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中,90%的政策具有指导性、建议性和预测性,仅有10%的政策具有监管性。可见,当前政策的引导性较强,而强制性和规制性较弱。未来应积极引导各级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共同参与,重视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管。同时建立反馈机制,综合利用指导和监管措施,通过多元协同治理的方式,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智慧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的新途径,提升智慧城市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度。就政策工具维度而言,借助公共政策工具理论,将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工具维度分为供给型政策、需求型政策和环境型政策三类。当前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以供给型和需求性为主,环境型政策次之。智慧城市环境治理需要依靠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供给,通过政策执行推动环境治理系统运转。环境型政策应借助法律法规、环境标准以及宏观环境来不断细化和调整,以此来提升政策的实效性和执行力,发挥环境型政策的间接推动作用。此外,智慧城市环境政策所发挥的工具作用不应局限于以往的生活垃圾、废物、污水、污染物,亟需拓宽政策管理范围和治理维度,革新政策治理对象,以此来应对智慧城市不断出现的新兴环境问题。就政策时效维度而言,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时效性分为长期、中期和短期,国家及地方层面颁布的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以长期或中期为主,政策执行期限为3—5年抑或5年以上,忽视了短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智慧城市作为现代新兴信息与通信技术应用的集大成者,应当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倡导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5G等新一代信息与通讯技术,从而促进智能环保和智慧生态的快速发展,驱动地方政府不断革新环境治理政策,加强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以确保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时效性和适用性。

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是一个新兴的治理问题,其政策的时效性、全面性和完备性亟待持续优化和完善。应注重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组合应用,考虑不同政策工具的政治性因素,^①发挥环境治理政策效力,综合利用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金融、财税以及价格等激励措施,加强智慧城市环境治理和保护,依靠绿色发展,^②以控制环境政策非预期效应,^③推进智慧社会建设。

责任编辑:王冰

① 邓集文:《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向度的考察》,《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7期。

② 孟卫东、吴振其等:《雄安新区绿色智慧新城建设方略探讨》,《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7期。

③ 丁文广、万宗希:《环境政策非预期效应研究》,《学术研究》2020年第7期。

人口结构变化对美国政治格局的潜在影响探究

——基于多数据源的考察^{*}

陆杰华 王笑非

[摘要]美国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其人口数量和结构特征延续过去多年趋势,但也出现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族裔构成多元化的深刻变动和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等新特征。在中美博弈日趋复杂的背景下,探讨美国人口结构长期变化趋势对美国两党政治格局的影响的重要性凸显。基于最新普查和相关调查等多源数据发现,短期来看,人口结构特征变化对两党政治格局影响较小,但众议院席位数量变化对共和党更加有利,两党仍激烈争夺重划主导权;长期来看,族裔多元化、城镇化水平提升、高等教育普及等将对民主党更加有利,年龄结构日趋老龄化将助力共和党拓展民意基础,但未来“千禧一代”“Z世代”及其后代出生成为选民的主体将大大抵消老龄化对民主党的潜在负面影响。综合短期和长期影响,美国两党政治格局不存在整体性压倒优势,未来两党也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动态调整各自竞选策略。

[关键词]美国人口普查 人口结构变化 政治格局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2)12-0072-07

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于2021年4月开始陆续发布,最新普查数据所反映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特征均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深刻变化,表现为人口自然增长率创新低、白人人口规模首次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族裔构成日趋多元化、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等。国内学界以往重点关注美国人口结构在年龄、族裔、分布等方面的变化及其原因。^①随着美国最新人口普查结果发布,学者开始聚焦美国最新的人口变化趋势,尤其是关注其在总量、年龄、性别、城乡、地区、族裔、家庭等方面变迁的主要特征;^②还有研究进一步对未来美国人口发展趋势做出预判。^③

基于美国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和人口结构变化特征,学界聚焦细分领域,如探讨少数族裔人口变化及其对美国政治外交政策的影响;^④或采取纵深视角,关注美国人口变动史,分析重要人口政策与政治、宗教、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⑤或基于美国低生育率、老龄化、家庭结构多元化、族裔分布不平衡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对其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研究”(21VMG04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陆杰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100871);王笑非,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组织学院讲师(北京,100089)。

① 吴艳文、刘玉博:《美国人口发展变化及原因探析》,《市场论坛》2014年第1期。

② 姬虹:《拉美裔在美国的政治参与:美国人口结构变化的视角》,《拉丁美洲研究》2021年第6期。

③ 陆杰华、谷俞辰:《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人口变化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人口学刊》2022年第1期。

④ 何晓跃:《美国少数族裔人口变化特征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9期。

⑤ 陈奕平:《从人口普查看美国200余年社会政治的变化》,《南方人口》2002年第2期。

等趋势，对美国社会不平等及其引发的社会分裂展开深入讨论。^①

探讨美国人口结构长期变化趋势对美国两党格局的影响一直以来也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② 在中美博弈日趋复杂的背景下，这一研究的重要性凸显。一个稳定且内部变化能够预测的选民群体在塑造美国政治走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美国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学界更多关注选民的族裔、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等人口学特征如何影响选民的政治倾向。^③ 美国学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更加丰富，曾多次有研究预测人口结构变化会分别给两党带来不同优势，相关研究也具有实际政策借鉴意义。有学者建议共和党用种族矛盾来离间南部白人与民主党的关系，并尽力吸引郊区和蓝领白人选民。^④ 有学者则指出民主党人应当利用美国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机会，增加教育投资，应对收入不平等，倡导少数群体权利，持续在高知、职业女性、少数族裔中获得选票优势。^⑤ 有学者详细探讨了共和党过去竞选政策在人口变化趋势下面临的困境，并总结认为美国少数族裔、年轻人在持续转向民主党，而共和党所依赖的保守派白人和老年人口正在不断减少，共和党应逐渐摒弃白人至上主义。^⑥ 关于美国人口结构变迁对民主党、共和党的政治格局影响这一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以往研究或数据时效性和创新性略显不足，如缺少最新人口普查数据且多数仅分析政党倾向这一个影响因素，或缺少系统性梳理和总结多重政治因素在不同人口结构特征下的长期变化趋势。此外，关于人口结构特征对政治格局的影响，一些研究多聚焦于年龄分组这一传统的人口学变量进行分析，^⑦ 美国学者已经逐步探索代际间政治倾向存在的差异及其对未来政治版图带来的长期影响，^⑧ 但上述研究尚未涉及另一个重要政治参数——选民投票倾向。为此，本文尝试基于美国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和大选调查数据，总结与探讨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对两党政治格局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二、当下美国人口发展变化的新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一）人口规模增速放缓，区域人口增长不平衡

截至 2020 年 4 月，美国人口约为 3.314 亿，2010—2020 年间，美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7.4%，显著低于 2010 年普查时的 9.7%，接近 1790 年开始人口普查以来最低增速，即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 7.3% 的增速水平（图 1）。过去 10 年美国人口增速放缓，一方面是受大衰退后经济放缓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深远影响，居民生存压力大幅增加导致女性生育意愿降低。2019 年，美国总和生育率为 1.73%，低于 2010 年 1.9% 的水平。同时，随着二战后“婴儿潮”一代进入老年阶段，美国老年人口的增长率将持续高于年轻人口的增长率，加剧了生育率疲软造成的人口增长缓慢问题。另一方面，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大幅收紧移民政策，部分墨西哥裔移民被迫返乡，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口的增长。从地域来看，美国南部和西部高科技产业等新兴产业发展较快，接受移民更多，人口增速强劲，增速分别为 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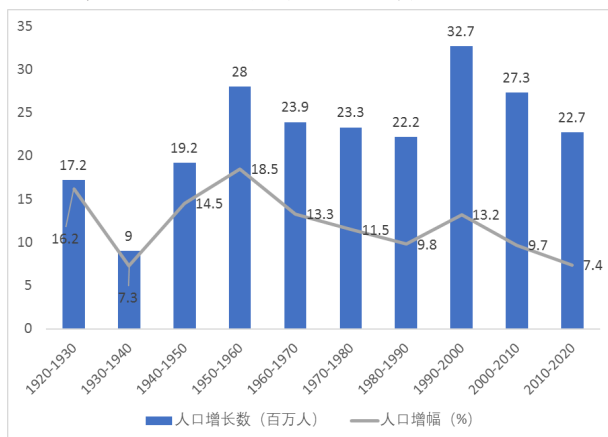


图 1 1920—2020 年美国人口增速变动趋势

① 魏南枝、常夷：《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和社会不平等》，《美国问题研究》2018 年第 1 期。

② 何晓跃、许开轶：《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对大选政治的影响》，《国际论坛》2011 年第 5 期。

③ 付随鑫：《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对 2020 年大选和两党格局的影响》，《美国问题研究》2021 年第 1 期。

④ Malnick Joel R., “The Emerging Republican Majority”, *Geographical Review*, vol.61, no.3, 1971.

⑤ John B. Judis and Ruy Teixeira, *The Emerging Democratic Majority*, New York: Scribner, 2004, p.67.

⑥ Thomas E. Patterson, *Is the Republican Party Destroying Itself?*, Seattle: KDP Publishing, 2020, pp.131-132.

⑦ 付随鑫：《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对 2020 年大选和两党格局的影响》，《美国问题研究》2021 年第 1 期。

⑧ Robert Griffin, William H. Frey and Ruy Teixeira, *America's Electoral Future: The Coming 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americas-electoral-future-3/>, 19 Oct 2020.

和 9.2%。南部“阳光带”各州（即美国北纬 36 度以南阳光充足、气候温暖的地区）增速普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增速均达到约 15%，西部超过一半州的人口增速超过 10%，但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仅增长 6.1%。传统行业集中的东北部和中西部陷入产业停滞危机，人口占比持续缩减，东北部和中西部人口仅分别增长 4.1% 和 3.1%，“铁锈带”各州（美国传统制造业衰落前原主要钢铁、汽车工业区）人口增速低迷，伊利诺伊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甚至出现负增长。

（二）人口老龄化加剧，青年人口占比下降明显

2020 年普查数据显示，过去 10 年，美国 55 岁以上人口增长了 27%，是 55 岁以下人口增长率的 20 倍之多，65—74 岁人口增长了接近 50%。^① 美国人口发展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婴儿潮”目前已相继步入 56—74 岁的中老年阶段，这一庞大的群体正加速进入“退休潮”，导致美国老年人口占比大幅度增加，人口老龄化加剧。同期，美国 18 岁以上成年人口增加 10.1% 至 2.58 亿，18 岁以下未成年人口下降 1.4% 至 7310 万。实际上，自 1960 年人口普查以来，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下降，青年人口的减少将进一步加剧当前美国老龄化问题所带来的挑战。从地区差异上来看，2010—2020 年，有 27 个州的青年人口出现下降，尽管这些州分布在美国各地，但青年人口下降幅度超过 5% 的州大多集中在东北部，例如缅因州（-8.1%）、密歇根州（-7.7%）、康涅狄格州（-9.8%）等，与美国东北部总体人口增长速度较缓的趋势相一致。

（三）白人数量首次下降，种族分布更加多元化

白人和黑人仍为主要的种族和族裔群体，2020 年白人和黑人总人口分别约 2.04 亿和 0.41 亿，占总人口比重分别为 61.6% 和 12.4%。2020 年人口普查结果中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白人人口规模首次呈现小幅下降。从 1790 年第一次普查开始到“大萧条”之前，美国白人人口增长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大萧条”期间增长率骤跌，之后的 20 年间强力反弹，但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白人人口增长率呈持续下降趋势，在 2000—2010 年，增长率跌至 1.2%，而 2010—2020 年，白人人口规模甚至出现下降，降幅为 8.6%，也是唯一人口数量下降的种族。与白人人口规模减少相伴随的另一个现象是 10 年间其他非白人种族和族裔群体人口规模的持续增加。在最新人口普查中，美国人口普查局采用更加细化的方法定义个人族裔身份，^② 同时进一步细分西班牙裔或拉美裔（以下简称拉美裔）身份（Hispanic Origin）问题，对种族问题进行了多项设计改进，有利于更加全面、准确反映民众的自我身份认同。普查数据显示，人口增长最多的为拉美裔美国人，增幅达 23%，约占 10 年间 2270 万人口增长数目的一半；而非拉美裔人口增幅仅为 4.3%。同时，相较于 2010 年普查，自我认同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种族（Two or More Races/Multiracial Population）的人口呈大幅增加趋势，达到 3380 万人，而 10 年前这一群体仅有 900 万人。其他族裔人口中，亚裔人口增长 35.5%，总人口合计 1989 万人，其占比也从 4.8% 上升至 6.0%。黑人或非裔美国人占比略有下降。总体来说，美国社会正加速向种族多元化发展。

（四）大城市集聚人口效应延续，城乡差异增大

根据 202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居住在人口 5 万以上的大都市区的美国人口比例增至 86%，而 10 年前这一比例为 85%。从县级数据来看，根据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 2021 年的分析，^③ 26 个州的农村地区的人口出现了下降趋势，其中 12 个州的农村人口自 2010 年以来下降了 3% 以上。人口增长率与县级人口规模显著相关，人口较少的县更容易人口流失，而人口密集的县更容易实现人口增长。以德克萨斯州

^① William H. Frey, *What the 2020 Census Will Reveal about America*,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what-the-2020-census-will-reveal-about-america-stagnating-growth-an-aging-population-and-youthful-diversity/>, 11 Jan 2021.

^② <https://www.census.gov/newsroom/blogs/random-samplings/2021/08/improvements-to-2020-census-race-hispanic-origin-question-designs.html>.

^③ Tim Henderson, *Shrinking Rural America Face State Power Struggle*, PEW Charitable Trust: <https://www.pewtrusts.org/en/research-and-analysis/blogs/stateline/2021/08/10/shrinking-rural-america-faces-state-power-struggle>, 10 Aug 2021.

和佛罗里达州为例，休斯顿、奥兰多等大城市实现了超过 20% 的人口增长，而州内其他农村地区的人口则普遍减少。中西部地区小城镇人口进一步萎缩，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爱荷华州多个小镇人口减少超过 10%，伊利诺伊州的亚历山大县人口更是锐减约 30%。

三、基于最新人口普查考察美国政治格局的即时影响

短期来看，人口结构特征长期变化趋势对两党格局演变影响较小，但是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将会直接影响众议院席位的重新划分并开展选区重划。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众议院席位应根据各州的人口规模在各州之间分配，从而确保每一位选民得到平等的代表。而席位分配人口（apportionment population）是指各州的常住人口（resident population）之和，其中包括少数族裔群体、非公民群体、在美国本土之外的海陆空三军及其家属，以及工作在海外的联邦政府雇员及其家属。自 1959 年以来，美国一直保持 50 个州不变，由于各州人口规模发生变化，在每 10 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结束之后，众议院席位将根据普查结果在各州重新分配。同时，为了反映人口结构的动态变化情况，国会将重新划分选区，以确保各选区选民规模基本平衡。

（一）众议院席位数量变化对共和党更加有利

在 2020 年普查之后，美国国会选区的平均人数为 761169 人。与 2010 年相比，美国各州 2020 年大多数州的平均选区人口规模均呈上升趋势，其中西弗吉尼亚州增幅最大，其选区平均人口规模增加 277585 人，但蒙大拿州、俄勒冈州和密西西比州平均选区人口规模呈下降趋势，分别下降 451712 人、62804 人和 3581 人。由于各州人口规模的相对变动，2020 年人口普查结果影响 13 个州的众议院席位数量，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密西根州、纽约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西弗吉尼亚州各减少 1 席，科罗拉多州、佛罗里达州、蒙大拿州、北卡罗来纳州、俄勒冈州各增加 1 席，德克萨斯州增加 2 席，选区数量变化总体来说对共和党有利。“阳光带”席位继续增长，传统红州（倾向支持共和党的州）德克萨斯州是最大赢家，佛罗里达州席位首次超越纽约州；西部地区两党势力此消彼长，俄勒冈州与科罗拉多州席位增加有利于民主党，大蓝州（倾向支持民主党的州）加利福尼亚虽然拥有最多的众议院席位，却首次丢失席位；“铁锈州”（美国中部各州）和纽约州席位亦有所流失。过去 20 年，席位增加最多的是德克萨斯州，增加 8 个席位，佛罗里达州增加 5 个席位紧随其后，众议院席位重新分配，呈现东北部和中西部下降、南部和西部上升的整体趋势。

（二）共和党在选区重划中尚存一定优势，但两党激烈争夺重划主导权

选区重划需要遵循紧凑、保留政治区划边界、尽可能保留先前划分核心、种族公平等基本原则。在此前提下，如何划分选区以满足本党派利益，仍存在较大操作空间。历史上，两党都曾多次充分利用“杰利蝟”手段（Gerrymandering，即“不公平选区重划”，因 1812 年马萨诸塞州长 Gerry 精心设计重划后的选区行政模式类似蝟而得名）设计选区地图，通过灵活运用多种策略干预选区划分，从而塑造有利于自身席位优势的选举地图。2010 年以来，共和党多次充分利用选区重划环节的结构优势，影响众议院选举的结果。根据《库克政治报告》，共和党共计控制 20 个州 187 个选区的重划主导权，而民主党仅仅控制 8 个州共计 75 个选区的重划主导权，共和党未来可以借助选区重划的主导权进一步拓展其在众议院的影响力，两党也必将在选区重划方案上开展激烈交锋，重划方案可能面临多次反复。

四、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对政治格局的长期影响

（一）人口结构特征与政党倾向和投票倾向的关联性考察

人口结构特征不是党派倾向性的唯一决定因素，一个地区的人口结构并不能说明选举和政治势力变化的全部情况，但是在一定时期内，人口结构变量在选举中呈现的特征与变化趋势通常有迹可寻。大量的新闻或者文献对此均有涉及，但尚缺少统一且权威的数据对人口特征与政党倾向的演变规律进行系统整理和总结。本文选用美国国家大选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ANES）的 1968—2020 年大选民调数据，虽然数据与实际选举情况存在偏差，但是趋势性的结论还是可以取信的。

1. 政党倾向与年龄、族裔、受教育程度、城乡分布等人口结构特征之间的关系。在对 ANES 民调数据进行分析中,我们只选取政治倾向为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数据,剔除政治倾向为其他政党和不确定的数据并及去除干扰项的影响。从年龄结构来看,青年人(17—24岁)和成年人(25—34岁)中民主党支持率较高,特别是21世纪以来,青年人中民主党支持率快速上升并持续保持在60%以上,甚至在部分年份超过70%。而长期以来,老年人特别是65岁以上老年人中大部分人支持共和党。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大学及以上学历人群中民主党支持率较高,且21世纪以来,支持率持续上升。从城乡分布来看,^①城市人口中民主党支持率显著高于郊区和农村,且城市人口中民主党支持率一直显著高于50%,而郊区和农村则低于这一比率,这与城市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有关,从另一方面验证了受教育程度与民主党支持率相关性的可信度。从种族分布来看,少数族裔多数支持民主党,特别是黑人对民主党的支持率一直维持在80%以上,拉美裔对民主党的支持率也在近20年快速上涨并维持在60%以上,但是白人对民主党支持率一直保持在40%—50%之间,其他少数族裔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因其占调查人数比例较低,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偏差,但从近20年数据来看,也维持在50%以上。

2. 投票倾向与年龄、族裔、受教育程度、城乡分布等人口结构特征之间的关系。从年龄结构来看,青年人投票出席率显著低于其他年龄段,长期低于70%,表明青年人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并不高。同时,投票参与率呈现出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的特点。从受教育程度来看,选民受教育程度越高,投票参与率越高,大学及以上学历选民投票参与率连续多年维持在90%左右。从城乡分布来看,城市和郊区选民投票参与率显著高于农村,其参与率一直维持在70%以上,这也与城市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有关。从族裔分布来看,白人投票参与率一直高于其他族裔,表明白人一直处于美国政治的中心,政治参与度与参与意愿较高。同时,少数族裔投票参与度近年来快速提高,特别是在总统候选人有明显少数族裔色彩,投票参与率快速上升。例如2008年黑人总统奥巴马和2020年黑人女性副总统贺利锦(Kamala Harris)参加选举,少数族裔选民投票参与率均较前一次总统大选出现跳升。

ANES 调查数据可能由于抽样偏误和数值缺失等问题,无法全面勾勒所有选民的政治倾向,但2020年最新大选结果从侧面印证了 ANES 调查数据的准确性。在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选民中,拜登获得61%的选票,其中包括57%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白人选民、69%的拉美裔选民和92%的黑人选民。不同受教育程度选民的政治倾向存在巨大差异,是否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白人选民对拜登的支持率相差24%,在拉美裔人群中相差14%。上述数据表明,随着全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开始逐渐获得更多受过高等教育选民的支持。

(二) 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对政党倾向和投票倾向的长期影响

第一,人口多元化趋势将对民主党更加有利。少数族裔历来对民主党支持率较高,拉美裔对民主党支持率快速上升,且未来少数族裔人口占比进一步增加,少数族裔投票率出席率也在不断提高,当前435个国会选区中非拉美裔白人占比不到50%的选区数量已经达到139个,相比2010年选区划定时增加27个,美国人口多元化趋势延续,非拉美裔白人数量下降,拉美裔、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影响将越来越大。第二,城市化进程和高等教育普及使得民主党更占优势。美国人口向有产业和就业机会的大城市集中,同时也伴随着接受高等教育人口占比逐步增加,民主党在高知人群和大城市选民中占有显著优势,未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和高等教育进一步普及,其优势可能更加明显。2020年美国大选,民主党赢得亚特兰大地区选举,且亚特兰大在佐治亚州人口中占据主导地位,最终使得民主党在该州胜出。此外,城市化进程将限制“杰利蝾螈”的作用。由于大多数农村人口持续减少,许多人口稀少的农村选区必须扩大范围或与邻近地区合并,这也将增加共和党通过“杰利蝾螈”手段来稀释城市和郊区民主党选票的难度。第三,美国人口年龄结构日趋老化助力共和党拓展民意基础。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步迈入老年,美国老年人口占比逐步提高,老年人对共和党支持率高于对民主党支持率,且老年人更愿意通

^① ANES 调查数据中关于城乡分布的数据截至2000年,但是其长期趋势和相对关系还是可以取信的。

过投票表达政治倾向，人口老龄化进程将给民主党带来新的挑战。但是我们也看到，2020 年 CATALIST 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① 在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白人选民中获得的支持呈分化趋势，民主党也一直对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和少数族裔的选民进行政治渗透，从而弥补其在农村人口、老龄人口方面的民意劣势。

总体来看，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趋势虽对民主党更加有利，但是民主党仍面临其他因素的制衡。一方面，美国每州两名参议员制度和选举团制度提升了内陆州、规模更小的州的政治影响力，而这些州受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最小。另一方面，目前拉美裔是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他们以家庭为导向，工作勤奋，文化保守，种族身份认同意识逐渐减弱，如果他们不遵循少数族裔的政治倾向，民主党所依赖的多民族联盟可能失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②

（三）基于队列视角考察人口结构变化对两党政治格局的长期影响

上述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对政治格局的影响是基于如下假设，即美国年轻人的政治倾向随着年龄的增长将发生变化，代际的影响只是重新创造当前的政治平衡，从而得出美国人口年龄结构日趋老化是民主党面临的重要挑战这一结论。但不可忽视的是，年轻一代正在崛起，其政治影响力尚需从不同维度进一步分析。

本文从人口学常用的队列视角重新审视民调数据。2008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民众将经济危机归咎于当时执政的共和党经济金融政策，导致共和党在大选中失败。如果剔除 2008 年数据，从长期来看，同一出生队列选民的政治倾向保持相对稳定。同时，不同出生队列选民的政治倾向差异明显，越是晚出生队列的选民，对民主党的支持率越高。在有限的 3 次统计中，1991 年后出生的“千禧一代”^③ 对民主党的支持率接近 70%，而“婴儿潮”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常年保持在 50% 以下，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与上几代人相比，青年一代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千禧一代”和“Z 世代”青年人中，近 40% 拥有大学或以上学历，而在 65 岁以上人群中，这一比例仅为 27%。二是美国青年一代在种族分布上较上几代人更加多元化。“千禧一代”和“Z 世代”的青年人中近 60% 属于少数族裔，而 65 岁以上人群中，这一比例仅为约 20%。三是与上几代人相比，青年一代买房、初婚和抚养子女的年龄均有所提高，而这些经历一般会让个体行为与政治倾向趋于保守。

从不同年代人的投票倾向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对政治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投票出席率随之上升，“婴儿潮”及以前出生的选民，投票出席率近年来甚至达到 90%。同时，“千禧一代”在达到投票门槛年龄时投票出席率仅仅徘徊在 50% 左右。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得涉及工作、劳动保障、子女教育、医疗、税收、社保等与个体切身相关的政策，对选举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也必然随之上升。近年来，两党竞争愈发激烈，均通过各种手段加大竞选宣传，致使“千禧一代”投票参与率快速上升，2020 年已经接近 70%。

从队列视角看，过去几十年，美国选民群体代际构成发生巨大变化。过去 30 年，“婴儿潮”群体均在选民中占据多数比例，但即将被更年轻、更多样化的群体取代。在 2020 年大选中，“千禧一代”和“Z 世代”占选民总比例已经大幅超越“婴儿潮”，分别为 37% 和 28%。美国人口普查局等多来源数据预测结果显示，^④ 到 2036 年，“千禧一代”“Z 世代”以及其后一代将占选民总数的 60%，在北达科达州、

^① Yari Ghitza and Jonathan Robinson, *What Happened in 2020*, Catalist: <https://catalist.us/what-happened-in-2020/>, 10 May 2021.

^② Ruy Teixeira, *Democrats Can Reach More Working Class Voters But They'll Have to Ditch the Woke Stuff*, The Liberal Patriot: <https://theliberalpatriot.substack.com/p/democrats-can-reach-more-working>, no.19, 2021.

^③ ANES 数据中对于不同年代选民的断代与标准意义的“Z 世代”“千禧一代”“沉默一代”和“婴儿潮”不完全一致，但本文可近似将 ANES 数据的断代与标准意义的断代一一对应，相关数据的趋势性结论是可信的。

^④ 数据来源为美国人口普查局、ANES 和 CCES 等多项调查数据，具体包括“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2014-2018”“2016 Time Series Study”，“CCES 2016 Data Guide”“2016 Presidential General Election Results”；同时参考“American's Electoral Future: The Coming 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一文预测结果。

阿拉斯加州、犹他州和华盛顿特区，其占比甚至要超过 65%。届时，“婴儿潮”占比将进一步下降至 17%，而“沉默一代”（1945 年以前出生的人）到 2036 年可能完全消失。随着选民群体出生队列不断更迭，未来“千禧一代”“Z 世代”及其后年代出生的人群将成为主体，其投票行为与政治倾向将成为两党政治角力的关键。

未来，“千禧一代”依然维持对民主党较高的支持率，同时其投票参与率越来越高，对民主党支持的整体贡献将增大，并显著抵消人口老龄化给民主党带来的挑战。特别是在德克萨斯州、佐治亚州等 2020 年大选关键州，这些人口结构变化将有利于民主党在未来数十年逐步拓展和巩固民意基础。

五、结论与讨论

人口结构在塑造政党格局和决定选举结果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分析美国近期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和其他人口数据，总结美国人口发展变化的新特点，发现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人口增长速度呈下降趋势，种族多样化进一步提升、人口老龄化态势加剧、人口进一步向大城市集聚、民众受教育程度稳步提高。本文利用 ANES 调查数据，分析人口结构特征对选民政治倾向和投票参与率的影响，得出结论如下。首先，2020 年人口普查结果将会直接影响众议院席位的重新划分并开展选区重划，共和党具有一定制度与资源优势。具体表现为其在众议院席位重新分配中拥有较大优势，在重新划分选区方面具有更大的控制权和政治影响力。其次，从年龄结构来看，青年人对民主党支持率高，而老年人大部分支持共和党，但是老年人投票出席率显著高于青年人；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大学及以上学历选民中民主党支持率较高，并且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投票出席率也较高；从城乡分布来看，城市人口中民主党支持率显著高于郊区和农村，同时城市和郊区人口的投票出席率也较高；从种族分布来看，少数族裔多数支持民主党，白人投票出席率一直高于其他少数族裔，同时近年来少数族裔投票出席率快速提高。再次，从人口年龄结构、种族多样性、城市化进程和受教育程度的长期变化趋势来看，人口结构变化可能重塑有利于民主党候选人的政治格局。此外，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选民是共和党长期的坚定支持者，但长期来看，此类选民在总人口中占比也呈逐渐下降趋势。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选民代际变化与种族和教育等其他因素结合，未来更加有利于民主党拓展民意基础。

人口学特征变量可以作为选民政治倾向的精准“侧写”，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趋势对两党政治格局产生显著影响。根据上述分析结果，2020 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即时影响和人口结构长期变化趋势对两党各有利弊。民主党在少数族裔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选民群体中占据更大民意基础，但其在多选民群体中弥合分歧和寻找政治平衡的难度也在不断增大；共和党享有一定制度优势，在受教育程度不高或居住于农村地区的白人群体中更受欢迎，但人口变动导致其民意基础面临萎缩困境。两党尚不存在整体性压倒优势。

本文研究人口结构以及不同人口特征下选民的政党倾向性和投票行为，其目的在于探究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对选举结果和政治格局产生的潜在影响，进而揭示未来两党面临的各种利弊，以及可能采取的政策调整。对民主党人来说，随着年轻一代的成长，该党能够吸引更多少数族裔和年轻的白人群体，也符合部分受教育程度高的白人选民的期待，维持这些现有群体的支持，未来可能带来可观的政治回报。对共和党人来说，美国最年轻的几代人的政治倾向对该党派较为不利，其竞选策略必然包括从种族构成更加多元化的年轻选民中争取支持。人口结构不是影响政治版图的决定性因素，但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均是两党在政策制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对美国的政治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

责任编辑：王冰 许磊

流动人口医疗卫生服务利用影响因素研究

——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李 燕

[摘要] 聚焦于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群体,通过构建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模型,以珠三角地区为例,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样本数据,探讨流动人口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第一,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员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程度相对较低;第二,流动人员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程度受社会因素、压力因素、个体倾向特征、使能特征、需求特征等多种因素的显著影响;第三,倾向特征对流动人员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程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使能特征,影响程度最低的是社会因素。

[关键词] 流动人口 医疗卫生服务利用 珠三角地区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C91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2)12-0079-05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是与流动人员身心健康息息相关的一个概念,具体指个体在有病感、疾病、生理障碍时选择买药、看医生等方式的门诊医疗或是住院医疗等治疗行为。^①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利用安德森模型(The Andersen Model),聚焦于探索个体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安德森模型被研究者们广泛称为“医疗服务利用模型”或“医疗保健服务利用行为模式”。该模型涵盖了医疗服务可及性、医疗服务需求、医疗服务利用行为过程以及行为结果等多个方面。从影响因素视角而言,主要包含环境因素和个体人口特征中的倾向特征、能力资源、医疗需要两个层面。^②除安德森模型所提及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相关影响因素外,相关研究也指出:心理因素作为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的综合因素,对个体健康和医疗卫生服务利用行为也存在显著的影响。例如,面对不同的社会压力,不同的人会展现出诸如抵抗、脆弱等差异化的反应。^③因此,从这一视角来看,心理压力对个体医疗卫生服务利用行为也存在一定的影响。

另一类研究医疗卫生服务利用行为的相关文献则针对老年人、流动人口等特定的群体展开具体研究。流动人口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所面临的健康和医疗服务利用问题广受学界和政府的关注。大多

作者简介 李燕,中山大学讲师(广东 广州,510275)。

① 胡思洋:《农村老年人就医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谷城、南阳两地数据的实证》,《人口与发展》2016年第5期。

② Fotios Anagnostopoulos and Tzesiona Botse, “Exploring the Role of Neuroticism and Insecure Attachment in Health Anxiety, Safety-Seeking Behavior Engagement, and Medical Services Utilization”, *Sage Open*, vol.6, no.2, 2016.

③ 高明华:《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对健康的影响效应——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

研究认为城市流动人口属于年轻群体,身体和心理都处于相对健康的状态,^①甚至优于同等社会经济地位的本地居民。^②但也有研究表明,城市流动人口中青年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③此外,有学者认为,随着在迁入地务工时间的延长,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会对流动人口群体的身心健康产生消极的影响。^④目前,针对流动人口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相关研究,主要得出了以下三个结论:其一,流动人口的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高于城市居民,但就诊率和住院率远低于区域内的户籍人口;^⑤其二,就诊机构选择方面,流动人口倾向于选择私人诊所或自我治疗;^⑥其三,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险覆盖率、预防保健服务利用方面的知晓率和利用率均低于城市户籍人口。^⑦存在以上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类:一是医疗保险、就业制度等社会制度体系;^⑧二是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以及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特征;三是家庭收入、工资增长等经济因素。^⑨

中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虽在改革开放以后持续了40余年,但对城市流动人口医疗服务利用的研究仍存在不足。其一,缺乏完整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影响城市流动人口医疗服务利用的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其二,比较分析不足。已有研究多数是比较城市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医疗服务利用差异,但缺乏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因此,本文将在深入探究流动人口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程度的基础上,以珠三角地区为例,详细梳理流动人口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促进性因素和阻碍性因素。这一研究对于改善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的利用状况,增进流动人口健康福祉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 数据来源

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简称CMDs),是国家卫生健康委自2009年起一年一度大规模全国性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目前已有2010—2018年共9年的相关数据,为更贴合当前流动人口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现状,本文拟采用最新的2018年的CMDs数据。

(二) 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公共政策)、社会经济水平等宏观层面以及个体的人口学特征因素、服务购买力因素以及自评健康状况等微观层面,探索影响流动人口医疗卫生服务利用行为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并进一步厘清影响流动人口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关键因素。由于本文中的因变量为“应就医而未就医情况”“身体不适是否优先选择综合医院”和“是否参加免费健康体检”,这三个变量都属于0-1变量,因而本研究的模型选定为随机模型中的二元Logit回归模型。即对于每一个观测样本,某事件发生与否的条件概率可以写成如下形式,即:

$$\begin{cases} P(y_i = 1|X) = P_i \\ P(y_i = 0|X) = 1 - P_i \end{cases} \quad (1)$$

① 郭永沛、钟会民等:《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及变化研究——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20年第12期。

② 程菲、李树茁等:《中国城市劳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健康——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比较研究》,《人口与经济》2018年第6期。

③ 李晓芳:《青年民工心理卫生状况调查分析》,《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4年第6期。

④ 牛建林、郑真真等:《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和居住环境及其健康效应——以深圳为例》,《人口研究》2011年第3期。

⑤ 蔡敏、徐玲:《流动人口住院服务利用及影响因素》,《中国医院统计》2019年第2期。

⑥ 李海明、徐颖毓:《医保政策能否促进分级诊疗的实现:基于医疗需求行为的实证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1期。

⑦ 范宪伟:《流动人口健康状况、问题及对策》,《宏观经济管理》2019年第4期。

⑧ 杜本峰、曹桂等:《流动老年人健康状况及医疗服务利用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8年第5期。

⑨ 邱红、周文剑:《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人口学刊》2019年第5期。

其中，式（1）中 P_i 是关于 β 系数的 Logit 函数， P 表示目标概率。两种情况合并得出一个二元分布函数，具体形式为：

$$P(y_i) = p_i^{y_i}(1 - p_i)^{1-y_i} \quad (2)$$

此外，由于 Logit 回归假设样本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所以它们的联合分布可以视作各个边缘分布的乘积，进而构建似然函数，具体如下：

$$L(\beta) = \prod_{i=1}^n p_i^{y_i}(1 - p_i)^{1-y_i} = \prod_{i=1}^n \left(\frac{e^{X\beta}}{1+e^{X\beta}} \right)^{y_i} \left(1 - \frac{e^{X\beta}}{1+e^{X\beta}} \right)^{1-y_i} \quad (3)$$

通过上述的阐释可以看出，Logistic 模型建立了某事件发生的概率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故而可与本文对流动人口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研究相匹配。

（三）变量的操作化及测量

因变量为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程度。该指标具体包括“应就医而未就医情况”“身体不适是否优先选择综合医院”和“是否参加免费健康体检”，以期从门诊、住院以及预防保健三方面考察流动老年人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具体含义及赋值为：将“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及时就诊”赋值为 1，反之则为 0；将“最近一次患病（负伤）或身体不适时，首选综合医院”赋值为 1，反之则为 0；将“过去一年，接受过本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乡镇卫生院免费提供疾病随访评估、健康体检等服务”赋值为 1，反之则为 0。

基于上文对医疗卫生服务利用行为相关文献的梳理可知，个体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水平受到“生理—心理—社会”三个层面的影响。因此，本文的解释变量主要涉及社会因素、压力因素、倾向特征、使能特征以及需要特征五类。具体而言，在社会因素中，主要考虑经济因素与各城市年鉴中的人均 GDP 相匹配，以所在城市的人均 GDP 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因素水平的指标。压力因素包含工作压力、社交压力和生活压力三个层面，三类压力分别对应问卷中“近两年，您感觉找工作的难度有没有变化”“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其中一员”“目前在本地，您家是否存在生活困难”三个题项，并根据问卷结果，进行 0-1 赋值。

倾向特征中包含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籍类型、流动范围以及流动原因等 7 个方面，除流动原因这一指标外，其他指标均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对各项指标分别进行了 0-1 赋值。使能特征中包含家庭收入情况、收入增长情况、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就医距离四个操作化指标。其中家庭收入情况根据 2017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核定后，进行 0-1 赋值；收入增长情况仅考虑收入增长与否进行 0-1 赋值；基本医疗保险中，根据是否参保进行 0-1 赋值；就医距离则以居住地到最近的医疗服务机构所需时间为准，以 15 分钟为参照标准进行 0-1 赋值。需求特征则主要以自评健康状况为操作化指标进行具体赋值。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流动人口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描述性分析

本文参照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您现居住地址（地区）”和“您本次流动范围是什么”进行珠三角地区的初始样本的选择。在删除存在无效值的样本数据后，最终选取的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样本数量为 756 份。通过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后发现：第一，超过半数的流动人口在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未选择及时就诊，占比约为 53.04%；第二，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仅有 14.15%（样本数为 107）的流动人口优先选择综合医院；第三，约有 17.72% 的流动人口接受过本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乡镇卫生院免费提供的随访评估、健康体检等服务。由此可知，流动人口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相对较低。珠三角地区的流动人口的医疗资源利用效率和预防保健服务利用整体水平均有待进一步提升。

就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而言，在社会因素层面，样本中流动人口流入城市的人均 GDP 达 134596 元，远高于 2017 年全国人均 GDP 的 59201 元，表明珠三角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全

国而言,处于较高水平。在压力因素方面,样本中有 30.03% 的人认为过去一年所面临的工作压力有所增加;超过半数的流动人员不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意味着流动人口面临的社交压力相对较大;61.77% 的流动人员认为自己生活中面临着困难,说明多数流动人员正经历着较大的生活压力。

在倾向特征方面,女性流动人口数占 53.44%。流动人口的年龄多为 40 岁以下,意味着样本中的流动人口群体以中青年为主,年龄结构相对较年轻。从受教育程度来看,82.41% 为高中及以下水平,表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从婚姻状况来看,流动人口群体已婚的占比达 87.04%。从户籍类型来看,流动人口中多数为农村户口(87.83%),符合中国人口城镇化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这一典型特征。从流动范围来看,流动人口的迁移范围多为跨省迁移。从流动原因来看,工作、升学或经商是样本中人口流动的关键因素。

在使能特征方面,流动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远低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在收入增长方面,78.57% 的流动人口的收入处于稳定甚至减少的状态。从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情况来看,90.34% 的流动人口最少购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在内的多种保险类型中的一种。从就医距离来看,流动人口由居住地到最近的医疗服务机构的距离多数小于 15 分钟,占比约为 98.94%,说明珠三角地区的公共服务普及程度较高。

在需求特征方面,样本中 99.21% 的流动人口健康状况为基本健康和健康,说明样本中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相对较好。

(二) 流动人口医疗卫生服务利用影响因素分析

1. 基准回归结果。本文结合筛选后的样本数据,利用 Stata15.0 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将 M1、M2、M3、M4 与 M5 设定为逐步控制了社会因素、压力因素、倾向特征、使能特征和需求特征的回归模型。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水平包含了应就医而未就医情况、身体不适是否优先选择综合医院以及是否参加健康体检三个层面,在进行回归分析时,鉴于三个层面的赋值均为 0-1 变量,因此取三者的平均值作为流动人口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水平的衡量指标。

回归分析有如下的发现。第一,社会因素对流动人员医疗卫生服务利用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流动人员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水平也相对较高。第二,在压力因素中,工作压力的估计系数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0.022),意味着工作压力越大,流动人员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水平越高。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流动人员的身体素质也相对较差,所需医疗资源也相对较多。社交压力与医疗卫生服务利用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流动人员融入流入地的意愿越强,其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水平越低。第三,在倾向特征中,性别的估计系数在 1% 的显著水平上为负(-0.102),说明相比男性,女性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水平较高。年龄的估计系数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受教育程度的估计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0.109),意味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流动人员,其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水平也较高。婚姻状况和户籍类型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0.018 和 0.001,均不显著。流动范围的估计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0.408),意味着流动范围越大,流动人口群体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水平越低,这一结果可能与中国的医疗保险统筹层次有限有关。第四,在使能特征中,家庭收入水平、收入增长以及医疗保险参保情况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0.022、0.037、0.035,收入增长的估计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家庭收入水平和医疗保险参保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流动人员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水平。就医距离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存在统计学层面的显著意义。第五,在需求特征中,自评健康状况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0.054),意味着流动人员的健康自评情况越好,其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水平越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自评健康状况越好的流动人员对自身的身体状况的敏感与重视程度降低,在自觉身体不适时,不愿意前往医疗机构就医,其医疗卫生服务利用需求也相应地降低。

2. 影响因素对比分析结果。根据上文对 Andersen 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模型的分析可知,模型中包含的各个维度之间保持连续的相互作用。因此,本文在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进一步采

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分别对压力因素、倾向特征、使能特征中各个分指标进行整合。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各个分指标的得分系数。其中，压力因素中的工作压力、社交压力和生活压力的系数分别为 0.383、0.334 和 0.283。倾向特征因素中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籍类型、流动范围、流动原因的系数分别为 0.195、0.093、0.170、0.049、0.012、0.310 和 0.171。使能特征因素中的家庭收入情况、收入增长情况、基本医疗保险、就医距离的系数分别为 0.367、0.201、0.174 和 0.258。

进一步而言，从社会因素、压力因素、倾向特征、使能特征以及需求特征五个维度得出的影响因素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在五类影响因素中，倾向特征的估计系数最大（-0.392），并在 1%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倾向特征是影响流动人员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最主要的因素。社会因素对流动人员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0.021），压力因素和需求特征的估计系数分别在 10% 和 5%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使能特征的估计系数虽然为正，但不显著。

此外，通过比较分析社会因素、压力因素和需求特征的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可知，使能特征是继倾向特征之后的影响流动人员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第二大因素。需求特征、压力因素和社会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效力则依次下降。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CMDS 数据研究了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流动人口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水平受到“生理—心理—社会”三个层面的多重影响。具体而言，在社会因素层面，流动人员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水平也越高。在个体心理层面，工作压力和社交压力均与流动人员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水平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在个体特质以及生理因素层面，女性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程度高于男性；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水平也越高；流动人员的流动范围越大，流动人员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水平越低；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和参加医疗保险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流动人员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水平；自评健康状况良好的流动人口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程度相对较低。本文对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除使能特征外，社会因素、压力因素、倾向特征以及需求特征均与流动人员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行为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并且相比较而言，倾向特征对流动人员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程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使能特征，影响程度最低的是社会因素。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完善全民健康保障体系，从构建多重强化医疗保险制度和优化医疗卫生服务工作体系出发，增强其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二是强化配套支持政策，进一步通过拓展流动人员的收入来源、创立外来人活动中心、构建家庭援助介入等方式增加流动人员的收入，提高其医疗卫生服务的支付能力。

责任编辑：王 冰

· 中国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研究 ·

多重机制协同减贫模式：政策工具与逻辑机理

——广东减贫治理成功的一种解释范式*

张开云 邓永超

[摘要]行政力量与行政机制、市场力量与市场机制、社会力量与社会机制三重力量与机制在减贫治理中协同互嵌，合力推动减贫目标的实现，形成了广东特色的多重机制协同减贫模式。该模式综合运用建档立卡、行政发包、督查与巡查、考核、评估与问责等政策工具，“公司+N”利益联结、扶贫车间、资产收益扶贫等市场机制工具，结对帮扶、社会组织扶贫等社会机制工具，面向多维贫困的系统治理呈现出丰富的实践样态。广东减贫治理实践就是充分发挥不同机制的优势与作用，协同互嵌、有效配置减贫资源从而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过程。

[关键词]多重机制 理论基础 政策工具 协同互嵌 解释范式

〔中图分类号〕F83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2)12-0084-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向世界宣告，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成功的减贫治理实践吸引了诸多学者的研究关注。有研究认为，中国减贫治理的成功在于构建了有效的回应性治理体系，^①形成了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治贫的理念以及“一中心与多部门协同治理”模式。^②与此不同的是，有研究认为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益贫政策和渐进式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脱贫成功的关键。^③有研究认为广东精准脱贫的成功密码是坚持党的领导、增强政治势能及扶贫与党建双管齐下。^④现有研究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主体参与及治理体系的重要作用，但多在全国层面、宏观层面讨论中国减贫的成功经验，从省域层面总结和讨论减贫治理成功经验有较大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生计脆弱性测度、形成机理与消减政策优化研究”(7207408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开云，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省减贫治理与乡村振兴研究院教授；邓永超，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省减贫治理与乡村振兴研究院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642）。

① 王小林、张晓颖：《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经验解释与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取向》，《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2期。

② 左停、李世雄等：《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国脱贫治理经验的基本面》，《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③ 黄承伟：《新中国扶贫70年：战略演变、伟大成就与基本经验》，《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④ 岳经纶、吴永辉：《从“‘双到’扶贫”到“精准扶贫”：基于广东经验的中国扶贫之路》，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65-266页。

拓展空间。从政策工具层面解析减贫治理成功的“密码”有助于更清晰描述减贫治理实践样态。此外,学界认同政府、市场与社会在减贫治理中的作用,特别是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及社会机制之间协同形成合力从而实现减贫目标的内在逻辑,值得深入挖掘。

在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阶段,广东省委、省政府精心统筹和有效推进,广东所有贫困村实现如期脱贫,还帮助支持云南、四川、贵州等省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走在全国前列。深入剖析广东减贫治理成功的“密码”,全面解析广东减贫治理模式,有助于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与治理相对贫困提供参考。

一、多重机制协同减贫的政策工具与实践样态

广东减贫治理实践就是通过政府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通过行政机制配置资源,同时借助市场机制、道德机制将更多的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配置整合于减贫治理,从而推动区域共富、群体共富的过程。

(一) 行政机制工具与实践样态

精准行政机制及其相应的政策工具是广东多重机制精准协同减贫模式的核心机制。广东省委、省政府及扶贫部门创设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的实施意见》《广东省新时期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办法》等系列文件,开发和综合运用了诸多的政策工具。

一是建档立卡。建档立卡是实现贫困治理精准化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也是中国和广东减贫治理体系中重要的技术治理实践方式。国务院下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明确要求“建立健全扶贫对象识别机制,做好建档立卡工作”。2015年在国务院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再次要求积极“抓好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这个关键环节,为打赢扶贫攻坚战打好基础”。^①基于上级文件要求,广东省先后制定、印发《关于做好2016年项目和2017年计划数据补充采集录入工作的通知》《关于确认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据和报送2017年脱贫计划的通知》等系列政策,对2277个贫困村约170万相对贫困人口“建档立卡”,为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进行数目字管理、数字减贫治理等政策实施与工具运用提供了制度基础与指引。

二是行政发包。行政发包制是指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发包关系,其本质是上级对下级的责任指定和目标结果考核。有学者认为,行政发包制突出的表现是行政权分配、经济激励和内部控制三个方面。^②“五级书记抓扶贫”工作体制本质上就是一种行政权分配、经济激励和内部控制的行政发包制度安排。通过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状的形式,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自上而下”地得到落实。^③广东在推进精准扶贫工作过程中,采取的是一个市(如广州市、深圳市等)的具体部门或省直属部门(如省委组织部、省纪委等)对口“包扶”非珠三角地级市(如广州对口帮扶清远、梅州)或贫困村的做法。从治理角度看,如此制度安排便于上级或扶贫部门对减贫绩效与目标进行管理和考核。有学者认为,这种扶贫包干制一方面能最大限度调动行政部门的资源和积极性,大力推动扶贫工作,另一方面也容易增加行政部门本身的工作负担,形成本职工作与扶贫工作之间的冲突。^④

三是督查与巡查。督查与巡查是减贫治理和脱贫攻坚目标实现过程中的一种常态化、辅导式政策工具与实践样态。脱贫攻坚能否胜利收官关系到2020年能否如期全面脱贫和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为此,广东制定了《广东省新时期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办法》。该《办法》规定,督查巡查工作主要采取召开座谈会、实地调查、问卷调查、个别访谈、受理群众举报、随机访或者暗访等形式开展,对脱贫攻坚重点工作进行专项督查,根据需要不定期开展。可以说,常态化督查和巡查机制是广东有力推进攻坚战

^① 袁树卓、高宏伟等:《精准治理中农村反贫困政策创新的合法性评价——以县域扶贫建档立卡为例》,《技术经济》2020年第4期。

^② 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③ 王小林、张晓颖:《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经验解释与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取向》,《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2期。

^④ 许汉泽:《行政治理扶贫:对精准扶贫实践逻辑的案例考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27页。

点任务完成的重要政策工具。

四是考核与评估。考核、评估与问责是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环节和治理工具，往往由政府自身或借助第三方运用多种方式对政府的决策和管理行为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等影响和效果进行测量、分析和评价，对提高治理效能具有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考核、评估与问责是一种“上下互动”机制，有助于提升扶贫绩效、避免出现较大政策失误。^①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的通知》（厅字〔2016〕6号）等文件要求，广东省制定印发了《2016年度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实施方案》，对广东省减贫治理总体绩效进行全面考核和有效评估，其中典型的政策工具或考核方式是第三方评估，即委托有关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采取专项调查、抽样调查和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相关考核指标数据进行审核、分析和评估。

（二）市场机制工具与实践样态

在压力型体制下，由于基层政府政策执行与资源配置的能力有限，需要借助市场力量与市场机制助力减贫目标实现。政府往往通过培育新型市场主体，对农户进行产业补贴，增进农户的市场参与度，从而改善农户的生计资源。^②发达的市场基础与有效的市场机制工具是广东减贫治理取得成功的优势。

一是“公司+N”利益联结机制。产业扶贫是减贫治理的重要路径之一，也是提升贫困户收入的重要方式。地方政府一般以扶贫资金投入、产业补贴等优惠政策为条件，积极推动农业企业、农业经营组织与贫困户等市场主体建立利益联结关系，从而帮助贫困户脱贫。在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实践中，广东充分发挥市场优势和市场机制作用，聚焦“发展产业脱贫一批”脱贫路径，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农户”等联农利益机制与实践样态。二是扶贫车间。扶贫车间是减贫治理实践中创设出的重要实践工具，既为农户提供与“种田”相比具有收入比较优势的就业岗位，也便利农户照顾家庭中的老人、小孩等有需要的家人。广东鼓励基层乡镇与贫困村盘活、整合村集体闲置的办公用房、废旧校舍等资源，改造建成“就业扶贫车间”，支持和引导有发展前景、用工形式灵活、适合到村建厂设点的项目。各地涌现出不同产业类型的扶贫车间，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提供了更多的生计机会，对于解决“零就业”贫困家庭的生计资源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资产收益扶贫。资产收益扶贫形成于精准扶贫战略实践，是股份制理论与扶贫实践相结合的机制工具，在脱贫攻坚中具有重要作用。实践表明，通过资产登记入股，让贫困户参与经营并按股分红，更能激发贫困户脱贫、减贫的积极性。此外，从贫困户的真实需求出发，以大米等物质形式补偿其资产出让比简单的现金发放形式更能让贫困户得到实惠，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情怀。^③四是消费扶贫。消费扶贫是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等主体通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产品与服务，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一种扶贫方式，是具有深厚市场基础和广阔市场空间的广东减贫治理实践中优势鲜明的减贫路径，形成了多种政策实践工具，如：消费扶贫市场（广东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枢纽型消费对接工具；在数字社会情境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直播带货等技术治理工具。实践表明，消费扶贫打通了从农户到合作社、从生产者或农业企业到消费者的供应链，促进了帮扶省份间、帮扶区域间的产销对接，联结了小农户与大市场，助推了群体共富与区域协调发展。

（三）社会机制工具与实践样态

社会扶贫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动，也是道德（社会机制）作为资源配置机制发挥作用的实践过程。从国家—社会视角来看，社会扶贫是对行政机制配置资源边际效用递减的有力补充，通过道德、自愿配置、筹集及引导社会力量和资源参与减贫治理实践。

一是结对帮扶。结对帮扶是推动精准扶贫深化的社会机制工具之一，通过精准对接贫困村、贫困户

^① 王小林、张晓颖：《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经验解释与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取向》，《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2期。

^② 袁小平、杨爽：《精准扶贫中的社会动员：政府、市场与共意》，《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③ 梁琦、蔡建刚：《资源禀赋、资产性收益与产业扶贫——多案例比较研究》，《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的需求,引导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与贫困村、贫困户形成结对帮扶关系,参与减贫。自2018年起,广东启动实施“万企帮万村”行动,引导全省民营企业 and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极参与减贫治理,聚焦农村产业发展、村庄建设、脱贫攻坚三大重点,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发展。数据显示,广东省发动“万企帮万村”帮扶企业10630家,结对帮扶村8805个,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31余亿元。^①二是社会组织扶贫。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和服务提供的重要主体,在减贫治理实践中有其独特优势,能精准对接贫困对象需求,服务专业性强,服务资源使用效率较高,注重对贫困对象的增能和资产建设,提升其发展的内生能力。广东省积极推动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合力的大扶贫格局,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减贫的社会扶贫体系。数据显示,2018—2020年,广东省6600多家社会组织开展扶贫协作项目6200多个,共投入资金约269亿元,累计受益贫困人口超1100万人。^②三是公益慈善扶贫与扶贫济困日。广东重视公益基金与慈善组织对减贫治理的作用,通过众多的公共基金和慈善主体,引导广泛的社会主体“自愿”把资源配置到减贫治理事业。广东“扶贫济困日”^③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扶贫济困爱心平台,是发挥社会机制及其道德基础作用的重要载体与政策工具。该活动以促进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和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济困。实践表明,广东扶贫济困日在减贫力量凝聚、资源筹集与配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多重机制协同减贫的作用逻辑与互嵌机理

(一) 行政机制及其治理基础与市场机制的协同互嵌

随着精准减贫实践的推进,中国政府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以市场机制提升农村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形成了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的减贫治理格局。^④在广东多重机制协同减贫治理模式实践中,行政机制及其治理基础与市场机制及其市场基础之间呈现鲜明的协同互嵌关系,其运行逻辑与机理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是行政统筹机制。广东扶贫部门全面落实“五级书记”抓扶贫工作机制,党委政府把扶贫列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和布局中统筹考量,通过扶贫工作队等人力资本投入、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治理的组织资本投入、鼓励企业等主体与贫困村、贫困户结对帮扶、定点帮扶等制度设置,全面优化农村基层的政策执行力和行政统筹能力,整合市场力量,形成行政统合减贫体系。二是财政投入机制和导引机制。自精准扶贫以来,中央财政每年都会根据各地情况安排大量财政资金用于扶贫发展,形成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在重视公共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的同时,广东省通过农业扶持资金导引及农业产业补贴机制,积极引导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筹集、配置更多资源投入减贫事业发展中。通过导引机制和产业实践,实现贫困户的脱贫积极性与产业发展、市场机制形成良性对接,有效增加了贫困家庭的生计机会,提升了其内生发展能力。三是东西部帮扶协作机制。广东通过行政动员和协作机制,组合配置广东不同地市及资源对接帮扶云南、四川、广西、贵州四省(自治区),全面推进产业协作、消费协作和劳务协作。在产业帮扶、消费帮扶与就业帮扶的多维帮扶实践中,政府(行政机制)不再是唯一的作用机制,市场力量遵循市场规律和市场机制日益广泛参与协作,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基于道德感召与道德机制也积极组合资源融入东西部协作大系统。政府(行政机制)、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道德机制)的协同互嵌,有效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了区域共同富裕进程。

(二) 市场机制及其基础的减贫作用与协同机理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直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基本着力点。政府和市场关系不是对立或替代关系,而是更多样化的协同关系。

①《广东“万企帮万村”累计帮扶资金逾131亿元》,凤凰网: <http://gd.ifeng.com/c/831HWKFSOL2>, 2021年1月14日。

②广东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广东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办公室会同100家社会组织开展2021年社会组织参与“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动员和倡议》,《大社会》2021年第6期。

③许汉泽:《行政治理扶贫:对精准扶贫实践逻辑的案例考察》,第160页。

④杨灿明:《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的百年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管理世界》2021年第11期。

市场机制及其基础是广东减贫治理模式的关键支撑，其作用及与其它机制的协同机理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是人居环境改造需要政府公共投入和政策支撑，也需要市场参与，两者协同合力实现“生态宜居”目标。实现“生态宜居”目标是贫困村发展、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要实现的目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对与“生态宜居”相适应的乡村人居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如村庄道路建设、垃圾收集转运与处理、厕所建造以及村庄风貌管控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离不开政府公共投入和政策支持，其建设和运营管护也需要专业化市场主体的参与。政府（行政机制）与市场（市场机制）协同合力，推动“生态宜居”目标实现，改善了贫困村、贫困户发展的生计环境，降低了生计成本。二是市场主体及市场机制为小农户对接大市场提供了强大的联结工具和市场空间。广东通过构建农超对接、消费扶贫网络、消费扶贫平台搭建等市场化工具及行政性消费市场（如通过行政规制引导广东消费贵州、云南等帮扶省份的农产品和引导珠三角地市消费购买非珠三角贫困村的农产品），为小农户联结大市场、“供—需”无缝对接提供了强力的制度支撑与市场空间。消费帮扶实践过程彰显了政府推动（行政机制）、信息嵌合与资本互动（市场机制）、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参与和公众响应（社会机制）这三重机制协同互嵌，有效助推了广东减贫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三是市场主体响应政策支持与行政导引，积极参与乡村产业发展。在扶贫产业发展过程中，企业基于政策引导和市场规律，积极兴办扶贫工厂、扶贫车间等，推进贫困家庭与农户就近就业。企业在农村投资设厂或兴办的扶贫车间要有效运行，既要企业投入资金和管理，更需要政府提供土地甚至厂房，还需要政府修建好交通设施和配套基础设施。这个过程实际就是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精准协同的过程。

（三）社会机制及其道德基础的减贫作用与协同机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力量作用，构建大扶贫格局，引领市场、社会协同发力。^①行政机制在减贫实践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容易扩大政府实际规模和加大行政成本，导致边际效用递减。为此，广东大力弘扬慈善文化和济困德行，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推动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行政机制协同互嵌，提高减贫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回应贫困家庭的多样化需求。

一是社会主体基于道德感召，筹集和“自愿”配置社会资源参与减贫治理，有力补充和丰富了精准减贫资源集。慈善共治与社会机制配置资源是国家治理、互助共济文化在减贫治理多元格局中的映射，是私人慈善、宗教慈善、国家慈善以及社会慈善等多元慈善形式在新发展阶段的存续发展与融合，也是国家和社会互动、协同共治的缩影。^②在多重机制协调减贫治理模式实践中，广东通过“万企帮万村”帮扶对接机制、互联网慈善多元协同对接机制等政策工具有效整合社会与市场资源，协调配置到减贫目标对象和区域，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群体共富的重要支撑。二是社会主体通过项目、专业服务赋能农户，即通过项目化装置、专业化方式提升减贫服务供给与需求对接的精准度，提升农户、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与能力。“社会组织”具有渠道优势、专业化优势和技术带动的减贫优势，可以在精细化帮扶贫困人口能力提升、精准解决贫困人口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③社会组织通过开展教育、文化、助残等减贫项目，基于需求为扶贫对象提供实用科学知识和技术技能，使扶贫对象通过参加学习，掌握和应用脱贫致富的技术技能。^④同时，政府与社会力量协同合作，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发挥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的多样性和专业性优势，在贫困人口和现代社会之间建立起互通的多层次渠道，促使其吸收和接纳现代化的理念、观点和思维，逐步调适自己的生活方式、脱贫意愿和提升生计能力。

① 习近平：《在打好进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0年第9期。

② 马金芳：《多元慈善合作及其法律规制》，《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③ 杨灿明：《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的百年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管理世界》2021年第11期。

④ 莫光辉、祝慧：《社会组织与贫困治理：基于组织个案的扶贫实践经验》，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第XII页。

三、结论与讨论

贫困的宏观表征是区域发展、群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减贫治理的核心是要解决政策、资源、机会问题，以及贫困群体的行动意愿、行动能力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①这意味着要逐步消除区域间不同群体生计资源、生计机会的差异，实现区域共富和群体共富。广东减贫实践的理论解析表明，这些问题的解决既要依靠政府（行政机制配置资源），也要依靠市场（市场机制配置或分配资源），还要依靠社会（道德机制配置资源）。精准行政扶贫体系及其相应治理机制为广东减贫治理成功提供了基础支撑，但广东脱贫成功的密码还在于雄厚的市场经济基础和广泛的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的扶贫参与，以及由此生成的在助力脱贫过程中的所体现出来的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基于道德与文化的资源再分配机制，亦可称为道德机制或社会机制）。不同机制在减贫治理过程中具有各自优势，发挥不同作用。如（政府）行政机制的优势是通过科层体系的制度安排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够通过内化机制降低市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而市场机制的优势是通过竞争体系的制度安排提高竞争效率，降低科层体系下的组织控制成本。^② 社会组织的优势在于其接地性、专业能力与使命意识。市场力量与市场机制、社会力量与道德机制、行政力量与行政机制三重力量与机制在减贫治理中协同互嵌，合力推动减贫目标实现，形成了广东特色的多重机制协同减贫治理模式。

丰富深厚的传统岭南扶危济困文化与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养成的现代公益文化认知相融合，在政府减贫政策引导和益贫制度环境的支撑下，有效嵌入和支撑了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的减贫参与和主体性作用发挥，这是广东减贫模式的鲜明特色。然而，正是由于广东精准行政机制及其基础植根于本土开放、务实的治理风格和独具特色的岭南文化，一定程度限制了其经验的可复制性和普适性。同时，在我国减贫治理实践过程中，由于中心统筹决策与强大的行政动员与压力型体制，基本是通过大投入、大项目和大动员在较短时期实现了脱贫奇迹，扶贫干部主要着力在收入脱贫上，帮助贫困户形成自生能力、内生动力（即扶志、扶智）不够充分，形成了基于政策和大资源投入的路径依赖性，使得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与运行效能受到影响。总的来看，广东多重机制精准协同减贫治理模式的实践表明，要有效实现减贫目标和可持续脱贫，在新发展阶段有力促进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必须持续优化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及行政机制、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减贫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精准协同性，需要在行政机制及其治理基础发挥统筹、导引等资源配置与组织协调作用的同时，使其与市场机制及其市场基础、社会机制及其道德文化基础相互协同和动态嵌入，形成减贫和乡村振兴合力。多重机制协同减贫治理模式本质上是多元资源不同配置方式或机制的搭配或配比均衡的实践过程。欠发达地区之所以需要发达省份帮扶，其实际就是补齐其在资源配置机制方面“协同失衡”的短板。当然，政府、市场与社会行动者之间如何动态协同，三种资源配置机制到底应该如何实现理想配比均衡，这是一个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进行治理实践探索 and 创新的持续过程。

面向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命题，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与治理相对贫困的过程中，必须持续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用发展的方式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前行。同时，既要优化产业振兴联农带农机制和改善脱贫户、低收入家庭的生计资本，提升其生计韧性，也要通过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其生计福利安全。应进一步优化第三次分配体制机制，支持社会组织、公益力量等持续发挥优势和作用，有力参与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责任编辑：王 冰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1页。

^② 黄祖辉、李懿芸等：《论市场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与作用》，《农业经济问题》2021年第10期。

乡村振兴背景下韧性乡村的影响因素 与示范带耦合分析^{*}

曲霞 文晓巍

[摘要]探索能够适应未来外界环境扰动的乡村振兴路径,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乡村全新发展并达到更高水平均衡状态的重要课题。基于此,将韧性理论引入乡村振兴领域,以广东乡村振兴示范带为研究对象,探讨韧性乡村及其影响因素,以及构建韧性乡村、推进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逻辑机制。乡村韧性能力受到经济水平、环境质量、归属感、就业机会、政府管治等因素影响,同时乡村韧性系统具有多维度的特征,以韧性乡村的维度特征为衡量标准,通过乡村振兴示范带构建韧性乡村具有理论耦合性,能够化解影响乡村韧性的因素,提升乡村应对外界扰动冲击的抵御能力、适应能力、转型能力,以及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关键词]韧性乡村 乡村振兴 影响因素 乡村振兴示范带 耦合性

〔中图分类号〕D630; 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2)12-0090-06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要求。但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发展不均衡,乡村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逐渐增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趋变为以“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为代表的“新三农”问题。^①这一变化表明,村庄结构和功能正在发生转型,村庄系统性的风险正在变化,依靠村庄自我修复和外部资源链接等方式无法应对和化解“新三农”问题,提升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成为化解风险、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途径。韧性是为了培育系统面向未来的不确定风险、主动适应和吸收化解外界干扰的能力,^②将韧性理论引入乡村振兴研究领域,本文将要讨论以下问题。第一,在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基于韧性乡村的影响因素,如何通过示范带构建韧性乡村以及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第二,将示范带建设整合到韧性乡村的维度分析框架中,示范带与韧性乡村的理论耦合程度如何?第三,以韧性乡村的维度特征为观照点,通过示范带构建韧性乡村还有哪些差距,如何进一步优化示范带建设,从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生产供应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风险识别与预警研究”(71633002)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人居环境整治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及形成机制研究:基于广东省的调研分析”(GD19CGL30)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曲霞,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文晓巍,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642)。

① 项继权、周长友:《“新三农”问题的演变与政策选择》,《中国农村经济》2017年第10期。

② T.Marsden and R.Sonnino,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gional State: Denying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in the UK”,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24, no.4, 2008.

而使乡村系统能够抵御、适应以及变革创新实现全新转型，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乡村振兴。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韧性”一词来自工程领域，是一个物理学概念，表示物体在塑性变形和破裂过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① 20 世纪 70 年代被广泛应用于自然生态学领域，形成生态韧性理论，其核心理念是生态系统在遭受不同类型的冲击时尽力维持其原有的稳定状态。^②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韧性”从自然生态系统向人类社会系统延伸，形成演进韧性理论。其中，以适应性循环理论为代表的演进韧性理论框架认为，社会生态系统受到不确定性干扰会经历四个阶段，分别是利用阶段、保存阶段、释放阶段以及重组阶段。^③ 系统通过这一循环过程，不断形成抵御、适应、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韧性在乡村领域的应用。随着韧性向人类社会系统的延伸，演进韧性则被更多的用于乡村领域的研究。该理论认为，韧性能够保持系统在动态演化过程中经受住内外部风险威胁和持续不断的适应力、学习力和转型力。基于演进韧性的视角，本文将韧性乡村定义为：乡村系统在受到内部和外界（自然、经济、社会因素）的各种扰动后，通过内部要素结构的自我调整以抵御和适应外界扰动，维持系统功能平稳运行，并促使系统进入新状态，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目前，国内学者较多将韧性理论及乡村韧性分析框架用于对脱贫地区防止返贫的治理研究方面。如有学者提出将脆弱性治理适时转向韧性治理，能够提升脱贫地区乡村系统主动、有效应对风险的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④ 还有学者以韧性治理为重点的反贫阶段开展研究，提出需要调整政策方向、政策机制、政策体系来实现贫困治理的政策转型等，^⑤ 这些研究都是围绕如何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提升乡村韧性治理探讨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乡村面临的风险和各种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乡村问题更加复杂，构建一套韧性乡村可持续发展系统是解决乡村振兴新阶段各种难题的重要路径。然而，以韧性乡村作为新阶段乡村转型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思路，既有研究还不充分。

基于以上分析，如图 1 所示，本文以广东乡村振兴示范带作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对示范带具有的多功能性、整体性、综合性分析，以社会、生态、经济作为韧性乡村的测度指标，通过实地考察，发现乡村振兴示范带与韧性乡村特征具有耦合性。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以示范带建设适应、增强、构建韧性乡村的过程，分析示范带所表现出的应对挑战的能力以及与韧性乡村存在的差距，从而提出优化路径，实现乡村全新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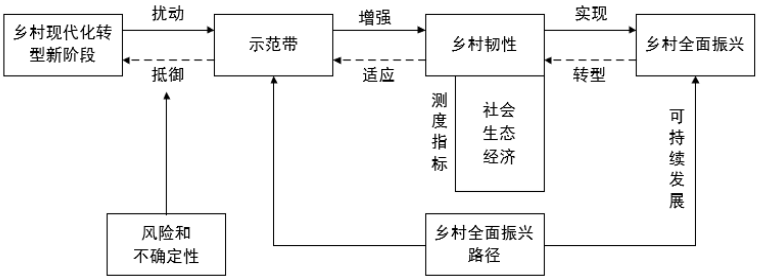


图 1 乡村振兴韧性分析框架

三、广东乡村振兴示范带构建韧性乡村的实践

在“三农”工作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的新阶段，广东以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为抓手，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进而辐射带动乡村全域振兴。通过对广东初具规模示范带的实地调研，结合广东

① 刘晓星、张旭等：《中国宏观经济韧性测度——基于系统性风险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 1 期。

② C. S. Holling,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vol.4, no.4, 1973.

③ C. S. Holling and Lance Gunderson Gunderson, “Resilience and Adaptive Cycles”, *Panarchy: 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 in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 New York: Island Press, 2001, pp.25-62.

④ 巩蓉蓉、何定泽等：《乡村振兴背景下脱贫地区韧性治理：机理与路径》，《世界农业》2021 年第 11 期。

⑤ 翟绍果、张星：《从脆弱性治理到韧性治理：中国贫困治理的议题转换、范式转变与政策转型》，《山东社会科学》2021 年第 1 期。

出台示范带建设指引等相关文件，将乡村振兴示范带定义为以中心村为节点、圩镇为枢纽，串点成线、连线成片、集片成带，统筹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的先行示范区。示范带建设要具备产业兴旺、环境改善、风貌提升、乡风文明、设施完善、治理有效六大要素。

乡村振兴示范带是串联圩镇和中心村的综合示范区，因此示范带沿线的乡村地域系统更加复杂。在韧性乡村的影响因素方面，按照乡村地域系统的内核子系统划分，一般划分为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子系统。基于三大系统，有学者构建了基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多维度韧性分析框架，认为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下，一些村落的经济韧性较高，但其他维度的韧性，尤其是自然、社会等韧性需要更强有力的政策来维系；^①有学者认为社会过程是影响农村韧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农户在城乡交流中的参与度对乡村韧性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当地经济情况、就业机会、环境质量以及归属感、社区凝聚力也是影响乡村韧性的重要因素。^②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将韧性乡村的影响因素归纳为经济水平、环境质量、归属感、就业机会、政府管治 5 个因素。^③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因此从影响因素看，韧性乡村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构建韧性乡村是推进乡村振兴与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根据韧性乡村的影响因素，通过实地观察、访谈等社会调查方法，对广东省初具规模的示范带建设情况进行梳理，筛选出具有良好自然、社会、经济因素基础的示范带作为案例研究对象（表 1），这些案例尽可能的解释了复杂乡村地域系统进行结构功能更新和转型的不同方式，通过具体分析，找寻构建均衡与可持续发展的韧性乡村，以及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表 1 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案例及效果分析

案例		典型案例及效果
案例 1	汕尾陆丰“滨海走廊”示范带	推动“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带动乡村旅游、休闲采摘、民宿农家乐等农村经济新业态，带动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促农增收和环境改善的双赢。
案例 2	茂名高州“古色荔乡”示范带	发挥荔枝、龙眼等特色农业产业优势，依托国家级、省级产业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带，推进县域、镇域、乡村产业形成规模集聚效应，实现联农带农。
案例 3	广州增城“时光穗道”示范带	以示范带建设为抓手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同步推进现代都市农业发展和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鼓励村民开展美丽乡村绿化美化提升行动，引导农民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投身美丽乡村建设。
案例 4	佛山“百里芳华”示范带	同步推进基层党建、乡村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三水区“办事有清单、干事有底气”重要事权管理清单制度入选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九江镇创新五治融合社会治理体系。
案例 5	珠海斗门农文旅融合示范带	示范带乡村导入产业，利用传统文化、非遗文化和民俗风情，发展基于当地特色的自主创业，为村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当地经济的再生和农民就地增收。

（一）产业发展是提升经济水平和就业机会的核心要素

实现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产业。产业发展是示范带建设的重要内容，如案例 1 汕尾陆丰推动美丽乡村转化为美丽经济，案例 2 茂名高州市围绕国家级、省级产业振兴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带，推进县域、镇域、乡村产业形成规模集聚效应。案例 5 珠海斗门示范带以农文旅融合发展美丽经济，两者均立足于推动休闲农业成为乡村发展的主导产业。

产业发展中，产业多元化是衡量乡村韧性的重要维度，以此应对与农村衰退相关的问题。因此，乡村振兴核心价值在于当地经济的复兴，提高当地的产业发展能力以及提供就业机会。^④以休闲农业为主导产业能够推动产业多元化发展，实现村民就地增收。案例 1 汕尾陆丰基于该区域的旅游资源和产业基

① Geoff A. Wilson, Hu Zhanping and Sanzidur Rahman, “Community Resilience in Rural China: The Case of Hu Village, Sichuan Province”,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60, 2018.

② Phil Mcmanus, Jim Walmsley, Neil Argent, et al., “Rural Community and Rural Resilience: What is Important to Farmers in Keeping Their Country Towns Alive?”,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28, no.1, 2012.

③ 刘美豆：《发达地区乡村韧性演进及动力机制——以扬中市为例》，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 年。

④ Jing Shen and Rung-Jiun Chou,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Xiamei: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of Integrating Tea Tourism with Ancient Village Preservatio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90, 2022.

础建设示范带,推动农旅融合,有助于村民就近就业与增收。案例5珠海斗门为乡村导入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基于当地特色的自主创业,为村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当地经济的再生和农民收入增长。

(二) 美丽乡村是改善环境质量的有效途径

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建立生态环境管理体系和绿色发展体系至关重要。案例3广州增城以示范带建设为抓手,推进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融入碧道廊道、农房风貌等,打造美丽生态、美丽生活空间和良好的生态宜居环境。从广东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整体来看,通过示范带深挖资源、集中发力,尽快补齐污水治理、农房风貌和乡村建设等短板,推动乡村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生态韧性得到增强,是实现乡村生态振兴和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以美丽乡村为标志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带,推动美丽乡村转化为美丽经济,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立以国内经济循环主导作用的流通发展格局创造条件。如汕尾聚焦八大美丽,通过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乡村振兴综合体,打造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景观示范带、美丽经济新样板,变“资源”为“资产”,提升资源变现能力,为村民找到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同时通过旅游、康养、民宿等美丽产业,打通城乡互通渠道,满足扩大内需的要求。

(三)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政府管治的重要内容

演进韧性理论认为,乡村主体是发展韧性能力的关键。乡村振兴是涉及多元组织的集体行动过程,明确乡村治理主体,是提升韧性治理能力进而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①党建引领是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的根本要求,如案例4佛山“百里芳华”示范带同步推进基层党建、乡村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并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以党建引领走出乡村振兴之路。实践中,广东各地都成立了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一般由县(市、区)委书记担任组长,把示范带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强化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制,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与工作引领。汕尾陆丰市成立示范带指挥部,创设“带长制”,人大、政协、纪委监委一体参与,协调和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并带动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共同参与,使之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在政府管治方面,参与主体也同样重要。因为韧性乡村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地域系统,不同尺度层次的建设管理主体是支撑乡村韧性的基础因素,对乡村韧性的作用也有所差异。如案例3广州增城示范带鼓励村民开展美丽乡村绿化美化提升行动,引导农民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充分调动村庄内生动力,从主体方面起到了有力支撑乡村韧性的作用。

(四) 乡村文化是增强归属感的根本动力

伴随现代化进程,乡村传统文化习俗受到挑战,村庄原始性动摇,进而导致归属感与凝聚力降低。有学者在评测乡村类型与乡村韧性的关系研究中特别强调情感依恋、归属感、自豪感对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性。^②文化是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的重要内容,如案例2茂名高州示范带,通过多种形式展示村史人情,弘扬地方特色文化和传统习俗;案例5珠海斗门结合莲溪片区丰富的非遗文化和民俗风情,将乡村传统文化民俗融入示范带建设中,增强了村庄归属感。在引入和建设乡村传统文化的同时,既提升了乡村文化韧性,也增强了村庄凝聚力。另一方面,乡村文化也是村庄内农民集体行动的动因。文化为集体行动提供了一般性的价值导向,这种价值来源于社会共享的象征系统,而人们的行动倾向就是受到这种价值规范的塑造而做出的选择,是人们指导其建构自己行为策略的工具包。^③通过乡村文化建构,实现乡土文化认同,促使村庄共同体行动,在提升乡村文化韧性中,发挥村民主体性作用。

四、乡村振兴示范带与韧性乡村维度特征的耦合分析

乡村是一个构成要素众多、机制复杂的多维性复合系统,^④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开放性特征。在

^① 唐任伍、郭文娟:《乡村振兴演进韧性及其内在治理逻辑》,《改革》2018年第8期。

^② Carmit Rapaport, Tzipi Hornik-Lurie, Odeya Cohen,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Type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vol.31, 2018.

^③ 魏海涛:《集体行动的形成:一个文化视角的理论模型》,《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7期。

^④ 李红波、胡晓亮等:《乡村空间辨析》,《地理科学进展》2018年第5期。

衡量韧性系统特征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是威尔德夫斯基（Wildavsky）提出的动态平衡特征、兼容特征、高效率的流动特征、扁平特征、缓冲特征、冗余度六个方面。^①乡村作为复杂地域系统，韧性系统特征适用于韧性乡村主要特征的分析。根据韧性系统特征，结合乡村地域特点，分析演进韧性所强调的抵御、适应、转型能力在乡村社会系统的主要表现，以此构建韧性乡村的多维体系。在经济、社会、生态三大子系统中，基于威尔德夫斯基的研究进行提炼，韧性乡村的维度特征主要体现在冗余度、多元度、多尺度连结性三个方面。^②其中，冗余度是乡村地域系统的物质条件或性能效率超过自身发展需求的能力；多元度是乡村结构与功能多元化，削弱分散外界扰动的能力；多尺度连结性是指要素流动较为迅速，能够及时填补资源缺口。以乡村振兴示范带作为韧性对象，将其置于韧性乡村的维度特征下，在理论上与韧性乡村系统特征具有耦合性，如图2所示，对照韧性乡村的维度特征，乡村振兴示范带所表现出的应对挑战的能力与韧性乡村仍存在差距，还需进一步优化示范带建设，以提升乡村韧性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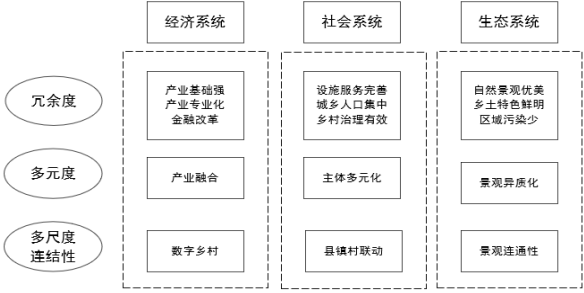


图2 乡村振兴示范带构建韧性乡村的维度特征

（一）示范带产业发展是提升乡村经济韧性构建韧性乡村的主要动力

通过示范带构建韧性乡村，经济维度的冗余度主要对应为产业基础强、产业专业化、金融改革。产业基础强，产业链水平高，经济的韧性和活力就会更足；产业专业化，有利于形成产业集群、产生溢出效应，强大的农业集群还能保障粮食安全；农村金融改革，能够缓解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问题，有助于农村资源变资本，为乡村区域韧性注入稳定因素。经济系统的多元度主要对应为产业融合，在乡村地域系统则主要表现为农村三产融合，即以农业为基础，以经营主体为引领，以利益联结为纽带，通过产业联动、要素渗透以打破产业边界，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有机融合。^③示范带内产业融合发展，能够削弱分散外界扰动，提高乡村系统的抵御能力。多尺度连结性主要对应数字乡村，表现为知识网络与市场网络的连结程度。农村电商是连结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有效平台，也是提高农民现代信息技能和培育新型农民的重要途径。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是促进乡村与城市、区域市场融合程度的重要途径，示范带内要素流动较为迅速，能够及时填补资源缺口，体现了示范带与韧性乡村的耦合性。对照经济系统的维度特征分析，通过乡村振兴示范带构建韧性乡村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从冗余度看，“三农”信用体系和农村资产市场建设相对滞后，是农村金融改革的难点，示范带内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建设有待加强；从多元度看，三产融合程度不深，主要以一、三产业融合的休闲类产业为主，无强大第二产业支撑，也较少形成类似于第二产业紧密的协作关系；从多尺度连结性看，目前农村数字基础还比较薄弱，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结合、农村电商服务体系以及人才培养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

（二）乡村治理乡村建设是培育乡村社会韧性构建韧性乡村的重要保障

乡村地域社会系统的冗余度主要表现为设施服务完善、城乡人口集中、乡村治理有效，设施服务条件是指交通通信与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以及医疗教育与社会保险等公共服务的覆盖程度、性能效率、应急管理。乡村振兴示范带选择人口较多的城乡结合部、中心镇、中心村，重要旅游景区周边建设，这些地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相对完善，人口相对集中，同时乡村治理是示范带建设的重要内容，与韧性乡村具有较强耦合性。

社会系统的多元度主要是指治理主体多元化，表现为村民决策次数、社会组织数量及其村民参与比

① Aaren Wildavsky, *Searching for Safet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8, pp.78-84.

② 邱明丽、刘殿锋等：《乡村韧性理论框架与测度体系》，《中国土地科学》2021年第8期。

③ 肖卫东、杜志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内涵要解、发展现状与未来思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例。示范带建设发挥政府规划引导、政策支持、组织保障作用,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构建政府、市场主体、村集体、村民等多方共建共管格局。多元主体参与示范带建设,是增强乡村韧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在社会系统的多尺度和连结性方面,示范带与韧性乡村的耦合性表现为县镇村联动。跨县联镇串村建设示范带,通过空间网络布局促使县域内有效整合资源,发挥各镇村单元优势,减少各节点差异,提高农民或企业获取信息与资源的能力,从而形成社会资本,弥补市场功能缺失及正式制度不足,提高乡村在面对外界竞争与不确定风险时获取有效支撑资源和发展机会的能力。对照社会系统的维度分析,目前示范带沿线还存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从连结性来看,部分镇村由于缺乏资源也没有纳入示范带建设,导致部分小县城仍然缺乏吸引人口集聚的能力;从多元度来看,农民主体作用发挥不够,内生动力不足。

(三) 乡村景观绿色化特色化差异化是增强乡村生态韧性构建韧性乡村的前提基础

生态维度的冗余度主要表现为自然景观优美、乡土特色鲜明、区域污染少。自然景观优美表现为示范带建设优先选择自然禀赋好、地理环境优越,拥有山林、江河、湖泊、温泉、海滩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等区域;乡土特色鲜明表现为示范带优先选择名人故里、红色基地、革命旧址,或历史建筑、古树名木、民情风俗等文化名镇名村,挖掘优势资源;区域污染少则表现为示范带内污染程度低、物资投入大,以及关键资源的管理水平好,能满足绿色发展要求。

生态维度的多元度主要通过景观异质性来体现,表现为景观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围绕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建设示范带,体现了乡村生态和自然资源的不同特征,反映了乡村生态韧性的多元特征。生态维度的多尺度连结性主要对应为景观连通性,通常用蔓延度与斑块凝聚指数来衡量。一般来说,高蔓延度值说明景观中的某种优势斑块类型形成了良好的连接性;反之则表明景观的破碎化程度较高。^①示范带选择优质资源特色资源连线连片建设,将区域内的优势斑块进行良好的连接,体现了较高的蔓延度,与构建韧性乡村具有高度的耦合性。从生态系统维度来看,示范带与韧性乡村的耦合度最高,但目前还存在破坏乡村生态的现象。应坚持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原则,依据资源禀赋,分类塑造乡村振兴示范带,加强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空间上优势资源景观连线成片的区域优先建设。

五、结论

构建韧性乡村,提升乡村系统的抵御、适应、转型能力,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影响乡村韧性能力的因素,与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二十字方针”有着内在契合性,因此以实现乡村振兴为目标的示范带建设可以化解影响乡村韧性的因素,实现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不过,以韧性乡村的维度特征为衡量标准,示范带虽然与韧性乡村具有理论耦合性,但在实践中,示范带所表现出的应对挑战的能力与韧性乡村仍存在差距,还需要进一步优化示范带建设以提升乡村韧性。基于此,以乡村地域经济、生态、社会三大系统作为韧性分析框架,根据韧性的多维度特征构建韧性乡村的维度体系,主要体现在冗余度、多元度、多尺度连结性三个方面。通过对广东乡村振兴示范带5个典型案例的深入剖析发现,示范带的建设要求、建设内容等与韧性乡村具有耦合性,其中,生态系统的耦合程度最高。但对照冗余度、多元度、多尺度连结性的维度特征,乡村振兴示范带在增强乡村韧性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尤其是在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两方面,还与韧性乡村存在差距。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讨构建韧性乡村的实践路径,从而增强乡村对不确定因素扰动的抵御、适应和转型能力,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符合时代发展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王冰

^① 刘焱序、彭建等:《生态系统健康研究进展》,《生态学报》2015年第18期。

制造业升级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 基础性作用与推动途径^{*}

张 杰 宋宜航

[摘 要] 制造业升级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因素，构建具有全球领先优势的高端制造业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本文构建了全面理解制造业升级活动对一国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推动作用的理论框架，以此归纳和分析全球代表性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典型发展陷阱。在此基础上，从五个方面分析当前中国推动制造业体系持续性升级的重点方向，并由此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框架下推动制造业体系持续性升级的具体途径和重大改革突破口。

[关键词] 制造业升级 中国式现代化 理论框架 突破路径 改革突破口

〔中图分类号〕F401.3; F421; 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 (2022) 12-0096-11

一、深刻理解中国制造业升级驱动的现代化进程存在的重大风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之一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由此，可以得出的基本判断是，如何维持未来 30 年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可持续升级，是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所在。

《中国制造 2025》指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升级能力和升级过程，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因素。作为全球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处于推动制造业连续升级和坚持对外开放的阶段，制造业对中国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决定性作用愈加凸显。一方面，在经济起飞阶段，坚持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促使中国主动利用自身庞大的低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快速发展成为全球的低端制造或者劳动力密集型制造领域的“世界工厂”或“世界加工厂”。发达经济体的 FDI 大量进入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模式形成，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在经济起飞阶段必然会面临的“节俭悖论陷阱”（人均收入低下导致储蓄不足和消费能力低下双重困局），帮助中国从低收入阶段一举顺利进入中等偏上阶段。一个最为显著的证据是，中国持续保持了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地位，按工信部发布的数据，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21ZDA02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国有经济研究院教授（北京，100872）；宋宜航，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讲师（北京，100048）。

全球比重由 2012 年的 22.5% 提高到 2021 年的近 30%。另一方面，中国当前正处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向初等高收入阶段跨越的关口，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机遇期。

然而，当前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升级正面临两个重大障碍。一是出口制造业企业和代工企业的“9 元/小时”低工资水平困境。虽然中国逐渐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领域培育和发展了出口优势，但毋庸置疑的是，制造业部门出口优势相当部分是构建在低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上的。例如，作为中国最大的代工型制造业出口基地，广东在 2022 年对临时用工人员开出了“每小时 9 元”的工资。这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低端制造业在提升劳动者报酬上面临的困境，以及全球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制造业企业利润的控制和压榨效应。进入 2010 年以来，中国的代工型出口制造业企业普遍面临严重的“用工荒”问题。这本质上反映的是，那些仍然试图要求工人每天工作 12 小时以上、每月工资收入只能维持在 3000—4000 元之间的代工型出口制造业企业，遭遇了难以维持以“每小时 9 元工资”招聘到足够数量劳动力的困境。它背后蕴含着劳动密集型出口模式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阻碍效应。发达国家利用对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和利益格局的控制权力和垄断势力，以及针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体系的各种利润纵向压榨效应和低端锁定效应，意图将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压制在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和全球创新链的低技术含量环节。这既能阻碍中国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和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的形成，也能对中国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现代化进程跨越造成负向影响。

二是“低端转移、高端挤压”的独特双重风险。当前，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升级面临典型的“低端转移、高端挤压”或“上有打压、下有追兵”的双重困局。所谓的“高端挤压”或“上有打压”风险突出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认为中国经济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持续崛起态势，必将对西方世界控制全球高端产业和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势力造成根本性的冲击效应，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收入就业岗位和人均 GDP 水平造成直接的竞争和替代效应，最终威胁所谓的西方民主制度体系。为此，面对中国正在构建的以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升级为目标的现代产业体系，美国的应对策略就是实施针对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和高端产业体系的全面技术封锁和遏制策略，积极拉拢美国的经济政治盟友针对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和高端产业体系组建各种形式的封锁和遏制利益共同体，从而全面压制和阻碍中国利用独特的“弯道超车”机会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所谓的“低端转移”或“下有追兵”风险表现为：伴随着现代产业体系的逐步成型、自主创新能力的持续提高和人均 GDP 水平的逐步提升，中国利用自身庞大的中高端内需市场逐步发展出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由此创造释放出中高收入就业岗位和形成居民群体工资持续增长的机制。这给中国那些严重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的加工和代工型制造业带来不可逆转的冲击效应，导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国家转移。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正在试图利用低端制造业向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国家转移的机会，重新组建排斥中国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进而削弱中国在全球的制造业规模优势，抑制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升级能力。因此，中国制造业体系迫切需要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的低收益生产制造组装环节向高收益的创新研发和市场销售环节转移。更为重要的是，在“低端转移、高端挤压”的独特双重风险下，留给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窗口期并不长，可能只有 5—8 年，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由此面临的风险不可忽略。^①

二、理解制造业对一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的理论框架

（一）制造业对一国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推动作用的理论框架

一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全方位的发展和升级过程，其中经济发展是最为基础性的推动因素。^② 换言之，一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会表现为经济发展阶段的动态变化趋势。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可以将一

^① 贾康：《5—8 年内中国制造业若未实现升级 或会被东南亚、印度等取代》，“2022 凤凰网财经（夏季）云峰会”发言，2022 年 6 月 17 日。

^② 张杰、张晨曦、林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大经济风险及应对》，《天津社会科学》2022 年第 6 期。

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区分为四个阶段：低收入阶段、中等偏下阶段、中等偏上阶段和高收入阶段。然而，该划分方法忽略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一国即便在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仍然会面临各种复杂挑战、压力风险以及各种形式的发展陷阱、困局。我们需要对之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进而更为有效地识别和判断一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各种重大风险和障碍。为此，如图 1 展示的逻辑，我们将高收入阶段进一步细分为初等高收入阶段、中等高收入阶段和高等高收入阶段。事实上，一国不仅会在低收入阶段面临“节约悖论陷阱”，也会在中等收入阶段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更会在高收入阶段面临“中等高收入陷阱”。因此，我们将一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动态演化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应该更能有效识别和解释一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差异性特征和动态演化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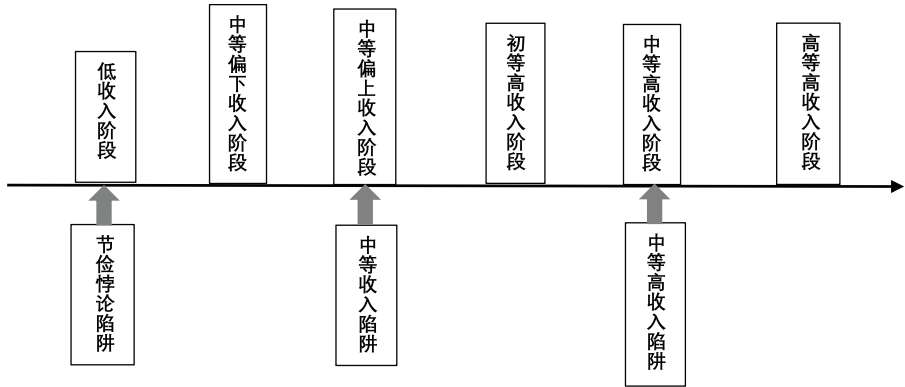


图 1 一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同动态发展阶段划分

从全球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依据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规律来理解影响一国现代化进程的动态演化规律的核心因素，应该主要聚焦在一国制造业体系的动态升级过程。事实上，自从全球进入工业化时代后，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创新和产业革命，愈发成为影响一国经济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换言之，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引导和推动下，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已经成为决定一国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因素。有鉴于此，必须将制造业体系的动态升级能力以及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作为分析和理解一国现代化动态演化规律的基础性条件。

首先，影响一国制造业体系升级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见图 2）。

一是原始创新主导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能力因素。影响一国制造业体系升级能力的最为基础因素，就是一国在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和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等领域体现出来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的领先优势和全球竞争优势。而且，越是那些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的培育和发展，越是受制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的基础性条件。在当前全球各国均将先进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竞争核心因素的前提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愈发成为影响一国现代制造业体系自主升级能力和全球综合竞争优势的根本性因素。

二是贯通式创新链和全链条式产业链技术创新能力。倘若没有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来承接和转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蕴含的产业竞争优势和企业技术创新优势，形成国家基础研究和企业或产业技术创新研究之间的隔离效应，那么，一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必然难以有效转化为企业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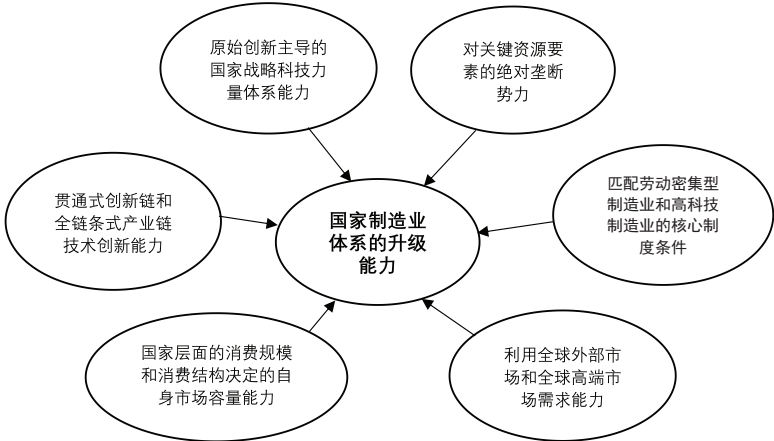


图 2 影响一国制造业体系升级能力的核心因素分析框架

业发展竞争优势和 GDP 创造能力，这将削弱其利用制造业升级能力来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生基础条件。因此，体现在制造业部门和高科技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决定一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以应用开发研究、中间试验研究、工程化研究和产业化商业化研究为主的贯通式创新链自主能力，以及按照产业链上下游需求特征布局的大中小微企业协同发展的系统性全链条式技术创新自主能力，愈发成为影响一国现代制造业体系升级能力和全球竞争优势的核心因素条件。

三是对关键资源要素的绝对垄断势力因素。虽然“唯一创新能力”在重点产业链体系之中的影响力得到强化，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发展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形成和走势愈发重要，但更要关注到的是，在重点产业链的关键资源领域拥有绝对垄断优势，也成为了影响一国是否具备发展先进制造业体系条件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尝试利用自身拥有垄断性关键资源，作为发展本国先进制造业体系的重要力量因素。

四是匹配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高科技制造业的核心制度条件因素。不可忽略的是，营商环境和制度条件正成为影响一国制造业升级的不可或缺因素。一方面，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全球竞争优势，不仅体现在低成本劳动禀赋优势方面，也深刻体现在一国相对宽松的具有灵活弹性的劳动力用工制度、发展工业园区和建立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所需要的土地征用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对以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主的综合成本过早过快上涨态势的控制能力、推动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以抵消要素成本上涨态势的能力等方面；^① 另一方面，要培养和发展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高科技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构建与之相匹配、相适宜的以“制度密集型”或“制度依赖型”为主导的科技创新激励体制、领先人才选拔激励机制和现代金融支撑体系，并将其作为制度完善和建设的核心方向。

五是消费规模和结构决定的自身市场容量能力因素。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面临的第一个发展困局就是“节俭悖论”，即在人均 GDP 水平较低阶段必然会面临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权衡困局。其中，居民拥有的消费规模和消费层次，更是决定着本国依赖自身内需市场所蕴含的企业内部规模经济、产业间外部规模经济以及“本土需求引致自主创新”等特定的良性循环机制的潜力运行和能力发挥。能否及时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转向内需驱动型增长模式，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体系升级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密集创新型制造业体系，对于一国实现从中等收入阶段跨越到高收入阶段至关重要。而决定一国的内需驱动型增长模式能否有效形成的前提条件，就是该国是否具备由自身庞大的消费规模和足够数量的高收入群体主导的内需市场。从当前全球各国经济发展的竞争格局来看，那些具有庞大规模和较高层次内需市场的国家，既可以影响甚至主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工和贸易体系的基本格局和走势，也可以决定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分工利润和贸易利益分配格局。

六是对全球外部市场的依赖和利用能力因素。对于众多发展中小国乃至发达小国来说，即便存在可以充分利用和依靠自身内需市场空间的发展机会，也会因为自身内需市场规模相对狭小而难以实现从低等高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或高等高收入国家。它们必须依靠其他国家的高端需求市场来获得自身制造业体系的升级和扩张机会。然而，从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的现实格局来看，各主要大国愈发将自身的庞大高端市场需求视作一种战略资源，视作维护自身制造业体系在全球竞争优势的核心力量、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和产业竞争的博弈工具、利用全球价值链体系遏制其他国家实施技术创新追赶的关键策略。同时，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逐步模仿和学习发达国家维护自身产业发展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培育和发展机会的种种策略，将自身潜在的需求市场机会作为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发展竞争的重要手段。这导致广泛的拟全球化态势的出现。对于相对小国而言，要利用全球其他主要大国或一般国家的高端需求市场机会，来获得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发展的战略空间，就必须让渡自身国家的部分主权，以附庸国或附属国的身份纳入到美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之中。

^① 张杰、王媛媛：《中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中的资本无序扩张现象、成因与对策》，《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2 年第 3 期。

其次，依据以上提出的一国制造业体系升级的决定性因素分析框架，结合一国制造业体系存在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创新密集型的具 体生产模式和比较优势来源的序贯式升级活动特征，可以进一步地构建制造业对一国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推动作用的理论框架（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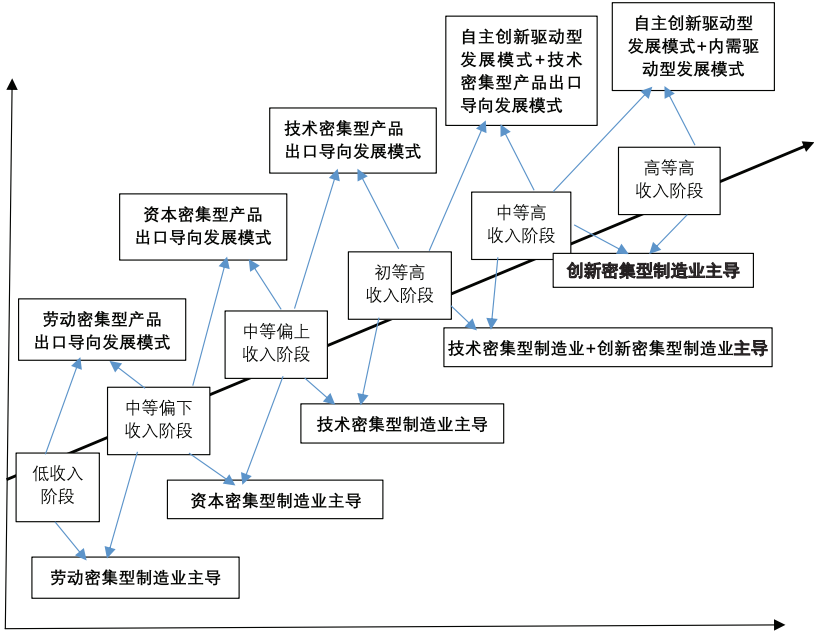


图 3 制造业对一国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推动作用的理论框架

一是“从低收入阶段到中等偏下收入阶段”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对于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要实现低收入阶段跨越到中等偏下收入阶段，即人均 GDP 逐步增长到 4255 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 2022 年标准），都必然面临不可克服的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在相对较低劳动生产率的农业和服务业难以支撑国民群体就业岗位和收入增长的前提下，只能依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培育和逐步壮大作为经济核心支撑力量。因此，能否培育和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是决定一国能否从低收入阶段升级为中等偏下收入阶段的最核心因素。另一方面，在国内面临“节俭悖论”发展陷阱的情形下，依靠国外资本对国内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投资，以及利用本国相对低成本的劳动力禀赋优势来塑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就成为发展中国家摆脱经济起飞阶段的核心手段。

二是“从中等偏下收入阶段到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 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在此阶段，一国的发展再一味依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该产业产品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弱化。由此，该国必须推动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导模式向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主导模式转变。这既可以依靠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推动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塑造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也可以通过创造相对高收入就业岗位来提高居民储蓄和投资能力，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提供资本来源。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该国由中等偏下收入阶段向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跨越，其劳动力成本优势必然发生整体弱化，进而导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出口优势弱化，以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向其他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转移。因此，这必然会倒逼该国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模式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模式转移和升级。

三是“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到初等高收入阶段”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主导 + 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从发展经验来看，众多国家在推动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容易遭受的发展陷阱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甚至还会出现部分国家从高收入阶段退回到中等收入阶段的现象，这凸显了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需要面临各种复杂性挑战和核心体制机制性障碍因素。从表面上看，支撑一国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上升为初等高收入阶段，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是一国能否在国内培育和发

展起以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在全球获取技术密集型产品优势和出口空间。从深层次看，培育和发展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既与一国是否具备以原始创新主导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能力密切相关，也与一国是否具备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贯通式创新链和全链条式产业链技术创新能力密切相关，更与一国是否具备与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相匹配及相适宜的现代金融体系、人力资本培养和激励体制、营商环境等核心制度条件密切相关，还与一国能否获得高技术产品在全球的出口机会的国际关系能力密切相关。因此，“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核心原因在于，一国并不具备发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和产业链技术创新自主能力的要素禀赋条件、政府实施能力以及制度环境条件。

四是“从初等高收入阶段到中等高收入阶段”和“自主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对于那些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而言，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持续提升人均 GDP。相反，一国一旦进入高收入国家序列，就会面临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激烈的科技创新自主能力领域的竞争。只有那些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掌握自主能力和全球控制能力的国家，方可具备从初等高收入阶段再次跨越中等高收入阶段的发展能力。事实上，由初等高收入阶段向中等高收入阶段跨越的过程中，支撑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对于很多小规模经济体而言，由于存在自身高端市场需求规模难以支撑本国高技术产品供给规模的问题，必须利用其他国家的高端市场需求空间来获得经济增长机会，也即必须依赖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方可实现从初等高收入阶段向中等高收入阶段的跨越。然而，要在全球获得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竞争优势，一国就必然要采取自主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并依靠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自主能力所催发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全球竞争优势和垄断能力。

五是“从中等高收入阶段到高等高收入阶段”和“自主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在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真正可以从中等高收入阶段持续发展到高等高收入阶段的国家相对较少，大国只有美国、德国、荷兰、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最为关键的是，在这些国家已经占据全球高端市场和控制全球价值链体系高端环节的前提下，新兴国家要从中等高收入阶段再发展到高等高收入阶段，除了依靠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所具备的强大自主能力之外，还必须具备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优势，形成依靠自身庞大内需市场规模和消费结构升级蕴含的高端需求来获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否则，新兴国家就会形成依附型经济发展模式，堕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发展成为高等高收入阶段国家。

（二）如何认识一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发展陷阱

1. 日本。日本面临的困境是制造业依赖性发展，它突出表现为国内人均 GDP 在实现高等高收入阶段后，即在人均 GDP 达到 4 万美元之后，人均 GDP 长期处于相对停滞不前的发展状态。日本困境的根本性原因，不在于美国针对日本实施的“广场协议”及由此诱发的泡沫经济破灭，也不在于其他新兴国家的制造业竞争，而在于日本高端制造业体系对外的依赖性和依附性本质特征。日本已经在全球高端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部分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艺等环节和领域中，掌握了“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自主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日本牢牢抓住和充分利用全球家电、集成电路和燃油汽车等重点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的战略机会，通过创新和产业的双重依附体系，实现了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然而，在此进程中，日本通过对美国的原创型科技创新体系的完全依附和消化吸收再创新行为，形成了对美国原始创新的依附体系，且日本的高端制造业通过直接投资美国市场形成了最为重要的产业依附体系，成为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被支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蕴含着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作用是，日本对美国主导的全球高端制造业体系的创新和市场领域的双重依附性。被控制性和被攫取性必然会造成日本的经济体制和高端产业体系受美国全球垄断势力所控制，

日本人均 GDP 的发展极限也就被限定在 4 万美元左右的发展水平。

2. 韩国。韩国的经济发展被誉为一个奇迹，全球只有 7 个“人口超过 5000 万且人均 GDP 超过 3 万美元”的国家，韩国是继日本之后第二个实现该发展目标、进入“5030 俱乐部”的国家。与日本相同的是，韩国也是依靠全球的集成电路产业、传统燃油产业和家用电器产业分工和贸易体系，获得了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式发展机会。与日本不同的是，韩国不仅在原始创新和产品市场上对美国形成了双重依附体系，而且也在技术创新和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关键元器件等领域对日本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依附。同时，韩国人均 GDP 能够从 2 万美元增长到 3.5 万美元，还严重依赖于中国大陆市场对韩国高端制造业产品的单向开放策略。因此，韩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发展，实质上是对美国、中国、日本的三重依附体系。其中，对美国的创新和市场依附最为重要，对中国的市场依附次之，对日本的技术创新依附相对较弱。不容忽略的是，这种三重依附体系使得韩国的人均 GDP 增长具有相当的脆弱性、高风险性和不可持续性，韩国很有可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3. 越南。越南面临的困境是制造业升级空间阻碍。越南是利用自身低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切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组装环节，充分利用了发达国家在中国布局的、中国本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外转移的机会，集聚了全球部分出口导向型低端制造业，从而顺利实现了人均 GDP 从 2000 年 390.1 美元向 2021 年 3694 美元的持续式发展进程。2021 年，越南累计出口额高达 3362.5 亿美元，已经成为全球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国家之一。在越南看似一片形势大好的经济发展成果刺激下，部分学者认为越南推进的完全对外市场开放、民主政治体制和土地私人所有权制度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有助于其最终实现从低收入阶段跨越到中等收入阶段，再继续跨越到高收入阶段国家的发展目标。然而，这种简单认为发展中国家奉行西式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逻辑市场机制就可以顺利成为发达国家的狭隘逻辑，完全忽略了小型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对其他国家的创新、产品市场和中间产品等领域的多重依附性及其背后隐含的高度不确定性。事实上，越南对外的多重依附性具体表现在，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的严重依赖，也对中国的各种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原材料乃至出口市场形成了深度依赖。难以避免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越南并不具备发展全球相对领先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体系和制度框架。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严防死守自身科技创新知识对其他国家转移和外溢的情形下，越南已经基本丧失了如日韩一样利用与美国同盟关系实现科技创新转移和模仿再创新的战略机会，很大可能会堕入“中等收入陷阱”。完全依附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组装环节，越南只会得到从低收入阶段跨越到中等偏下乃至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空间，而无法获得再持续升级到高收入阶段的战略机会。而且，一旦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堕入“中等收入陷阱”，模仿西方民主选举制度和奉行完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弊端就会集中爆发，这很有可能会使其接着陷入到政治和经济双重混乱的困局。

4. 印度。印度面临的困境是制造业空心化。印度是完全照搬英国殖民地的西方“一人一票”式民主选举制度和完全私人产权所有制的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相对中国，印度的劳动力数量优势更加明显，理论上，这应该有助于印度利用低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体系，从而获得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跨越的重要发展战略机会。但照搬式体制不仅没有给印度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体系带来额外制度优势，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重要阻碍因素。一方面，过早的土地完全私有化制度，使得印度在支撑制造业体系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征地建设上，面临极大的不可逾越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作为以竞争有限资源获得生存机会主导的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印度过早地实现“一人一票”式民主选举制度，带来的不是对多数人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的有效保障，而是民粹主义和过高福利主义盛行。这造成私人资本乃至国外资本控制国家权力和经济发展权力，使得印度陷入制造业发展动力不足甚至制造业空心化的困局。一旦经济发展到人均 GDP 低水平停滞阶段，印度的民主政治混乱和社

会不稳定问题就会逐步爆发出来，从而迫使国家陷入低收入陷阱。

5. 中国台湾。中国台湾面临的困境是制造业的完全依附性。由于在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电子产品产业和机电产业体系的特定生产制造环节获得了相对的技术创新优势和全球竞争优势，中国台湾实现了人均 GDP 从 1990 年的 8205 美元发展到 2000 年的 14908 美元再到 2021 年的 33011 美元，顺利从中等收入阶段上升为高收入阶段。事实上，中国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四重依附体系特征：依赖美国的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和高端人才培养体系；依赖日本的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和营销经验；依赖美国和日本的关键生产设备、零配件和元器件、材料等；依赖中国大陆市场。换言之，中国台湾属于“创新靠美国、技术靠日本、市场靠大陆”的依附型发展模式。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台湾利用大陆对台的单向市场开放，依靠大陆经济和产业的高速发展，才获得了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重大发展机会。然而，如此之深的多重依附性特征，很有可能会使得中国台湾堕入制造业完全依附性发展，从而在人均 GDP 达到 4 万美元时遭遇类似日本和韩国的增长停滞困局。

三、全面把握中国推动制造业持续性升级的重点方向与具体途径

第一，构建“全球领先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全产业链条技术创新能力+具有全球创新垄断势力的中国本土制造业体系”的三位一体式融合体系。当今全球主要国家在制造业领域的核心竞争手段和竞争途径，深刻体现出“创新决定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内在逻辑。然而，创新对一国制造业体系的决定性作用，并非仅仅体现在制造业部门单个龙头企业层面或者某个产业链层面的技术创新能力，而且还深刻体现在三位一体式的整体创新优势。首先，以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为主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蕴含的自主能力，表面上与一国的制造业体系技术创新能力并无直接关系，但深层次上却是其基础性条件。没有强大的独立自主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就必然没有一国全球持续领先的制造业体系技术创新能力。其次，一国在制造业部门的技术竞争优势，不仅体现在某个龙头跨国企业的全球领先技术创新水平上，而且还体现在重点产业链的全产业链条、全供应链条、全创新链条层面的贯通式和系统性技术创新优势上。这种系统性技术创新能力，正愈发成为一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优势来源。最后，一国企业要在全球的制造业体系中取得竞争优势，必须立足于企业或产业链层面的垄断式技术创新能力。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业领域主要竞争对象的情形下，唯一性的创新垄断优势愈发成为一国制造业企业获得全球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而产品品牌和营销渠道的重要性迅速下降。因此，推动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基础性因素，就在于能否及时布局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优势的“国家+产业链+企业垄断创新能力”的三位一体式融合体系，而不能仅仅局限在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或者某个产业链的特定环节上。

第二，构建“立足于本国高端需求市场+占据全球高端需求市场”的内外需相互支撑型的高端制造业体系。随着经济由粗放型增长模式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中国已经创造出相当规模的中高收入就业岗位，这为本土企业利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和中等收入群体逐步扩大所蕴含的规模化高端需求市场，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础条件。依据“需求引致创新”和“高端需求激发本土企业创新”的内在规律，在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全面跨越的特定场景，中国能够为中等收入群体创造高收入就业岗位的基础，仍然在于制造业部门由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向以创新为主导的高附加值环节的转型升级。因此，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科技创新和高端产业全面实施封锁和遏制策略的背景下，中国推动制造业持续升级的重点方向就必须立足于国内居民收入持续提升带来的中等收入群体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换代，这其中蕴含着本土高端需求市场规模的逐步扩张。进一步来看，中国经济一旦形成了“高端需求市场规模扩张→本土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发展模式，后续就必然会走上“本土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最大限度地创造和释放出高收入就业岗位→中国的本土高端需求市场规模持续扩张”的良性循环路径，最终发展为内需驱动型增长模式。而且，中国只有自身形成了庞大的本土高

端需求市场规模优势，方可利用其作为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全球分工、贸易的核心交换筹码，切入到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占据全球部分高端需求市场。在开放背景下，中国推动制造业持续升级的重点方向之一，就是要构建“内需是根基、外需是延伸”“高端内需决定外需扩张空间”的内外需相互支撑型发展模式。

第三，构建“战略科学家+产业领军人才和团队+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人才和团队+卓越工程师+紧缺急需专业技能人才”的贯通式多层次人才培养和激励支撑体系。创新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的“第一动力”，人才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的“第一资源”。打造处于全球前沿的战略科学家团队，需要瞄准解决中国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重大产业变革中谋取引导地位和绝对控制力量问题。打造全球领导能力的产业领军人才和团队以及全球前沿能力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人才和团队，需要瞄准解决中国在全球当前和未来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中获取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业设计和运行软件等的全球优势主导地位和对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影响力量问题。打造全球一流水平的卓越工程师和重点产业的紧缺急需专业技能人才队伍，需要瞄准解决中国在全球当前和未来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中获取关键工艺及高水平、一致性生产制造能力的全球绝对领先能力和垄断势力问题。一旦中国按照全创新链和全产业链的融合发展逻辑，有效搭建了这种贯通式、多层次的现代人才体系，它就必将成为促进中国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最后向创新密集型序贯式升级的核心基础，进而成为推动中国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重要力量之一。

第四，构建“直接融资体系支撑实体经济部门自主创新+间接融资体系支撑实体经济市场运行经营活动”的新型现代金融支撑体系。构建与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发展需求相匹配的现代金融体系，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方向之一。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金融体系本质上是为了对接和满足经济发展，特别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发展所蕴含和产生的各种服务需求。换言之，现代金融体系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中国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最终向创新密集型序贯式升级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要条件。要构建有效的现代金融体系，最为基础的问题就是如何科学界定和协调直接融资型金融市场和间接融资型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合理边界和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将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定义为二分法发展逻辑。^①一方面，积极发展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企业和创新型中小微企业获得外部直接融资渠道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发展与这些企业在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等领域研发活动相匹配的天使基金、风险基金和各类投资基金，打造围绕实体经济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和提升需求的多层次、序贯式直接融资型体系；另一方面，在中国金融结构仍然呈现以大型银行机构的间接型融资体系占据主导地位的特定情形下，银行机构应该瞄准解决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维持正常市场经营运行活动所产生的各种融资贷款需求问题。

第五，构建“国有企业主导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和关键资源+股份制企业主导集成创新和终端市场产品市场生产销售+中小微企业主导原始创新与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的产业链分工协同的新型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体系。从表面上看，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全球领先优势依靠的是拥有全球技术创新领先优势的大型跨国企业。但实际上，这些大型跨国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竞争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很大程度上是依托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中提供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的大量配套型、创新型中小微企业上，它们通过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分工和集聚效应，获得了集群式的创新优势和规模优势。也即是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培育和推动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的独特发展经验就在于“具有全球技术创新领先优势的产业链龙头企业+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的中小微产业链配套企业”的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有鉴于此，中国需要推

^① 张杰：《构建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发展路径与突破方向》，《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体系，其核心就在于按照重点产业的全产业链和全创新链的融合发展逻辑和内在运行规律，依据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战略定位和自身优势，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其中，国有企业应该瞄准产业链的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突破环节和关键资源掌握环节，^① 遵循市场化竞争逻辑的股份制企业应该主导技术创新、集成创新和终端产品市场生产制造销售环节，中小微企业应该瞄准具有原始创新的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等领域的生产制造能力。

四、推进制造业升级对中国式现代化核心支撑作用的重大改革突破口

首先，高度认识制造业在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始终将打造“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位一体式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作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的核心任务。2000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24.6%，中国只占5.9%，但到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经占全球的近30%，特别是2012—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从16.98万亿元增加到了31.4万亿元。在此期间，中国的制造业出口部门发生了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密集型产品、技术密集型产品升级的重大现象。具体表现在，中国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分别由2012年的7.4和3.8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2.8和6.3万亿元。未来，中国要在2050年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即按当前不变价达到4万美元左右），根基就在于稳住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水平的前提下，促进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全面转变。

我们迫切需要准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系统性”方法，将之运用到主动打造“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这四位一体式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中。具体的改革突破方向必须深刻体现和落实在：一是强化“科技创新”和“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深度融合体系。针对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在承担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自主创新突破能力不足的困局，中国首要的改革突破口是促进和强化制造业企业成为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和关键共性技术创新领域的主体。要将培育制造业领域的具有全球技术创新垄断势力的本土跨国企业，而非金融企业或其他行政垄断企业，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构建中国特色的产学研政贯通式体系，以企业和产业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而非仅仅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作为核心牵头者。二是强化“现代金融”和“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深度融合体系。当前，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型体系以及过度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各类直接融资型金融机构，事实上难以匹配和适应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培育活动所产生的多重融资需求。为此，应尽快启动和实施针对银行机构逐步放开直接融资的法律限制，推动银行机构为企业或产业的全生命周期所蕴含的不同形式外部融资需求提供全周期链条式金融服务，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共同成长和共享利益的“互利共赢”新型机制，限制金融企业利用自身的行政垄断地位压榨和攫取实体经济正常利润的旧有机制。要将正在积极发展的各种形式股票市场，设定为制造业部门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自主突破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提供培育、成长和发展的核心平台，合理限制其为虚拟部门企业服务的空间。三是强化“人力资源”和“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深度融合体系。无论是战略科学家层面，还是产业领军人才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层面，抑或是卓越工程师和专业化技能人才层面，中国均存在人才供给不足和人才激励机制过于僵化的顽疾。现行的院士及其他人才称号的评审考核制度也并不是以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或颠覆性技术创新领域的自主突破为选拔原则，存在“圈内人评圈内人”“非原创人才把控原创人才评审机制”的现象，严重削弱和阻碍中国利用人才优势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我们首要进行深化改革的就是这种人才考核体制。同时，要将培育具有全球领先水平的各层次人才，作为

^① 张杰：《强化国有企业对中国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体系支撑力的途径与对策》，《河北学刊》2022年第6期。

北京、上海等重点地区率先打造“全球人才高地”的重要任务之一。利用北京、上海等在集成电路产业领域的全球高水平科学研究和产业发展机会，提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薪酬水平和良好科研条件，制定以家庭为单位加入中国国籍的绿色通道制度，充分吸引和集聚全球战略科学家、关键技术攻关人才和产业领军人才，集聚全球高端产业领域的各层次人才。

其次，立足在制造业部门优先落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目标，构建“有为政府+有效政府”双重驱动的中国特色产业链政策体系。当前，在扶持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从中央主管机构部门到各地方政府都存在两大核心弊端。一是，中国高端产业发展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封锁和遏制策略，其已经贯穿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化产业化研究的全创新链条的各核心环节，涉及从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艺和工业设计、运行软件系统的全产业链条的各核心环节。而中国当前的顶层设计管理思维还存在各部门各机构各自为政的部门利益分割的现象，不适应基于全创新链全产业链的融合性、系统性新型产业政策发展需求。我们需要依据习近平总书记的系统论方法论来重新构建中国的新型产业链政策体系。二是，中国各级政府纷纷将招商引资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地方培育和发展高端产业的代表，不计代价地利用各种优惠政策进行招商引资竞赛。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分散化、割裂化发展态势，产业链创新链的集聚效应、分工和规模经济效益受到严重抑制。更为严重的是，各地政府的同质化招商引资竞争使得原本有限的创新扶持资金也发生了分散和碎片化，迫使正在实施的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举国体制的激励作用大打折扣。

因此，必须构建和布局全产业链条、全供应链条和全创新链条导向的新型产业链政策，以有效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针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的全面封锁和遏制策略。一是，依据高端产业体系的内在运行和发展规律，高度重视对各级政府旧有的片段化、割裂式、个体利益主导型产业政策进行根本性革新。按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全创新链和全产业链的融合性和系统性本质特征，在工信部和科技部内部设立部长或副部长牵头的针对半导体全产业链和全创新链发展任务的具有管理和协调机制的领导小组，解决中央层面对高端产业的产业政策片段化、割裂式问题。在国家层面设立国务院总理或副总理牵头的针对重点产业全产业链和全创新链发展任务的具有顶层设计和系统化职能领导小组，解决工信部和科技部将科学研究和产业发展对立割裂的部门利益发展思维困局，解决各地方政府在扶持半导体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财政资金分散化、碎片化、同质化的重大弊端和财政资金重复浪费困局。二是，要尽快实施我国基础研究财政资金投入的“对抗计划”和“强基计划”，尽快将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额由2021年的1696亿元尽快提高到1万亿元甚至2万亿元层级。要突破固有思维，将应对经济下行的中国特色政府财政宽松计划重点瞄准基础研究领域，这不会带来通货膨胀问题，反而可带来经济长期潜在增速的稳定和提升。三是全面改变和扭转各级政府仅仅对产业链单个核心企业进行资助的扶持政策，在梳理全创新链条、全产业链条、全供应链条企业的基础上，通过主动实施从全创新链条到全产业链条的资助和发展促进政策，实现系统性、一体化式的自主突破新格局。四是鼓励将全面布局和构建当前及未来技术水平的全创新链条、全产业链条、全供应链条体系，上升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优势、中国基础的高精尖产业体系的基础性攻关工作。尤其是，要强调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全产业链条、全供应链条在全国各区域合理布局的极端重要性。

责任编辑：张超

全球价值链嵌入、汇率变动与出口产品价格

——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盛 斌 吕云龙

[摘 要]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汇率变动对出口产品价格的影响,并运用中国企业—产品层面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数据进行实证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会提高出口价格的汇率弹性,且随着汇率波动幅度扩大,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价格的汇率弹性正向影响将增强。在控制了影响汇率传递的其他因素和变量测算误差等后,实证结论依然稳健。这意味着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深,贸易对汇率的敏感性就越弱。从影响机制看,全球价值链嵌入主要通过提高企业成本加成对汇率的弹性来增强出口产品价格对汇率变动的弹性。此外,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异质产品和消费品出口价格的汇率弹性提升效应更大。

[关键词] 汇率 产品价格 全球价值链嵌入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2) 12-0107-08

一、引言

贸易自由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全球价值链 (Global Value Chains, 简称 GVC) 分工模式的兴起,各个国家开始专注于价值链上的某个生产环节而不再是整个产品。以产品内分工或工序分工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成为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全球超过 2/3 的贸易通过全球价值链实现。^① 中国以劳动力要素禀赋的优势积极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根据 WTO (2015) 发布的世界贸易报告,2011 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接近 50%,成为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②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新型分工模式兴起是否影响到汇率对贸易的调节作用?事实上,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兴起正在不断挑战传统国际贸易相关理论与实证,如贸易统计、^③ 贸易政策、^④ 竞争优

^{*} 本文系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全球经济治理、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与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研究”(20JJD790003)、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主选题项目“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国际经济规则的重构及中国的角色”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盛斌,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天津,300071);吕云龙(通讯作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36)。

① WTO, IDE-JETRO, OECD et al.,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② WTO, *World Trade Report 2014*, WTO Publishing, 2015.

③ Johnson R. C., Noguera G., “Accounting for Intermediates: Production Sharing and Trade in Value Add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86, no.2, 2012, pp.224-236; Koopman R., Wang Z., Wei S. J., “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4, no.2, 2014, pp.459-494.

④ Blanchard E. J., Bown C. P., Johnson R. C.,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Trade Policy”, NBER Working Paper No.21883, 2016.

势 (Koopman et al., 2014)、有效汇率^①和环境责任^②等。随着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以及汇率制度改革逐步推进,研究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汇率变动如何影响对外贸易这一问题对于中国对外开放和汇率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汇率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通过汇率传递实现,汇率传递会影响一国国际收支调整和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一直是国际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关于汇率传递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如通货膨胀、对外开放)^③和微观层面(如价格粘性、依市定价以及配送成本)^④展开。其中,依市定价理论(Pricing To Market, PTM)是微观层面分析汇率传递的最经典理论,近年来关于汇率传递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该理论展开。该理论最早由 Krugman (1986)提出,它认为垄断厂商为了维护出口市场份额,在面临汇率冲击时会调整成本加成以吸收部分汇率变动的影响,这导致了汇率对出口产品价格的不完全传递。随着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兴起,学者接着从异质性企业视角分析影响依市定价行为的因素,包括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等。^⑤

现有文献对汇率传递和全球价值链分工都进行了深入分析,但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探讨汇率传递的文献依然较少。少数文献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形成如何改变汇率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例如, Ahmed et al. (2015) 基于 1996—2012 年 46 个国家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出口额对实际汇率的弹性在下降,而全球价值链分工解释了弹性下降的 40%。^⑥ Uddin (2016)、Soyres et al. (2021) 使用 1995—2011 年 WIOD 数据库研究发现,忽略增加值贸易会使汇率传递估算产生偏差,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较高的行业汇率传递率更低。^⑦ 项后军和吴全奇 (2015) 从垂直专业化视角考察人民币汇率冲击下定价问题,发现垂直专业化程度加深会提高价格的汇率弹性系数。^⑧ 随着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不断推进,汇率将会变得更加灵活、有弹性,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讨论汇率传递对于中国进一步推进汇率制度改革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是否会影响汇率对出口价格的传递,可能的贡献主要有:首先,本文在 Amiti et al. (2014) 理论上将全球价值链嵌入引入企业决策过程,构建了一个可用于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汇率传递影响的理论模型。其次,本文在 Upward et al. (2013) 等基础上,^⑨ 综合考虑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使用进口中间投入的差异、一般贸易进口品被区分为消费品和中间投入品抑或资本品

① Bems R., Johnson R. C., “Demand for Value Added and Value-Added Exchange Rat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vol.9, no.4, 2017, pp.45-90.

② López L. A., Cadarso M. Á., Zafrilla J., et al.,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the US Multinationals’ Foreign Affiliates”, *Nature Communications*, vol.10, no.1, 2019, pp.1-11.

③ Taylor J. B., “Low Inflation, Pass-Through, and the Pricing Power of Firm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44, no.7, 2000, pp.1389-1408; Gust C., Leduc S., Vigfusson L. R., “Trade Integration, Competition, and the Decline in Exchange-Rate Pass-Throug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57, no.3, 2010, pp.309-324.

④ Engel C. M.,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ss-Through and Sticky Nominal Prices”, HKIMR Working Paper No.11, 2004; Krugman P. R.,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IT Press, 1986; Berman N., Martin P., Mayer T., “How Do Different Exporters React to Exchange Rate Chang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27, no.1, 2012, pp.437-492.

⑤ Li H., Ma H., Xu Y., “How Do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Affect Chinese Exports?—A Firm-Leve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97, no.1, 2015, pp.148-161; Chen N., Juvenal L., “Quality, Trade, and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100, 2016, pp.61-80.

⑥ Ahmed S., Appendino M., Ruta M., “Depreciations Without Exports?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he Exchange Rate Elasticity of Export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7390, 2015.

⑦ Uddin S., “Value-Added Trade,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and Trade Elasticity: Revisiting the Trade Competitiveness”, SSRN Working Paper No.2852894, 2016; Soyres F. D., Frohm E., Gunnella V., et al., “Bought, Sold and Bought Again: The Impact of Complex Value Chains on Export Elasticities”, 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s 1309, 2021.

⑧ 项后军、吴全奇:《垂直专业化、计价货币与出口依市定价 (PTM) 行为研究》,《管理世界》2015 年第 4 期。

⑨ Upward R., Wang Z., Zheng J., “Weighing China’s Export Basket: The Domestic Content and Technology Intensity of Chinese Export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41, no.2, 2013, pp.527-543.

的可能性、通过贸易代理商间接进口等问题，并采用整合后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准确地测算了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最后，本文首次实证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汇率传递的影响，并对可能的影响渠道进行检验，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不同产品汇率传递的异质性影响。

二、理论模型

本文在 Amiti et al. (2014) 基础上，将全球价值链嵌入行为引入厂商生产决策中，同时考虑分销成本等因素，从而刻画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厂商出口产品价格的汇率弹性的影响。

在需求方面，假设出口目的地国家消费者具有不变替代弹性的效用函数：

$$U = \int_{i \in \Psi} q(i)^{\frac{\sigma-1}{\sigma}} di^{\frac{\sigma}{\sigma-1}} \quad (1)$$

其中， σ 表示厂商生产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Ψ 表示消费品集合， i 表示异质性厂商。每个厂商生产一种差异化产品，国家 k 对厂商 i 产品的需求函数为：

$$q_i(k) = Y_k P_k^{\sigma-1} p_i(k)^{-\sigma} \quad (2)$$

其中， Y_k 和 P_k 分别表示国家 k 的收入和产品价格指数， $q_i(k)$ 表示国家 k 对厂商 i 产品的需求量， $p_i(k)$ 是以出口目的国家货币表示的产品价格。

厂商出口面临三种成本：冰山贸易成本 $\tau_k > 1$ ，出口固定成本 F_k ，出口目的地分销成本（零售、储存、营销广告等以目的地货币支付的成本）。假设每单位产品的分销需要 η_k 单位劳动力， w_k 表示目的地的工资水平，因此单位产品分销成本为 $\eta_k w_k$ 。

以目的地 k 国货币表示的产品价格为：

$$p_i(k) = \frac{p_i^d(k) \tau_k}{\varepsilon_k} + \eta_k w_k \quad (3)$$

其中， $p_i^d(k)$ 是以本币表示的出口价格， ε_k 表示本国与 k 国的名义汇率（直接标价法）， ε_k 上升表示本币贬值。厂商 i 面临的需求函数为：

$$q_i(k) = Y_k P_k^{\sigma-1} \left(\frac{p_i^d(k) \tau_k}{\varepsilon_k} + \eta_k w_k \right)^{-\sigma} \quad (4)$$

假设厂商进行伯川德竞争（Bertrand Competition），边际成本为 MC_i ，则厂商利润最大化可以得到本币表示的出口价格为：

$$p_i^d(k) = \frac{\sigma}{\sigma-1} \left(1 + \frac{\eta_k \varepsilon_k w_k}{MC_i \tau_k \sigma} \right) MC_i = \mu_i MC_i \quad (5)$$

其中， μ_i 表示厂商 i 的成本加成，可以发现本币升值会降低厂商成本加成。将（5）式代入（4）式可以得到厂商需求函数：

$$q_i(k) = \left(\frac{\sigma}{\sigma-1} \right)^{-\sigma} Y_k P_k^{\sigma-1} \left(\frac{MC_i \tau_k}{\varepsilon_k} + \eta_k w_k \right)^{-\sigma} \quad (6)$$

在供给方面，假设厂商生产满足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q_i = \Omega_i X_i^\phi L_i^{1-\phi} \quad (7)$$

其中， Ω_i 表示厂商生产率， X_i 和 L_i 分别表示中间品和劳动力投入， ϕ 表示中间品投入份额， $1-\phi$ 表示劳动力投入份额。中间品生产函数为：

$$X_i = \exp \left(\int_0^1 \gamma_j \ln X_{ij} dj \right) \quad (8)$$

γ_j 表示生产过程每种中间品投入份额，每种中间品分别来自于国内和国外：

$$X_{i,j} = [D_{i,j}^{\frac{\zeta}{1+\zeta}} + a_j F_{i,j}^{\frac{\zeta}{1+\zeta}}]^{\frac{1+\zeta}{\zeta}} \quad (9)$$

其中, $D_{i,j}$ 和 $F_{i,j}$ 分别表示生产中使用的国内和进口中间投入品, 它们之间的替代弹性为 $1+\zeta$, a_j 表示进口中间投入的质量优势。厂商进口中间品需要支付固定成本 f_i (以劳动力的形式), 本国工资水平为 W , 国内中间投入品价格为 V_j , 进口中间品价格为 $\varepsilon_{im} U_j$, U_j 为以外币表示的中间品价格, ε_{im} 表示进口国与本国的名义汇率, ε_{im} 上升表示本币贬值。因此, 厂商总生产成本可以表示为:

$$TC_i = WL_i + \int_0^1 V_j D_{ij} dj + \int_j (\varepsilon_{im} U_j F_{ij} + W f_i) dj \quad (10)$$

该式第一部分表示劳动力成本, 第二部分表示国内中间投入品成本, 第三部分表示进口中间品成本。根据成本最小化可以求得厂商边际成本为:

$$MC_i = \frac{C}{B_i^\phi \Omega} \quad (11)$$

其中, C 表示厂商不进口中间投入时的成本, 可以表示为 $C = (V/\phi)^\phi (W/(1-\phi))^{1-\phi}$ 。 $V = \exp\left\{\int_0^1 \gamma_j \ln(V_j/\gamma_j) dj\right\}$, 表示国内中间投入品的综合价格指数。进口中间投入会带来成本下降, 成本减少因子 B_i 可以表示为:

$$B_i = \exp\left\{\int_j \gamma_j \ln b_j dj\right\}, \quad b_j = \left[1 + a_j (\varepsilon_{im} U_j / V_j)^{-\zeta}\right]^{\frac{1}{\zeta}} \quad (12)$$

将中间品按其对生产成本减小的作用从大到小排序, 最优中间品进口组合为 $J=[0, j]$, j 表示中间品进口分界, 中间品 j 进口带来的成本下降效应刚好等于进口所需的固定成本, 即 $\gamma_j \ln b_j MC_i = f_i W$ 。当中间品类型大于 j 时, 中间品进口导致的成本下降小于中间品进口所需固定成本, 因而厂商不会选择进口。

因此, 厂商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进口成分可以表示为:

$$\gamma_i = \phi \int_0^j \gamma_j (1 - b_j^{-\zeta}) dj \quad (13)$$

其中, ϕ 表示中间投入占的份额, γ_i 表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结合 (12) 和 (13), 可以将 B_i 表示为 γ_i 的函数 $B(\gamma_i)$, 即 $B(\gamma_i)$ 表示厂商嵌入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分工收益, 并且有 $\partial B(\gamma_i) / \partial \gamma_i > 0$ 。

结合 (5) 和 (11) 可以求得本币表示的厂商 i 出口价格为:

$$p_i^d(k) = \frac{\sigma}{\sigma-1} \left(1 + \frac{\eta_k \varepsilon_k w_k B(\gamma_i)^\phi \Omega}{C \tau_k \sigma}\right) \frac{C}{B(\gamma_i)^\phi \Omega} \quad (14)$$

厂商 i 出口数量为:

$$q_i(k) = \left(\frac{\sigma}{\sigma-1}\right)^{-\sigma} Y_k P_k^{\sigma-1} \left(\frac{C \tau_k}{B(\gamma_i)^\phi \Omega \varepsilon_k} + \eta_k w_k\right)^{-\sigma} \quad (15)$$

厂商 i 对国家 k 的出口额为:

$$r_i(k) = \left(\frac{\sigma}{\sigma-1}\right)^{1-\sigma} Y_k P_k^{\sigma-1} \left(\frac{C \tau_k}{B(\gamma_i)^\phi \Omega \varepsilon_k} + \eta_k w_k\right)^{-\sigma} \left(\frac{C}{B(\gamma_i)^\phi \Omega} + \frac{\eta_k \varepsilon_k w_k}{\tau_k \sigma}\right) \quad (16)$$

厂商出口价格对汇率的弹性为:

$$e_{p_i^d} = \frac{\partial p_i^d(k)}{\partial \varepsilon_k} \frac{\varepsilon_k}{p_i^d(k)} = \frac{\eta_k w_k B(\gamma_i)^\phi \Omega \varepsilon_k}{\eta_k w_k B(\gamma_i)^\phi \Omega \varepsilon_k + C \tau_k \sigma} \quad (17)$$

进一步可知, $\frac{\partial e_{p_i^d}}{\partial \gamma_i} = \frac{\partial e_{p_i^d}}{\partial B(\gamma_i)} \frac{\partial B(\gamma_i)}{\partial \gamma_i} > 0$, 因此得到假说 1。

假说 1: 厂商出口价格对汇率的弹性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增长而提高。

将价格取对数差分, 可以得到:

$$d \ln p_i^d(k) = d \ln \mu_i + d \ln MC_i \quad (18)$$

其中, $\mu_i = \frac{\sigma}{\sigma-1} (1 + \frac{\eta_k \varepsilon_k w_k B(\gamma_i)^\phi \Omega_i}{C \tau_k \sigma})$ 表示成本加成率, 成本加成率对汇率的弹性为:

$$e_{\mu_i} = \frac{\partial \mu_i}{\partial \varepsilon_k} \frac{\varepsilon_k}{\mu_i} = \frac{\eta_k w_k B(\gamma_i)^\phi \Omega_i \varepsilon_k}{\eta_k w_k B(\gamma_i)^\phi \Omega_i \varepsilon_k + C \tau_k \sigma} \quad (19)$$

进一步可以得到 $\frac{\partial e_{\mu_i}}{\partial \gamma_i} > 0$ 。而 $\frac{\partial e_{MC_i}}{\partial \gamma_i} = 0$, 全球价值链嵌入不会影响边际成本对汇率变动的弹性。

因此得到假说 2。

假说 2: 全球价值链嵌入增长通过成本加成率渠道提高出口产品价格对汇率变动的弹性。

三、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 计量模型设定

根据理论框架的分析同时参考 Berman et al. (2012) 和 Amiti et al. (2014) 等, 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Delta \ln p_{ijkt} = \beta_0 + \beta_1 \Delta \ln ER_{jt} + \beta_2 \Delta \ln ER_{jt} \cdot gvc_{it} + \beta_3 gvc_{it} + \mu_{ijk} + \eta_t + \varepsilon_{ijkt} \quad (20)$$

其中, i 代表企业, j 代表出口目的地国家, k 代表按照 HS6 位码分类的商品, t 代表年份, Δ 表示差分; $\ln p_{ijkt}$ 表示 i 企业 k 商品 t 年出口到 j 国的价格, 以人民币表示; $\ln ER_{jt}$ 表示 j 国对中国的名义汇率 (采用直接标价法, 数值上升代表人民币对该国的货币贬值); gvc_{it} 表示 i 企业 t 年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 μ_{ijk} 表示国家—企业—产品固定效应, 用于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国家—企业—产品特征 (如消费者偏好等); η_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用于控制企业面临的共同冲击; ε_{ijkt} 表示误差项。本文重点关注的系数是 β_2 , 该系数反映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价格汇率弹性的影响。

(二) 主要变量说明

1. 产品出口价格 ($\ln p$)。由于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并没有提供每种产品价格, 因此本文使用产品出口金额除以出口数量得到产品的出口价格, 以人民币表示。

2. 汇率 ($\ln ER$)。汇率数据使用直接标价法, 以单位外币能兑换的本币表示, 数值上升代表本币贬值。汇率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国际金融统计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简称 IFS)。IFS 提供的汇率数据是各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 为了得到各国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 需要将汇率数据进行转换。

3. 全球价值链嵌入度 (gvc)。本文结合中国实际贸易状况, 在 Upward et al. (2013) 等文献基础上, 考虑中间品进口、贸易代理商、间接进口等问题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进行测算, 测算公式为:

$$gvc = \frac{M^p + X^o [M^o / (Y - X^p)]}{X} \quad (21)$$

其中, gvc 表示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 上标 p 和 o 分别表示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 Y 、 M 和 X 分别表示企业的总产值、进口和出口。

(三)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样本来源于 2000—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①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统计范围为全部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 统计信息主要包括企业

^① 考虑到 2014 年以后海关数据质量不高, 因此本文数据只使用到 2013 年。

的基本情况和财务数据。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统计范围为全部贸易企业，统计信息为贸易企业每一种产品的交易信息。在对两个数据库进行合并时，本文在 Upward 等（2013）基础上，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中国海关数据进行匹配。同时，考虑到数据库中可能存在指标异常问题，对异常样本进行清理。此外，本文数据区间为 2000—2013 年，在此期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经历多次调整，为了便于研究，本文将行业代码进行了统一。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实证结果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价格汇率弹性的实证结果列于表 1。第（1）列只加入了汇率，并且控制国家—产品—企业固定效应（其中产品为 HS6 位层面），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每贬值 1%，出口产品价格仅上涨 0.054%，即汇率对出口产品价格的传递率高达 94.6%（=1－0.054），接近于完全传递。中国的汇率传递率远高于其他国家，如 Amiti et al.（2014）研究发现比利时的汇率传递率约为 80%，Berman et al.（2012）发现法国的汇率传递率为 87%。中国企业出口满足生产者货币定价原则（Producer Currency Pricing，简称 PCP）。第（2）列为汇改后样本的实证结果，汇改后出口价格对汇率变动的弹性上升，汇率对出口产品价格的传递率降至 92.3%，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第（3）列中加入汇率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交互项，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全球价值链嵌入会显著提高出口价格对汇率变动的弹性，也就是说全球价值链嵌入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的依市定价能力，即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每提高 1 个标准差，出口价格的汇率弹性会上升 3.52 个百分点。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Delta \ln p$	$\Delta \ln p$	$\Delta \ln p$	$\Delta \ln p$	$\Delta \ln p$	$\Delta \ln p$
$\Delta \ln ER$	0.05*** (6.3)	0.08*** (7.6)	0.03*** (3.0)	0.03*** (3.1)	0.04*** (4.5)	0.05*** (4.2)
$gvc \times \Delta \ln ER$			0.16*** (4.1)			0.28*** (5.2)
gvc			-0.02*** (-7.0)			-0.02*** (-5.5)
$gvc1 \times \Delta \ln ER$				0.00*** (3.8)		
$gvc1$				-0.01*** (-4.5)		
$gvc2 \times \Delta \ln ER$					0.09*** (3.2)	
$gvc2$					-0.01*** (-3.0)	
cons	-0.03*** (-9.0)	0.03*** (16.2)	-0.02*** (-7.0)	-0.03*** (-7.6)	-0.03*** (-8.3)	0.03*** (17.0)
国家—产品—企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5035590	4156197	4866262	4866262	4866262	4021384
R ²	0.433	0.454	0.443	0.443	0.443	0.465

注：() 中的值为系数的 t 统计量；***、**、*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

考虑到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出口产品价格的汇率弹性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我们设定高价值链嵌入虚拟变量，然后将该虚拟变量与人民币汇率交互项加入计量方程中，第（4）列和第（5）列分别采用不同的虚拟变量构造方式，第（4）列将全球价值链嵌入度高于 75 分位的企业设定为高价值链嵌入企业，第（5）列将全球价值链嵌入度高于 90 分位的企业设定为高价值链嵌入企业。结果发现，对于低价值链嵌入企业，出口产品价格的汇率弹性为 0.03—0.04，而高价值链嵌入企业出口产品价格的汇率弹性为 0.1—0.13，与本文核心结论相符，全球价值链嵌入会提升出口产品价格对汇率的弹性。

当实施固定汇率制度时，由于汇率变化幅度不大，厂商预期相对稳定，定价行为受汇率变化影响较小。当转向浮动汇率时，汇率波动会改变厂商预期，进一步影响厂商定价行为。在 2005 年之前，人民币盯住单一美元货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较小，基本保持不变。2005 年汇率进行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后，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扩

大。第(6)列实证单独考虑了汇改后的样本,交互项系数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每提高1个标准差,出口价格的汇率弹性会上升5.58个百分点,高于全样本平均水平。这意味着随着汇率波动幅度扩大,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价格汇率弹性的正向影响在增强。

(二) 稳健性检验

1. 考虑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不同测度方法。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是本文研究的关键变量,为了防止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本文针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其他几种算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不考虑贸易代理商计算得到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作为因变量;二是运用 Upward et al. (2013) 方法,不考虑进口产品类型计算得到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作为因变量。根据实证结果发现,^① 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越高,出口产品价格的汇率弹性就越大,与基准模型结果基本一致。

2. 加入边际成本。根据理论模型可以发现,企业边际成本会影响到出口产品价格。但目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等微观企业数据库均未提供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因此本文根据 Amiti et al. (2014),考虑了企业边际成本代理变量—进口产品价格,构建方法为:

$$\ln mc_{ft} = \sum_{j \in J_{ft}} \sum_{m \in M_{ft}} \omega_{fjmt} \ln p_{fjmt} \quad (22)$$

其中, $\ln mc_{ft}$ 表示 f 企业在 t 时间的进口产品价格, $\ln p_{fjmt}$ 表示 f 企业在 t 时间从 m 国家进口 j 商品的价格, ω_{fjmt} 表示企业中间品进口占总变动成本比重, J_{ft} 和 M_{ft} 分别表示进口国家和中间品集合。

根据实证结果发现,进口中间投入品价格同样会提高企业出口产品的价格,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汇率交互项系数依然显著为正,本文基准结果稳健。

3. 加入其他控制变量。随着异质性企业理论发展和微观数据逐渐可得性,学者开始从微观视角分析企业异质性对汇率传递的影响。目前主要的研究集中于企业生产率 (Berman et al., 2012; Li et al., 2015) 和产品质量 (Chen and Juvenal, 2016; 王雅琦等, 2015), 在控制这些因素后本文主要结论是否依旧成立需要进一步验证。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企业生产率和产品质量与汇率的交互项,企业生产率用工业生产总产值与就业人数之比表示,产品质量借鉴 Khandelwal et al. (2013) 使用需求残差法测算得到。^② 根据实证结果可以发现,同时控制上述两个影响因素,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汇率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本文核心结论仍然成立。

4. 考虑全球价值链嵌入滞后一期以及实际汇率的影响。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滞后影响,参考 Amiti et al. (2014) 等,我们使用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滞后一期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滞后一期与汇率变动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支持本文核心结论。此外,考虑到厂商定价行为可能参考实际汇率,使用实际汇率 ($\ln RER$) 进行检验,实际汇率由名义汇率剔除价格因素后得到。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滞后一期与实际汇率变动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5. 考虑不同样本。首先,在2005年之前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基本保持不变,所以将样本中与中国保持固定汇率的国家剔除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交互项系数与基准结果相差不大。其次,考虑到企业存在多产品出口的现象,为进一步提高文章结论的稳健性,参考 Berman et al. (2012) 和 Amiti et al. (2014),本文保留企业主要出口产品进行分析:一是保留企业 HS5 位码中出口值最大的产品,二是保留企业 HS3 位码中出口值最大的产品。发现交互项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从系数大小看,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主要出口产品价格的汇率弹性提升效应更大。相对于外围产品,主要产品市场竞争力更强,因此有较高的依市定价能力。

(三) 异质性分析

^① 由于篇幅有限,实证结果不再报告,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下同。

^② Khandelwal A. K., Schott P. K., Wei S. J.,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mbedded Institutional Reform: Evidence From Chinese Exporter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3, no.6, 2013, pp.2169-2195.

1. 基于同质产品和异质产品的分析。同质产品需求弹性高于异质产品,其成本加成要小于异质产品。当汇率变动时,同质产品成本加成的调整空间较小。因此,同质产品依市定价能力弱,汇率传递率高。为了对此进行验证,本文参照 Rauch (1999),^①将出口产品区分为同质产品和异质产品,然后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对于同质产品,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价格汇率弹性的影响不显著,而对于异质产品,全球价值链嵌入会显著提高出口价格的汇率弹性。

2. 基于中间品和消费品的分析。由于消费品价格中配送成本占比较大(约为40%—60%),中间品价格中配送成本较低(占比约为20%),因此,配送成本的异质性会导致不同产品依市定价能力的差异。本文按照 BEC 产品分类,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间品和消费品出口价格汇率弹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全球价值链嵌入每提高1个标准差,中间品出口价格的汇率弹性会上升3.51个百分点,消费品出口价格的汇率弹性会上升3.81个百分点,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消费品出口价格汇率弹性的提升更大。

(四) 影响机制检验

为了检验理论假说2,运用如下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Delta \ln \mu_{it} = \alpha_0 + \alpha_1 \Delta \ln ER_{jt} + \alpha_2 \Delta \ln ER_{jt} \cdot gvc_{it} + \alpha_3 gvc_{it} + \mu_{ijk} + \eta_t + \varepsilon_{ijkt} \quad (23)$$

$$\Delta \ln p_{ijkt} = \beta_0 + \beta_1 \Delta \ln ER_{jt} + \beta_2 \Delta \ln ER_{jt} \cdot gvc_{it} + \beta_3 gvc_{it} + \beta_4 \Delta \ln \mu_{it} + \mu_{ijk} + \eta_t + \varepsilon_{ijkt} \quad (24)$$

其中, μ_{it} 表示企业成本加成率,本文基于 De Loecker and Warzynski (2012)方法,^②使用中国工业企业层面对应的实际产出数据测算企业成本加成率。

根据实证结果,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汇率变动交互项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全球价值链嵌入会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对汇率变动的弹性。在基准方程基础上加入成本加成率,发现其系数显著为正,成本加成率越大,出口产品价格就越高。同时与基准实证结果相比,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汇率变动交互项系数大小和显著性均变小,说明成本加成率是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出口价格汇率弹性的渠道。

中介效应是否存在需要检验 $H_0: \alpha_2 = 0$, $H_0: \beta_4 = 0$ 。如果均拒绝原假设,说明中介效应存在。从实证结果发现,成本加成率作为中介变量是显著的。此外,通过 Sobel 检验发现,成本加成率的中介效应是显著的。

五、结论

本文在 Amiti et al. (2014)基础上将全球价值链嵌入引入企业决策过程,构建了一个可用于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汇率传递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利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产品价格汇率弹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全球价值链嵌入显著提高了出口价格对汇率变动的弹性,即全球价值链嵌入会显著提高企业出口的依市定价能力,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每提高1个标准差,出口价格的汇率弹性会上升3.52个百分点。随着汇率波动幅度扩大,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价格的汇率弹性正向影响在增强。在稳健性分析中,本文在控制了影响汇率变动对价格传递的其他因素和变量测算误差等后,实证结论依然稳健。其次,从影响机制看,成本加成率是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汇率传递的渠道。最后,从产品差异化的角度看,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异质产品出口价格的汇率弹性提升效应比同质产品更大。从配送成本异质性的角度看,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消费品出口价格的汇率弹性提升效应比中间品更大。

责任编辑:张超

^① Rauch J. E., "Networks Versus Market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48, no.1, 1999, pp.7-35.

^② De Loecker J., Warzynski F., "Markups and Firm-Level Export Statu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2, no.6, 2012, pp.2437-2471.

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研究^{*}

陈卫平 余 乐 梁舒培

[摘 要]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两方面对地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将其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微观数据相结合,实证检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民创业,这一结论在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显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信息获取和亲友借贷,进一步激活了农民的创业活动,但却降低了机构借贷,对农民创业产生遮掩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效应大于生存型创业,且更有助于促进低人力资本、低社会资本和位于外围城市的弱势农民群体的创业行为,有利于我国农村的包容性增长。

[关键词]地区数字经济 农民创业 数字鸿沟 包容性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2)12-0115-09

农民是新时代背景下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人数最多、潜力最大、需求最旺的重要群体,推动农民创新创业对于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①近年来,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以互联网、大数据、5G和云计算为载体的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不断融合发展,催生出农产品电商、网红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和新商业模式,带来了新的商机和市场空间,为农民创业活动开展提供了新机遇。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创业所产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当前,关于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创业的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互联网使用行为。学者们利用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会通过拓宽信息渠道、提升社会资本、改善融资渠道等途径对农民创业产生正向影响。^{②③④⑤⑥}二是数字金融发展。学者们利用微观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交媒体时代下农产品网商线上社会资本的获取途径与转化利用机制研究”(7207313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农人微信营销行为及其对消费者购买决策机制的影响研究”(7177313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研究”(21ZDA058)的阶段性成果,还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

作者简介 陈卫平,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余乐(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梁舒培,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① 李晓静、陈哲、夏显力:《数字素养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② 张剑、周小强、肖诗顺:《从背井离乡到创新创业——兼论互联网使用对创业的作用》,《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③ 张文武:《数字经济时代的移动互联网使用与农民创业:传导机制和异质效应》,《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④ 庞子玥、曾鸣:《农户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互联网+电商创业”背景的分析》,《调研世界》2020年第8期。

⑤ 贺建风:《受教育水平、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家庭创业决策》,《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⑥ 赵聆雅:《乡村振兴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南方经济》2019年第8期。

数据^{①②}或者将地区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调查数据相结合进行实证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缓解农民的信贷约束,提高农民的创业概率。^{③④}尽管互联网使用、数字金融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构成部分,但迄今为止,还鲜有文献对地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其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因此,本文借鉴赵涛等(2020)的研究,^⑤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两方面对地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将其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微观数据相结合,运用二元 Probit 模型实证检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

依据动机—机会—能力理论,^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由三种因素共同决定:行动者的机会、能力和动机。一个行动者实施行为的机会越多,实施行为的能力越高,实施行为的动机越强,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数字经济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⑦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带来创业机会、创业能力和创业动机的变化,对农民创业行为产生影响。从创业机会看,数字经济发展会激发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为农民创业带来新的市场机会。在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需求向高级化、个性化、小众化升级,消费场景从线下市场向线上平台延伸,消费者也由以往的市场价值被动接受者演变为主导者。这带来了需求侧各环节的深刻变革,^⑧成为创业活动开展的市场基础。从创业能力看,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获取信息、资金、社会资本等重要创业资源提供了新路径(赵涛等,2020),有助于提升农民创业能力。从创业动机看,数字经济具有较强的社会互动性,有助于加强创业成功形成的示范效应,增强农民的创业动机。崔丽丽等(2014)的研究就显示,^⑨“淘宝村”的村民往往受已经在淘宝网开展经营的同村村民、朋友及社交网络的影响,开始关注和了解淘宝网,又从邻里和社交圈的示范案例中得到激励和相关技能、经验的传授,最终踏上网上创业之路。除此之外,数字经济还可凭借数字技术降低创业成本,包括信息搜寻成本、沟通成本、商品与服务的追踪成本和验证成本等,^⑩这也有利于增强农民的创业动机。综上,本文提出假说 H1。

H1: 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创业具有正向影响。

(二) 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农民创业的内在机制

除了直接效应,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还可能通过中介机制间接影响农民创业。已有研究显示,农民创业非常依赖于信息资源的获取和经营资金的支持(何婧和李庆海,2019;张文武,2021)。首先,有效的信息资源能够帮助农民把握市场动态和政策规定,进而帮助他们了解市场、捕获商机,^⑪更好地进行

① 何婧、李庆海:《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创业行为》,《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1期。

② 宋帅、李梦:《数字金融对农民创业决策的影响》,《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③ 赵丙奇:《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户创业效应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5期。

④ 黄倩、朱鸿志、苏慧媛:《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选择影响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8期。

⑤ 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20年第10期。

⑥ MacInnis D. J., Christine M., Bernard J. J., “Enhancing and Measuring Consumers’ Motivation, Opportunity, and Ability to Process Brand Information from Ads”, *The Journal of Marketing*, vol.55, no.4, 1991, pp.32-53.

⑦ 陈文、吴赢:《数字经济发展、数字鸿沟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南方经济》2021年11期。

⑧ 戚聿东、肖旭:《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变革》,《管理世界》2020年第6期。

⑨ 崔丽丽、王骊静、王井泉:《社会创新因素促进“淘宝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实证分析——以浙江丽水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14年第12期。

⑩ 秦芳、王剑程、胥芹:《数字经济如何促进农户增收?——来自农村电商发展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22年第2期。

⑪ Shane S., Sankaran V., “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25, no.1, 2000, pp.217-226.

企业经营管理、业务开展、销售渠道拓展等，提高其创业成功的概率。其次，创业是一个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运营、管理和发展的过程，且具有高不确定性，非常考验创业者的抗风险能力和资金保障能力。^①如果没有相对充足和稳定的资金来源，农民几乎不太可能放弃原本的小农经济运作方式而选择相对高风险高回报的创业模式。本文认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促进信息获取和缓解资金约束，进而对农民创业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第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满足农民的信息获取需求。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打破信息资源的中心垄断，赋予个体生产并传播信息的能力。^②有经验的创业者可以通过网络便捷地进行创业经验分享和信息交流。由于数字技术具有“可见性”和“持久性”的技术性能，这些信息内容及其他用户参与创造的内容（如对信息进行点赞、评论及分享）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并保持可用性，为农民创业活动决策提供了信息来源和信息基础（赵涛等，2020）。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农民的信息搜寻成本。在数字经济中，数字本身具有低成本重复搜索和利用的特点，随着信息搜寻的广度增加和质量上升，搜寻成本得以下降（秦芳等，2022）。借助于信息通讯技术，农民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获取所需信息。此外，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农民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借助微信、头条、抖音等数字化媒体，农民可以与客户、同行、上下游产业合作伙伴建立在线连接，并实现跨越时空的交流联系。这为农民获取丰富的创业相关信息提供了有利途径。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H2。

H2：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促进信息获取，进一步正向影响农民创业。

第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缓解农民的创业资金约束。农民融资主要有以传统金融机构（如银行、农村信用社）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借贷和以社会网络为载体的亲友借贷两种方式。^③一方面，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使农民享受到便捷的金融机构借贷服务。金融机构可以借助线上金融产品的开发，实现线上支付、转账、借贷等功能，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借贷业务成本。同时，依托于大数据，金融机构能够用较低的成本对农民进行风险评估，降低了农民的融资成本。过去，农民缺乏经营记录，使得金融机构难以判别其诚信度，不敢放贷。而数字技术有助于金融机构利用贷款人在互联网上沉淀下来的大量行为数据信息，并以大数据分析手段对农民信息进行评估。这为降低风险评估成本提供可能，^④也有助于农民获得机构借贷，帮助其跨越资金约束的创业门槛。另一方面，地方数字经济发展可以使人们跨越时空距离建立连接，有助于增进亲友间的信任度和透明度，促进亲友间的互惠互助。数字支付和数字理财的使用也能够显著提高金融资产交易的安全性，保证交易安全的同时可以溯源留痕，为亲友间借贷提供了渠道保障，有助于促成亲友间借贷交易（何婧和李庆海，2019）。综上，本文提出假说 H3a、H3b。

H3a：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促进机构借贷，正向影响农民创业。

H3b：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促进亲友借贷，正向影响农民创业。

综上，本文提出如图 1 所示的理论分析框架，即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不仅对农民创业产生直接影响（H1），同时也通过信息渠道（H2）、机构借贷（H3a）和亲友借贷（H3b）三个中介机制产生间接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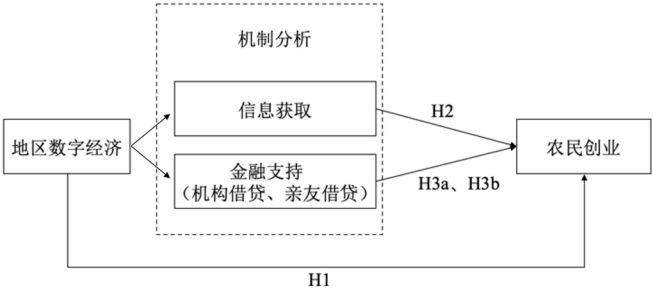


图 1 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户创业影响的假说框架

① 周冬梅、陈雪琳、杨俊、鲁若愚：《创业研究回顾与展望》，《管理世界》2020 年第 1 期。
② 唐庆鹏：《新媒体“去中心化”的政治学解读》，《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
③ 马光荣、杨恩艳：《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经济研究》2011 年第 3 期。
④ 谢绚丽、沈艳、张皓星、郭峰：《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18 年第 4 期。

为检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户创业之间的关系, 本文建立二元 Probit 选择模型:

$$Entre_{ijt} = \beta_0 + \beta_1 Digital_{j, t-1} + \beta_2 X_{ijt} + \varepsilon_{ijt} \quad (1)$$

其中, $Entre_{ijt}$ 为被解释变量, 表示 j 地区的受访者 i 在第 t 年从事创业活动的情况; $Digital_{j, t-1}$ 为解释变量, 是 j 地区滞后一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滞后一年主要借鉴谢绚丽等 (2018) 的做法, 它有助于减弱反向因果的可能性; X_{ijt} 表示个人、家庭和社区层面的控制变量; ε_{ijt} 为随机误差项。在估计模型系数时, 我们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各 1% 的缩尾处理, 并加入区域控制效应和年份控制效应。

进一步地, 本文以信息渠道、机构借贷、亲友借贷为中介变量, 使用中介效应模型, 考察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创业的作用机制。借鉴温忠麟等 (2004) 的方法,^① 在 (1) 式基础上通过层次回归分析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Intermedia_{ijt} = \beta_0 + \beta_1 Digital_{j, t-1} + \beta_2 X_{ijt} + \mu_{2ijt} \quad (2)$$

$$Entre_{ijt} = \gamma_0 + \gamma_1 Digital_{j, t-1} + \gamma_2 Intermedia_{ijt} + \gamma_3 X_{ijt} + u_{3ijt} \quad (3)$$

其中, $Intermedia_{ijt}$ 为该模型中的中介变量, 代表信息渠道、机构借贷和亲友借贷。

(二) 变量测量

1. 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农民创业”的测量数据来自调查时点的样本工作状况。我们将工作状态为“老板”“雇主”和“自雇”的样本认定为创业农民, 赋值为 1; 否则为非创业农民, 赋值为 0。

2. 解释变量。借鉴赵涛等 (2020) 的研究, 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金融发展两方面对解释变量“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进行测量。其中, 采用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每百人宽带接入用户数、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总体从业人员比重、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四个指标对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进行测度; 采用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数字金融发展进行测度。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对以上五个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后再做降维处理, 计算得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

3. 中介变量。本文包含信息渠道、亲友借贷和机构借贷三个中介变量。参考周广肃和樊纲 (2018) 的研究,^② 以“受访者使用手机微信、QQ 等网络社交工具的频率”为信息渠道的代理变量; 借鉴马光荣和杨恩艳 (2011) 的研究, 以“在本地这些关系密切的人中, 您可以向他/她借钱 (5000 元及以上) 的人数”来衡量亲友借贷; 以“是否成功从正规金融机构贷到款来用于生产性投资”来衡量机构借贷, 回答“是”和“否”分别赋值 1 和 0。

4. 控制变量。(1) 个体层面因素, 包括农民的性别、年龄、政治身份、受教育年限、个人健康水平和婚姻情况 (何婧和李庆海, 2019)。除此之外, 本文还考虑了个人社会网络、宗教信仰和农民参加保险情况。社会网络能为创业活动带来信息、资金等资源, 会提升农民创业的概率;^③ 宗教信仰可能通过影响创业偏好、扩充社会资本等途径对农民创业产生影响;^④ 社会保险能够缓解创业失败带来的收入冲击, 提高个人抗风险能力和创业意愿。^⑤ (2) 家庭层面因素, 包括家庭规模、父亲是否为党员、上一年家庭用于礼品和礼金支出三个变量。父亲政治身份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父辈所建立的社会网络, 家庭礼品和礼金支出是反映家庭社会资本的重要维度 (马光荣和杨恩艳, 2011), 两者都可能对农民创业行为产生影响。(3) 社区层面因素, 包括村级总人口和村级经济状况, 以控制各村级资源禀赋和创业氛围差异对创业的影响 (张剑等, 2021; 秦芳等, 2022)。

(三) 数据来源

①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心理学报》2004 年第 5 期。

② 周广肃、樊纲:《互联网使用与家庭创业选择——来自 CFPS 数据的验证》,《经济评论》2018 年第 5 期。

③ Linda, Yuch, “China’s Entrepreneurs”, *World Development*, vol.37, no.4, 2009, pp.778-786.

④ 阮荣平、郑风田、刘力:《信仰的力量: 宗教有利于创业吗?》,《经济研究》2014 年第 3 期。

⑤ 陈怡安、陈刚:《社会保险与创业——基于中国微观调查的实证研究》,《人口与经济》2015 年第 6 期。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农民微观层面数据主要来自于 CLDS，用于测量被解释变量（农民创业）、三个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CLDS 是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覆盖中国除西藏和海南的 29 个省市的 2000 多个区县，包含个体、家庭和村级三个层面问卷，内容包括教育、就业、医疗、社会关系、基层状况等方面。本文使用 CLDS 最近三年调查数据，即 2014、2016 和 2018 年。考虑到跨城市流动问题，本文剔除了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的农民，同时由于一些受访者的变量指标（如受教育年限、互联网使用情况和社会网络水平等）存在多个缺失值，在实证检验中实际用到的样本数为 14956。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测量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表 1 报告了各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研究结果

（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创业影响的基准回归

本文首先运用二元 Probit 模型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创业的关系进行基准回归，在逐步控制个人、家庭和社区层面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观察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创业的关系及其变化。如表 2 所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第（1）列结果显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

表 1 变量测量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类型	变量名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农民创业	1= 农民创业；0= 非农民创业	0.04	0.19	0.00	1.00
解释变量	地区数字经济发展	地级市数据经济发展综合指数	0.01	0.61	-0.66	2.18
控制变量	性别	1= 男；0= 女	0.48	0.50	0.00	1.00
	年龄	岁	46.41	14.74	15.00	75.00
	政治身份	是否为党员：1= 是；0= 否	0.05	0.21	0.00	1.00
	受教育年限	年	5.73	4.70	0.00	18.00
	宗教信仰	是否有宗教信仰：1= 是；0= 否	0.12	0.33	0.00	1.00
	社会网络	本地可以帮助受访者的人数	10.29	17.29	0.00	100.00
	参保情况	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1= 是；0= 否	0.47	0.50	1.00	1.00
	婚姻状况	是否已婚：1= 是；0= 否	0.83	0.37	0.00	1.00
	家庭规模	家庭人口数（人）	4.86	1.97	0.00	11.00
	健康水平	1= 丧失劳动能力；2= 差；3= 一般；4= 健康；5= 非常健康	3.56	1.04	1.00	5.00
	父亲政治身份	父亲是否为党员：1= 是；0= 否	0.08	0.28	0.00	1.00
	家庭礼金支出	前一年家庭礼金支出金额，取对数	5.75	3.74	0.00	11.51
	村级规模	村级人口规模，取对数	0.40	1.05	0.02	9.72
	村级人均财政收入	村级人均财政收入（元）	5.60	24.44	0.00	181.82
中介变量	信息渠道	受访者使用手机微信、QQ 等网络社交工具的频率：0= 不使用；1= 很少使用；2= 偶尔使用；3= 经常使用	1.35	1.35	0.00	3.00
	融资渠道—机构借贷	是否成功地从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贷到款：1= 是；0= 否	0.08	0.27	0.00	1.00
	融资渠道—亲友借贷	在本地关系密切的人中，可以借钱（5000 元及以上）的人数	3.88	4.98	0.00	25.00
创业类型	机会型创业	1= 问卷中回答为“抓住好的创业机会”及“当时有好的工作岗位，但创业机会更加好”；0= 其他	0.02	0.13	0.00	1.00
	生存型创业	1= 问卷中回答为“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0= 其他	0.00	0.06	0.00	1.00
工具变量	邮局历史数据	各城市 1984 年每百万人邮局数量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的交乘项	2.34	1.98	0.00	11.92

区数字经济发展每提高 1%，农民创业概率增加 26.8%。加入个人、家庭和社区特征变量后的第（2）和（3）列结果显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创业的正向影响始终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增加 1% 对农民创业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但稳定在 15.3%，模型的拟合优度从 0.029 逐步提高到 0.158。研究结果总体上支持了假说 H1。

对于控制变量而言，性别、教育年限、宗教信仰、社会网络、健康状况、婚姻状况与村级规模都与农民创业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条件下，农村居民中男性创业概率显著高于女性，农民受教育越多越可能创业，宗教信仰也可能促进农民创业，健康水平高的农民更有可能创业，已婚农民更有可能创业，在人口更多的村的农民创业可能性更高。而农民年龄和村级经济情况与农民创业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条件下，越年轻的农民及村级人均财政收入低的农民更可能创业。这些结果进一步印证了已有研究（何婧和李庆海，2019；阮荣平等，2014）。

（二）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缓解内生性问题是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农户创业行为的增加可能带来对互联网交易需求的增加，进而促进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尽管模型中使用地区数据经济发展的滞后项（谢绚丽等，2018）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但无法完全规避这一担忧。另一方面，尽管本文参考已有文献考虑了影响农户创业行为不同层面的控制变量，但依然可能出现遗漏变量的情况，进而导致回归结果偏误。为缓解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工具变量进一步考察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借鉴黄群慧等（2019）的做法，本文以各地级市 1984 年邮局历史数据与 2014、2016 和 2018 年互联网用户数交乘项作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的工具变量。这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邮局是当时人们信息沟通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铺设电信基础设施的执行部门，邮局的分布能够从技术水平和使用习惯等因素影响到后续阶段数字技术的应用，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具有相关性；其次，在经济逐步发展的情况下，邮局所代表的传统电信工具的使用频率逐渐下降，与当前经济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地区数字经济发展	0.268*** (6.64)	0.177*** (3.33)	0.153*** (2.85)
性别		0.476*** (5.84)	0.477*** (5.81)
年龄		-0.020*** (-5.81)	-0.019*** (-5.60)
政治身份		-0.040 (-0.26)	-0.051 (-0.33)
受教育年限		0.034*** (4.11)	0.034*** (4.09)
宗教信仰		0.533*** (5.24)	0.514*** (5.03)
社会网络		0.003* (1.85)	0.003** (1.97)
健康水平		0.113*** (2.99)	0.119*** (3.08)
参保情况		0.070 (1.01)	0.080 (1.13)
婚姻状况		1.050*** (7.08)	1.040*** (7.00)
家庭规模			-0.009 (-0.47)
父亲政治身份			0.061 (0.51)
家庭礼金支出			0.005 (0.60)
村级规模			0.077*** (3.41)
村级人均财政收入			-0.004*** (-2.67)
Constant	-3.506*** (-33.71)	-4.205*** (-10.47)	-4.272*** (-10.05)
区域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样本量	14956	14956	14956
Pseudo R ²	0.029	0.136	0.158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列示为 t 值，下同。

活动特别是创业活动关联性不大，满足外生性条件。

表 3 第（1）列报告的 2SLS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工具变量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弱工具变量检验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达到 1343.89，显著超过临界值。第（2）列结果显示，解释变量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系数为正且在 1% 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农民创业概率，基准模型结论依然成立。此外，本文还针对方程（1）展开 IV Probit 估计。表 3 第（3）列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且在 1% 的显著水平上。综上所述，即使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依然有助于促进农民创业。

表 3 引入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1)	(2)	(3)
	2SLS 第一阶段	2SLS 第二阶段	IV Probit
地区数字经济发展		0.038*** (4.03)	0.336*** (3.94)
历史邮局数	0.00*** (2.7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样本量	14956	14956	14956
R-squared	0.124	0.114	
DWH 检验 P 值		0.0116	
Wald 检验 P 值			0.0031

为避免研究中指标选取可能产生的偏误，本文采用替换关键变量的方法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将解释变量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用腾讯研究院提出的“互联网+”发展指数进行替换，结果显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创业正向关系保持不变，且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结论稳健可靠（见表 4）。

表 4 腾讯“互联网+”发展指数回归结果

	(1)
	农民创业
腾讯“互联网+”发展指数	0.006*** (2.84)
控制变量	YES
Constant	-4.267*** (-8.21)
区域效应	YES
年份效应	YES
样本量	14956
Pseudo R ²	0.121

（三）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农民创业的中介机制分析

本文进一步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农民创业的中介机制进行分析。如表 5 所示，第（1）至（3）列显示了信息渠道作为中介变量的层次回归分析结果。第（2）列表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信息渠道的影响显著。第（3）列表明，信息渠道对农民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加入信息渠道这一中介变量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了。这说明，信息渠道稀释或削弱了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创业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假说 H2 得到验证。

第（4）至（6）列显示了机构借贷作为中介变量的层次回归分析结果。第（5）和第（6）列的结果表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机构借贷的影响、机构借贷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存在中介效应。然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机构借贷的影响系数为负，且通过进一步利用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抽样法进行检验发现，间接效应在 95% 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这表明机构借贷对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和农民创业之间关系的中介影响是一种遮掩效应，假说 H3a 没有得到支持。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首先，农民居住相对偏远、较为分散，其贷款额度也往往偏小，传统金融机构发放信贷的成本较高，机

表 5 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7)	(8)
	信息渠道			机构借贷			亲借友贷	
	农民创业	信息渠道	农民创业	农民创业	机构借贷	农民创业	亲友借贷	农民创业
地区数字经济发展	0.010** (2.00)	0.142*** (6.98)	0.006 (1.18)	0.009*** (3.39)	-0.015*** (-3.09)	0.010*** (2.65)	0.606*** (9.73)	0.009*** (3.19)
信息渠道			0.028*** (9.34)					
机构借贷						0.034*** (4.03)		
亲友借贷								0.001** (2.4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 ²	0.156	0.239	0.175	0.1771	0.149	0.1208	0.2552	0.2023
样本量	8801	8801	8801	14956	14956	14956	14956	14956
Sobel 检验			0.004***			-0.000**		0.001**
Z 值			-5.589			-2.45		2.33
Bootstrap 检验						[0.0020, 0.0180]**		[0.0027, 0.0153]***
Z 值						2.46		2.78

构借贷仍不是农民融资的主要方式；^①其次，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网络借贷为农民创业提供了更多融资渠道选择，对机构借贷产生替代效应。

第(7)、(8)列报告的以亲友借贷作为中介变量的层次回归结果表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亲友借贷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亲友借贷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创业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亲友借贷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和农民创业关系具有部分中介效应，结果支持了假说 H3b。

四、进一步异质性分析

(一) 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惠及哪种类型的创业

依据创业动机不同，创业类型可区分为机会型和生存型(周广肃和樊纲，2018)。机会型创业是指创业者为了追求一个商业机会而从事创业的活动；生存型创业是指创业出于生计考虑，别无其他选择而进行的创业。本文依据 CLDS 问卷中“您这次创业是因为找到好的创业机会还是因为您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这一问题，将回答“抓住好的创业机会”及“当时有好的工作岗位，但创业机会更加好”划分为机会型创业，将回答“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作为生存型创业。

表6的第(1)、(2)列分别显示了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的效果。结果表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两类创业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相对于生存型创业，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效果要更大。可能的原因是，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既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农民创造了更多的创业机会，又促进了农民对数字技术的使用，有助于其识别创业机会和获取创业资源，更好地实现机会型创业。

(二) 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是否对弱势群体农民创业的影响更大

已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创业的影响可能存在创业者特征的异质性(赵涛等，2020；张文武，2021)。本文关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弱势群体农民创业的影响，选取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所在区域三个创业者特征变量。其中，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样本为低人力资本农民，初中及以上的样本为高人力资本农民；朋友/熟人的人数低于平均值(12人)的样本为低社会资本农民，高于平均值的样本为高社会资本农民；所在区域是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的为中心城市农民，所在区域是其他地

^① Berger A. N., Gregory F. U., “Small Business Credit Availability and Relationship Lending: The Importance of Bank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112, no.477, 2002, pp.F32-F53.

级市的则为外围城市农民。参考何婧和李庆海（2019）的研究，将低人力资本农民、低社会资本农民和位于外围城市的农民定义为弱势群体农民。

表6第（3）—（8）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地促进了低人力资本、低社会资本和位于外围城市的农民创业，而对高人力资本、高社会资本和位于中心城市的农民创业的影响均不显著。这一结果与之前的研究相似（何婧和李庆海，2019），说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包容性特征，能够弥补弱势群体农民的创业劣势，激发其创业热情。

表6 异质性分析结果

	（1）	（2）	（3）	（4）	（5）	（6）	（7）	（8）
	机会型创业	生存型创业	高人力资本	低人力资本	高社会资本	低社会资本	中心城市	外围城市
地区数字 经济发展	0.158*** （2.66）	0.099* （1.74）	0.103 （1.63）	0.334*** （2.75）	0.029 （0.26）	0.184*** （2.84）	0.206 （1.11）	0.255*** （3.7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区域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14956	14956	9472	5484	6140	8816	5097	9859
Pseudo R ²	0.121	0.092	0.115	0.158	0.134	0.119	0.042	0.122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两方面构建地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并将其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微观数据相结合，运用二元 Probit 模型实证检验了地区数字经济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民创业，这一结论在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信息获取和亲友借贷，进一步激活农民的创业活动，但却降低了机构借贷，对农民创业产生遮掩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效应大于生存型创业，且更有助于促进低人力资本、低社会资本和位于外围城市的弱势农民群体的创业行为，具有包容性特征。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首先，要加大政府对互联网和数字普惠金融的投资力度，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提高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水平，以进一步巩固数字经济发展为农民创业带来的红利优势。其次，要加强农民数字素养，提高其利用数字技术获取信息和线上交流沟通的能力，使其能更好把握创业机会和实现成功创业。最后，要实施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着重加强受教育程度低、社会资本低和位于外围城市的农民群体的数字接入和数字应用能力，让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成为有效缩减农村内部发展不平衡的重要途径。

责任编辑：张 超

近代中国财政分权的历史框架与当代启示^{*}

毕学进 马金华 许 晖

[摘 要] 将近代中国的财政分权进程,划分为分权下的集权与集权下的分权两个阶段,发现分权下的集权难以实现财权事权配置,而集权下的分权则能实现财权事权的合理分配。分权下的集权会使事权脱节财权,导致地方通过苛捐滥征、公债滥发解决财政困境,还会使财权错配事权,导致地方将本已实质性独立的财政用于军需扩张,进一步离散中央和地方。集权下的分权则是在“强中央”统一框架下配置财权事权,使财权事权更易配适。从晚清到北洋时期是在分权下集权推进财权分权改革,故无果而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相对集权下分权,才初具近代财权分权制度雏形。但形式上的统一、可控范围内的独裁强化及随意加征的苛捐杂税,侵蚀了该时期中央政府权力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财政分权的效果。这为我国在“强中央政府”框架下“集权”提供了历史证据与经验启示。

[关键词] 财税分权 财权事权 政治纠葛

[中图分类号] F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22)12-0124-09

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归属,划分中央和地方职责关系,不仅是历代王朝治理财政的要点,也是我国当前财政改革的重点。当前,学界对中国当代财政分权做了大量研究,形成了包容性财政论、^① 财政分权竞争论、^② 财政分权激励论^③ 等多种学说。既往学界尝试从财政学理出发,分析中国当前财政分权的运行逻辑,提炼财政分权的演化规律,以期当前财政改革提供学理参考。尽管前述研究做了大量探索,但是存在两点不足。第一,既往多数研究是借鉴西方财政学理或经验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缺乏中国本土的历史考察验证与解剖。从西方历史实践中生成的西方财政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本土,^④ 从中国财政分权的历史演化出发,或可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中国本土财政集权与分权的演化规律。第二,既往学界关于财政分权的研究,多以集权论集权,分权论分权,割裂了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集权下也有分权,分权下也有集权,二者之间并非对立,而是复杂系统的交互关系。基于此,本文从中国历史演化视角出发,分析中国财政分权的历史规律,以期为中国当代财政治理提供本土的经验镜鉴。与既往研究相比,本文边际性贡献主要体现在:(1)不同于以往学界从西方学理视角分析中国财政改革,本文在回顾中国财政分权的演化历史上,通过学理解构,探究了中国财政分权的基本

^{*} 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代中国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划分研究”(20AJY018)、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代财政转型与国家财政治理能力研究”(15ZDB03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毕学进,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研究生;马金华,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北京,100081);许晖,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北京,100072)。

① 吕炜、王伟同:《中国的包容性财政体制——基于非规范性收入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② 汪彤:《中国式税收分成制下政府间竞争的运行逻辑——理论机制和解释框架》,《经济体制改革》2022年第2期。

③ 吕冰洋、李钊、马光荣:《激励与平衡:中国经济增长的财政动因》,《世界经济》2021年第9期。

④ 李俊生、姚东旻:《财政学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基础?——兼评市场失灵理论的“失灵”》,《经济研究》2018年第9期。

规律与分析框架,从一个新的视角提供了不同财政分权模式的经验证据;(2)本文没有简单将财政集权与分权做割裂考虑,而是根据分权的基本状态,将财政分为“分权下集权”与“集权下分权”两种模式,分析了两种模式复杂的交互关系与不同效应,并尝试解构不同效应产生的原因。以上两个新的视角,或可给当前中国财政改革提供新的学术线索。

一、财政分权的历史演进

(一) 晚清到北洋时期的财政分权(1851—1927)

中国传统社会在高度集中的财税管理体制下,财税所有权基本归属中央政府所有,地方留存与押京数额并不能自主,而独立的地方财政需要满足自由的税目设置权与财政收支的自由支配权,因此在传统社会中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地方财税。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由于镇压需要,清廷允许地方督抚自行“就地筹饷”,督抚开始实质性掌握地方财税,原有高度集中的一元财税逐步转变为央地二元财税模式。晚清时期,西方财税理论源源不断流入中土,将已成为既定事实的地方财税合理划分,明确央地二级财权与事权权限,成为时人呼吁财政改革的主要焦点之一。^①1907年福建道监察御史赵炳麟上奏,拟请朝廷制定预算决算表整理财政。度支部认为,国家预算之所以难以推进,在于中央对地方收支细额难以得知,于是派遣财政监理官清理地方财政,详查各省收支确数。这令地方督抚藩司大为恐慌,他们担心中央会借财政清理之名收回既有财权,于是视中央委派的财政监理官为肉中之刺。在地方督抚屡次阻扰下,地方财政清理工作难以着手。一年多的财政清理工作,因员少事多、先核后报、积补无着、事权不一等多种难处,中央仅获得地方收支大概额度,在此粗略基础上度支部着手划分央地两税。但在如何划分上,中央与地方再起龃龉。既然中土并无地方税划分的祖制成规,那么如何界定央地收支结构,自然是各执一词。地方督抚想将已据为既得利益的地方财政获得制度上与法律上的承认,而中央却想借两税划分收回财权。1907年度支部要求各地奏报款项以凭核办,以求“财权统一”。^②1911年度支部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财税在历史上同为民财,同归国用,从不区分,表达了“统一财权之义”:^③“全国预算当合全国一统”,^④这明显与地方督抚的财税分权利益诉求南辕北辙。在集权与分权之间,中央与地方反复纠葛,一直到清廷覆亡,税目划分亦未形成完整的制度框架。

进入到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地方掌控财权历经半个世纪的路径依赖已成为既定事实,枝强干弱成为这一历史阶段的基本样态。地方都督各有财权,地方财政各自为谋,地方解款屡催无应,导致中央财政濒濒可危。如何打破财政分权事实,集中规复财权一统,成为中央政府的财政方策。1913年,中央政府以立法形式正式承认了地方财税。同时规定中央税包括田赋、盐课、关税、契税等大端税种,而地方只有田赋附加税、商税、牲畜税、船捐等繁杂难收的税捐。中央此举明显是想打破枝强干弱困局,把控主要税源。然而此举遭到地方的强烈反对,难以施行。1916年袁世凯身亡后,原本羸弱的中央政府更无权威。1916年8月,众议院再次提议恢复1913年的国税地税两税划分方案,虽经国务会议通过,但此时很多地方实力派拥兵自立,不予理会。1917年,众议院再次将国地两税划分问题提上日程,虽多数代表认为有划分之必要,但如何划分却谨终慎始,悬而未决。考虑到地方实力派权势渐重的事实,1923年,中央将田赋下归地方,中央税收则保持关税、印花税、消费税、盐税、烟酒税等税,以维一统之局。虽此举中央已做较大让步,但方案一经发布,立即遭到地方的强烈抨击。随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方案旋即搁梁。^④

(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财政分权(1927—1948)

① 刘巍:《西学中用:熊希龄财政思想与实践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② 《度支部奏议覆制定预算决算表折》,《东方杂志》1907年第3期。

③ 《为试办全国预算拟定暂行章程事奏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41-0025-0001,1911年5月。

④ 刘巍:《北洋政府时期的财政分权与集权》,《求索》2017年第6期。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随后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由于国共合作领导的北伐战争消灭了中国主要三大割据军阀,地方名义上承认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随后中央推行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原则上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权责,并对地方政府的权力获取途径进行规制,这便于南京国民政府在其可控范围内实现财权统一。1928年7月,在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上,提出裁厘改统、废两改元、实行国地税等财经变革措施。1928年,又严格限制地方政府举借债务。同年成立中央银行,并在全国设立分支机构,金融网络开始渗透全国。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实施法币改革,使中央政府强化了金融控制。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央地两税划分,是集权环境下的分权。其主要做法是:

第一,实省虚县。实省虚县主要是划分中央和省级两级财政体系。1927年,古应芬划分案列入国家收入的有盐务税、关税、常关税、烟税等,列入地方的则有田赋、契税、牙税、当税等。1928年宋子文划分案进一步明确了中央、省两级财政体制,岁入大宗归属基本与古氏划分案无异,同时规定属于国家支出的项目有中央党务费、立法费、监察费等21项,属于地方支出的项目有地方党务费、地方立法费等13项。纵观古氏与宋氏的划分方案,其最为主要的特征在于明确了省级财税的财政收支结构与权责。

第二,撤厘改统。厘金是清代咸丰时期为镇压太平天国政权允许地方团练就地筹饷而对国内贸易征的税,后成为地方主要岁入之一。早在清季关于废厘的呼声就此起彼伏,光绪帝也曾有废厘筹划,但因手握重财的地方督抚反对而不得不束之高阁。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厘金已成为地方的重大财源,但脱离中央管制。1928年,中央政府着手准备撤厘事项,到1931年底地方厘金基本得以裁撤,切断了地方实力派的重要税源。

第三,实县虚省。实县虚省主要是确立中央、省和县(市)三级财政体系,与实省虚县相比,其主要特征是弱化省级财政,强化县级财政。虽然撤厘改统后地方财源锐减,但不少省级政府依然手握重财,县(市)级政府财政收入不足。1946年,颁布《财政收支系统法》,将中央和地方二级财政体制演变为中央、省、县(市)三级财政体制,并把省级财政土地税、田赋附加、印花税、营业税的三成划给了县级财政,使县级收入大为增强。因此省级的财权得以一定程度的限制,县级政府获得法定税入,无需完全依附于省政府,部分省级权势削弱。

尽管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种种措施强化中央权威,但中央政府并未完全整合地方实力派,其改革措施,仅在其少数控制的地区得以顺利推行。其他地方反抗中央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甚至发生多次反蒋事件。因而上述措施的财政分权效应较为有限,但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北洋时期中央过度羸弱的局面。

二、分权下集权与集权下分权:财政分权的一个历史分析框架

(一) 分权下集权与集权下分权:财政分权的两种模式

何谓分权?既往学界将分权定义为权力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地方实体的过程。^①分权在财政领域,即为多级政府结构中从上而下的财政权力配置。一般认为,稳定职能最好由中央政府履行,而分配职能最好由地方政府履行。^②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归属不同,这催生了财政分权学说。财政分权已历经第一代分权论和第二代分权论,虽其观点颇有差异,但有一个共识是,中央和地方应该合理划定财政边界,让其职能得以发挥。我国学者将财政分权定义为政府间收入分享规则,^③参照吕冰洋等(2021)对财政分权的测量,^④本文将财政分权定义为将支出责任和收入分配转移到下级政府的过程,让不同的

① Cheema G. S., Rondinelli D. A., *Decentralizing Governance: Emerging Concepts and Practic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p.67.

② Oates, Wallace E., "Toward a Second-Generation Theory of Fiscal Federalism",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vol.12, 2015, pp.349-373.

③ 吕冰洋、贺颖:《分权、分税与市场分割》,《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④ 吕冰洋、马光荣、胡深:《蛋糕怎么分:度量中国财政分权的核心指标》,《财贸经济》2021年第8期。

支出责任与财政收入得以适配。将收入分配转移到下级政府的程度，决定了分权的程度，简而言之，就是“蛋糕应该怎么分”的问题。

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财政分权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任何政府不可能采取简单的集权或者分权策略，而是建立在复杂环境下做出理性选择。任何一个行政主体，其做出的分权或者集权决策，一般是建立在分权或者集权既定事实的潜在危害性基础上进行的纠偏行为。如果过度分权，将会导致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下降。^①为规避风险，中央政府将会设法集权，此种决策被称为“分权下集权”。但如果中央政府过度集权，会导致地方积极性难以提升，引起资源配置效应弱化。^②为规避其潜在风险，中央会适当下放财权，称之为“集权下分权”。中国近代历史上即经历了从“分权下集权”到“集权下分权”的演变过程。如图1所示。

自1850年前后地方财政形成后，财权不断下移，财政处于分权之态，到1927年中央政府一直都想通过两税划分的方式集中财权，此阶段为分权下的集权阶段。该阶段内，晚清政府尝试通过清理财政、试办预算、尝试两税划分以复财权一统之局，然而地方督抚纷纷反对中央单方面的路径选择，在清理财政等多项事宜中，中央亦多跟地方妥协，财权划分最终无果而终。到北洋政府时期，支强干弱，中央政府承认地方财政后，多次尝试划分央地两税，以稳定中央税源，但由于中央羸弱不堪，缺乏制度变迁的博弈资本，多次分权尝试败不旋踵。进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北伐战争、东北易帜、中原大战等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军事派系实力，央地秩序关系得以重新洗牌，中央政府在财政分权中具有一定话语权，通过撤厘改统等措施，界定了央省县三级政府财税收支权责，最终明确了近代意义上的两税雏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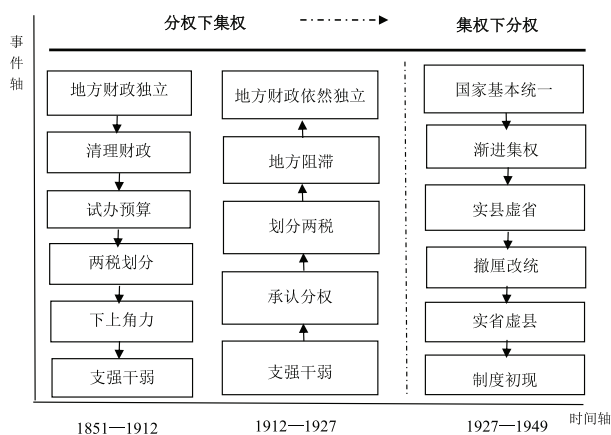


图1 分权下的集权、集权下的分权与财政分权演进逻辑

（二）分权下集权模式

1. 分权的既定路径依赖与集权纠偏。

维斯和霍布森（2009）认为，过度分权会导致国家和地区“越搞越糟”，甚至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俘虏。强国家权力干预是发展的关键前提。^③从这个视角分析，晚清时期中央政府的财政集权行为，是对分权潜在危害下的纠偏。中国自古以来，是中央高度集中的财权体制。清前期继承了这一财政模式，地方督抚州县并不具备独立财政。虽然这种管理模式不太灵活，但在传统时期的中国，地方公共品提供较为单一，且其主要职能是维护王朝稳定，尽管这种财政管理模式较为僵化，但并不意味着国家能力的低下。^④因为国家具有统一的税收与财政调度能力，使清初统治者能顺利平三藩、收台湾、安边疆。同时通过中央统一的财政调度，以协饷制度使富省接济贫省，这种政府主导间的财政转移，维持了清初大一统的疆域治理。但太平天国运动的突然爆发让情况发生转变。到清中后期，中央政府财力早已不济，依靠中央拨款维持军队机动已力不从心。为此，中央允许地方自筹款项，自办团练，历经半个多世纪演化，督抚牢牢把控了地方的财权与事权。虽然中央依然具有政治权威，但地方已能跟中央分庭抗礼，清末督抚对中央财政清理的掣肘即是例证。

① 吕冰洋、台航：《从财政包干到分税制：发挥两个积极性》，《财贸经济》2018年第10期。

② 张虹、崔耕瑞：《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经济韧性影响研究》，《新疆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③ 琳达·维斯、约翰·M. 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黄兆辉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第6页。

④ 和文凯：《财政制度、国家权力正当性与国家能力：清代国家能力的再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1期。

长期的财政分权，其危害不言而喻。首先，中央政府逐步失去了对地方财政的信息控制，这就导致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调度“失灵”。其次，长期的地方财政分权，使奏销制度、协饷制度渐趋废弛，财政运转日趋混乱，尤其是边疆省份长期得不到协饷支持，不稳定因素日趋增加。最后，中央对全局调控能力日趋下降，尤其是在列强屡次入侵下，中央失去了对全国资源的实质性调度能力，难以集中全部物力财力抵御列强入侵。这些都会降低国家能力。一场财政过度分权的纠偏改革，不得不酝酿。

路径依赖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原理，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不论“好”“坏”）就可能对这种既定事实产生依赖，且难以更易。尽管清末中央政府设想“集中财权”，但已积重难返。到北洋时期，过度财政分权的路径依赖被进一步强化。面对已成事实的地方财政，1913年北洋政府在法律上正式承认了地方税。但地方解款依然屡催无应。1916年袁世凯身亡后，地方随意扣解京饷，并乘势扩张地盘。如此局面令中央惶恐，但又不得不做出让步。1923年，中央将田赋下归地方税收，中央仅保持关税、印花税、消费税、盐税、烟酒税、租税等6种，但地方依然强烈反对，最后亦付诸东流。

诺思（2014）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①沿着既定的路径，财政制度可能遁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也有可能沿着错误的制度而积重难返。一旦既定制度被形成，要脱身而出将会十分困难，除非借助外部效应，如环境颠覆，才能实现制度的扭转。从晚清到北洋时期的财政制度变迁，正揭示了这一道理。因为制度一旦形成，便会生成利益相关者。财权下移，地方明显是利益既得集团，他们只有不断强化现有制度，才能保持既得财权不会上移，方可巩固地盘，甚至扩张。故时人评价：“地方为挟制中央政权，自亦坚执其固有财源，毫不放松，甚至截留国税，擅发纸币，无所不为。盖所谓财政，早已变成大小军阀穷兵黩武之经济基础。”^②要想在长期路径依赖下的“分权下集权”，打破既有规则，可谓难上加难，除非引入外部变量，颠覆性打破利益分配规则，方可实现集权扭转。

2. 分权下集权的效应：财权错配事权与事权脱节财权。

（1）财权错配事权。国家功能的实现前提是中央政府能够界定一套产权，提供一个经济地使用资源的框架，形成产权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如前所述，“分权下集权”，难以实现制度变迁，由此国家会失去资源的调度能力，地方竞争也会进入无序状态，使财权错配事权。这在北洋时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一时期各大地方实力派争相割据混战，因此不少地方财政支出大端乃为军费，而兴办实业、发展教育、维护治安等基本政府职能多被搁置，财权错配了事权。这不仅严重引发了资本挤出效应，同时还阻滞了央地两税的权责划分。由于地方实力派将自有的财政收入大量扩充军备，直接造成地方有足够的资本与中央抗衡，因此中央的两税权责划分路径选择一旦损害地方既得利益，地方自然群起反之，这进一步加剧了央地关系的离散，也阻滞了近代央地财权事权权责的划分。

（2）事权脱节财权。财政分权的最终目的，是让财权与事权得以匹配。历史演进下，地方公共服务、经济发展、区域安全等事权会不断增加。Tiebout（1956）认为，财政分权的最大优势在于，由于邻近和信息优势，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响应当地的需求和服务。^③但如前所述，既定分权路径下，财权错配事权，各省实力派连年用兵，财政多数用于军需消耗，省及其以下政府事权并未有财力进行匹配，直接导致基层政府多项职能不能发挥。随着近代化的逐步推入，原先集中于中央以及省级政府的多项事权下移到县级政府。以安徽省合肥县为例，到北洋政府时期合肥县已有自卫、公安、教育、建设、工程等的多项事权，但安徽省政府连年穷兵黩武，甚至参与复辟帝制，使安徽各地原本用于教育、建设、工程等多项财政资金被挤出用于军需。县政府只能通过附加税、公债解决基层的财政困境，其每正税一元附加税达到了

① 道格拉斯·C.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年，第111-118页。

② 张一凡：《民元以来之地方财政》，银行周报社，1948年，第171页。

③ Tiebout C.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64, 1956, pp.416-424.

1.182 元，^①换言之，附加税已超过了正税额，这给民众带来了较大的负担，分权并未实现地方公共服务、经济发展、区域安全的功能发挥。

（三）集权下分权模式

诺思（2014）认为，战争、革命、武力征服是非连续性制度变迁的源泉，既定的制度依赖通过战争和武力等非连续性方式实现的是一种根本变迁。^②从晚清到北洋时期，尽管时人做出了大量努力，以期纠正央地不平衡的财政关系，央地的关系形态并未颠覆性改变，因此大多数以失败告终。为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致力打碎旧的制度。1924 年，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合作，并于 1926 年组建国民革命军北进讨伐各路军阀，先后击溃割据苏、皖、浙、闽、赣、豫、湘、鄂等地的孙传芳、吴佩孚。1928—1930 年，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东北易帜、中原大战，将东北地区以及中原地区在形式上收归中央统一管理，相对于北洋时期而言，中央政府强化了对地方的控制力。

为了进行有效的治理，所建立的政府必须足够强大。^③从晚清到北洋，由于中央失去了对全国资源的完全调度能力，使其社会渗入能力、社会关系调节能力、资源提取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都受阻碍。相对于晚清到北洋时期，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强化了中央的控制，如“四行二局”使金融渗入到社会，并收回关税自主权，以及通过废厘改统等措施，使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有所提升，加之中央和地方的税权归属得以初步界定，打通了北洋时期央地财政运转的链条卡点（刘巍，2017）。^④以图示方法表示出内在逻辑理路，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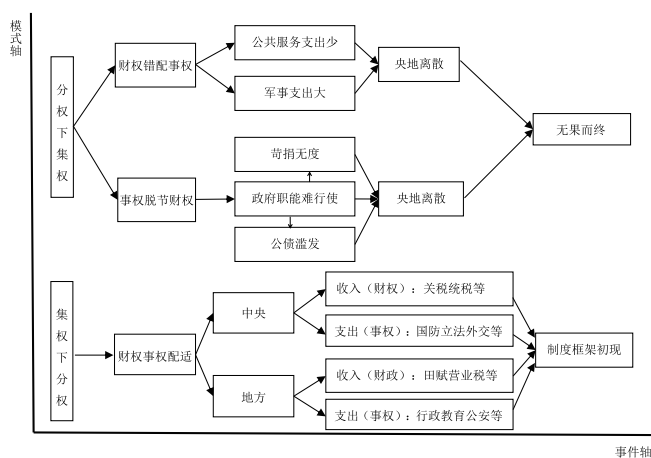


图 2 不同分权模式下效应演化

财权与事权的匹配程度直接关系到两地两税的划分。其内在理路在于，财权匹配事权，能使政府的财力合理匹配到行政、教育等政府职能发挥中，规避财权过度匹配到各自为政的军备扩张中，避免央地离心离德。而事权匹配到财权，能使地方政府各司其事。有序的制度环境更有利于制度的变迁，这为央地两税划分创造了外部变迁的必要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已经初步完成了分权的制度框架建设，但并没完全完成现代化的财税分权转型。其遗留的主要问题是：（1）税权划分不清。南京国民政府虽多次调整了中央和地方的税权归属，但大体而言，地方税以农业税和手工业税为主，中央税以商业税为主，将主要的农业税划分地方脱离国情。^⑤（2）三级财政划分过后，县级收入增加，职能亦日益扩充，以致“各项管、教、养、卫事业开支也日渐增多，所有不足之数就不得不出自附加、摊派或另兴其他苛杂之一涂”，^⑥这并没有改变既往的苛捐杂税，甚至较前有过之而不及。（3）省与县之间的财权事权边界并未得以界定，导致省与县之间的财权与支出责任范围并不明确，影响了地方职能的发挥。（4）最根本的财政内生动力问题并没有解决。财政分权的根本前提是要把“蛋糕”做大，但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动力依然不足。反映当时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国民所得”，并没有显著增长，如 1931—1936 年，中国国民所得值分别为 248、

① 毕学进、郭飞平：《北洋政府时期合肥县田赋问题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5 期。

② 道格拉斯·C.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 119-120、136 页。

③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等：《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杨红伟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11 页。

④ 刘巍：《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土地调查——基于乡村治理的视角》，《学习与实践》2017 年第 7 期。

⑤ 焦建华：《现代化进程中的集权与分权：南京国民政府分税制改革再探讨（1927—1936）》，《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

⑥ 金鑫：《中国民国工商税收史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年，第 231 页。

229、203、192、209、257 亿元，波动较大。^①而该时间段，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发展最好的时期。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并没有显著改善，甚至不得不依靠公债补足。如 1928—1936 年，债务依存度一度高达 70% 以上，远超 20% 的安全线。^②这种“蛋糕”做不大下的分权，影响了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

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即使划分了较为有序的央地收支权责体系，但受限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内生动力不足，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面临着财力与支出责任不匹配的情况，不得不依靠苛捐杂税、公债发借等方式以厚财力。这不仅尽夺民富，还导致税目繁杂，不同税种之间难以明晰归属边界。税目并未简洁有序，权责归属难以明晰。此问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到有效解决。

（四）两种模式的关键作用路径：中央对全局的把控能力

国家权力作为国家垄断的具有强制效力的治理工具，其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对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都至关重要。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本身需要一系列的政治基础和制度条件，而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调度资源，以维系国家运转。

晚清与北洋时期，是“弱中央政府”样态，在既定分权事实下，经过长期制度自我强化，中央权威愈发下降，在“分权下集权”寸步难行。虽然清王朝是帝制行政模式，但是咸同以后，以帝制为轴转的中央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能力明显下降。太平军兴之时，中央下令地方督抚可自行练兵、就地筹款，厉行百年的“财权不下地”局面被打破。洋务运动时期，中央政府拨款十分有限，洋务经费由各省“通盘核计”，不少洋务企业所获利润亦归地方。历经庚子之后，清廷厉行新政，然而多项新政之任仍在地方，清廷默许了地方自行筹款以办新政。不仅如此，中央更是放宽地方政府举借外债的条件，地方可举借外债。这一系列制度变迁的后果，就是将“强中央政府”演化为“弱中央政府”：资源由中央统筹控制转变为地方与中央割裂控制，军队由“国有”转变为“将有”，财权由中央统一调度转变为地方自主调度。尤其到清末，地方督抚自筹款项兴办新式学堂、试办新式司法、编练新式军队、发展新式实业，地方政府已经掌控了地方的司法、人事、经济、军队等各项大权，中央权威已被实质性侵蚀。^③北洋时期，虽然帝制终结，但这并未完全打碎旧的制度安排，多项旧制度、旧观念依然被保留，地方财权依然牢不可破。尽管中央政府做了大量努力，但这一时期中央政府羸弱不堪，如《申报》评论，“中央极希望整理财政……近来督军跋扈……财厅种种紊乱，地方财政余亦痛恨，但现中央能力薄弱，无可讳言。”^④而地方则利用牢牢掌控的财权，扩充军需，以至于“民国成立以来，九年三乱，……自湖南建义破走北军，光复旧壤，而四川亦击走滇黔，自固疆圉，……”。^⑤地方利用债务、苛捐、滥发钞票等手段扩充军需，扩张地盘，进一步巩固了其已实质性控制的财权、军权与事权，成为地方与中央离散的重要驱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则是在相对“强中央政府”下实施的分权改革。在政治上，通过国家形式上的统一，中央政府增强了对地方的信息获取能力、资源调度能力。在军事上，收束军权，规划军队统一编遣。在经济上，废两改元，统一货币，发行法币，建立中央银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政府的羸弱之态。

因此，“分权下集权”，是在已经分权状态下实施的纠偏行为，经过长期路径依赖，中央权威渐受侵蚀，进而失去对全局的控制能力，其制度的再构将寸步难行。而“集权下分权”，是在已经集权的状态下分权，中央政府有统筹全局的能力，其分权的制度安排自然也会遭遇更小的阻力，分权效果亦可揣而知。

①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社会科学杂志》1947 年第 2 期。

② 姜良芹：《南京国民政府内债问题研究（1927—1937）——以内债政策及运作绩效为中心》，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33-137 页。

③ 施成杰：《斯密动力、国家能力与晚清近代化受挫》，《2020 年（第十届）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论文集》，2010 年 10 月 1 日。

④ 《閻代表与周自齐谈话》，《申报》1920 年 12 月 18 日。

⑤ 《章炳麟之离奇建议》，《大公报（天津版）》1920 年 11 月 12 日。

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政府的权威有所改善,但“强中央政府”改革并不彻底。其弊病主要包括:(1)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完成实质上的国家统一。尽管北洋时期军阀并立的局面有所改善,但滇系、桂系、晋系等地方实力派依然各行其是,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仅能完全控制长江中下游的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江西五个省份,仅将全国约8%的国土和20%的人口完全纳入到了中央的运转框架之下。^①同时,国民党内、国民政府内部相互倾轧,影响了中央政府的运转和整体调控能力的提升。(2)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并不具备马克斯·韦伯所言的综合合法性政府特征,因而其中央权威的合法性受到质疑。马克斯·韦伯(2010)将综合合法性政府分为魅力型统治、合法型统治、传统型统治三类,^②这分别要求政权领导人必须具备超凡魅力、完善的法治建设及集体认同、最低限度的服从愿望等基本特质。然而,蒋介石过分推崇武力,并不具备领导人的超凡魅力,其威望只局限于嫡系亲信之间。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法治建设亦存在多种问题,“情大于法”“人大于法”的实践,与法治所蕴含的公共、理性、平等、公正精神存在根本冲突,^③法治的集体性认同低。其政权合法性的唯一途径,是形式上继承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在实践过程中,可控范围内的独裁强化、统治集团的资本累积与苛捐杂税,将“三民主义”精神内核逐渐消解。因此,从理论上而言,南京国民政府并不完全具备合法性政府的特征,也就导致中央的权威性备受挑战,央地关系同时还交织着复杂的派系斗争与权力博弈,从而侵蚀了中央权威。(3)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在集中中央政府权力的同时,亦不断强化个人的权力控制。蒋介石推崇个人独裁,强行干预财政运行。例如,蒋介石多次强制要求增加军费预算,引发财政部长宋子文不满,宋氏感叹“当财政部长,跟给蒋介石当一条狗,没什么两样”,^④预算的约束性、独立性受人格化的侵蚀。正是这种“人治”的倾向,使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并不合理,如1928—1932年,财政支出连年攀升,且有70%用于军费和债费支出。而对于政府应当承担的公共服务供给支出只有10%左右,教育、实业与交通支出占比平均不及1%。^⑤这不仅使南京国民政府的现代化建设极其迟缓,同时使政权性质不能体现公共利益与公共需要,从而影响了国家权力正当性的认可,中央权威亦随之削弱。

因此,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分权进步性,是相对于晚清与北洋时期而言。在中国近代社会剧烈转型中,其复杂的派系倾轧、独裁的统治强化与纠葛的央地纠纷,使南京国民政府并未真正完成财政分权的现代化改革,从这个角度而言,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分权价值,也不应被高估。

三、近代财政分权的当代启示:在“强国家”框架下施行集权下分权

弗朗西斯(2007)认为,弱势的中央政府下公共权力难以运行,制度构建往往处于“越搞越糟”状态,而“强国家”下则利于保持政令统一,实现制度运转。^⑥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也提出,制度的变迁驱动力是多元的,然而质变力则取决于强势力一方。国家能力是实现斯密动力运转的重要前提,也是自强型变革的应有维度。^⑦与自弱性改革将中央的各项权力分散到地方,使地方能完全自由支配所辖区域的财权事权不同的是,自强型变革更强调中央政府对全国资源的有效支配。回顾晚清到北洋时期的改革历程,是一步步走向自弱性财政改革,最终弱化了国家的整体能力,中央政府所做的两税划分尝试皆无果而终。

以史为鉴,当前我国深化中央与地方财税体系改革,必须要以自强性改革为原则方针,以“强中央

① 翁有为、王力:《近代中国权力更替与国家中心力量重塑》,《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②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出版社,2010年,第322、333、351页。

③ 刘云虹:《差序格局社会中的法治困境——以国民政府监察院“打虎”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④ 陈延一:《民国财长:宋子文》,上海: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44页。

⑤ 焦建华:《现代化进程中的集权与分权:南京国民政府分税制改革再探讨(1927—1936)》,《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2期。

⑥ 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19页。

⑦ 施成杰:《斯密动力、国家能力与晚清近代化受挫》,《2020年(第十届)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论文集》,2010年10月1日。

政府”改革为标杆，建立以中央为主导的财税制度框架，充分提高中央政府的资源调配能力与国家能力。做到法政统一，发挥中央统筹大局作用，保障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提升国家公共危机的应对能力、区域发展协调能力、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同时，无论是“分权下集权”还是“集权下分权”，其基本前提是对分权或集权的既定事实下潜在风险的应时纠偏。晚清地方财权形成后，成为地方政府掌实权的重要筹码。中央政府做出财政分权选择，在地方既得利益派看来，无疑是想收回财权，遭到各省反对，改革难以推进。到北洋时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路径依赖，中央财权早已下移，在分权状态下，中央政府明显处于弱势博弈地位，难以取得改革的突破。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之所以能形成制度框架，一方面在于前期北伐战争基本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割据军事实力派势力，同时又通过中原大战等削弱了阎系冯系军事实力派力量，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打破了原有的路径依赖，以便建立起新的制度安排。当前，我国财政分权还面临着多重考验，集权或者分权的失衡，都会引发过度集权或过度分权的风险。如不及时纠偏，可能会不断自我强化为路径依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目标定位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积极性的发挥前提要有事权和财权权责相适的制度。让财权应时匹配事权，需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诸如国防、立法、外交、全国性政策规则等事权应当归属为中央，以强化中央的全国资源调配能力与宏观管理能力，保证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涉及跨区域的重大项目建设可作为央地的共同事权，而作为地方性的公共服务事权则归属于地方。让事权匹配财权，需让事权归属有相应的财税保障，建立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财税归属。对于地方基础性的公共服务，由地方政府承担主要支出责任，中央政府适当补助。对于跨区域的重大工程建设或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承担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划定央地税收的分享比例，为各地方的事权功能发挥提供及时的财力保障，避免近代因财权不足而导致滥发公债、滥征捐税的历史重演。

最后，“分权下集权”与“集权下分权”，回归到原点，是“蛋糕怎么分”的问题。“蛋糕小”，财权无论怎么“分”，央地财力都难以得到保障，其阻力纷争亦随之加大。“蛋糕足够大”，分权的阻力也会相应减少。晚清时期入不敷出，“财政之困难亦已极矣”。^①及至北洋时期，“政府之穷，确已到山穷水尽的境地了”，^②各省自然围绕财权纷争不已。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收支亦严重失衡。此种形势下，不得不加大苛捐杂税征收，发行超过偿还能力的巨额公债，同时通过恶性通货膨胀的方式解决财政困境，导致民众时有倒悬之危。究其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滞后，优质税源较少，财政内生动力不足，不得不另辟他径以厚财力。因此，即使有完善财政分权制度安排，但无优质税源作为保障，分权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经分税制改革，我国已相对建成完善的中央和地方的税制划分制度。然而现实的困境在于，现多数地方，亦时临财力不继之局，不得不通过巨额的地方政府债务缓解财政困难。借鉴历史的教训，要解决财权与财力不匹配的问题，除完善各级政府之间的转移方式外，根本途径在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涵养优质税源。在全球信息化、智能化发展背景下，应顺势而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发展智能化、数字化产业，推动经济结构的持续优化。尤其要注重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动能培育，促进新行业、新动力的发展，做到自我驱动、自我供给，拓展税源。“蛋糕做得大，自然分得好”，培育更高质量税源，推动经济质量与税源结构的同步优化，从根本上解决财力与财权不匹配、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困境。

责任编辑：张超

^①《李家驹奏考察日本财政编译成书呈览折》，《申报》1911年2月3日。

^②《中国财政状况述评/〈新建设〉第1卷第6期》（1924年5月），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D2-0-1379-118。

历史学

晚清官员印章散论

——以《杜凤治日记》的记载为中心^{*}

冷东 邢思琳 沈晓鸣

[摘要] 本文论及的印章,包括印信、关防、临时官印以及官员的私印、闲章等,主要根据晚清州县官员《杜凤治日记》的相关内容,来讨论清朝官员的印章与行政运作、官场惯例、官员生活的关系。从《杜凤治日记》中可以看出,印信、关防是清朝行政运作和官员权责的象征,私印也与官员个人生活密切相关。探讨接印、交印、封印、开印、用印、监印、借印等活动,以及官员私印的情况,有助于加深对晚清典章制度、行政管理和社会文化的研究。

[关键词] 《杜凤治日记》 官印 私印 晚清官场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22)12-0133-12

印者、信也,其功能在于辨等威、昭信守、防诈伪。随着封建官僚制度的日臻完善,印信制度亦日益完善,至清代达到顶峰。关于清代印信制度,已有较为丰富的资料及研究成果,^①但从清朝州县官员日记的角度进行探讨,仍是薄弱领域,仅有个别日记封面钤印及藏书印的提示,并无结合印信领域进行深入细致考证的成果。^②在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③基础之上,中山大学邱捷教授点注本《杜凤治日记》10册近期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④日记中保留的接印与交印、封印与开印、用印与监印、私

*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整理研究”(20VJXG005)、省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特别委托课题“清代梅州商业用印比较研究”(21KYKT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冷东,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东 广州,510031);邢思琳,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选人、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特藏组馆员(广东 珠海,519000);沈晓鸣,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选人、珠海澳科大科技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广东 珠海,519000)。

①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6年;[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官箴书集成》第3卷,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梁晓庄:《岭南篆刻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刘志伟、陈玉环主编:《叶名琛档案——两广总督衙门残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冼玉清:《广东丛帖叙录》,广东省文献委员会,1949年;朱万章:《广东传世书迹知见录》,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广州图书馆主编:《广州图书馆藏仪清室所集广东印谱提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王廷洽:《中国古代印章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胡忠良主编:《清代公务印章图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郭福祥:《明清帝后玺印》,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王日根、徐婧宜:《清代封印制度的经与权》,《历史研究》2021年第2期;杜家骥:《清代官印的特点及其所反映的职官制度变化》,《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年第11期;吴佩林、李晋:《清代文书“预印空白”制度考》,《档案学通讯》2014年第3期;孟杰:《档案中的清代职官印章》,《兰台世界》2011年第11期;李琳:《乾隆时期官印文字研究》,渤海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林勃:《清代州县印信制度浅析——以〈南部档案〉为中心》,《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任万平:《清代官印制度综论》,《明清论丛》1999年第1辑;Mark McNicholas, *Forgery and Impersonation in Imperial China: Popular Deceptions and the High Qing Stat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② 参见张剑:《中国近代日记文献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国学学刊》2018年第4期。

③ 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清代稿钞本》第19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④ 邱捷点注:《杜凤治日记》10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

印与书印等内容，有助于晚清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研究的深入。

一、接印与交印

杜凤治，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长塘人，生于清嘉庆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1814年5月11日）。同治五年（1866）任广东省广宁县知县，继而在广东四会、南海、罗定等地任州县长官，光绪六年（1880）因老病辞官回乡，光绪九年（1883）去世。

（一）接印。官印是行政运作和官员权责的象征。杜凤治是在京铨放的地方官，到任第一件大事就是接印，《杜凤治日记》中对宦粤时期权力更替的接印与交印^①记载颇多。

接印首先要确定接印吉日。清代有着非常繁琐的确定接印吉日的惯例，^②但日记中的记载相对简单，只是说明了清代官场有正月、五月、九月避讳接印之说，每月还有初四、初七、十六、十九、廿八不吉五日，最忌上任接印，不能久安于任。

同治十三年（1874）杜凤治卸任南海知县，急待后任顺德知县张琮接印，双方就交接印日期反复讨论。张琮坚称：“若在四月内无一接印吉日，五月又照例不接印，心甫^③三月间如不到来，诸凡掣肘。”杜凤治询问三月有吉日乎？张琮言：“惟有二十五日尚可勉强用得”。杜凤治笑言：“正、五、九月不接印是何讲究？予向不信，君试看我此次赴罗定必在五月间，看我五月接印。如谓四月正一月共有三十日，无一接印佳日予更不信，只须拣是黄道日与本身生命不冲即可矣，何必拘泥。”张琮则言：“余不足计，凡在大事，择日不可不讲究，四月亦有吉日，无如俱逢初四、初七、十六、十九、二十八日四不祥日，是以为难。”杜凤治感叹张琮惑于阴阳谶纬家言，拘泥成癖，牢不可破，无法劝说。后经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参与定夺，方决定三月二十五日张琮接印，事情始告一段落。^④

接印仪式通常都很隆重。同治五年（1866）二月初一日，杜凤治赴任广东省四会县知县，日记记载了接印过程：已初进城，径至公馆。捕厅来禀见，辞以接印后见。未初暂时代理知县职务的肇庆府经历沈钺将四会县大印送来，刻有嘉字一千四百二十三号，嘉庆二十三年经发。^⑤未正由公馆启身，先诣城隍庙显佑伯神座前行香，行二跪六叩礼，遂进衙门。先祀仪门神毕，入二堂花厅，与幕僚相见，捕厅禀见，禀参见礼，均辞之。朝服出，望阙谢恩，继拜印，更蟒袍补服升座，标各房红单，用印、排衙，礼毕复进内。互相道喜，又祀灶神。捕厅禀见，见之，蔡总爷拜会，亦见之。即出上轿拜同城各官士绅。^⑥其他各次接印大同小异，都是新官上任后，在接印仪式上撕下密封条，用钥匙打开印箱，在同僚的见证下检查官印上面的文字、四角和印钮，正常则接印，接任的新官开始自己的任期。如有损坏、修复的迹象，就会详细记录这些问题并放回印箱，用新的封条封上，并禀报上司以待解决。^⑦

高官赴任更是隆重。日记记载了光绪元年（1875）两广总督英翰前来广州接印的排场：

新制宪英官保是有名大手笔，在上海十二日乘轮船来，择二十及廿二日两日接印，随员十余人，道两人、府三人、州县数人、佐杂五六人，兼有武员数人。闻说文武巡捕一概不用，用自带来之人，衙门不敷入住，差官到，飭两县先备大公馆一所，将来衙门定要开拓改造，上下约百余人，幕中星相医无所不有。其母喜欢听戏，连戏班一并带来。^⑧

日记特别记载了刘长佑接印及其变故。其时广东巡抚由两广总督瑞麟兼署，瑞麟事先派人询问刘长

①《杜凤治日记》中也称为“接篆”与“交篆”。

②黄六鸿：《福惠全书》卷1《莅任部·择到任吉期》，《官箴书集成》第3卷，第16-20页。

③始兴知县林灼三，字心甫，前往顺德接印。

④《杜凤治日记》第7册，第3294-3296页。

⑤清代官印多有款识，印左侧款为编号，以当朝皇帝年号首字顺序而编。印右侧款为制造时间年月，其目的是便于印信登记造册的管理工作。同治九年（1870）杜凤治第二次接任广宁县知县，日记记载曾灼光（前任知县）差人将印送来验视，是“道光三年四月颁道字三百三十三号”。

⑥《杜凤治日记》第2册，第466页。

⑦[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卷2《委任部·受印》，第5页。

⑧《杜凤治日记》第7册，第3850页。

佑有关接印日期安排，刘长佑定为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二十八日。经过广宁时杜凤治登船拜见，当面禀明二十八日为“黑道，又四不祥日也”。刘长佑笑言素不信谶纬之学，不论何事均不计较，即如到任日亦随便。竟不改。^①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二十八日广东巡抚刘长佑接印时的排场如下：

更初点起，微明出署诣天字码头接新中丞（刘长佑）。两厅、两县到后本府亦到，司、道均齐，中堂、将军、左右都统、海关监督亦到。府、厅、县差人持手本请中丞上岸入接官亭，先司、道，府、厅、州、县均上手本参见，挡驾不见。时正雨甚，抚宪冒雨上来。府以下在外厅站班，司、道与各大宪在内，抚台进内厅，各相揖见。抚台未接印，犹为客，首座，将军居其次，余叙次坐。略谈已交辰刻，抚宪即出来更换行装，着补服朝珠上轿行。司、道亦随出上抚署伺候接印，予等府厅、县不及候中堂行，亦随上抚署伺候。抚台先谢恩，次接印，坐堂画卯毕进内，司、道先入道喜，四营将次入，府、厅、州、县又次入，在二堂行礼道喜，司、道散后，予等亦散。^②

然而刘长佑只担任广东巡抚一个月即调任广西巡抚，杜凤治在日记中将其与接印日期不吉联系起来。^③此外还举例署理肇罗道齐世熙的前任道台海廷琛选择在十日开船赴任、十九日接印，两日均属不吉日，果然不久在寓仙游（去世）。^④广东巡抚如蒋益澧、李福泰、刘长佑在避讳日期接印，均官运不利。^⑤因此杜凤治接印广宁日期定为同治五年（1866）十月廿四日，其他地方接印日期也尽量避免不吉之日。

广州知府梁采麟（号山谷）是杜凤治的顶头上司，又是同乡。同治九年（1870）接印时，道贺的百余州县官员挤满大堂，依次叩拜印贺，已60余岁的梁采麟要一一跪下回叩，没等到结束就大呼“实在来不得了，气都喘不过来”，被人搀扶径入内署休息。杜凤治感叹：此实恶顽笑，年已60余，如何能连请百余安？无怪其然也。^⑥臬局总办知府严先佑已67岁，开封印行礼，跪下不能自起，必须二人掖之方可。^⑦新按察使俊达（俊质翁）向署理按察使钟谦钧（钟云翁）接印时，日记记载“人如恒河沙”，道贺者既有许多官员及家人，又有许多轿夫，尚有办事人。天气酷热，官厅人气熏腾，竟不能进去。^⑧杜凤治四会接印后也曾任在日记中诉苦：“燥热异常，汗出如浆”。^⑨接印固然隆重，辛劳也一览无遗。

（二）交印。官员离职前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如钱粮、狱囚、案件、人事等事务的交接。正常情况下交印只是仪式，主要是协商好印信交接事宜。道光二年（1822），热河都统廉善因母患病奏请开缺回京侍亲，不待新任都统成德到署接印，便将都统印存贮库内，自带印钥返京，准备在路上迎到成德进行交接，被道光帝斥责：“设使前后任交代各员纷纷效尤，成何政体。廉善因母病奏准回京就医，原系朕格外施恩，俾得遂人子侍奉私情。乃不候交代遽行离任来京，全不以公事为重，实属胆大，廉善着交部议处。”^⑩这个案例中廉善被责惩并不是没有当面向新任官员交印，而是没有协商好印信交接事宜，没有上奏获准就擅自锁印回京。《杜凤治日记》的记述，有助理解晚清印信制度中的交印环节。

与以往朝代官印较小、由官员直接携带于身不同，清代印信较大，不适合携带，所以各衙职官都将其“存储公署”。从清代典制记载来看，虽交代印玺各处规矩不同，但大都是官员离任前将相关文书印结造册，上报有关衙署官吏，印信封存，无论前官署篆及府厅代掌，具于新官入境日委本州县贰佐同吏

①《杜凤治日记》第4册，第2043-2044页。

②《杜凤治日记》第4册，第2047页。

③《杜凤治日记》第6册，第2910页。

④《杜凤治日记》第2册，第824-825页。

⑤《杜凤治日记》第6册第2910页记载：“余事犹可，最忌（不吉日）接印履任，屡试屡验，如用此日履任，必不能久安于任，广东如蒋芑泉（蒋益澧）、李星衢（李福泰）、刘荫渠（刘长佑）三中丞皆是也。”笔者按：李福泰任广东巡抚约三年，不算很短，调任广西抚后不久去世。

⑥《杜凤治日记》第4册，第1604页。

⑦《杜凤治日记》第2册，第884页。

⑧《杜凤治日记》第6册，第2943页。

⑨《杜凤治日记》第2册，第466页。

⑩胡忠良主编：《清代公务印章图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4页。

房送至衙署供新官查验接印。^①从《杜凤治日记》来看，也是离职官员不向新任直接交印，而是双方商定好交印时间及相关事宜，如上文提及杜凤治与张琮确定二十五日为接印日期后，当日派人提前送到衙署，自己才动身离开。^②光绪六年（1879）杜凤治署理佛冈同知时患病，因担心病死在佛冈，于是上禀求退，没有禀请上司派人去接印，就把关防、公事图章交给官亲、幕客，委托司狱暂时处置公务，自己“登舟即开，驶如飞鸟”，^③回到省城才向上司请病假。上司乃调恒林署理佛冈。虽然清代官员如遇出缺、调动、罢免、丁忧等情况，其公务通常由下级代理（兼理），或平级代理（署理）、指定下级代理（护理），其印也暂由代理官员掌管，但是杜凤治擅离职守违反制度和惯例，为何没有受到惩罚而平安无事？日记没有说明，应是得到广东巡抚张兆栋、广东布政司杨庆麟的关照。

晚清各衙署前后任收支的分摊，以印信交接时间为界，由此出现不少争议和纠纷。衙署的很多开支要由州县官筹措，加上必不可少的向各级上司的馈送等，使广东州县每年开支至少要1万多两，而南海这种大县数额就更多。印信在谁手上谁就要负责承担这些开支，这是清朝几百年来的规矩。同治十三年（1874），杜凤治卸去南海知县，等待后任顺德知县张琮接印；而张琮则待始兴知县林灼三前往顺德接印；林灼三又待冯泰松前往始兴接印。如此连环交接，需四五月方可交接完成。杜凤治在日记中叫苦道：“南海每日需用，平匀计算约非二百余金不可，核之部、杂、捐摊各款，任此一日必用三百余金。以故予自开正至二月初十日截止，已用至七千余金，既不过年，进项萧条，迟至五月必将用至二万余金，其事尚堪问乎！”杜凤治遂请示布政使转禀总督、巡抚，作函并委牌专差限日驰至始兴，令林灼三即刻带印上省，就省中交印与冯泰松。林灼三迅赴顺德接印，则张琮可以上省与杜凤治办理接印。^④

清代县衙官印的配套设备主要有印箱（储放印章）、印钥（开启印箱）、印池（印泥盒）、印垫（盖印衬垫）、印架（放置印章）等，交印时必须要有这些物品。如杜凤治与广宁知县饶继惠交印时，由于饶继惠的行李未到，于是向杜凤治借用这些物品，以保障交印顺畅。^⑤

清代官员更迭时，印信的署理、护理、兼署是常态。乾隆二十七年（1762）广东巡抚托恩多离任时，没有将巡抚关防交同城的两广总督苏昌署理，而是交布政使护理。乾隆认为此“拘泥成例，于事理深属未协。向命巡抚遇有事故，将印信交与布政使护理，原为督不同省而言。若同省则督篆既可交巡抚兼摄，岂抚篆转不可令总督兼署，而必以布政使为重足倚恃乎？”从此规定：“嗣后凡督抚同省，遇有应行摄篆，非旦夕不可缓待者，均不得率交布政使护理”。^⑥《杜凤治日记》中记载了瑞麟不止一次兼署广东巡抚的情况。光绪元年（1875）两广总督英翰离任，广东巡抚张兆栋临时署理，接管英翰所掌两广总督关防及盐政印信；其时乡试刚结束，主考未出闱，学政关防亦在张兆栋手中；还有其所掌的广东巡抚关防和太平关监督印，则一人掌管五印，^⑦事权高度集中。

杜凤治在日记中除了对自己的“接印”和“交印”记载详细，对清廷中央重要人事变动也有记载，对广东官场更加关注。省级如两广总督瑞麟、英翰、刘坤一，广东巡抚蒋益澧、李福泰、刘长佑、张兆栋，布政使李福泰、郭祥瑞、王凯泰、邓廷楠、俊达、杨庆麟、觉罗成孚，按察使蒋超伯（署理）、梅启照、张瀛，盐运使钟谦钧，广东学政杜联、胡瑞澜、何廷谦、章鋈、吴宝恕；府级如广州知府梁采麟、冯端本，肇庆知府郭式昌、蒋立昂、五福、瑞昌等；县级如番禺知县彭君谷，南海知县徐赓陞，新会知县聂尔康，广宁知县曾灼光，东莞知县王炳文等人的动态都很关注。杜凤治虽然不可能出席和记载所有人的接交印仪式，但对“接印”及“交印”基本信息则多有记载。

① [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卷2《委任部·受印》，第5页；卷32《升迁部·交代》，第13页。

② 《杜凤治日记》第7册，第3319页。

③ 《杜凤治日记》第9册，第4996页。

④ 《杜凤治日记》第6册，第3262页。

⑤ 《杜凤治日记》第2册，第457页。

⑥ 胡忠良主编：《清代公务印章图说》，第184页。

⑦ 《杜凤治日记》第8册，第4161页。

二、封印与开印

为保障各级官吏的休假制度和政权顺利运转，清代实行封印与开印制度，^①给予官员一年内唯一的公休假期，营造官员与民同乐的和谐气氛，同时设有《预印空白》制度以不影响行政运作，《杜凤治日记》对这些制度也做了详尽记述。

（一）封印。清朝规定，官署衙门于每年十二月之十九、二十、二十一这三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吉时，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各省封印的顺序是，从最高一级的官员开始，到最低一级的官员结束。所有僚属都必须出席以见证长官的封印仪式。封印仪式的程序是：将印章放在举行封印仪式的大堂案台上，点起香烛，人们进行跪拜。封印完毕，燃放爆竹、鸣礼炮。当最高一级的官员结束了封印仪式，除了本衙门的属吏，其余人都分别赶赴所属的下一级衙门参加那里的仪式。如此逐级封印，参加仪式的人群越来越少，直到最低一级。仅举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二十日杜凤治参加两广总督瑞麟封印仪式的记载，其他不赘述。

已初即赴督轅伺候封印，凡封印由上封下，开印由下开上。京中行出文定午时。约交午初，中堂即出坐大堂，司道皆到，不站班，府、厅、县均站班，文东武西，请出四印箱。左二箱一为总督印，一为盐务印；印较巡抚印还小而色黑，相传谓盐政铁印，其然乎。右二箱一为巡抚印，一为太平关税务印也。中堂拜印毕加封，复升堂，我辈俱退，上手本禀贺，司道先行。照例司道封印，由首县派各州县往站班伺候，中堂处亦有派者，而不派者亦多到。向例首府、南海诣藩署，番禺诣臬署，理事厅诣粮署，广粮厅诣运署。两县及候补州县俟本府回署，共诣府伺候，俟其拜印毕，即挡请归封印，遂各回署自行封印，已午正四刻矣。典史、河厅亦来伺候，待伊等归封印，交未刻矣。^②

日记对杜凤治自己的封印仪式记载很少，光绪三年（1877）十二月二十日杜凤治任职罗定州，体弱多病，日记有如下记载：“本年二十日封篆，予正因感冒且生疮，不能举步，请假。予委捕衙代封，书吏言向例只须请印至大堂，铃用各红条固封收藏而已，不必请捕厅也。”^③

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二十日，杜凤治在封印期间接到谕令，要将羁押很久的两名罪犯正法。虽然是封印时期，但犯人早就审结定案判决，杜凤治于是改动日期，将办理日期改到封印日期之前，密令师爷和捕厅代办，提犯正法，却发现二犯中一人已病故。^④

（二）预印空白。清朝封印期间，如遇突发公务需要用印，预先多盖空白文件，用时写就文书即可，在下行文书空白印签上加盖“预印空白”戳记，上行文书则用“遵印空白”。

广州府的南海、番禺、香山、顺德、东莞、新会被称为广府六大县，在《东波塔档案》中保留有香山县诸多这类戳记文献，^⑤但是《杜凤治日记》中却没有任职州县使用预印空白的记载，仅有少量内容与其相关。杜凤治在南海知县任上经常处理“卖猪仔”出洋的案件，期间外国官员要求杜凤治在他们“合法”招工的护牌上盖印。因此事未获瑞麟指示，且送来的护牌有20多张未填写内容，杜凤治担心用印后外国人随意填写导致多招乱招，故向瑞麟报告：

洋人新立招工馆，要差人往各州县招工，明买猪仔，有二十四条，均如约准其招工，照会中堂允之，派齐、章二人承办其事，移文与予要护牌，上用印，并移文知会各州县。予以不得中堂文行，未知其事果否。且护牌送来用印有十三张，已填往招工人之姓名，二十余张是空白，且亦未见二十余条之条约，迟疑不发。洋人性急，不时到伊处索牌。予言必回明中堂方可行，中堂大以为然：“公事固宜慎重，洋务更甚。此件真为不得已允之，出去必多骚扰，不可不小心。若辈不怀好意，一味

① 又称为封篆、开篆，参见王日根、徐婧宜：《清代封印制度的经与权》，《历史研究》2021年第2期。

② 《杜凤治日记》第5册，第2305页。

③ 《杜凤治日记》第8册，第4316页。

④ 《杜凤治日记》第8册，第4318页。

⑤ 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年。

欺哄，真不易办。”子言空白不可发，又言：“牌上填明某人往某处，而牌文中又言往东江某州某县等处、西江某州某县等处，此层李湘浦看出。恐伊拿此牌各州县皆往骚扰，故请示。”中堂言：“空白必不可发，恐其随便填写，既定地名，牌文须改，如何凭空用印？”^①

从日记看，杜凤治宦粤十几年间，封印期间没有出现什么差错，可见杜凤治在协调官员休假与基层政权运转之间，还是比较成熟的。

（三）开印。每年十二月到第二年一月，清代各级衙署都“封印”停止公务，直至次年正月二十日前后，方行开印礼，于“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吉时，先行知照，朝服行礼，开印之后，则照常办事矣。”开印的顺序是，从最低一级的官员开始，到最高一级的官员结束。

开印对所有正印官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对有状要告或有案未断的民众来说也是如此。低级官员如县丞、巡检等开印时间很早，以便在清晨城门一打开时，就可入城参加上司的开印仪式。然后再随上司赶到更高一级的衙门，如此类推。越高级的衙门开印时人越多，越热闹，直到最后文武齐集到总督衙门。

各级官府的开印仪式大体相同，开印的大堂灯火通明，点满香烛。在正印官以及所有部属在场的情况下揭掉封条，取出印箱，放在大堂的案台上，然后正印官走到案前，行三跪九叩大礼。长吏双手捧起印匣，高举过头，躬下身，表达对正印官新年高升、衙门昌盛的祝愿。然后将大印从匣中取出，放在案上，正印官再次三跪九叩。最后在一张写着“开印大吉”的红纸上盖四个印，再将这张红纸贴在大堂的门上。各级官府开印仪式都要大放鞭炮。正月二十是衙门胥吏的盛大喜庆日子，午后和晚上要演戏庆贺，常常在晚上结束时还要放冲天的礼炮。《杜凤治日记》中记载的各次开印程序大致如此。^②

开印喜庆热闹，但是开印日期偶尔会与帝后忌辰重合，按照清朝制度不可有欢庆活动，对此如何处理日记中也有记载。杜凤治任职广宁和南海知县期间的开印，恰逢孝穆成皇后忌辰，日记中记载，向来是日开印不忌，^③即不必严格按照忌辰的规矩，允许有一定程度的喜庆和热闹。官员在开印仪式时着图案鲜艳的“吉服”，仪式结束后立即改穿色彩较单调的官服，不挂朝珠等。^④

清代公务印章的印色为红色，取其醒目而吉利。遇国丧，官衙机关悉用蓝色印鉴，这种情况在《杜凤治日记》中也有记载。光绪元年（1875）同治皇帝驾崩，署理罗定知州杜凤治在正月二十日日中记载，接到哀诏后按制度举行祭奠仪式，百日不剃发，公事用蓝印蓝笔。^⑤27天的祭拜期后，服装可穿青色袍褂，帽缀纓顶，办理公务恢复红印红笔，名帖亦用红纸，惟灯笼、门彩、铺垫、帏幔、轿伞等俱用蓝黑。皇后丧服典礼大略与皇帝丧礼同，而蓝印蓝笔仅用13日，^⑥体现严格的典制规定。

三、用印与监印

印信是清王朝权威的象征，是公文重要的信用凭证。君主以玉玺为权威信征，向臣僚和全国民众发布谕令；臣僚以印信为凭证，向上级禀报和进行平行机构文书传递；官员对下属的谕札等下行文书，以及对绅民的告示、谕单等也必须用印。清朝建立了一套安全准则和程序体系，限制官印的制作和分发，监督官印的使用和保存，保障了官僚体系的运作，但也有弊端与漏洞，这在《杜凤治日记》中多有记录。

（一）用印。清代各衙门都设有专门机构和专人管理印信，如六部设有掌印、帮印，或掌印上行走、帮印上行走、知印等，他们与主稿、帮主稿是印务的主要任事者。在县级衙门设有印房，执行保存、使用、审核分管程序。司吏将待钤印的公文逐条登记，将请印文书递送师爷行判。^⑦杜凤治身为清代州县的主官，需要审核并批准钤印的公文，书吏在监印官的监督下盖印，在印簿进行记录，并汇总为印册

①《杜凤治日记》第4册，第2202页。

②《杜凤治日记》第6册，第2778页。

③《杜凤治日记》第2册，第454页。

④《杜凤治日记》第5册，第2345页。

⑤《杜凤治日记》第7册，第3824页。

⑥《杜凤治日记》第7册，第3864页。

⑦胡忠良主编：《清代公务印章图说》，第180页。

存档。杜凤治在审查以往印簿记录时感叹，印串根底不胜其看，印簿流水尽可假造，我等何从清查，大是难事！只求十成中以三成或两成半就满足了。^①说明以往保留印簿之多。

《杜凤治日记》中多有记载委派亲信家人负责签稿、文书登记、核对、用印、传递等重要公务。如清朝规定田地、房产买卖征收产价的6.5%作为契税，绅民为避税往往不通过官府白契交易。但官员有时会大幅减低税率吸引买卖双方投税，州县官离任前一般都会这样做。绅民缴纳较低税金可使产业交易合法，因此愿意踊跃投税。由于投税的契据太多，所以需要动员多名官亲加班加点盖印。杜凤治第一次南海卸任前，几个最亲近的官亲连夜帮助用税契印，前后共收税契产价54万两。^②光绪三年（1877）杜凤治在南海下乡催征，因为催征期间有可能有发谕单、发告示等必须用印的公务，于是所带“门、印、跟、茶、号、三小、轿夫、执式、差头、壮勇将二百人”。^③

用印是重要并有利可图的职务，就算家人管印也不保险，例如杜凤治查得负责书禀签押的家人吴芳，时时外出与绅士交往，走漏公事风声，福寿寺僧人亦来他处侦探事宜，且闻有偷印空白之事，大堪痛恶，于是撤去用印，另派亲信李荣负责用印，^④反映了晚清官场滋生的弊端。

基层县衙事务繁多，用印不能间隔长久。^⑤同治六年（1867）杜凤治任职广宁时特别下谕印房，每日上下午用印两次，二梆后不准时时请印，如有万分紧要事件，禀请特发，否则不准，请亦不发，永以为例。^⑥除了严格的官府印信体系，杜凤治也很重视签字签押等中国传统社会民间的文书形式。审案是杜凤治的主要政务，日记中记录了数以百计详略不等的案例，如罗定州林胜扬与蒋光杰、蒋光俊兄弟争田案，罗定州彭球璋、吴天爵争坟山案，广宁罗亚水杀死三人案，四会湛郭氏因奸引发人命案，四会罗文来被控强奸侄媳案，罗定唐、梁两姓互控命案，南海县邱官之子与邓权惠上代钱债案，南海县潘仕成、潘铭勋诉讼案等。杜凤治审理案件时除了依据《大清律例》及官方颁布的判例，亦仔细查勘现场及证据，而司法文书印章是否周全亦是判断的重要依据。及至审理结束，他也非常重视印章画押等形式是否完整，如代人写结，均印手模，尽行到案画押、印模，如一名不到，即不准具结：缴推照无印，不可取信，令众人同下笔书押。所缴之契，如有涂销作为废纸等，体现签押者对契约文书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以及约束力的承认和责任。^⑦

清政府的官方印章分五种，即宝、印、关防、图记、条记。^⑧最低等的条记还有“条记”“铃记”“戳记”等名目，从日记看，杜凤治能够灵活使用戳记处理政务。初任广宁时，杜凤治奉督抚谕令绅士于紧要处所设局团练，令其缉匪、交匪。但士绅认为必须有知县的谕令，办团设局才具合法性。杜凤治出行时不便随身携带印信，所以随身带有事先印好的空白谕单，遇到合适的士绅即临时填上，但如何填写则由自己掌握。^⑨在主持乡试时，杜凤治“令众家人于各童卷上盖戳，无戳者卷不收。携卷私出者恐无戳不收，另私刻小戳仿样摹镌，亦查得姓名四人：陈殿照、陈传森、王应全、王承荃，拟于二覆案榜扣除七人名。此次放牌，子每次亲出头门坐看，有阁人者即拿之。三牌后坐许久，上轿回署以后所交之卷盖戳不阅。”^⑩这只是收发试卷的专用印，并非官印。清代公文必须盖有印信，如若因外出办事等原因未带印信，所拟

①《杜凤治日记》第3册，第1239页。

②《杜凤治日记》第7册，第3319页。

③《杜凤治日记》第9册，第4963页。

④《杜凤治日记》第1册，第166页。

⑤高级衙门用印时间间隔较久，如内务府每逢一、四、七日为用印日，如有用印事务提前报请，经总管批准后由轮值堂官取出印匣，从掌握印钥大臣处请到印钥，由值日堂主事、掌稿笔帖士等验明印匣封锁后，开匣取印，铃印完毕由值日堂主事、掌稿笔帖士等监视封锁，印匣由库使请回储库，印钥归还印钥大臣。同时将本日用印事由和用印数量开写印单，由内务府大臣查看后存记。参见胡忠良主编：《清代公务印章图说》，第184页。

⑥《杜凤治日记》第1册，第151页。

⑦参见邱捷：《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第4章《州县衙门的公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⑧《清会典》（光绪朝）卷35，第293-295页。

⑨《杜凤治日记》第4册，第2044-2046页。

⑩《杜凤治日记》第8册，第4369页。参见商衍鎤：《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

公文须就近向正印官借印加盖于上，日记中即有借印的多次记录。同治六年（1867），杜凤治首任广宁知县，初攥印把，经验不足，对士绅严厉催征钱粮，当地士绅乃向省级官员上控，后来还阻挠县考正常进行以示抗议。道台王澍亲到广宁处置，加派候补知府周毓桂、候补知县俞增光为委员到广宁查办，也有查办杜凤治之意。最后杜凤治虽然没有被处分，但被调离广宁，任职四会知县。^①期间周毓桂、俞增光向省级官员的禀文，还得向广宁知县杜凤治借印。同治八年（1869）杜凤治解四会任，在省城办理广宁、四会任上交代事务，相关文书则必须向番禺知县杨先荣借印，盖上印后才可以上禀。^②

方功惠（1829—1897），号柳桥，湖南巴陵人，瑞麟亲信，晚清著名藏书家，学识渊博，精于版本目录之学。杜凤治宦粤期间，两人互相欣赏、无话不谈，一起“手谈”（赌博）。上司因方功惠办理过多次乡试科场事务，委派他与福纶一同负责乡试科场事务。但文书是发给福纶、方功惠两个人的，权责不明。福纶能力有限，又懒得管事，导致其亲属和家丁胡作非为，于是上司把责任都压到方功惠头上。科场事务涉及大量采购、雇用、治安等事项，要与各文武衙署沟通协作，方功惠没有实职，故没有印信，而且福纶的亲属和家丁往往刁难，使公务延误。方功惠为有责无权烦恼，找杜凤治诉苦。于是两人会同广州知府一起找布政使，请求布政使再发一札给方功惠本人，明确方功惠是总办，而福纶是副手，并发给方功惠木质关防作为科场事务总办权力的凭据。^③但是临时关防只是在方功惠担任总办期间办理科场事务才有效，这是临时印信的典型案例。

（二）监印。清朝对印信的监督十分严格，规定各衙门均要在堂用印，监印官监印。而在地方，总督、巡抚、藩臬两司都有监印官，每用一印，其旁必加盖监印官衔名戳。州县衙门级别低，不能设立专门监印的官员，杜凤治于是委派亲属娄玉林（菊臣）等监督“家人”和书吏用印。^④南海典史席宝书（振千）调任东莞，但他不想离开省城，即请求杜凤治帮助谋求按察使监印职位。^⑤

监印者经常接触印信关防，涉及行政要务，与主官联系密切，易得主官信任，有更多机会获得优差美缺。如邓绍忠善于相面，预言广州将军瑞麟会荣升两广总督。没过多久瑞麟果然署理粤督，于是心存感激，特委任邓绍忠在督轅监印。瑞麟在邱与春督署监印多年后，将九江缺委任与他，以示奖励。^⑥

（三）流弊。官印是权力和威严的象征，被视为地方官员的命根子，向来供奉有加，不敢怠慢。然而《杜凤治日记》也显示个别基层官吏对印信的管理并非如此，甚至闹出笑话。

1. 官印重铸。杜凤治任四会知县时，属下南津司巡检龚葆球（榕门）求见，称接印后发现官印损坏，不敢接印，并将印带来呈看。杜凤治亲自检验，发现官印确实角上缺失一小块，旁有字号一边字迹已模糊，伤痕累累，遂传唤书吏询问，供称有前任巡检朱寿昌，将印作锤敲钉以故损伤。龚葆球要旧巡司出结方敢接印，杜凤治与幕客金玉墀（楚翹）商量，金玉墀认为官印正文并不损动，但用无妨。^⑦

纵观有清一代，改铸者不多，以添铸、换铸者为多。凡有旧印章字迹模糊等情况，经各部院或督抚奏准可铸发新印章，同时旧印仍旧使用，直至新印信到达启封。官员得到新印信后，即“去柱启封”，并上报启封年月日，由礼部存案。旧印章还需“该衙门于印面清汉印文正中，镌一缴字，呈送上司验看，封固送部。由部验明封储存司，汇齐销毁。”^⑧铸印的程序是：凡有新设衙门或印信改铸者，“有吏部、兵部会同礼部校正印模，拟定字样铸给。”^⑨凡有旧印章字迹模糊或丢失，由督抚、将军、各部院、内务府等机构奏准，“照原模字样发局，依限铸造”。其限期大致是，银印自从户部领到银两始，铜印自礼

①《杜凤治日记》第1册，第368、400、403页。

②《杜凤治日记》第3册，第1174、1177、1186、1187页。

③《杜凤治日记》第9册，第4427页。

④《杜凤治日记》第7册，第3384页。

⑤《杜凤治日记》第5册，第2368页。

⑥《杜凤治日记》第5册，第2242、2253页。

⑦《杜凤治日记》第2册，第838页。

⑧《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21（礼部三十二）。

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21（礼部三十二）。

部仪制司付局始，“银印，虎钮者限三十日，无虎钮者二十日。铜印、关防，柳叶、钟鼎、殳篆者二十日，其余悬针、垂露篆均限十日。”^①新印信铸完后留有四角的“柱”（铸造之时，四角各留一柱，俟赉到，本官截磨开用），留待启封。礼部也需将新印信当堂验看并封存，等候各衙门请领。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仅仅是铸印的时间，从禀请督抚、部院，到上奏，到奏准开铸再到下发（地方紧要部门从接到部文到请领的时间限定是四个月）可能需时一两年。即使官衙小吏的条记等，也要由地方布政使负责指定刻字铺镌刻颁发。由于换印手续繁杂，耗时长久，使得杜凤治与幕客都不愿更换巡检印。

2. 官印失得。印信是公文体系的权威证明，丢失印信会受到严厉的惩处。若在京各衙门印信失窃，专职监守官员会被革职，印官革职留任；遇水火之灾毁失，监守官员革职留任，印官降三级。外省各官印信在署或在行寓丢失，印官革职，五日内自行查拿究办。公差外出丢失，员弁革职留任，本官降三级。^②嘉庆二十五年（1820），兵部行在印失窃，道光二十二年（1842），吉林将军印被盗，相关人员均被处罚。同治二年（1863），山东陵县知县谢际亨带兵出城迎战捻军，将县印交弟谢遇亨看守。后来谢遇亨战中阵亡，所携官印因而遗失。朝廷认为谢际亨应随身携带印信，而谢遇亨也不应带印出战，最终将谢际亨革职。^③除了太平天国时期大批官印丢失于战火之中，清朝官员极少发生印信丢失的情况，或者说极少留下印信丢失的记录。《杜凤治日记》中没有丢失官印的记载，但有几例险些丢失官印的案件。

同治十年（1871）十月，杜凤治第一次任南海知县时，有盗贼二三十人，半夜明火持械入巡检署抢劫，把巡检李腾骧（雨村）一家财物抢劫一空，并搜得印箱，见是官印，遂弃之而去，致官印未失。巡检本有缉捕之责，巡检署竟被盗贼抢劫，故不便禀报上司。杜凤治同广州知府商量把巡检署遭劫改报为“因窃失物”，为李腾骧保全了面子，使其免受严重处分。日记中记载：此等事在他省则为惊天动地之事，而在广省则往往有之，自予莅省已非一见，上游亦不以为奇。^④这批盗贼看来是小贼，不想把事情闹大。如果把官印抢走或损毁，就成为大案要案，官府必全力查缉，盗贼被捕后也必然死罪。如果是大盗，就有可能抢走官印勒索。日记还记载了鹤山县发生的一个抢劫案，学案教官被抢劫一空，印亦抢去。教官再三与贼言此不值钱物，得之无用，贼乃掷还之，幸柄不断。^⑤看来也是同样道理。

同治十三年（1874），灵山县百姓因知县冯询（咨周）贪虐，遂烧毁了县衙大堂，仓、狱皆失，并抢走官印。冯询逾垣逃逸，数日不见。知府张炳炎认为灵山县不可无官无印，遂委颁张亮甫携带木质关防前往代理。说明一旦官印遗失，马上会颁发临时木制官印。而冯询则以2000余元将官印赎归，仍入灵山视事，并称：“我本无事，不过饥民滋闹，印亦未失，我一灵山令耳，予来胡为者。”^⑥不久两广总督瑞麟质问冯询丢印之事，冯询则狡辩将印藏在阴沟无失，瑞麟颇有怒意，大声申饬。杜凤治在日记中感慨：你之失印，通国皆知，千金买回，何人不知？何人不言？尚思执此狡辩，以为执言印不失，上司亦无法办我。不知事之真伪自有公论，欲以一口解众论？一县两官，与府互禀互揭，种种纰缪，自谓咬定印在阴沟未失，冀得瓦全，得乎？自以为智，实愚甚矣！^⑦

3. 假印之弊。清代公务印章管理制度十分严格，凡金属印信关防的颁铸立项，文职由吏部代请，武职由兵部代请，然后统一由内阁、翰林院画篆，礼部统一铸造颁发。即使官衙小吏的条记等，也要由地方布政使负责指定刻字铺镌刻颁发。“凡盗各衙门印信者，不分首从，皆斩监候。又伪造印信、时宪书、条例云钦给关防与印信同。盗关防印记者皆杖一百，刺字”。^⑧

①《清会典》（光绪朝）卷35，第296页。

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21（礼部三十二）。

③胡忠良主编：《清代公务印章图说》，第111、183-184、190页。

④《杜凤治日记》第5册，第2219页。

⑤《杜凤治日记》第4册，第1912页。

⑥《杜凤治日记》第5册，第2521页。

⑦《杜凤治日记》第5册，第2588页。

⑧《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21（礼部三十二）。

清代只存在应急的“假印”制度，即在正式的官印外，还存在着另外一枚复制印。如新任外交官出国赴任，乘船需时近一个月，途经各地各国海关需行使职权，而正式铜关防还在国外已解任官的手里，于是便领刻另外一方木印，供赴任者途中使用。新官到任后，卸任者将正式铜印与继任者的临时木印进行交换，回国沿途使用木印，返国后缴还。^①

私刻官印是对权力的公然挑衅，明清以来私刻官印案件屡见不鲜。明代经济发达的江南频繁出现伪造官府印信“诈伪”现象，从事“诈伪”者既有卫所军人与州县民人，也有衙署胥吏，还有社会游民，他们均了解王朝法律及其运作程序，也掌握一定的刻写印信技巧，而有时官员也参与其中。^②清朝涉案金额最大、牵涉人数最多、时间跨度最长的，当数嘉庆十一年（1806）案发的直隶司书王丽南私刻假印案。此外在嘉道统治时期的55年里，清廷共发生私刻官印案件18起，案发地点包括京师和直隶，也涉及山东、河南、湖北、云贵、四川、蒙古、安徽、广西和江苏；既包括套取钱粮的经济案件，也包括伪造圣旨、伤兵回籍、乡试作弊、勒索陷害、起意谋反等案件。^③而《杜凤治日记》中也记载了晚清广东的假印案例。杜凤治任职南海县时，在同治十年（1871）正月封印期间，有一次他正在宴请师爷、上房、账房等文员，突然接到广州知府丁浩（松亭）密令，令其速带差役30名与游击黄龙韬会合，查处吴亮泰假印案件。吴亮泰曾从广西巡抚刘长佑，有人揭发其招摇撞骗，刘长佑逐之不用。吴亮泰回到广州后专作假印、假照、假札等事。杜凤治在其家中查获广西巡抚假印一枚、假札三件、假照十余件。^④审讯时吴亮泰又供出并拿到同犯吴晴波，搜得假印、假照多件。供印系黄省斋之妻吴氏手镌，即擒拿黄省斋，但他已逃跑，其妻亦不见。^⑤

光绪二年（1876），安徽婺源人汪均冒充兵部主事、戊辰进士、奉尚书沈中堂遣往云南全省军务，骗取广东粮道金护牌，由南海县发溜信，即给予因公出差的官员请求沿途各州县予以协助的公函，一路招摇撞骗，而沿途州县给发夫马、船只、酒席，并致送程仪不菲，到南宁时被杜凤治的好友左江道员周星誉识破。周星誉为免牵连金国琛、杜凤治，命将汪均解送给杜凤治相机处置。杜凤治禀见金国琛，并打算禀报按察使严惩。该事件中护牌虽非伪造而是骗取，但令杜凤治由此警觉，严申属下查究空白印信，盖预印空白、乱用印信皆降一级调用，且系私罪。^⑥

假印泛滥的另一领域是捐纳职衔。《杜凤治日记》记载，在晚清社会，“绅”的概念已经不限于“缙绅”，所有拥有功名、职衔者，即使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补缺任职，但都被官员、民众视为“绅”，他们自我认同的身份也是“绅”。捐纳职衔的门槛本来就低，据说“四两银可买一从九职衔”，且假印照多。^⑦以当时的档案管理水平和技术条件，不可能一一检验数量巨大的低层官衙印照的真伪，即使对某个绅士的身份有所怀疑，但除非涉及官司，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去查核。乡镇的“绅”当中肯定有不少是假冒的，他们本人也未必清楚自己的士绅身份是真是假，有可能在捐纳或购买印照时即已被骗。

杜凤治宦粤期间，当了两广总督瑞麟8年下属，且有几年为首县南海知县，经常谒见瑞麟，瑞麟对杜凤治也很赏识。日记中杜凤治对瑞麟有不少感激、钦佩的文字，但又毫不隐讳瑞麟的负面事实及评论。如记载瑞麟有一个十几岁瘫痪的儿子为“疯子”，不能行走和言语，终日男女数人负之，无日不出外游玩，广东布政使俊达待如上宾，每到必赏十余元，下人皆有沾润，故喜常往布政使官署。有一日去时正钐印公文，“疯子”必要布政使官印玩耍，令俊达大窘，无奈之下，只好令人照样以点铜（铜锡合金）制作一

① 胡忠良主编：《清代公务印章图说》，第17页。

② 刘正刚：《明成化时期江南“诈伪”现象探析——以条例为中心》，《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

③ 倪玉平：《“文书治国”还是“书吏治国”？清嘉庆朝王丽南私雕官印案研究》，《南国学术》2019年第4期。

④ 《杜凤治日记》第5册，第2305-2306页。

⑤ 《杜凤治日记》第5册，第2387页。

⑥ 《杜凤治日记》第9册，第4826-4828页。

⑦ 《杜凤治日记》第5册，第2386页。

枚布政使假印给他方善罢甘休。^①当然这不是假印只是玩具，不会在形制印文等方面与真印相同，只是日记记载的一则趣闻。

四、官员私印

明清以来私印流行，文人政客多喜用印藏印，《杜凤治日记》封面及内页加盖的数十枚大小不等私印，成为杜凤治身份、经历、精神境界、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②

（一）私印分布。《杜凤治日记》始于同治五年（1866），终至光绪八年（1882），共42本，除了第2本日记缺失，第40本日记封面题署《有余不尽室日记》没有印章外，其余日记封面都盖有大小、多少不等的私印，第22本日记封面题署《南海县衙日记》，盖有12枚印章，是印章最多的一本日记。第1本《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和第41本《闲居日记》各盖有一枚藏书印章“张篁溪先生遗存”。此外，每本日记内页也多处盖有杜凤治私印。

（二）私印特点。身为州县官的杜凤治还有文人钟情印学的一面，个人拥有数十枚不同篆字印章，日记中称为“小印”。规制上有长方形、正方形、椭圆形之分；印章印文有不同变体，同样印文的印章还有大中小之分。反映杜凤治祖籍祖缘的印章有“望凫行馆”“凫公手书”。杜凤治祖籍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长塘，父母坟墓所在地称为“栖凫”，“望凫行馆”之名由此而来，^③成为第1本日记《望凫行馆宦粤日记》的题署，几乎出现在每本日记封面之上，体现了杜凤治浓厚的家乡观念。

反映杜凤治身份的印章最多。杜凤治榜名“人凤”，字“平叔”，号“五楼”“后山”“屋山”“屋三”，都一一入印，“杜凤治印”“臣杜凤治”“后山”“城南后山”“五楼又号后山”“人凤”“屋山”“屋三”“平叔氏”等，几乎出现在每本日记封面之上。杜凤治要处理繁杂的公务，“日日奔走，公事山积，日事酬应，夜间每阅至三四更，往往五更，黎明即出署有事，亦未尝一言告劳”。^④虽然公务繁忙，但杜凤治十几年间坚持写日记，几千字一气呵成，积累下了几百万字详尽的日记。日记对公务记录得很详细，既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以及亲身经历的平实记录，同时还有大量对上司、同僚、下属甚至亲朋好友刻薄的评论及若干个人隐私，这说明杜凤治并不打算将日记示人，只是记录真实的自我，以此宣泄情绪。而在封面上加盖身份私章，更有盖章论定的含义。

《杜凤治日记》多次出现“短缘四六七”“迟我廿年”“商哉一个生”“先劳无仙”（长方形、正方形和椭圆形）等印章，都与杜凤治一生坎坷经历和复杂心境有关。杜凤治曾与友人在信中哀叹坎坷的一生：28岁丧母，34岁丧父；妹妹10岁夭折，同胞姊、兄、弟均在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攻入家乡绍兴时期亡逝；前后三任妻子病亡。在京谋官、做幕客时伙食很差，使他不食无法养命，食之难以下咽。连蚊帐、席子都买不起，子、媳要用一个被囊带着孙子睡觉。所生四子五女仅存二子二女。杜凤治进入仕途时已53岁，到任后始知广东70余州县中十有九累，一经接印竟有终身挂碍不克清厘者，肇郡属下惟一广宁无累，潮郡无一不累，下数府更无论，宦海险恶，洵可危也。^⑤他曾一度哀叹：“何苦如此？所为何来？若回头有路，三百水田，决不干这九幽十八地狱营生也！”^⑥“天下宦途险恶未有如广省者，念及此实为寒心。既入网罗，何日得摆脱离此苦海也！”^⑦杜凤治在四会任上抄录了《陶唐莲花寺记》所记本地北宋时期的“大师”阮子郁与莲花寺大鉴禅师讨论佛法时所说的“平生修得成明镜，不受人间半点尘”。^⑧杜凤治在四会知县任上可谓宦途的艰难黑暗时期，抄录这段话，反映了他对脱离“苦海”的向往。“商

①《杜凤治日记》第6册，第3107页。

②感谢广东嘉应学院政法学院曾旭博士在印玺学领域提供了专业指导，得以识读杜凤治诸多模糊的私章印文。

③邱捷：《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第34页。

④《杜凤治日记》第9册，第5008页。

⑤《杜凤治日记》第1册，第86页。

⑥《杜凤治日记》第2册，第558页。

⑦《杜凤治日记》第3册，第1119页。

⑧《杜凤治日记》第2册，第614页。

哉一个生”之印，即杜凤治闻兄弟姊妻之死而作，^①因此有这些人生感叹的印章就不足为奇了。

（三）私印与交游。杜凤治善于精打细算，当州县官十几年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产。对家乡的宗祠、祖祠、祖墓的维修祭祀他都非常重视，为此从宦囊付出不少。杜凤治对子女、孙辈、媳婿、侄甥等亦关照有加，除自己家庭、杜氏家族外，他对舅族以及前妻、妻子家族亦经常予以接济，印章成为杜凤治财务管理的有效手段，日记中记载：

子侄辈不知艰难，妄支钱文，或作衣或置物，此后必领告予知道，如必不可少者，予亦不忍却之，有予亲笔手条盖用看稿图章方可付与。或予不在家，亦要内子手条，盖用图记始付，将条留存备查，如或私付，予五日至帐房一查帐，一文不认，吾等自行赔贴弥补。^②

杜凤治日记中也有印学的记载，如称道台沈映铃随员县丞孙应霖（子珊）晚年潦倒，杜凤治致信同年余恩鏊（镜波）请其救济孙应霖，余恩鏊复信说会尽力，但又说自己的宦囊一半已用于买画，广东盐运使方濬颐（子箴）曾转赠他小印一方，上镌“官为买画穷”，所以只能资助孙应霖 50 元。^③三水县处于西江、北江交界，是上司赴任必经之地，各种送往迎来支出很多，导致三水成为著名累缺。同治十二年（1873），三水知县蔡忠沼到任几个月就亏欠八九千金。清朝规定，州县官亏累未清理，即使去职也不准离开任职省份回乡，本人死后还会继续向子孙追责。为此蔡忠沼刻了一枚“从今长作岭南人”印章，担心因亏累本人及子孙都会长留广东不能归乡。后来蔡忠沼没等到调剂优缺的机会就病故了，杜凤治担心他死后会“抄家追款，子孙拖累，颠沛流离”。^④

总之，杜凤治将诸多私印衿于日记之上，内容丰富，形态各异，借印寄情，表达了其心志、情感或雅趣，是内心世界的外溢。日记中记载的他人私印内容，也成为一种独特的“官场现形记”。

（四）藏书印。《杜凤治日记》第 1 册及第 41 册封面各盖有一枚藏书印章，印文“张篁溪先生遗存”。张篁溪先生即张伯桢（1877—1946），字子干，号沧海，又号篁溪，东莞篁村胜和村人。近代著名学者，藏书家。^⑤著有《张篁溪遗稿》《南海先生全书》《南海康先生传》《焚余草》《篁溪笔记》等，刊刻《沧海丛书》1 到 5 辑，广收乡贤袁崇焕、张家玉等的文学史料，有《袁督师遗集》《袁督师配祀关岳议》等，又创办《正风半月刊》，刊登考证北京历史的文章，还有大量诗词、文稿等手记，这些著作对研究民国的历史具有较高的价值。杜凤治日记何时被张伯桢收藏、何时转藏中山大学历史系不得而知。“张篁溪先生遗存”藏书印是追溯岭南文献流传聚散的线索和凭据，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

与汉语文字象形表意特性相关、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经过长期演进所形成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文章合一（即文字内容与印章形式相结合）的印信体系，呈现出“文本性”与“权威性”的特点。文为政本，章为政魂；文助政实，章昭政威；二者相得益彰，成为国家治理、社会运行和个人生活的核心要素。《杜凤治日记》是州县印官从政宗旨和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研读其日记，从识字到识人，从识人到识心，文如其人，章如其心，是研究杜凤治和晚清广东官场政治文化的重要参考。

责任编辑：郭秀文

①《杜凤治日记》第 2 册，第 871 页。

②《杜凤治日记》第 2 册，第 475-476 页。

③《杜凤治日记》第 4 册，第 1834 页。

④《杜凤治日记》第 9 册，第 4460-4461 页。

⑤《杜凤治日记》第 1 册《前言》，第 1 页。

“自我史”初探^{*}

陈茂华

【摘要】“自我史”这一术语来自法国著名学者诺拉发起并主编的《自我史论文集》，最初特指战后法国7位著名历史学家以自我反思的方式书写的个人史，旨在重新发现历史学家的主体性。从目前一些英语国家和意大利已有一定出版数量的“自我史”文本来看，“自我史”融合了三个不同层次的历史：历史学家亲历亲感的个人生活史、历史学家所见所思的社会—时代变迁史，以及历史学家所选所为的个人从业史。从叙述策略来看，一方面以作为个人的自我为主题，通过叙述个人生活经历和社会—时代的互动关系，建构个人主体性的历史；另一方面则以作为历史学家的自我为主题，通过叙述以史学为业的个人学术经历，探讨历史学家主观性的效用。

【关键词】自我史 自我反思 主体性 元自传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2)12-0145-09

一、何谓“自我史”

“自我史”(Ego-Histoire)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学术编辑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20世纪80年代发明的一个术语，最初特指战后法国7位著名历史学家以自我反思的方式书写的个人史，旨在重新发现历史学家的主体性。这7位历史学家及其自我史文本分别是：莫里斯·阿居隆(Maurice Agulhon)书写的《从幕后看问题》(Vu des coulisses)、皮埃尔·肖努(Pierre Chaunu)书写的《死亡之子》(Le fils de la morte)、乔治·杜比(Georges Duby)书写的《历史学家的乐趣》(Le plaisir de l'historien)、拉乌尔·吉拉德(Raoul Girardet)书写的《战争的阴影》(L'ombre de la guerre)、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书写的《历史的胃口》(L'appétit de l'histoire)、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t)书写的《时代氛围》(L'air du temps)及勒内·雷蒙(René Rémond)书写的《当代的当代人》(Le contemporain du contemporain)。^①这7篇自我史论文主要围绕“我是如何成为一名历史学家的”这个议题，在回忆中反思了20世纪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抵抗运动和阿尔及利亚战争)、法国教育体制及年鉴学派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7位历史学家的职业选择及研究活动，以及他们在历史学领域如何在“叙事史的复兴”影响下反思布罗代尔倡导的总体史和长时段理论。1987年，诺拉将这7篇采取第一人称自我反思叙述方式书写的个人史集结为《自我史论文集》(Essais d'ego-histoire)，由他曾经担任编辑的伽利玛出版社(Éditions Gallimard)出版，标志着“自我史”概念正式出现。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方新传记史学研究”(17BSS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茂华，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副教授(上海，201210)。

^① 在此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崇明教授提供的Essais d'Ego-Histoire一书，感谢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艳红和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助理教授刘禹汐提供的法文翻译。

从 Ego-Histoire 的构成形式和字面意思看,“自我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自传”(autobiography)或“回忆录”(memoir)。在现代西方文化语境中,“Ego”不仅仅指的是对自身价值的确信,通常还指当下的自己所拥有的优越感和确定感,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指对自身价值及其确信的反思,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强调内省自我反思。为了与传统意义上的自传及其“对手”^① 米歇尔·维诺克(Michel Winock)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主持的法国史学家自传访谈进行明确区分,诺拉抱着一种试验的心态,鼓励法国历史学家采取自我反思的个人史书写方式,以探讨历史学的主体性问题为目标,构建一种新型的历史学。“自我史,历史意识新时期的一种新类型”。^② 需要强调的是,诺拉提及的“历史意识新时期”有着特定的指向。从根本上说,这是诺拉针对 70 年代法国“主体的回归”的智识氛围,即不同群体看待传统及历史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而提出的。在这一时期,“法国的社会关系和公共领域的轮廓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新的群体或新的实体……都以一种新方式要求在公共空间中获得一席之地……还有……对过去的重新理解,对某种特别的历史的把握,这种历史被视为具有个别性,它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如民族史。此后,人们所关心的更多的是记忆,或者说话的传统,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因为传统的历史遮盖了某种历史行动者扮演的特殊角色。”^③ 这种现象说明“从记忆传统演变而来的历史是如何演变成社会对自身的认识的”这个问题急需解决。为此,诺拉从“相当广义的”史学史(historiographiques)的方法论角度提出,有必要“对不同时代的各种历史撰述和记忆呈现作更为全面的剖析”。“这种史学史不是对史家、流派的分析,而是在民族历史的框架中,以理性的批判眼光对法国人接受的全部传统进行分析,因此这是一种相当广义的史学史。”^④ 诺拉指出,法国社会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了“记忆危机”,在历史学领域,新社会史的兴起意味着“历史学开始反省自身”,“历史学已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认识论阶段”,未来“历史学或许会更更多地注意力转移到个别记忆上,也会将自己转变为有关过去心态的实验室……(因为)对每个群体来说,从记忆向历史的过渡,使得它们必须通过复兴自己的历史来重新确定自己的身份。记忆的责任使得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⑤ 这种将当下与记忆结合在一起的当下主义视角,表明把每个个体或群体为了自身的现实目的而产生阐释历史的意识——记忆的责任——视为历史意识。故此,他一边组织众多法国学者以“全新的”身份——“只是阐释者和中间人”——参与“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书写计划,一边提出“历史学家可以尝试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的主张,要以阐明“自己研究的历史与塑造自己的历史之间的关联”为己任,从而开启了一场“实验室里的试验”(tentative de laboratoire)——“自我史”书写计划。^⑥ 此外,诺拉这里所说的“历史意识新时期”,还指因后现代主义理论对职业历史学的核心概念——客观性——的冲击而引发的 80 年代“历史学危机”,即福柯所断言的“历史学的终结”。^⑦ 自 70 年代开始,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取代了分析的历史哲学,促使历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解释策略为核心的后现代的叙事主义理论

① 这里的“对手”一词,主要指的是他们二人分别供职于法国两个知名出版社,并且都擅长组织历史学术活动,他们在争取历史学家人力资源方面有某种竞争关系。维诺克是塞伊出版社(Les Editions du Seuil)的知名编辑,在他的推动下,年鉴学派第三代史学家菲利普·阿里埃斯(Philippe Aries)和勒华拉杜里的自传文本分别于 1980、1982 年出版。

② Pierre Nora, “Introduction” from *Essais d'Ego-Histoire*, Translated by Stephen Muecke, *Ngapartji Ngapartji: In turn, in turn: Ego-histoire, Europe and Indigenous Australia*, Edited by: Vanessa Castejon, Anna Cole, Oliver Haag, Karen Hughes, Australia: ANU Press, 2014, p.22.

③ Christian Delacroix et al., *Les courants historiques en France, XIXe-XXe siècle*, pp.564-565. 转引自黄艳红:《“记忆之场”与皮埃尔·诺拉的法国史书写》,《历史研究》2017 年第 6 期。

④ 黄艳红:《“记忆之场”与皮埃尔·诺拉的法国史书写》,《历史研究》2017 年第 6 期。

⑤ [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 [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10、11、16-17 页。

⑥ Pierre Nora, “Introduction” from *Essais d'Ego-Histoire*, Translated by Stephen Muecke, *Ngapartji Ngapartji: In turn, in turn: Ego-histoire, Europe and Indigenous Australia*, Edited by: Vanessa Castejon, Anna Cole, Oliver Haag, Karen Hughes, p.21.

⑦ [美]恩斯特·布赖萨赫:《西方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第 3 版),黄艳红、徐翀、吴延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556 页。

为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所接受和青睐。尤其是海登·怀特书写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973）对“言说与关于言说的言说”所做的区分，使许多历史学家越来越渴望“褒扬主体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历史实在和历史学家的伦理和政治价值观常常如此地相互趋近，从而事实上是不可区分的。”^① 为了进一步摆脱科学—客观主义史学的桎梏，已有部分历史学家运用以福柯、德里达和利奥塔为代表的法国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和阐发的一些后结构主义概念作为历史认识的工具，并且在此基础上对书写自己的个人史产生了新的兴趣。例如，1977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泰勒（A. J. P. Taylor）应《近代史》（*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之邀，书写了自历史学职业化以来便被同行贬称为“私生子”的自传。1983年，泰勒在该论文的基础上，围绕个人生活与学术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反思性地书写了《个人史》（*A Personal History*）一书。他在书中指出，人要通过反思才能发现真正的自我，进而实现对人类社会演变规律的认知。

作为记忆研究的开创者之一，诺拉强调个人的记忆是回顾性地建构起来的，这实质上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叙事主义的史学理论，理解了历史描述与历史表现之间的根本区别，认识到“自我史”的产生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主体性问题日益关注的学术氛围，同时也与当下主义的视角密不可分。“它发端于两个重要进展的十字路口，其一是历史学的客观性经典根基开始遭到逐渐削弱，其二是历史学的眼光开始聚焦于当下。”^② 故此，《自我史论文集》一经出版，“Ego-Histoire”这个术语就不胫而走，掀起了法国之外的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自我史”书写的热潮，大有“墙内开花墙外香”之势，而且这股热潮至今仍未消退。从目前一些英语国家及意大利已有一定出版数量的“自我史”文本来看，虽然不同国家间因智识传统而存在些许差异，但总体而言，“自我史”书写融合了三个不同层次的历史：历史学家亲历亲感的个人生活史、历史学家所见所思的社会—时代变迁史，以及历史学家所选所为的个人从业史。从叙述策略来看，一方面以作为个人的自我为主题，通过叙述个人生活经历和社会—时代的互动关系，建构个人主体性的历史；另一方面则以作为历史学家的自我为主题，通过叙述以史学为业的个人学术经历，探讨历史学家主观性的效用。

二、作为个人的自我

据诺拉所述，他在拟定“自我史”书写计划后就立即给许多法国知名历史学家发出邀约，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历史学家都拒绝了，最终只有勒高夫等7位出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学家如期完成了写作。他们“把自己视作国族认同的阐释者和宗教司仪”，^③ 着重反思了法国教育体制（特别是高等教育体制）和以史学为业的个人经历，而对个人生活经历和1940—1962年间法国政治剧变的叙述则相对粗略。就此而言，作为个人的自我似乎被隐匿了，只有在他们论及各自的学术训练和历史研究主题时才隐约可见。这不能不说是法国早期自我史书写的缺憾。庆幸的是，这个缺憾在稍后出版的法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专家安妮·克里格尔（Annie Kriegel）的自我史书写中得以弥补。

事实上，克里格尔当初也是诺拉“自我史”书写计划邀约名单上的一员，同时也是出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著名女性历史学家。但因她的论文篇幅过长，且无法赶上编辑出版的日期，故没有出现在《自我史论文集》中。她撰写的《我的理解》（*Ce que j'ai cru comprendre*），在叙述形式和内容上，将个人生活史、20世纪社会—时代变迁史及历史学职业史融为一个整体。透过她的自我史文本，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她一边小心翼翼地与自己的生活经历确立一种批判的距离，把自我视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一边确保自己的个人记忆能够被完整地记录下来。在回忆自孩童记事起的生活经历时，主要是批判性地叙述了她与父母的关系。作为一名犹太女性，她在20世纪40年代参加法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抵抗

① [荷兰] F. R. 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3页。

② Pierre Nora, “Introduction” from *Essais d'Ego-Histoire*, Translated by Stephen Muecke, *Ngapartji Ngapartji: In turn, in turn: Ego-histoire, Europe and Indigenous Australia*, Edited by: Vanessa Castejon, Anna Cole, Oliver Haag, Karen Hughes, p.21.

③ Richard Vinet, “The Poisoned Madeleine: The Autobiographical Turn in Historical Writ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46, no.3, 2011, p.542.

运动、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以及1956年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直接导致她退党，其后支持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那段人生经历，认为这一切对后来她选择历史学作为职业以及选择法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作为研究主题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是一个以反思性回忆形式实现自我认知，进而构建自我身份（共产主义者）的过程。对于她本人后来的婚姻、孩子及家庭生活，克里格尔则只字未提。显然，在克里格尔的心目中，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经历对她的历史学职业生涯来说意义非凡。透过克里格尔对其个人生活经历和社会—时代变迁的反思性叙述，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她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释。克里格尔不仅清晰地叙述了她所生活的社会和时代对其政治担当、道德信念和历史观的塑造，以及她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选择和接受，而且还叙述了她本人在当下对这二者关系的历史性反思。这种自我反思的主体性叙述逻辑，既是“历史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另外一种表述方式，即把自我理解为一种历史性存在，又是个人主体性的历史的展现，即个人是如何以未来主义的视角理解历史的。用史学理论的话语来表达，这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将自我语境化的一种方式，即通过自我反思，把来自自身社会的个体化经验和记忆转化为历史。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克里格尔的自我史书写展现了其历史介入（historical intervention）中存在着的一些被隐藏起来的表述行为因素，被她从外部的立场转化为对情势的严肃分析，“但这实际上是一个自我表现和解放的过程”。^①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评价同样适用于意大利左派历史学家路易莎·帕萨里（Luisa Passeri）的自我史书写。在美国名校接受历史学专业训练的帕萨里坚信关于某些重要时刻的记忆创造了个人自身的历史，因而在她书写的《一代人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Generation: Italy, 1968*）中，作为个体的自我以复数的形式出现。该书以包含反思她本人历史研究的日记和针对经历了1968年政治激进的那一代意大利人而展开的口述课题为基础，通过重建他们被客体化了的记忆，阐释政治介入的过去与身份认同的当下之间的关系，从而探究一代人的自我意识模式。“那些今天在政治上依然活跃的人，通过在他们的自我叙述中推断融为一体的接受与拒绝承认之含义，由此重塑他们的政治定位和意识。”^②美国女性史研究先驱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同样强调自我史应该以解释自我意识模式为目标：作为“一位富有创造力的书写者”，重要的是解释自己对曾经走过的道路、生活的世界，以及在生活世界中所做出的选择——介入激进的政治——的所感所思，从而追求一种诚实的人生、意识清醒的人生。^③英国华威大学历史系教授卡罗琳·斯蒂德曼（Carolyn Steedman）则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把这种以建构或阐释主体性的历史为目标、采取自我反思方式的个人史书写称为元自传（meta-autobiographical）。^④她本人早在80年代初计划以“内省性”的分析方法书写自传时，就开始有意识地避开传统的自传文体，尝试在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及学术话语之间的对话中展现主体性的存在及其产生历史知识的可能性，以重建她本人作为个人、作为历史学家的自我为旨趣。

1986年，斯蒂德曼出版了体现元自传理论自我史著作——《好女人的风景》（*Landscape for a Good Woman: A Story of Two Lives*）。她在书中明确提出：“我认为共同体潜在的各种可能性均由历史意识提供，我想把我的书写称作历史，而非自传。”^⑤在讲述属于个人的生活史和社会—时代变迁史时，斯蒂德曼反思了她母亲和本人在资本主义结构及其社会关系的处境和位置——阶级意识和性别意识将女性置于社会边缘，以及她们做出的种种反抗行动，强调19世纪中期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及其文化塑造了作为个人的自我，而作为女性的个人，不得不适时调整自己的意愿或欲望，尽可能彰显存在主义意义

① Jaume Aurell, “Autobiographical Texts as Historiographical Sources: Rereading Fernand Braudel and Annie Kriegel”, *Biography*, vol.29, no.3, Summer 2006, p.441.

② Luisa Passerini, *Autobiography of a Generation: Italy, 1968*, Translated by Lisa Erdberg,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30.

③ Gerda Lerner, *Fireweed: A Political Autobiography*, “Introduction”,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3.

④ Carolyn Steedman, “History and Autobiography: Different Pasts”, in Steedman, *Past Tenses: Essays on Writing, Autobiography and History*, London: Rivers Oram Press, 1992, p.50.

⑤ Carolyn Steedman, *Landscape for a Good Woman: A Story of Two Lives*,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5.

上的主体性。在斯蒂德曼看来,解释即意味着反思和建构。她真正在意的是对往昔个人经历的理解,即回忆、再现和解释它们的方式。“因此,这是一本关于解释的书……是为我们自己而书写的历史,是我们所理解的那些经历的社会特性……关键在于解释。”她深刻地认识到,个人记忆一旦以时间经验维度的故事形式发出自我解释的声音,就有可能转化为关于主体性的历史,并由此成为个人所属群体或共同体共享的历史性存在。“经历一旦被讲述,它就不再是一段经历:它变成了一段历史,一种解释策略。”^①毋庸置疑,在探究作为个人的自我这个主题上,斯蒂德曼对主体性的历史采取了一种后现代理论的建构视角,强调的是她本人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通常认为,斯蒂德曼提出的元自传认识论对后来书写自我史的历史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我们可以在为国内学者比较熟悉的加拿大著名历史人类学家娜塔莉·戴维斯书写的《求知的一生》(*A Life of Learning*)、格尔达·勒纳书写的《杂草》(*Fireweed: A Political Autobiography*)、美国女性历史学家群体书写的《女性历史学家的声音》(*Voice of Women Historian: The Personal, The Political, The Professional*)、澳大利亚—欧洲人文学者群体书写的《自我史、欧洲与澳大利亚本土研究》(*Ngapartji Ngapartji: In Turn, In Turn—Ego-histoire, Europe and Australian Indigenous Studie*)、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书写的《趣味横生的20世纪》(*Interesting Times: A Twentieth Century Life*)及全球知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书写的《椰壳碗外的人生》(*A Life Beyond Boundaries: A Memoir*)等著述中清晰地看到元自传的特征。例如,霍布斯鲍姆申明他并非是在书写传统意义上的自传,而是旨在通过个人史的反思性书写形式阐释他对20世纪历史的认知。故此,他自觉地抵制西方传统自传书写那种“销路甚广的‘忏悔录’”和意图“为自身辩护的陈述”。“我所追寻的则是对历史的认知,而非打算得到同意、认可或同情。”^②作为一名女性主义史学家,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康威(Jill Ker Conway)更是主张女性史学家应该积极书写自传:“当我们出于对自身经验的理解而自信地说话时,我们就得到了承认……我们应该密切关注我们的故事。……我们都是自传作者。”^③

从目前的自我史文本来看,对作为个人的自我这个主题的表述,显然关涉历史意识,关涉如何看待和理解历史的问题。在书写自我史的历史学家这里,历史被视为一种特定的时间意识,而他们对自身生活经历及社会—时代变迁的解释,则是实现对自己当下存在的真正认识的必要前提。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提倡研究历史之前需要研究历史学家的论断基础之上,有论者进一步指出:“如果历史研究是用来认识人类自己的话,史家首先要认识作为个体的自己。史家所有的历史认识都首先在于丰富自己的历史认识,即丰富自己的存在性。在此之后,才谈得上史家的认识代表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代表人类的自知。”^④

三、作为历史学家及人文学者的自我

如前所述,《自我史论文集》偏重于以作为历史学家的自我为主题,期望通过重新发现历史学家的主体性,从而构建记忆认同和国族(nation)认同。诺拉观察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开始意识到“科学历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的困境,在反思中发现自己的历史书写实质上是在一种预构目的论框架中进行的,并未摆脱法国民族史专家厄内斯特·拉维斯未来主义视角的民族国家历史叙事,因而他们开始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有意识地审视主客关系问题。另一方面,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当下,这些历史学家往往从当下主义的视角,既把当下作为回溯过去的出发点,又视当下为历史解释的目的,在竭力阐明主客关系的基础上,将主观性视为历史学的一个优势,“在过去的20年间,确保

① Carolyn Steedman, *Landscape for a Good Woman: A Story of Two Lives*, p.5, p.143.

②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霍布斯鲍姆自传:趣味横生的20世纪》之《自序》,周全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VI。

③ Jill Ker Conway, *When Memory Speaks: Reflections o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Knopf, 1998, pp.177-80.

④ 陈新:《史家与读者——论历史认识中的主体》,《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历史学非个人性的伪装正在被褪去。今天的历史学家有别于他们的前辈，他们已做好承认他们自己与其研究之间有着密切关联的准备。没有人会不明白，与其徒劳地抗议客观性，不如详尽地道明自己与材料之间的关系，以便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研究。绊脚石反倒变成了优势。对有关存在之介入的揭示和分析，而不是远离不偏不倚的调查，反而成为增进理解的工具。”^① 诺拉认为历史学家在历史书写中用不着隐藏自己的激情和面对多种史料时所做出的抉择，更不必担心激情和种种抉择会造成对真相追索的不忠诚，因为主观性的存在并不必然意味着是对历史学客观性的损害或牺牲。就《自我史论文集》的7位撰稿人和克里格尔而言，他们都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接受了实证主义训练的结构主义者，客观性和总体史的观念是他们书写历史的理论假设。然而，透过这几位法国历史学家的自我史文本，我们可以窥见他们在反思自身学术训练及其教研的过程中，坦率承认主观性存在的必然性，并且着力表明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并非是任意武断的，而是在历史定义的可能性范围中进行选择的一个结果，由此捍卫“岌岌可危的”客观性。譬如，勒内·雷蒙反思年鉴学派的历史书写存在“人为的连贯性”，由此批判法兰西整体史观及其决定论；克里格尔强调问题意识和现实关切在历史研究中的中心地位，非常细节化地阐述了她本人搜集资料的过程，以及面对各种史料时是如何依据问题意识“重构主题和初步假设”，如何在甄别史料类型的基础之上运用历史学技艺确立历史事实，从而获取历史知识的。^② 此外，克里格尔坚持必须从历史的角度而非在抽象的概念上来理解共产主义，著名思想史家托尼·朱特（Tony Judt）曾回忆说这种研究取向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③

正如诺拉引领了法国的自我史书写，帕萨里也引领了意大利的自我史书写。在《一代人的自传》中，帕萨里从重建各个群体记忆的现实需求角度出发，倡导历史学家借鉴精神分析的方法来反思自我主体性的建构及经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重建历史，而是要仔细思量那些仍然处于我们外部的、过分客观的记忆，并使之内化于我们自己。各个群体的经历实际上被完全客体化了，符合时代需求的主体性处于十分匮乏的状态……”^④ 《一代人的自传》获得了西方学界的高度认可，帕萨里被学界赞誉为“研究主体性的历史的先锋”，^⑤ 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她以“自我史”为主题在意大利组织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在1997—1999年间，她在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院以“历史学家的职业”（Le Métier d'historien）为主题多次举办研讨会。自2000年开始，她又在欧洲大学研究院开设了“欧洲自我史”（European Ego-histoires）课程，邀请欧洲各国的知名历史学家做主讲嘉宾。正是在一系列“自我史”教学和研讨的实践以及反思法国自我史书写的基础上，帕萨里与纽约大学副教授亚历山大·格佩特（Alexander Geppert）于2001年合编了一本革新“自我史”范式的论文集——《欧洲的自我史：1970—2000年的史学与自我》（*European Ego-Histoires: Historiography and the self, 1970-2000*）。该论文集以“史学与自我”为主题，具有“在对主题进行解释之时严格把控自我与历史事实之间的距离”的鲜明特征。计划之初，帕萨里和格佩特就明确表示，虽然诺拉发明了“自我史”这个概念，并且经由《自我史论文集》在方法论层面上自成一派，但并未建构起一种新的书写范式。鉴于此，他们打算在认识论层面推进“自我史”，追求在元史学的层面实现“主体性的最高层次”，使其将作为历史学家的自我与作为集体的自我型构为一个整体。“自我史主要是一种方法论体系，旨在构筑对元史学进行反思的地基……自我史的困难之处与兴趣点就在于需

① Pierre Nora, “Introduction” from *Essais d'Ego-Histoire*, Translated by Stephen Muecke, *Ngapartji Ngapartji: In turn, in turn: Ego-histoire, Europe and Indigenous Australia*, Edited by: Vanessa Castejon, Anna Cole, Oliver Haag, Karen Hughes, p.21, p.22.

② Annie Kriegel, *Ce que j'ai cru comprendre*, Paris: Robert Laffont, 1991, p.677.

③ [美] 托尼·朱特、蒂莫西·斯奈德：《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苏光恩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62页。

④ Luisa Passerini, *Autobiography of a Generation: Italy, 1968*, Translated by Lisa Erdberg,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33.

⑤ Joan W.Scott, *Autobiography of a Generation: Italy, 1968*, Luisa Passerini, Translated by Lisa Erdberg, “foreword”,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xi.

要努力地进行自我反思，而此处的自我必须被视作是个人与集体的一个结合体。”因此，“我们打算充分激发反思，使‘自我史’概念得到拓展，进而成为一个国际样板，为进一步探析自我意识模式、历史学家与公众的关系、生活与自我在历史书写当中的重要性奠定基础。”^①于是，基于跨国性和在近几十年来史学范式转换中起到过重要作用的两点考虑，他们向8位在政治上持左派立场的“进步的”欧洲历史学家——两位来自德国、三位来自英国、一位来自希腊、一位来自俄罗斯、一位来自法国（皮埃尔·诺拉），其中两位是女性——发出了邀请信。这8位历史学家出生于1935—1950年间，经历过1968年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事件，适逢70年代新社会史的兴起，而且专攻当代史。在邀请信中，他们要求每位历史学家都要通过分析个人兴趣、个人和一代人的生活选择及其方式与以史学为业之间的关联，从个人的角度重新解读和反思自己对史学的贡献，回答5个与他们的主观性有着密切关系的问题：第一，为何会对历史及历史研究感兴趣？第二，有哪些关键的动因、决定性变化和转折点？第三，能否在自己的研究中辨别出理论、方法论取向及连接的政治、社会、文化或经济主题？第四，如何看待过去、现在与历史专业之间的关系？第五，为何要从事历史研究？两位编者设想这5个问题的回答涵盖了5个不同的领域：主题、方法论、历史关注点、历史书写的导言及政见。根据他们两人提供的阅读建议，《欧洲的自我史》文本大致体现了两种主要思想：其一，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8位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围绕主客关系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主体性意识逐渐增强；其二，8位历史学家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在60年代以直接介入的方式参与政治和文化，但从70年代末开始则越来越采取间接介入的方式。从对这8位历史学家的挑选、“标准化的”邀请信及其后来的自我史书写实践来看，《欧洲的自我史》文本显然有意识地将个人生活史、社会—时代变迁史及个人从业史结合在一起，通过深刻反思作为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模式，阐释他们各自的历史观和史学观，以便于“帮助读者理解历史书写与历史学家在公共领域的作用”。^②换言之，在反思作为历史学家的自我这个主题时，《欧洲的自我史》文本不仅仅将“自我史”视为探究主体性问题的方法论工具，而且还视为认识论工具。在以英国、美国及澳大利亚为主要代表的英语国家的自我史文本那里，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书写范式。

相较于法国和意大利的自我史书写，以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及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英语国家，参与者在年龄、性别（包括同性恋）、族裔、职业、宗教信仰及政见等方面均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而在反思作为历史学家——在澳大利亚自我史书写范式中，还包括其他学者——的自我这个主题时，则显示出与后现代理论——特别是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和后殖民理论——进行对话的鲜明特征。无论是以个人专著形式面世的《好女人的风景》和《求知的一生》，还是群体论文集形式的《女性历史学家的声音》和《自我史、欧洲与澳大利亚本土研究》，均在回顾个人学术经历的过程中，比较透彻地反思了历史实在的本质和历史知识的可能性之思考路径，进而批判了既定的现代主义假设——科学主义和客观主义，这实质上是在回应来自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和后殖民理论的质疑。例如，斯蒂德曼在《好女人的风景》中采取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后殖民的女性主义及文化批评的理论视野，强调历史研究的实质在于历史解释及其解释策略，并以福柯式的反抗姿态倡导打破各种中心论的历史书写，强调运用想象力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可以实现史学的多元化和民主化，认为真实的历史是传统上被逐至边缘但仍然有效的历史。^③戴维斯在反思她书写《档案中的虚构》和《边缘女人》（“Women on the Margins”）的思想历程时，不仅提及了劳伦斯·斯通的叙事史复兴论述对历史学的贡献，以及她本人从跨学科对话中获取的智性启示，比如与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合作开设历史人类学课程，更重要的是，她通过解释“虚构”（fiction）

① Luisa Passerini and Alexander Geppert, “Historians in Flux: The Concept, Task and Challenge of Ego-Historie”, *Historein*, vol.3, 2001, p.8, p.16.

② Luisa Passerini and Alexander Geppert, “Historians in Flux: The Concept, Task and Challenge of Ego-Historie”, *Historein*, vol.3, 2001, p.12.

③ Carolyn Steedman, *Landscape for a Good Woman: A Story of Two Lives*, p.127.

和“边缘”(margins)的真正意涵,以及历史想象力在场景设置中的作用和限度,指出在具体历史语境中故事讲述(storytelling)的形式和技巧往往比内容更能揭示历史真相。^①无独有偶,另外一位加拿大历史学家泰勒(C.J.Taylor)在反思自己构建的面向公众的史学项目时,对采取虚构的手法让历史上的4个不同种族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事而感到十分自豪,但同时警告必须以全面、客观掌握具体的历史情境为前提。^②作为《女性历史学家的声音》的合编者,女权主义史学家爱琳·鲍里斯(Eileen Boris)和诺普尔·乔杜里(Nupur Chaudhuri)强调这本自我史论文集撰稿的20位女性史学家通过反思从个人到政治到学术职业的经历和经验,阐明了“作为历史学家的女权主义者”和“作为女权主义者的历史学家”这两个身份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个反思过程恰恰彰显了“高度的自我意识”,实质上驳斥了后结构主义者旨在消除主体的解构性言说。^③可见,历史学家的批判性思维仍然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晚期以来,澳大利亚所有的人文学科几乎都出现了与和解政治(politics of reconciliation)及“历史战争”(the history wars)相关且具有自我反思性质的学术回忆录。因此,虽然出版于2014年的自我史论文集《自我史、欧洲与澳大利亚本土研究》在形式上采取了与《欧洲的自我史》相同的跨国对话取向,邀请了澳洲和欧洲的学者参与,但是学者的专业身份却不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还有被归属为人文学科类别的人类学、文学和文化学。正如帕萨里和格佩特在计划时所认识到的那样,自我史书写计划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主题,即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将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凝聚在一起。就澳大利亚而言,原住民研究(Indigenous studies)就是这样一个明确的主题。换言之,为《自我史、欧洲与澳大利亚本土研究》提供自我史书写文本的人文学者都关注原住民问题。尽管他们遵循诺拉最初构想的“自我史”反思路径,“试图在其所研究的历史、学问与塑造自己的历史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但因“自传故事”和“传记”在澳大利亚本土拥有强大的智识传统,故而其关联性、身份认同及历史的本体论概念均有别于诺拉自我史中的“自我”概念。“‘自我史’这个概念在澳大利亚土著研究中的运用并非就是原住民学者进行自我反思的典范。不同的原住民文化对讲故事有优先和主权的观念,他们的历史建立在国家、家谱与个人/家族亲属的复杂关系之上。”于是,在反思作为原住民研究者的自我这个主题时,这些人文学者主要解释他们聚焦于原住民性(Indigeneity)的“他者”概念的学术研究,是怎样在后殖民理论的视角下理解主权和公民权,是怎样批判性地接受和运用福柯知识权力论和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批评理论、女性主义理论、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来消解欧洲中心论视角下的原住民客体化历史叙述的,又是怎样在基于本土视角的“地方化”研究中“发现”或“建构”了原住民的主体性(身份)历史,并由此形成本土批评理论(Indigenous Critical Theory)的,旨在倡导去中心化的原住民研究。“自我史能够让人们注意到种族及其他身份的确认,并且起到在学术知识生产中使非对称权力关系去中心化的作用。”^④

整体而言,“自我史”是实践中的历史学家确认自我存在意义和历史学存在价值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蕴含了历史观和史学观的史学方法论。当历史学家反思性地叙述个人生活史和社会—时代变迁史时,实质上是在阐释自己的历史观,试图由此发现真正的自我,从而把握现实生活;当历史学家以论辩的姿态反思自身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及历史书写中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时,实质上是在建构自己的史学观,试图由此塑造历史学共同体,从而捍卫历史学的合法性。事实上,无论是阐释个人的历史观,还是建构个人的史学观,历史学家自我反思的个人史书写都起到了建构本国文化的作用,从而创造了历史。

① Natalie Davis, *A Life of Learning*, ACLS Occasional Paper, no.39, 1997, pp.19-22.

② C.J.Taylor, “Continuing Education: My Life as a Historian”,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4, no.1, 2013 March, p.137.

③ Eileen Boris and Nupur Chaudhuri, “Introduction: Standpoints on Hard Ground”, *Voices of Women Historians: The Personal, the Political, the Professional*,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Xiii.

④ Introduction: “Ngapartji Ngapartji: In Turn, In Turn”—*Ego-histoire and Australian Indigenous Studies*, edited by Vanessa Castejon, Anna Cole, Oliver Haag and Karen Hughes, 2014, p.8, p.10.

诺拉曾经强调，历史学家就是防止历史仅仅成为历史的人。面对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虚无主义倾向，近年来日益关注“自我史”发展的美国政治史家杰里米·波普金（Jeremy D. Popkin）信心十足地指出，历史学家必定十分清楚反思自己的个人经历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没有人设法获得了历史意识吗？难道没有人意识到——无论如何也比其他人更清楚——他们自己的决定方式吗？”^①此外，根据社会心理学的自我理论，自我由“主我”和“客我”构成，“主我”以记忆的方式出现在个体的经验里，“客我”是特定社会情境中某个共同体的一员，与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共享经验。个体对“客我”的反应，体现了自我经验中的“主我”。^②由此观之，“自我史”或许是对抗和抵消被现代性裹挟的假性自我的最佳方式之一，有助于当代人进行自我定位和反思。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公众会选择相信致力于追求“真实”并奉“客观”为圭臬的历史学家的自我反思，何况对个体具体经验的自我反思具有天然的吸引力。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普通大众以回忆录和自传为主要形式的个人史书写就失去了必要性和重要性呢？

从本质上说，人类一直在“反思性”地创造历史。换言之，历史只存在于人的记忆和思考之中，并以各种语言形式（包括图像）呈现出来。故此，“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每个人都可以且应该书写自身的生命故事。如果说战后国际史学研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治史新方法，在民族国家史和宏大叙事之外，开启了一种看待历史的新视角，从而激发了以书写普通人或小人物的历史为要旨的微观史学的兴盛。那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新的以个人为主的交互式媒体形式，则使民权运动以来渴求社会平等、发出声音的普通大众书写自身的个人史成为一种可能。相较于历史学家书写的自我史，非专业的普通人书写的个人史，虽然也采取第一人称的视角和具有反思性质的自我叙述，但其主要以展现作为时代亲历者和见证者那具体而微的生命经验为中心，并且意图将个体记忆融入集体/社会记忆，与民族国家史和群体史形成文本互阐的关系，从而实现对自我的认知、对历史的创造。在这个意义上，致力于书写个人史的普通人和书写自我史的历史学家一样，均希冀通过彰显个人自主的历史阐释，表达自己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参与当下时代精神和文化生活的建构。此外，个人史所具有的私密性和个性化或许比自我史更胜一筹，它除了能够激起同时代人的情感共鸣之外，从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必然会引发众多同为普通人的读者的关注、讨论、对话和移情想象，从而开创一个有助于促进社会平等和文化多样性的话语空间。

责任编辑：郭秀文

^① Jeremy D. Popkin, “Historians on the Autobiographical Frontie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4, no.3, Jun., 1999, p.740.

^② [美] 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172-177页。

内藤湖南的中国古史研究

——兼论内藤湖南古史观念与同时期中日疑古思想之异同

郭露凝

〔摘要〕内藤湖南在其著作《中国史学史》《中国上古史》及相关论文中，对中国古史史料价值多持肯定态度。基于“加上”原则以及儒家早期历史，他先是试图为中国古史研究推演出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之后又侧重于文本考证。他认为儒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为了提高自身的地位而不断向前追述道统，此为对中国古史体系形成的主要原因。内藤湖南、白鸟库吉、顾颉刚等人的古史观念虽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他们的学术认知途径和论证逻辑却并不相同。内藤湖南的中国古史观及其研究方法值得分析和总结，但是其中或隐或显地服务于当时日本政论的观点以及为日本侵略中国张目的潜在意图，则需要我们进行深刻反思与批判。

〔关键词〕内藤湖南 “加上”原则 古史研究 白鸟库吉 顾颉刚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2)12-0154-11

1925年4月5日，内藤湖南在大阪每日新闻社主办的演讲会上发表介绍学者富永仲基学问的演讲，演讲内容以《大阪的町人学者富永仲基》为题刊登于同年8月出版的《大阪文化史》上。内藤湖南肯定了富永仲基佛教研究中的“加上”原则，并提出将其应用于史学研究：“这是从思想的角度出发构建起来的一种考察历史过程的方法。对没有历史记载的时代进行历史性的考查，没有比这更合适的方法。一些理由充足、完善无缺的东西总是逐渐形成、最后出现的。其在最初时期一定是最简单的，后来逐渐地附以各种理由而又不断变换，反反复复，最后形成了一个结果。”^①仅看这段话，其基本观点与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②以及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③都有一定相似性，故有学者认为其古史观与白鸟库吉和顾颉刚的观点存在某种联系，三者间的关系如何存在很大争议。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出现了较多讨论中日疑古思想源流的学术成果，论述重点多为二者间的相互影响与关系。笔者认为，要厘清这些问题，尚需从内藤湖南的中国古史研究本身出发做多方面探析，如内藤湖南为什么认同富永仲基所谓“加上”原则并主张将此原则运用于古史研究中？他对于古代留存下来的史料真实性持什么态度？

作者简介 郭露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北京，100875）。

①〔日〕内藤湖南：《大阪的町人学者富永仲基》，《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刘克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56页。

②一般认为，白鸟库吉最初是在东洋协会评议员会上的演讲中明确提出“尧舜禹抹杀论”的，该演讲词以《支那古传说之研究》为题发表于《东洋时报》第131号，1909年8月。

③顾颉刚发表于1923年5月6日的《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上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明确提出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

富永仲基所谓“加上”原则对内藤湖南的古史观和古史考证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内藤湖南的古史观与同时期中日史学的疑古思想有何异同？本文试结合相关史料，对其中一些问题做初步探讨。^①

一、内藤湖南对中国古史史料价值的理解

中国古史研究受困于“文献不足徵”，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陷于今古文经的真伪和学派之争，后出的记载则掺杂了大量编造和杜撰的口头传说。判定这些史料的真伪、认清其史料价值，成为后续古史研究的基础。要认识内藤湖南的古史观及其古史研究，首先需要了解他对于古史史料所持的态度。内藤湖南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任教期间，曾多次开设《中国上古史》及《中国史学史》课程，但并未形成专著。内藤湖南去世后，才由其儿子、学生通过收集整理课堂笔记成书出版。这两本书尽管并不是经内藤湖南本人在世时亲手著述编定，但对作者的学术观点有十分直观的反映，通过这两本书可以参详内藤湖南对中国古史记载的史料价值的理解。

内藤湖南书中所论及的可能存在失实的古史史料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于流传中的各种客观原因导致与史实产生偏差的史料，另一种是后世有意对传世文本进行附加甚至作伪而导致失实的史料。他认为，只要能厘清史料记载发生偏差的原因，就能够找到将其应用于古史研究的正确方法。

首先，对随着漫长的流传过程而与史实产生偏差的史料记载，内藤湖南认为其本身仍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假如设法认清其失实之由并收集到多角度的旁证材料，应该能够据此进行古史研究。这类史料以来自口头传说的古史材料为主，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历史记录的起源与其记录者即史官的起源是密切相关的，而史官的起源则是“口传官”。^②西周以前的历史传说，由“口传官”主导、人们口耳相传逐渐形成的记录，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好像殷人对盘庚以后的事记得很清楚，从盘庚到纣直系八代。日本阿依努族人还记着十代的事。所以从现存的书籍来看，盘庚以后的事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信的”。^③记录口传历史的官职到周代依然存在，在《国语》中被记载为“瞽史”。“瞽”最初指传诵天道与乐曲的盲人。“瞽史”的含义和具体职能，《国语》中有“瞽献曲，史献书”的记载，学术界对该记载的含义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④内藤湖南认为瞽史是史官职能不断扩大的产物：“史官本是处理文件的职务，但是由于例举前代往事、说明道理的职务需要，而成为了像瞽那样通晓前代往事的人物”，^⑤因此，史官逐渐成为与君主问答的瞽者、主管天文者以及卜筮家，留下的记录主要是以口传的形式，经历代代传承在战国时期呈现为简册上的文字。^⑥这样的记录虽在行文上难免会有一些不足，但内藤湖南认为，自古以口头传承保

① 内藤湖南在京都帝国大学任教期间，开设有《中国上古史》《中国史学史》等课程，这些课程的讲义、课堂笔记在他去世后经后人整理出版，同时他还发表了若干中国古史研究的专题论文，如《尚书编次考》（《尚書編次考》，《支那學》1921年第1卷第7號）、《尔雅的新研究》（《爾雅の新研究》，《支那學》1921年第2卷第1號、第2號）、《禹贡制作的时代》（《禹貢製作の時代》，《東亞經濟研究》1922年第6卷第1號）等。这些著述均反映了内藤湖南的中国古史观和史料观，亦为本文主要史料来源。

② 刘知幾有言：“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第一》，刘知幾撰、浦起龙通释：《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5页）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即由此展开，他认为仓颉、沮诵是中国古代历史记录的开端，其中沮诵的名字“诵”，“在古时候是讲述、传授往事的意思。《国语·楚语》‘瞽不失诵’的‘诵’就是这个意思……由于‘诵’是口传的意思，所以黄帝时有关名叫沮诵之史官的传说，与其认为是有记录官不如说是对口传官的传说。”（[日]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马彪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页）

③ [日]内藤湖南：《中国上古史》，《中国史通论》，夏应元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第91页。

④ 顾颉刚就此认为瞽和史始终为两种官职，瞽史一词也只是对二者的合称，详见顾颉刚《左丘失明》（《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16，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95-197页）中的论述，根据《国语·周语上》中“瞽、史教诲”一句，顾颉刚认为瞽与史“为二种人，非以瞽为史也。”王树民则认为瞽的听力和记忆力使其逐渐承担起传诵历史故事的责任，合并了史的职能：“瞽者的听力和记忆力比普通人都要强些，最适宜作音乐和演述故事的工作，古代还没有文字的时候，或已有文字而书写条件十分困难，那时想要保存历史事件的具体情节，惟有利用瞽者这一特长，这样瞽和史就自然地结合起来了。”（王树民：《瞽史》，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2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6页）

⑤ [日]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马彪译，第19页。

⑥ 参见[日]内藤湖南：《中国上古史》，《中国史通论》，夏应元等译，第135-140页。

存下来的史实本身仍然是相对可信的,将其应用于历史研究时,不必过度拘泥于其书写和文体方面的问题,而应当关注其记录的事实本身。

此类史料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古文《尚书》中的《泰誓》篇。《泰誓》记述了周武王伐纣前的战前立誓,传世本古文《尚书》中,《周书》之下包含《泰誓》上、中、下三篇。朱熹认为:“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①这是从文风的角度质疑《泰誓》为古文《尚书》所伪造。内藤湖南则认为,《泰誓》被诟病文风过于平易流畅,甚至带有后世韵文的特点,结合现存的彝器来看,“今天尚存的周代铜器古孟鼎毛公鼎上的铭文,与《周书》中的《诏诰》《洛诰》的文句有相似的地方,但与《泰誓》《牧誓》相比,后者的文句显得过于流畅。由此我猜测,此两篇一开始就是以讽诵的方式传播的,从来没有载入简册。”^②今文《尚书》中所存的《牧誓》及《甘誓》《汤誓》,在行文上都与古文《尚书》的《泰誓》篇有相似之处,如果从记录流传的角度来考察,“其文辞决不可能是最初载于简策的形式,那种韵文体例所显示的是一种经过长期讽诵流传之后再被记录下来的痕迹”,^③这并不代表其记录的内容本身是不真实的,“比较古老的传说是后来才被收录的,不像《诏诰》《洛诰》那样,一开始就是文字记录。虽说如此,我觉得仍不失为相当确实的记录。”^④

这种在流传中发生偏差的史料,除了口传历史之外,还有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对此,内藤湖南认为,这种史料的形成可能来自于对同一事件不同角度的叙述。例如在分析《毛诗序》的史料价值时,内藤湖南批驳了今文经学家认为《毛诗序》中记载的史事与《国语》的记载出入较大而不实的观点。他将《毛诗序》中与《国语》相差较大的记载,看作是从另一种角度对《国语》的补正,因为“《诗经》基本是为颂扬功绩而作的。《国语》记述了穆王以来君王的失败,以训诫君王。应该从二者不同的侧面中看到全面的事实”。^⑤然而内藤湖南在其古史研究中并未对此类史料做出进一步考辨,他将口头传说或是《毛诗序》等史料应用于历史研究中的设想,更多停留在理论上的阐发。

其次,传世古史文献中有许多内容都是后世作者出于不同目的附加和作伪而成的,但内藤湖南对此类史料仍持基本信任的态度,理由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中国的古史与古书记载详尽,即便其中有作伪的部分,要完全凭空编造也是难以完成的。如他不认同郑樵、朱熹对《毛诗序》全盘废弃的主张,原因除了上文所提及的为《国语》做补充之外,更重要的是,即使郑樵对《毛诗序》所述的创作主旨并非《诗》真正的创作意图的质疑合理,^⑥《毛诗序》的史料价值也并不是依附于《诗》而存在的,“即便说《诗序》与《诗经》没有关系,但《诗序》中写的事不会是没有根据的。不仅如此,如果脱离开《诗经》来考虑,作为历史性资料,《诗序》的记述是很有用的。”^⑦又如,对于今文经学家因为《周礼》记载的周代制度与《礼记》中的记载差别明显而主张《周礼》为伪的观点,^⑧他认为,即使《周礼》并非周公所作、内容与《礼记》有所出入,“从今天的立场来看,《周礼》中记载的诸多官职,如果说都是伪造的,那是

①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第78,明成化九年陈炜刻本。

② [日]内藤湖南:《中国上古史》,《中国史通论》,夏应元等译,第109-110页。

③ [日]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马彪译,第37页。

④ [日]内藤湖南:《中国上古史》,《中国史通论》,夏应元等译,第114页。

⑤ [日]内藤湖南:《中国上古史》,《中国史通论》,夏应元等译,第143页。

⑥ 郑樵主张《诗》为纯文学性的创作,《毛诗序》中所解释的政治教化作用实为牵强附会。《毛诗序》中总结《诗经》中的《风》与《雅》为“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诗经·大序》, [宋]朱熹集传:《诗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页)郑樵在《诗辨妄》中反驳道:“凡制文字,必依形依象而立。《风》《雅》《颂》皆声,无形与象,故无其文,皆取他文而借用,如‘风’本风雨之风,‘雅’本乌鸦之鸦,‘颂’本颂容之颂。奈何序诗者于借字之中求义也!”([宋]郑樵著、顾颉刚辑点:《诗辨妄》,北平:朴社,1933年,第4页)

⑦ [日]内藤湖南:《中国上古史》,《中国史通论》,夏应元等译,第141页。

⑧ 如皮锡瑞曾提出:“《周官》与周时制度多不符,则是当时并未实行,其非周公之书可知。”([清]皮锡瑞:《经学通论》,清光绪思贤书局刻本)

不可想象的。”^①第二，中国大部分的古史文献在流传的过程中，都会在后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出现附加的情况，这种附加并不一定是编造，也可能是后人发现了前人未能掌握的资料而对文献进行的补充修订。以《周礼》与《礼记》的差别为例，他认为“即便《周礼》中多有《礼记·王制》所没有的内容，也不能一盖认为都是《周礼》作者所伪造的，现存《仪礼》与《礼记》亦有不合之处。可以这样认为：在这期间发现了各种从前的笔记，于是就将这些笔记加以汇总，在这些材料不能顺畅衔接的情况下，编纂者进行了补缀。所以《周礼》中出现的那些《礼记》、《仪礼》所见不到的内容之中，也包含了有关周代制度的贵重史料。”^②因此，“不能说因为《周礼》是后出的，就都是编造的，后人发现前人不知道的东西是常有的事。《周礼》作为记述周代制度的书籍是最后问世的，吸纳了到其为止所有先前已知的内容。”^③假如我们由此看待经典的形成，那么像《周礼》这样成书较晚的文本中所包含的值得参考的史料反而更为丰富。

当然，无论是客观环境造成的文本变化，还是后人对文本主动的改写，即使信任其史料价值，内藤湖南也承认由于其渐次形成、吸纳多种记载的特性，必然会融合部分不真实的因素，史家应当寻找正确的方法，通过考证从中剥离出最初的记录。以对《尚书·洪范》的介绍为例，他提出“《洪范》中有不少后世加进的内容，但其中原有的部分确实很古老，序文中自‘十有三祀云云’开始的这段文字可认为是帝向禹传授《洪范》的记录，其帝字自古从未解释成尧或舜，而解释成天，表明这是尧、舜的综合传说尚未形成之前的事”，据此而言，“如果去掉后世附加的部分之后，可以说中国王者古代遵循的大法，就是通过《洪范》这样流传下来的。”^④史家如果能够通过考证研究，分辨出古史记载中原始的部分、后世附加中真实的部分以及后世附加中编造的部分，就能最大限度发挥出其史料价值，将其应用于中国古史研究中。至于是否真的存在一种行之有效的古史考证和研究方法，内藤湖南也始终在进行积极的尝试，其中在他看来最为可靠的，正是著名的“加上”原则。

二、“加上”原则与内藤湖南的古史考证

内藤湖南在《中国上古史》和《中国史学史》中表达了他对中国古史史料相对乐观的信任态度。他以这种态度利用古史史料对中国古史的具体研究，主要集中在他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其中贯穿始终、被后世学者以及内藤湖南本人最为重视的理论，就是所谓的“加上”原则。

“加上”原则是内藤湖南对日本江户时期哲学家富永仲基的学术思想的概括。富永仲基对日本以及中国的佛教、神道、儒学都有所涉猎，对于这三者的思想史发展路径，他的认识和理论是一以贯之的。富永仲基的著作中只有《出定后语》和《翁之文》两部流传后世。其中《出定后语》探讨了如何明确佛教不同教派、佛典以及哲学思想产生发展的时间顺序。这个问题的提出，主要是由于佛典中常用“如是我闻”的表述，把所有的教诲都说成是弟子对释迦牟尼本人原话的转述，这就导致佛教中时间概念的缺失。富永仲基认为，古印度的宗教发展是连续的，在佛教兴起之前，古印度的主流宗教为婆罗门教，婆罗门教以“天”为崇拜对象，由此衍生出的96种教派互相争胜，将各自所推崇的“天”置于前人之上，各自的教义与宗教传说也愈发完善，以至于最后造出33重天之多。释迦牟尼欲创建新说，吸引教众，又在“天”之上提出神力更甚、传说更完整的“佛”为崇拜对象。佛教建立后，其内部分化出诸多教派，后出的教派为了胜过前人，又编纂了各种愈加完善的佛典。富永仲基将宗教发展的规律总结为：“是诸教兴起之分，皆本出于其相加上，不其相加上，则道法何张？乃古今道法之自然也。然而后出学者，皆徒以谓诸教皆金口所亲说、多闻所亲传，殊不知其中却有许多开合也，不亦惜乎。”^⑤在这里，富永仲基使用了“加上”一词，以此来概括诸教张其道法的手段，内藤湖南由此将富永仲基的理论总结为“加上”

①[日]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马彪译，第7页。

②[日]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马彪译，第46页。

③[日]内藤湖南：《中国上古史》，《中国史通论》，夏应元等译，第127页。

④[日]内藤湖南：《中国上古史》，《中国史通论》，夏应元等译，第119页。

⑤[日]富永仲基：《教起前后第一》，《出定后语》，浪華書林丹波屋理兵衛刻本，1746年，第12页。

原则。

除佛教外，富永仲基对日本的神道思想以及中国的先秦诸子学说，也同样以“加上”原则进行了剖析。富永仲基的《说蔽》一文，主要以先秦学术争鸣的发展路径解释了中国古史的建构，但该文已经亡逸，他的另一部著作《翁之文》中有简要的论述：“孔子述祖尧舜以宣扬文武，提出王道之说，是因为当时齐桓晋文强盛，为了学说能够凌驾于当时尊崇五霸之道的风气之上。而墨子在对尧舜的尊崇之上，再主张夏禹之道，也是为了超过宣扬文武的孔子。这之后杨朱尊黄帝而宣帝道，又是为了超过孔墨所提倡的王道。后来农家的许行提出神农，到庄列的时候又推到无怀、葛天、洪荒的时代，这些都是为了一层一层地置于前人学说之上。如果说上述的都是不同流派的学说，那么即使是同样追求孔子之道的学问，儒学也自分八派，各自都借孔子之名抬高自己的学说。告子主张性无善无不善，世子提出性有善有恶，这都是在踩着对方抬高自己。”^①由此可见，富永仲基在讨论佛教的教派继起以及中国的古史架构时所提出的“加上”原则，其发生的原动力多为不同学派间以及相同学派内部不同流派间的相争，具体的表现形式则是学派文本内容在流传过程中的不断细化与扩充。如果以“加上”原则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古史及其文本的形成，就应该能够理解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是漫长的、随学派思想的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日本大正十年（1921）3月，内藤湖南在京都帝国大学支那学会主办的杂志《支那学》上发表了文章《尚书编次考》，1928年4月由日本弘文堂出版的文集《研幾小录》中又将该文题目改为《尚书稽疑》。该文虽未直接引用富永仲基的理论，但其思考逻辑与“加上”原则明显是相近的。^②在《尚书稽疑》的开篇，针对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著述中被认为存在大量后人伪托诸子之名所作的内容，内藤湖南主张不应绝对地看待这个问题，并以此引出了该文的核心观点：“当时各学派的后人可以自由地在文章之后附加内容，因此也就不应把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文本变化理解为伪作或篡入，而应将其视为各学派学说发展的体现。换句话说，一个学派的文本，从这个学派产生之时开始，一直到其发展完全停止的瞬间，都是不间断地在变化的。”^③他主张，即使是被今文经学家奉为可靠经典的伏生本今文《尚书》，也应当是随着儒家思想的发展和流变逐渐完成的。他将伏生本《尚书》29篇分成了三部分，分别为开篇的《尧典》到《洪范》11篇，末尾的《甫刑》《文侯之命》《秦誓》3篇，以及其余的15篇，认为前两部分分别出于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时期被附加到了第三部分前后，最终形成了传世的伏生本《尚书》。

具体来说，由于“孔子对政治的理想是复活周公建立的制度”，^④最早的《尚书》应当是以“五诰”为主体、以记载武王执政初期周公事迹的《大诰》《金縢》两篇为开端、以记载周公长子鲁公伯禽伐夷誓师的《费誓》为结尾的。开篇的《尧典》到《洪范》诸篇，是儒家学说在发展过程中为了彰显自身而不断将其道统追述到更早的年代，经后人附加形成的。在推崇伯禽的“王鲁说”之后，“孔子素王说”产生，^⑤由于孔子继承了殷的血统，儒家后人开始有尊殷的倾向，于是在《大诰》《金縢》之前增加了《盘庚》到《洪范》诸篇记载殷商历史的内容。后来墨家兴起，推崇禹为理想人物，儒家为了与其竞争，又向前述祖尧舜，在开头附加了《尧典》一篇。最后，战国末期法家、名家思想风行，当时的儒家思想也受到影响，将执掌刑罚的皋陶与尧舜并列，《皋陶谟》成为典谟诸篇中最晚完成的一篇。由此，伴随

① [日]富永仲基：《翁の文》，博文堂影印本（以延享三年1746年刊本为底本），1924年，第20-22页。

② 按富永仲基的《翁之文》首次刊印于日本延享三年（1746），但并未大量发行，很快散失于民间，1924年才重新影印出版。内藤湖南在为影印本《翁之文》所作的跋中提到：“余少小已读富永仲基出定后语，深服其学有家法，又闻其著有《翁之文》，物色之三十余年未能获。”（[日]富永仲基：《翁の文》，第33页）可见《尚书稽疑》发表时，内藤湖南无法看到富永仲基对中国古史的具体观点，但对《出定后语》中阐述的“加上”原则应当已十分了解。

③ [日]内藤湖南：《尚书稽疑》，《内藤湖南全集》第7卷，东京：筑摩书房，1970年，第10页。

④ [日]内藤湖南：《尚书稽疑》，《内藤湖南全集》第7卷，第20页。

⑤ 尽管孔子素王说在西汉时才被以董仲舒为首的公羊学家正式提出并推广，但内藤湖南认为孔子作《春秋》这一行为就已经有了以自己为王的意识，最初的素王说应当是由此而引申出的一种观点，在战国时就已存在。（[日]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马彪译，第37页）

着儒家思想的发展，其尊崇的道统也不断向更早的时代推移，思想变化产生的越晚，代表道统的传说人物就越早。如果说典谟诸篇体现的是儒家思想随着时代变化而产生的纵向发展，那么《尚书》末尾的《甫刑》《文侯之命》《秦誓》三篇，则是因为儒家内部不同派别各自的需求而出现的横向差异，即“孔子之后儒家的传人们各自被战国时代诸国所重用，在为了本国的利益而谋划时，自然而然就会产生曲学阿世之风。”^①《甫刑》中将姜氏始祖伯夷与禹、稷并列为三后，意在抬高姜太公吕尚建立的齐国，应当是任职于齐国的儒家学者加入《尚书》篇尾。《文侯之命》记载周平王赐命晋文侯一事，自然是晋国的儒家学者所作出的曲学。至于最后一篇《秦誓》，“今日的《尚书》当然是由伏生所传，伏生是秦的博士，在此基础上再思考《尚书》以《秦誓》结尾一事，也就不难窥见其中原委了”。^②

由上可知，内藤湖南对于《尚书》编次的梳理并非来自严谨的文本考证，而是基于“加上”原则以及儒家早期历史所进行的推演，其主要目的在于为中国古史研究以及将《尚书》作为史料的应用提出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即“用如上的方法依次研究其他的经籍，自然就能从中发现儒家思想的发展史，在此基础上，或许就能实现对先秦古籍的完备研究。”^③内藤湖南在文集《研幾小录》出版时将文章原本的题目《尚书编次考》改为《尚书稽疑》的做法，或许正是依此思路。

《尚书稽疑》发表6个月后，内藤湖南又于大正十年（1921）9月、10月两期《支那学》上发表了《尔雅的新研究》，文中对他之前的《尚书》研究进行了反思：“我知道，对《尚书》编次的解释方式仅仅是从理论上进行了思考，是缺乏实证的，要想把这种方法应用于其他经书的研究，工作的复杂程度远在这之上。”《尔雅的新研究》正是他基于考证不足这一点，试图找到一种更加严谨且泛用的方法，即“以被认为是诸经辞典的《尔雅》为基础，摘出其中可以成为实证的部分，结合《尔雅》形成的过程考订经书发展的顺序。”^④但该文论证的并非这种方法本身，而是通过他在撰写《尚书稽疑》以及在大学讲授中国上古史时借助“加上”原则所建立起的对古书和古史的认识，选择部分在他看来已经可以确定时代的文献，将其内容与《尔雅》各篇进行对比，反证《尔雅》成书的过程，以证明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并建议将其推广到其他经书的研究中。

例如，《尚书稽疑》一文论证了《尧典》和《皋陶谟》两篇是在战国后期被加入《尚书》的，尽管内藤湖南认可《释诂》篇是《尔雅》中最早出现的部分，但由于其中包含对典谟中文字的训释，《释诂》篇也应当是经过种种附益，到比典谟进入《尚书》时间更晚的战国末期才最终完成。在考察《释言》篇完成的过程时，对于其第一条训释“殷，齐，中也”，内藤湖南认为这里以“殷”为“中”并非出于地理层面的解释或殷商文化的影响，而是因为编写者尊孔子，故而尊殷，证明《释言》一篇产生于“孔子素王说”兴盛的战国时期，^⑤故该篇应当是于《释诂》篇以后被增加进《尔雅》的。之后的各篇，内藤湖南也都以同样的逻辑进行梳理。这样就确定了《尔雅》各篇产生的年代顺序，也证明了《尔雅》的训释能够反映经书出现的不同时代，理论上就能以《尔雅》为工具，利用文中的方法考证其他经书的产生和发展。

尽管《尔雅的新研究》是内藤湖南反思《尚书稽疑》不足而做出的新尝试，但结果显然并不如他所预期的那样成功。内藤湖南对于《尔雅》成书的论证原本就存在模糊不清的地方，例如文章开篇便强调了其立论的根本是《尔雅》为十三经中其他经书的字典这一性质，但在文中却又多次用了《山海经》和

① [日]内藤湖南：《尚书稽疑》，《内藤湖南全集》第7卷，第16页。

② [日]内藤湖南：《尚书稽疑》，《内藤湖南全集》第7卷，第16-17页。

③ [日]内藤湖南：《尚书稽疑》，《内藤湖南全集》第7卷，第22页。

④ [日]内藤湖南：《尔雅の新研究》，《内藤湖南全集》第7卷，第37页。

⑤ 如前文所提及的，内藤湖南在《尚书稽疑》中认为，《公羊传》将孔子作《春秋》解释为以自己为王，尽管到西汉时才成文并经由公羊学家推广，但这种说法在当时就应当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力，产生了孔子素王说，而孔子又有殷的血统，故尊殷便是推崇孔子素王说。因此无论是《诗经》中的《商颂》，《尚书》中的《洪范》等篇，还是《尔雅》中的《释言》，都应当是在《公羊传》最初产生的战国时期完成的。（参见《内藤湖南全集》第7卷，第19页）

《楚辞》作为参照，即使用“我认为在汉初时，《楚辞》之学恐怕与大部分经书的研究同样兴盛，对其的解释自然会被收入《尔雅》之中”^①来合理化，也难免显得牵强，削弱了其论证的严谨性；此外，他在1922年发表的《禹贡制作的时代》和1923年发表的《易疑》中，也都未使用《尔雅》作为经书研究的主要佐证，说明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方法的局限性。

《禹贡制作的时代》发表在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现山口大学）下设机构东亚经济研究会所发行的刊物《东亚经济研究》上，该校事实上是为20世纪初日本开始对周边东亚国家的市场扩张和经济侵略培植力量而组建的，其目标之一是为了解中国等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从而更加高效地进行经济扩张。在这种情况下，经历了前两次不尽如人意的尝试之后，《禹贡制作的时代》一文不再致力于找到一种应对中国古史和古书的研究方法，而是将《禹贡》作为中国经济史的开端，通过对其文本流变的梳理，为后来学者的中国经济研究提供参考。^②内藤湖南将《禹贡》中所包含的材料分为8类，并选择了九州、四至、水脉、贡赋筐包、土色5类进行具体考证。尽管不涉及对中国古史的宏观论述，但内藤湖南的思考和论证仍然基于“文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渐次附益而完成的”这一认识。例如在讨论贡赋筐包的记载时，他认为其中既载有狩猎时代的产物，也有关于畜牧、农业的记录，再结合《禹贡》的篇名中仅含有“贡”而没有农业时代才出现的田赋来看，“可以认为有关畜牧和农业的记载都是后来附加的，《禹贡》的基本框架或许是自古便流传下来的，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禹贡》，其体裁的建立只能是在农业发达以后。”^③他在这里还列出了《禹贡》的四至说与当时其他文献中四至的对比，以及《禹贡》记录的水脉与《汉书·地理志》中的记载作对比，认为都有一定相似性，综合来看，《禹贡》的大部分内容应当出现于战国末年至汉初。然而经过一番看似周翔的论证，内藤湖南在文章最后却没有给出一个正面的确切结论，只是说“我们无法证实是《禹贡》出现更早，也不能说是其他的地理学记载参照了《禹贡》的内容”以及“尽管《禹贡》中多少包含一些战国时代之前的材料，其大部分材料还是很难认为来自于战国以前”。^④大约到这篇文章写作时，内藤湖南对待中国古史的态度开始体现出从理论设想到严谨考证的转变倾向。到了1923年12月发表于《支那学》的《易疑》中，内藤湖南的措辞则更为谨慎，论证的展开也多基于词句考辨。尽管他把这篇文章的题目定为《易疑》，其本意也是“由于近来在前人研究之外作的思考稍有所心得，对《易》作成的由来也思有所得，故在此陈述大略，希望学界诸君批评指正”，^⑤但《易疑》中对于中国古史、经书的考证与《尚书稽疑》之“疑”已经不尽相同了。

1925年4月，内藤湖南在题为《大阪的町人学者富永仲基》的演讲会上正式介绍了富永仲基的学问，将“加上”原则总结为“一些理由充足、完善无缺的东西总是逐渐形成、最后出现的。其在最初时期一定是最简单的，后来逐渐地附以各种理由而又不断变换，反反复复，最后形成了一个结果”，并认为“今天在有关各个国家的古代研究中，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原则”。^⑥纵观内藤湖南对中国古史的研究和考证能够看出，将“加上”原则用于中国古史和古书的研究之初，他确实是希望能够以此归纳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将所有在他看来非信史的史料都整理出形成的时间顺序，进而推动信史的建立。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内藤湖南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角度也发生了转变，其古史研究从之前的侧重于逻辑推论变成了后来的以文本考证为主，这大概是内藤湖南在演讲中将富永仲基的“加上”之说定义为“原则”而非“方法”的原因。

① [日]内藤湖南：《尔雅の新研究》，《内藤湖南全集》第7卷，第34页。

② 即如内藤湖南在《禹貢製作の時代》中所述的“希望仅就《禹贡》的内容，判明其中究竟包含有多少可信的材料，提供给该问题的研究者作为参考就够了。”（《内藤湖南全集》第7卷，第165页）

③ [日]内藤湖南：《禹貢製作の時代》，《内藤湖南全集》第7卷，第170页。

④ [日]内藤湖南：《禹貢製作の時代》，《内藤湖南全集》第7卷，第171页。

⑤ [日]内藤湖南：《易疑》，《内藤湖南全集》第7卷，第38页。

⑥ [日]内藤湖南：《大阪の町人学者富永仲基》，《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刘克申译，第356页。

三、内藤湖南的古史观念与同时期的中日疑古思想

在论及 20 世纪初期对于中国古史的批判和辨伪时，白鸟库吉、内藤湖南和顾颉刚的研究时常被一同提及，^① 主要原因是三人提出的关于中国古史形成的基本观点中都包含有“中国的古史并非当时的记录，越早时代的历史产生得越晚”这一认识。三人古史观点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或存在怎样的联系，一直以来都存在不同看法，但无论是哪一种看法，在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史料中，都找不到证明三人之间彼此有影响的直接证据。因此，下文不再过多纠缠于这类争议，而是以比较三位学者的中国古史演进观的不同特点和对《禹贡》中疆域记载的不同认识这两个方面为切入点，说明三人的理论来源以及论证时的侧重点都有所差别，不应简单将其等同看待。

1909 年 8 月，白鸟库吉在日本《东洋时报》上发表《支那古传说的研究》一文，指出儒家是支配中国上层社会思想的宗教，儒家经典中记载的尧舜禹是根据“自古流传的天地人三才说”编造出来的宗教传说而非真实历史。“尧”字取高远之意，指尧禅让之品德至公至明，《尧典》中记载尧派羲和观天文、授民以时，是主天事；“舜”字在《风俗通义》中记音同“循”，在《说文》中记音同“顺”，二者皆意指孝顺，是主人事；“禹”字虽然在《说文》中解释为虫，但“不当用于夏王”，“宇”与其同音，《释文》及孔颖达《正义》中都有“四垂为宇”的训释，对应《禹贡》中禹治九州四垂之水，是主土地，这就是尧舜禹的记载编造自三才说的逻辑。至于编造的原因，他解释说，当时儒教主导上层社会，道教则是下层社会因与儒教对抗而形成的宗教，发生在尧舜禹传说之前的三皇五帝，便是易学家和老庄学派根据阴阳五行说编造的。白鸟库吉在文中的解释为“虽然根据自古的流传，尧舜禹的传说发生在三皇五帝之后，但传说形成的时间不一定如此，如果说道教的形态形成于反儒教的过程中，那么表现道教派理想的传说发生的时间自然就会被设定在儒教之前，这是不言自明的”。^② 在这里，白鸟库吉对于中国古史演进传说是由儒道相争而推动的推断，与后来内藤湖南所述的“加上”原则有一定的相似性。

该文发表后，在日本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以林泰辅为代表的汉学家纷纷撰文反驳，坚持儒学传统，称白鸟库吉的观点为“尧舜禹抹杀论”。1912 年 4 月，作为对林泰辅等学者的回应，白鸟库吉又在《东亚研究》上发表了文章《〈尚书〉的高等批评》，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提出不仅尧舜禹、三皇五帝的传说皆为后世编造，其所依据的三才说与阴阳五行也并非发源自中国本土，而来自于迦勒底文明与亚述文明，波斯的祆教中有阴神阳神的概念，印度的佛教中也可见三才的思想。这种文化“无法认为是由中国传入西方的”，^③ 其结论自然就是两河文明与印度文明先传入中国，经过一番改造后成为中国的天地人三才说、阴阳五行说，中国的文化又影响了日本，形成了日本的神代史。

白鸟库吉提出尧舜禹的历史为虚构的传说，道家为了反对儒家又在此之上虚构了三皇，最终走向“中国文化西来说”乃至“日本文化西来说”，与当时日本的社会背景以及他个人的学术背景密切相关。对于 20 世纪初期迫切希望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快速融入西方近代化社会的日本来说，借助西方史学观念重新审视东亚历史，虽然有其自带的学术逻辑，亦含有强烈的政治诉求。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发动，白鸟库吉的中国古史观体现出适应日本侵略扩张策略的现实意图。1931 年 5 月，白鸟库吉在日本东洋文库作了题为《支那古代史的批判》的演讲，明确提出“古代文明的发祥地都体现出一种一般

① 如廖名春：《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陈其泰、张京华主编：《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 年，第 253-269 页），钱婉约：《“层累地造成说”与“加上原则”——中日近代史学上之古史辨伪理论》（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1999 年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436-447 页），李孝迁：《日本“尧舜禹抹杀论”之争议对民国古史学界的影响》（《史学史研究》2010 年第 4 期），李长银：《日本“疑古”思潮与“古史辨运动”》（《史学理论研究》2016 年第 1 期），[日]竹元规人：《顾颉刚の疑古学説と同時代日本の諸説との比較》（《九州中国学会報》2014 年卷，第 61-75 页）等。

② [日]白鸟库吉：《支那古傳説の研究》，《白鳥庫吉全集》第 8 卷，東京：岩波書店，1970 年，第 387、391 页。

③ [日]白鸟库吉：《『尚書』の高等批評（特に堯舜禹に就いて）》，《白鳥庫吉全集》第 8 卷，第 397 页。

性的法则——地理上的利好条件和与其他优秀文明的不断接触——由此看来，太古的中国应该几乎没有自主创造文明的力量，那么我们自然就会考虑其文明是由外国输入的。”^①拉克伯里、李希霍芬等西方学者从时代推论，认为输入方应是古埃及或古巴比伦文明，但白鸟库吉论证中国思想文化输入的源头是印度文明和迦勒底文明，由此就能反推出中国文明真正的开端应当后延到战国时期。

如果从学术角度分析，白鸟库吉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师从兰克的再传弟子利斯，是日本较早接受西方近代史学方法的学者之一，推崇对史料的实证考辨。白鸟库吉认为，中国、朝鲜乃至日本自身以传说构建起的“神代史”必须以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视角重新阐释。《支那古传说的研究》一文开篇便写道：“在西欧最近的学风以狂风暴雨之势席卷东亚的天地之前，东亚所谓的古代传说一直都被认为属于正确的史实，（学者们）对待二者的态度并无差别……如今时运一转，欧美的文化频频输入东亚，各科学术皆改换了面目，史学研究的方针亦随之革新，史学家们认识到正确的历史事实才是他们研究的基础。”^②可见白鸟库吉对中国古代传说的质疑及其研究方法，多由西方实证史学而来。白鸟库吉能够提出“尧舜禹抹杀论”和“东亚文化西来说”，主要是由于他接受了近代西方史学观念，其疑古思想的学术资源几乎不含有东亚文化因素。在《支那古传说的研究》《〈尚书〉的高等批判》等文中，亦多见直接使用英文术语和西方史学概念进行论证。这也使他有可能在近代西方史学思想在东亚推广之前，首先提出对中国古史的一己之见。

内藤湖南虽然与白鸟库吉年龄相近，但他原本的职业为记者，并未在大学中受过历史学专业的训练。1907年他经狩野直喜推荐成为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讲师，1909年晋升为教授，至此才真正进入专业的史学研究领域。内藤湖南提出中国古史的观点要晚于白鸟库吉，其立论点也与深受西方史学影响的白鸟库吉有所区别。首先，内藤湖南的《尚书稽疑》发表于1921年，此时距离白鸟库吉提出“尧舜禹抹杀论”过去了12年，日本学术界对怀疑和批判古史古书已经有了相当的接受度，只是对于如何在此基础上进行古史与古书的研究，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学者提出新的理论。内藤湖南应用“加上”原则进行的一系列研究，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作出的探索。内藤湖南对中国古史古书研究的重点并不是证伪，而是要建立起一套能够将被证伪的史料应用于古史研究中的方法。比起白鸟库吉，内藤湖南对待中国古史和古书的基本态度应该更加积极。其次，当时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两大重镇——东京帝国大学与京都帝国大学，都深受白鸟库吉所建立起的西方实证史学框架影响，内藤湖南的学术背景却与当时的大部分日本学者截然不同，^③其学术更多受到晚清经学家、章学诚《文史通义》及以富永仲基为代表的日本哲学家启发。内藤湖南的研究相对轻实证，也并未将儒学看作一种宗教，而是从东亚文化的角度出发，将其视为与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联系紧密的一种学术思想。综合以上两方面，内藤湖南在解释古史记载相“加上”的驱动力时，并未提及儒道之争，而是更强调儒家学说发展过程中不同学派的争胜导致古史和古书内容的增加，希望能够通过二者的互相论证，找到古书中可靠的古史资料，同时完成对儒家思想和学说发展历程的整理。

1923年5月，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文中首次提出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即“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以及“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④顾颉刚在文中简单梳

① [日]白鸟库吉：《支那古代史の批判（講演要旨）》，《白鳥庫吉全集》第8卷，第589页。

② [日]白鸟库吉：《支那古傳説の研究》，《白鳥庫吉全集》第8卷，第381页。

③ 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学科建立要晚于东京帝国大学，其教学队伍中也多有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曾受教于内藤湖南的明清史学者三田村泰助在介绍所谓的“京都学派”时认为：“即使说是京都学派，学者们也大都毕业于东京大学，也就是说（学派之争）更像是同一个家庭里的兄弟吵架，从学问的性格上看，二者是同质的。所以无论如何，京都学派也还是基于东京学派统帅白鸟库吉所确立的西欧风格的科学性实证主义而建立起来的。如此看来，也就只有以文化史观立学的内藤湖南一人是与东京学派异质的存在了。”（[日]三田村泰助：《内藤湖南》，东京：中公新书，1972年）

④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5月。

理了中国古史层累形成的过程：东周初年最早的历史只记载到夏禹，东周末年就追述到了尧、舜，秦灵公时祭黄帝，致使其立在尧舜之前，许行在黄帝之前立神农，《易·系辞》在神农之前立庖牺氏，李斯在庖牺氏之前立天皇、地皇、泰皇，汉代交通苗族后，又将苗族始祖盘古作为最早的开天辟地者，至此，中国古史基本框架才算完成。与白鸟库吉、内藤湖南将思想的斗争和对立作为古史传说逐渐向前追述的动力不同，顾颉刚更加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文献记载中对古史的“层累”堆积，而不认为古史系统的形成来自思想观念的互相争胜。

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时间晚于白鸟库吉与林泰辅的争辩，与内藤湖南一系列古史研究发表的时间则相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日两国史学近代化进程的先后差异。还应该注意到的，儒家经典及其构建的中国古史系统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和广泛影响力，在日本知识界是没有这种情况的，白鸟库吉、内藤湖南等日本学者不可能遇到顾颉刚提出打破旧的古史系统时所面对的那种压力与障碍。正如顾颉刚在《古史辨》第2册《自序》中所说，对于外界“说我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批判，“我以为学术界中应当分工，和机械工业有相同的需要。古史的破坏和建设，事情何等多，哪里可由我一手包办。就是这破坏一方面，可做的工作也太多了，竭尽了我个人的力量做上一世，也怕未必做得完”。^①虽然“建设”是顾颉刚疑古辨伪的最终目标，“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②但是在他疑古之初“破坏”工作尚多到“未必做得完”，“建设”之事只能来日徐徐图之。白鸟库吉中国古史研究的侧重点虽同样在于“破坏”，但他面对的儒学传统的压力相对较小，又有处于学术前沿的西方史学观念作为依据，使他能够少有论证地简单提出对于古史演进动力的观点；而处于白鸟库吉之后的内藤湖南，尽管成果并不充分，但无论是当时的日本学术界还是他本人，都更希望能够在“破坏”的基础上有所“建设”，建立起将古史史料应用于学术研究的有效方法。就此而言，表面上看三人对“时代越后，古史越前”的认识有一定的相似性，实际上他们的古史观在认知途径、推导依据、论证语境等方面都有差异，不宜简单相提并论。

内藤湖南、白鸟库吉、顾颉刚之间不同的学术取向以及对待史料的态度，还反映在对古史记载中具体问题的认识中，三人对《禹贡》中有关禹时疆域的记载进行研究考察时所体现出的不同特点，就是一个明显实例。

《禹贡》中记载的四至为“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如前所述，白鸟库吉在《〈尚书〉的高等批判》中认为中国文明来自西方，而《禹贡》中“西被于流沙”的记载在文中也为其佐证。因为《禹贡》中的疆域到达了靠近中亚地区的流沙，就能够证明在《尚书》产生的时代，中国已经能够交通西方，那么不仅佛教、祆教的思想，包括28星宿、一日分为12时等概念，也都能够通过两河文明传入中国。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或目的，白鸟库吉重在判断《禹贡》的成书时代，对其中的疆域记载并无过多质疑。

顾颉刚在回应刘掞藜、胡堇人的《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了推翻非信史四个标准，其中第二条为“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顾颉刚对此的解释是，《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有黄帝时的四至，《禹贡》和《尧典》中也分别记载有禹、尧时的疆域，营造出中国的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他认为实际情况应该是，“中国的统一始于秦，中国人民的希望统一始于战国”，以上各文本中记载的疆域实为战国乃至秦汉时的范围，“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秦的四十郡算做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③顾颉刚论述的重点仍为推翻非信史、转变中国人对古史的认知。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顾颉刚的学术取向以及对历史地理的研究都发生了转变，研究重点不再集中于疑古辨伪。1959年，顾颉刚应中国科学院地理所之邀为《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注释《禹贡》、选释《山海经》。

① 顾颉刚：《古史辨》第2册《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页。

②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第28页。

③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

在《禹贡》注释的导言中，顾颉刚提出“到了今天，经书的权威已经打破，我们才可以指出禹贡篇的缺点。然而它的优点，我们必当承认。在两千多年以前，交通不发达，巫风盛行，禹贡的作者能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用徵实的态度联系实际，作出全面性的地理记述，虽是假借了禹事作起讫，其实与禹无关，这是作者的科学精神的强烈表现。”^①看得出来，在数十年对中国古史的研究与考辨已经取得显著成果的情况下，打破旧的古史系统已经不是此时的顾颉刚想要强调的重点。

内藤湖南在《禹贡制作的时代》一文中对《禹贡》所载四至有所考察，再结合其《中国上古史》中与四至相关的内容，能够看出他在处理史料时与其他学者的不同。文中除《禹贡》之外，内藤湖南还列举了其他文献中所记载的不同时代的四至，如《吕氏春秋》中的夏禹时代、《淮南子》中的神农时代、《史记》中的黄帝时代、《史记》及《大戴礼记》中的颛顼时代等，认为这些四至说的记载虽有小异，但大体是相同的，不过是同一流传系统中的异说。甚至《管子·小匡》和《国语·齐语》中记载的齐桓公时期疆域，也同样来自这一系统。内藤湖南提出“虽然这种种说法之间多少还是有产生时代的早晚之分，但各种四至说所流传的时代无疑是差别不大的”，^②由于其中大多数的说法都对西至流沙有所认知，“由此看来，此说是诞生在中国地理学上对流沙的认识出现以后的时代”，^③即战国时期。之所以会得出这样一个粗略的、看似并不严谨的结论，是因为内藤湖南强调四至之说所反映的只是当时的中国人所认为的世界边际，既没有地理学上的学术意义，也不能作为某个时代疆域的证明，故而想要由此入手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几乎是不可能的。由此可以看出内藤湖南治学的两个特点：第一，他的古史研究重点是确定古史史料价值，并找到将其科学应用于古史研究中的方法，对《禹贡》及其他文献中四至说的分析考证同样是为了认定其史料价值，而不一定用作疑古辨伪的材料。第二，鉴于内藤湖南并无专业历史学训练的学历背景，并且有相当一段时间作为记者撰写新闻稿、采访稿的经历，使得他的学术论证在某些方面看起来并不十分严谨，但却不乏较为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独到的研究思路。

在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东亚的学术都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如何认识中国古史，关系到如何解释东亚文化产生的渊源与流变过程。对于当时的日本史学界而言，在中国古史研究中寻找新的理论解释、新的研究方法，仅从学术研究层面看，值得研究与借鉴。如内藤湖南的中国古史研究，他肯定了中国古史记载的史料价值，以儒家思想的发展为主轴架构起中国古史的演进系统，作出了有别于前人且意在摆脱近代西方史学观念片面影响的中国古史研究论断，其中虽有诸多不足，但都值得分析和总结。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内藤湖南等日本史家的中国古史观中存在的现实政治诉求，无论是其古史研究中存在着为日本侵略扩张提供资料的动因本身，还是或隐或显地服务于当时日本政论的观点，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

责任编辑：郭秀文

① 顾颉刚注释：《禹贡》，《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6页。

② [日]内藤湖南：《禹贡製作の時代》，《内藤湖南全集》第7卷，第168页。

③ [日]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上，《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夏应元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页。

中国古代“海丝之路”的文学镜像

纪德君

[摘要] 自古以来,描写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学作品不绝如缕。这些文学作品勾勒了敢于破浪逐梦的沿海商人形象,展现了陌生、奇异的岛国想象,揭示了沿海商人的经商手段与经商理念,描绘了“海丝之路”的重要门户——十三行,以及濒海商贸文化浸润下的城市生活。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沿海地区的文化精神气质,诸如开放、冒险、兼容、变通、务实、功利、诚信、公平等,正是由千年来的商贸文化传统孕育、熏陶而形成。“海丝之路”的文学书写,不仅为“海丝之路”保留了珍贵的文化记忆,对于今天如何更好地传承发展“海丝之路”的文化精神,建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海上丝绸之路 商人形象 岛国想象 商贸文化 城市生活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22)12-0165-10

近年来,伴随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海上丝绸之路”(下文简称“海丝之路”)的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研究者从地缘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社会学、中外文化交流等角度,对“海丝之路”进行了多维度、多层面的研究,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但相对缺乏文学角度的考察。实际上,自古以来描写“海丝之路”的文学作品不绝如缕。以往学者虽然也会从文学作品中征引相关记载,以资研究,但掌握的文学资料毕竟有限。本文主要依据历代小说、笔记、诗文等书写的“海丝之路”,从文学角度具体地观照“海丝之路”的历史风貌,揭示其丰厚的历史文化意蕴。

一、海丝之路上破浪逐梦的中外商人

虽然中国“海丝之路”很早就载诸史籍,但得到文学观照与艺术呈现,则主要始自唐代。较之以往各代,唐代更重视交通四邻,并专门开辟了两条通夷海道,即“广州通海夷道”和“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致使“海外诸国,日以通商”,^①由海道入华朝贡、贸易者络绎不绝。唐人诗歌中就不乏吟咏“远夷”由海路朝贡、入华贸易的诗句,如“冠冕中华客,梯航异域臣”、^②“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③“大海吞东南,横岭隔地维……百国共臻奏,珍奇献京师”,^④等等。唐人小说对海上贸易有更为具体的描述。如苏鹗《杜阳杂编》对南洋诸岛国所贡奇珍异宝有生动的记述;而戴孚《广异记·径寸珠》、牛肃《纪闻·水珠》、薛用弱《集异记·李勉》、李冗《独异志·李灌》、张读《宣室志·严生》、皇甫氏《原化记·鬻饼胡》等,则对波斯商人识宝的故事进行了饶有奇趣的摹绘。《广异记·南海大蟹》

作者简介 纪德君,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府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006)。

①[唐]张九龄:《开大庾岭路记》,[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50页。

②[唐]元稹:《元稹集》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9页。

③[唐]刘禹锡著,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18页。

④[唐]韦应物著,孙望校笺:《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08页。

还写一个波斯胡乘舶去天竺，至一海岛，发现岛上车渠、玛瑙、玻璃等诸宝，不可胜数。《杜阳杂编·元藏几》《广异记·慈心仙人》、范摅《云溪友议·登州贾者》等，则写华人入海遇险，漂至一岛，得宝而归的传奇。这些小说所叙，虽不无猎奇炫异的虚幻成分，但毕竟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多少寄托了唐代沿海居民幻想通过海上贸易发财致富的人生理想。

宋元时，中国“海丝之路”又有了进一步拓展，海上贸易日趋繁兴，朝廷还在广州、明州（泉州）、宁波、杭州、福州等地设立市舶司，负责对外贸易。宋元诗词中多有吟咏海上贸易者，诸如“巨舶通蕃国，孤云远帝乡”、^①“奇物试求师子国，去帆稳过大蛇洋”、^②“流求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③“万国梯航满禁衢，卉裳象译语音殊”，^④等等，可谓不胜枚举。又如宋洪适《师吴堂记》云：“岭以南，广为一都会。大贾自占城、真腊、三佛齐、阁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凡西南群夷之珍，犀象珠香流离之属，禹不能名。”^⑤元杨翮《送王庭训赴惠州照磨序》也指出：“岭南诸郡近南海，海外真腊、占城、流求诸国蕃舶岁至，象犀、珠玑、金贝、名香、宝布，诸凡瑰奇珍异之物宝于中州者，咸萃于是。”^⑥反映沿海居民出海贸易的小说，也屡见不鲜。如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十记述了庐陵商人彭氏子等乘舶入海至蕃部意外发财的故事；洪迈《夷坚甲志·昌国商人》《夷坚甲志·岛上妇人》《夷坚乙志·无缝船》《夷坚乙志·海岛大竹》《夷坚丙志·长人岛》《夷坚丁志·泉州杨客》等，也描叙了一些从事海外贸易的海商在海岛历险的故事。

逮至明清时期，中国政府虽然基本上实行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但是沿海地区的商民迫于生计，从未停止过下南洋、过爪哇漂洋过海谋发展的活动。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指出：“浙之宁、绍、温、台，闽之漳、泉，广之惠、潮，其民皆习于海”，“海上操舟者，初不过取捷径，往来贸易耳，久之渐习，遂之夷国。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旅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刺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⑦明末傅元初在《请开洋禁疏》中也指出：“滨海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区脱之地。”^⑧清康熙时海禁初开，民间海外贸易的繁兴更是前所未有的，蓝鼎元在《论南洋事宜书》中说：“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⑨后来，清政府担心海患，对民间海外贸易时禁时弛，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才被迫对外不断开放自由通商之门。与之相应，沿海商民与海外各国通商的风气也就更为浓厚。吴趼人在《发财秘诀》第一回中就慨叹“广东得风气之先”，而所谓的“风气”，也就是与海外各国通商谋利。

对于沿海地区的中外贸易活动，明清文学作了更为丰富多彩的艺术呈现。诸如“峨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⑩“江边鼓吹何喧阗，商航贾舶相往旋”、^⑪“惟见西洋人，朝朝海头见”、^⑫“红毛鬼子蜂屯集，峨舸大舰交风樯。殊方异物四面至，珠箔翠羽明月珰”，^⑬等等，这类描写“海丝之路”

①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八九“广南东路·广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869页。

② [宋]洪适：《设蕃致语》，《盘洲文集》卷六十六，《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1922年影印。

③ [宋]楼钥：《送万耕道帅琼管》，《攻媿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影印，第302页。

④ [元]袁桷：《元日朝回》，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丙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36页。

⑤ [宋]洪适：《盘洲文集》卷三一《师吴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57页。

⑥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一八四三《杨翮》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11页。

⑦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69页。

⑧ [清]陈梦雷、蒋廷锡等辑：《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第208册《方輿汇编·山川典·海部》第316卷，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

⑨ [清]蓝鼎元：《鹿洲全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⑩ [明]孙蕡：《广州歌》，《西庵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1册，第495页。

⑪ [明]韩上桂：《广州行呈方伯胡公》，[清]温汝能纂辑：《粤东诗海》卷四十一，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88页。

⑫ [清]屈大均：《西洋菊》，陈永正主编：《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卷十，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48页。

⑬ [清]李坛：《澳门歌》，陈永正编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第319页。

的诗篇可谓洋洋大观。笔记、小说等自然也不例外。如明周叔懋《泾林续记》记载,“闽广奸商,惯习通番”,^①有商人苏和购福橘出海,卖与夷人,竟然获利千金,归国途中又从一荒岛意外获得一巨型龟壳,卖与波斯商人,得银五万两。后来,凌濛初将该故事加工成《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鼃龙壳》,故事更加精彩动人。清初李渔小说《无声戏》第四回,写南海县中靠“飘洋起家”的杨百万,资助当地一位弃儒从商的秦世良“去做飘海的生意”,最后因祸得福,发家致富。袁枚《续新齐谐》卷一《浮海》,写温州人王谦光,“初至日本,获利数十倍”,后遇飓风,至一岛国,受国王礼遇,得“赀钱颇多”。^②钮琇在《觚賸》卷四《海天行》中记载了海瑞之孙述祖,“治一大舶”,伙同濒海贾客三十八人,互市海外诸国。崇祯壬午二月,述祖等人扬帆出洋,至一岛国,获无数奇珍异宝,“入广州,出囊中珠,鬻于番贾,获货无算”。^③青城子《亦复如是》卷二,记载了一个姓郭的番禺人,“以航海贩货为业”,“尝遇飓风,缆断船飘,瞬息千里,不辨南北”,漂至一岛,遇救于夷民的故事。^④清末王韬《淞隐漫录》卷四《海外美人》,写汀州商人陆梅舫,“家拥巨资,有海舶十余艘,岁往来东南洋,获利无算”。^⑤清末“钜鹿六郎”所撰《海外萍因》,写广州陈生投奔南洋做生意的亲戚,遭遇不测,与一名英国人、一名法国人流落荒岛,意外发现钻石,发财归来。^⑥这些小说中,“冒险出海——遭遇风暴——漂至一岛——发财回归”,可谓屡见不鲜。这一类海外传奇故事,无疑真切地反映了沿海商民甘冒风险到海外贸易以求发财致富的社会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沿海商民不仅敢于破浪乘风,与东南亚诸岛国进行贸易往还,甚至还在一些岛国安营扎寨。明马欢《瀛涯胜览》记载,“爪哇国”中有“新村”,“原系沙滩之地,因是中国之人来此创居,遂名新村。至今新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其各处番船多到此地买卖”;而“旧港国”中,“国人多是中国广东、漳、泉州人来居此地,人甚富饶”;至于“暹罗国”,其“国语颇似广东乡谈音韵”。^⑦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也记述其在爪哇国中,“又东行半日,至厮村,中国人客此成聚落,遂名新村,约千余家,村主广东人。番舶至此互市”。该卷还记载了一个名叫梁道明的广东南海人,“贸易于爪哇国,久而情熟,挈家住居,积有年岁。闽、广军民弃乡里为商,从之者至数千人,推道明为长”。^⑧明末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所引福建地方文献记载,“漳泉民贩吕宋者,或折阅破产,及犯压冬禁,不得归,流寓夷土,筑庐舍,操佣贾杂作为生活,或娶妇长子孙有之,人口以数万计”。^⑨

至于清代,中国沿海商民侨居日本、朝鲜、吕宋、越南、马来、缅甸、印度、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澳洲、新西兰等地,从事商贸活动的,更是在在有之。清后期英国人约翰·汤姆森指出,从广东、福建移民东南亚诸岛国的商人,“几乎与所有能经营外国货的岛屿建立了联系,其代理人遍及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甚至到达印度支那大陆。他们用本国产品和当地人进行物物交换,由此建立了经常性的社会联系,同时也成为商业的纽带。就这样,很多来自东方的产品,通过这些中国中间商,或直接通过他们的代理人远销欧洲和美洲”。^⑩清末徐珂也慨叹:“吾国侨商之旅外贸易者,以粤人为最多,势力亦以粤人为最盛。粤人之营业思想,固较胜于他省人也。”他在《清稗类钞》中还记载了广州人阿胜,年少孤苦无依,游于美利坚国之旧金山,因善于贸易,居六载,积货颇丰;又记载了一位名叫张振勋的广东

① [明]周叔懋:《泾林续记》,《丛书集成新编》第8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2008年,第83页。

② [清]袁枚:《新齐谐续新齐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579页。

③ [清]钮琇:《觚賸》,《笔记小说大观》第30编,台北:新兴书局,1979年,第3204-3207页。

④ [清]青城子:《亦复如是》,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67-68页。

⑤ [清]王韬:《淞隐漫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93页。

⑥ 刊载于广州《赏奇画报》1906年第5期。

⑦ [明]马欢:《瀛涯胜览》,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9页。

⑧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95、293页。

⑨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备录·漳州府志·洋税考》,《顾炎武全集》第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094页。

⑩ [英]约翰·汤姆森:《镜头前的旧中国:约翰·汤姆森游记》,杨博仁、陈宪平译,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人，“壮年尚赤贫，至南洋群岛，不二十年致富千万，为南洋巨商”。^①清末，黄世仲在小说《宦海潮》中写广东新宁人李洪自美国华盛顿开国时，已自航海到美国，其家族在美经营已逾百年。黄伯耀在小说《片帆影》中也写了一富家子黄汉生，冒险出洋游历，他“先到香港，寓于某栈”，偶遇黄兴，黄对之曰：“吾国人囿于浅见，出门百里，家常惘惘，是岂足与语环瀛之大哉？某虽经游不远，然就所历之南洋群岛而论，觉山岳之出产，洋海之奇幻，海岛上居人之自由逸乐，已迥非惨受专制之种族所得而问也。况乎为吾足所未历，目所未观者？”于是深受鼓舞，只身乘船赶往“新嘉坡”，此后不久，又“附轮入缅”，不料遭遇飓风，漂至一海岛，“俯视山岩，现一皮壳，如龟背模样。生检视之，有明光光的宝珠数粒，大如鸽卵”，因他将随身所带面包饼干给予岛民，又获“大珠二颗”，后来脱险，“复抵新嘉坡后，将珠贩卖，骤变巨富，开张商店。即命亲信人汇单返里，挈家同往新嘉坡之山巴（即园口）居住”。^②上述这些故事虽多为小说家言，但是它们所表现的沿海商人敢于漂洋过海、冒险致富的精神却是真实无疑的。1907年，有粤商曾自豪地说：“各省无不有粤商行店，五大洲无不有粤人足迹……我粤省于历史、地理、物产、民俗得商界优胜之点，似非他省所及，谓为天然商国，谁谓不然。”^③

二、海丝之路上的岛国想象

当文学作品描述滨海商民漂洋过海、投身遐荒时，一个个陌生的、神奇的岛国便借由亲历者的见闻感受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写一士人随新罗使，被飓风吹至一处，人皆长须，语与唐人通，人物甚盛，栋宇衣冠，稍异中国，士人做了附马，后来方悟此乃虾国。宋刘斧《青琐高议别集》卷四写王榭以航海为业，具大舶，欲往大食国，不料遭飓风翻舶，侥幸附木，漂至一岛，为一老翁所救，与老翁之女结婚，后来受国王礼遇，以法术助其回国，榭方悟其所到之岛乃“燕子国”。宋洪迈《夷坚甲志》卷七写泉州一海商，欲往三佛齐，遭飓风，漂至一岛，为一妇人所救，与她生活七八年，生三子，后来趁机逃离。《夷坚乙志》卷八写宁波两海商，被风暴吹至一岛，遇一长人，高三四丈，其行如飞，抓住两人后，以巨藤穿其肩胛，缚之于高树，返身取镬欲烹之，两人以刀断藤，侥幸逃走。明冯梦龙所编《情史》卷二十一《焦土妇人》《海王三》，也写海商被风浪吹至某海岛，遇女子相救，同居生子。这些小说所写岛国多半未脱原始野蛮习气，甚至带有某些动物习性，一旦身入其中，就可能遇险罹难，当然也有可能遇救，在岛上娶妻生子。联系上文所说沿海商民多有在东南亚岛国安营扎寨者，可知这些小说所叙商民在岛国历险的故事，虽不无臆想、附会或前后蹈袭的成分，但也有一定的现实依据。

至于中国商民在岛国发现异宝奇珍，得以发财致富，也是这些小说中常见的情节。唐苏鹗《杜阳杂编》写元藏几担任过海使判官时，遇大风浪，漂至一岛，发现这里“花木常如二三月，地土宜五谷，人多不死，亦出凤凰、孔雀、灵牛、神马之属。又产分蒂瓜，瓜长二尺，其色如椹，一颗二蒂。有碧枣、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所居或金阙银台，玉楼紫阁，奏萧韶之乐，饮香雾之醕”。^④唐戴孚《广异记·慈心仙人》，写袁晃出海，“其船遇风，东漂数千里”，至一岛上，岛中“有城壁，五色照耀。回舵就泊，见精舍，琉璃为瓦，玳瑁为墙。既入房廊，寂不见人。房中唯有胡猓子二十余枚，器物悉是黄金，无诸杂类。又有衾茵，亦甚炳焕，多是异蜀重锦。又有金城一所。余碎金成堆，不可胜数”。^⑤诸如此类的情节，不胜枚举。直到清末，王韬仍对此津津乐道，如《淞隐漫录》卷三写闵玉叔出洋，被飓风吹至海岛，遇一老媪，自述其全家在南宋末为避战乱入海来此定居，其女谢芳蕤带闵游海市，只见“市场周围约数十里，各国之人麇至，虬髯侠客，碧眼贾胡，无不出其中”，又至一宝山，“凡遇有缘者，

① [清]徐珂编撰：《清稗类钞·农商类》，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31、2354页。

② 黄伯耀、黄世仲主编：《中外小说林》1908年第8期。

③ [美]西·甫·里默：《中国对外贸易》，卿汝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105页。

④ [唐]苏鹗：《杜阳杂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90-1391页。

⑤ 李时人编校，何满子审定：《全唐五代小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9-310页。

辄掘地得宝物，火齐、木难，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俯拾即是”，后来闵又遇美女燕娇，娶归故里。^①其他如《淞隐漫录》卷一《仙人岛》、卷四《海外美人》、卷八《海底奇境》《海外壮游》等，均写主人公岛国艳遇、获赠珍宝的传奇。这些描写虽属异想天开，但也多少反映了沿海商民对于海洋岛国的遐想与憧憬，特别是表达了清末海禁大开后，一部分国人想要探奇海外、了解世界的强烈渴望。

耐人寻味的是，上述小说家在描述主人公的岛国奇遇时，虽然流露出艳羡、向往之情，但秉持的文化心态仍然是华夏中心主义，他们或将岛国之民视为夷蕃，刻意夸大其野蛮凶残的一面，或写他们对华夏文明由衷仰慕，不仅自愿入贡，还乐意接受华夏文明的熏陶。如唐范摅《云溪友议》写登州贾者来到新罗，国君接以宾礼，并说：“吾虽夷狄之邦，岁有习儒者，举于天阙，登第荣归，吾必禄之甚厚。乃知孔子之道，被于华夏乎！”^②清袁枚《新齐谐》卷十五写常州人吕恒，以贩洋货为业，为海风所吹，飘入一国，国人“闻是中华人，颇知礼敬”。^③《红楼梦》第五十二回写宝琴自述其海外游历时遇见真真国一女子，热爱中华文化，既通中国诗书，又会讲《五经》，还能作诗填词。《淞隐漫录》卷四《海外美人》，写岛民所居“颇似中华宇舍，余皆板屋”，“岛中人皆倭国衣冠”，“女子肌肤白皙，眉目姣好”，老者“谓此为日本外岛，岁时贡献”，并自言“曾至中国，读书京师十余年”；^④卷八《海底奇境》写瑞士女子兰娜说自己仰慕中华文化已久，希望聂瑞图能够教她中国的语言文字，聂欣然应允。宣鼎《夜雨秋灯录》卷四《北极毗耶岛》，写松江朱笏岭遭飓风飘至一岛，岛民“闻客自天朝来，争来问讯，竞具壶觞，且为烘湿衣，设寝榻”，“进松子饼、藤花糕”，引见首领，首领云：“茫茫孤屿，文星忽临，仆正有所求，岂非天乎！中原才士必熟六经，乞为蚩蚩者日授一二，感不可言。”^⑤于是请朱传授中华文化，欲为岛民“稍化气质”。当然，也有个别岛国对中华文明采取抵制甚或敌视的态度，如《镜花缘》中写姚芷馨、薛蘅香将中国养蚕织纺的丝绸文化传布到巫咸国，不料竟引起木棉种植户和经销商的仇视，差点儿送命；而唐敖和多九公为女儿国打造器具、治理水患，最后也被迫落荒而逃。这些描写固然透露了华夏中心主义的文化心态，但也或多或少反映了华夏文明对海外岛国的沾溉与影响。

三、海丝之路彰显的商贸文化精神

受濒海商贸文化传统的浸淫，中国沿海商民自古便有重商、经商的风俗。清人姚延启在《上赵观察论粤俗书》中说：“粤地边民，素食于洋，巨室大贾，惟视洋舶之大小，利则有百万之息，不利则人舶俱漂，此逐利轻生，风俗所由成也。”^⑥这种敢于漂洋过海、逐利轻生的冒险、进取精神，与内地基于农耕经济而产生的安土重迁、和平自守的文化心态适成鲜明对比。

从文学作品对“海丝之路”的描写，可以看到唐宋以来特别是明中叶以后，东南沿海商民对外贸易日趋频繁，商贸活动几乎遍及异域番邦，他们不仅把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等带到国外，同时也将五花八门的洋货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以牟取丰厚的利润。如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就说：“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耒耜而从之。”^⑦也因此，清代广府地区从事洋货买卖的商民随处可见。《番禺末业志·工商业第四》载，清中后期广州开洋货店的层见叠出，如同治以来，番禺之茭塘司、鹿步司、慕德里司等所辖各墟、市，“均为工商业之所聚，而以河南为最繁盛，有商店数千间、工厂数百间，席庄虽仅十余间，而所办洋庄席，行销于外洋，国外贸易尚得占

① [清]王韬：《淞隐漫录》，第113-117页。

② [唐]范摅：《云溪友议》，《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第1272页。

③ [清]袁枚：《新齐谐续新齐谐》，第324页。

④ [清]王韬：《淞隐漫录》，第194页。

⑤ [清]宣鼎：《夜雨秋灯录》，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215-216页。

⑥ [清]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七五，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2695页。

⑦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1-372页。

一席”。^①小说《圣朝鼎盛万年青》里的粤人李慕义，即承充洋商，入口洋货转售。《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的咸水妹，用自己的积蓄在香港开了一间洋货店。《发财秘诀》里的区丙，在藩台衙门前开了一家“丙记”洋货字号，又在香港中环地方开了一家“丙记”杂货店。清末上海开埠后，粤商又纷纷涌至沪上经营洋广货铺，贩卖从外国进口的洋货或产自家乡的广货。光绪时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就写道：“广洋杂货粤人开，灯镜高悬布匹堆。排列繁多装饰丽，五光十色映楼台”，“满街装饰让银楼，其次绸庄与疋头。更有东西洋广货，奇珍异产宝光流。”^②

有的粤商经营当时新兴行业——保险业。陈坤《岭南杂事诗钞》云：“别开生面效居奇，只为桃僵李代之。水火无情风不测，黄金化险可如夷。”其注曰：“粤东香港地方，华洋人俱有开保险行生理，无论是何物事，向纳银两均可保，无水火之患。倘遭不测，许为赔偿，经商者故甚乐从。近年转让亦皆照办，谓之买燕梳。燕梳系洋语，犹保险之意也。”^③粤商中也有擅长精打细算、经营放贷以牟利的。如清庾岭劳人所写小说《蜃楼志全传》中的广州十三行行商苏万魁，除了经营洋行生意，还兼营放贷，“放债七折八扣，三分行息，都要田房货物抵押，五月为满，所以经纪内如兄若弟的固多，乡邻中咒天骂地者亦不少”。^④其他如走私鸦片的、贩私盐的、办赌场的、开妓院的、办船运的、开煤矿的，不一而足。清末彭养鸥《黑籍冤魂》第四回就写广府商人吴春霖，不怕官场禁令森严，与贩鸦片的洋商串通，“做了私贩的头脑”，“不上数年，积得家资数十万”。^⑤黄世仲《廿载繁华梦》写广府巨商周庸祐不仅在香港置办产业，还投资银行，入股开矿；梁早田则在香港开办“□记”，还“供应轮船伙食，兼又租写轮船出外洋去”。^⑥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有的粤商还蓄养黑奴。北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记载：“广州富人多畜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欲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谓之野人，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卷而黄，有牝牡，生海外诸山中。”^⑦有的竟然干起贩卖外国奴隶的勾当。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记载：“有曰奴囷者，出暹罗国……有罪者没为奴囷，富豪酋奴囷至数百口，粤商人有买致广州者，皆黧黑深目，日久亦能粤语。”^⑧清末，有些粤人甚至拐卖同胞出洋作苦工，俗称“卖猪仔”。也有的粤人是被亲戚哄骗上当的，如《劫余灰》第十六回写陈耕伯与同学游于艺、柴也愚，被其表叔朱仲晦骗到香港去看赛会，结果被“卖猪仔”。后来，陈耕伯劫后余生，痛苦地回忆了他被卖猪仔的整个过程：先是被骗误入“猪仔馆”，签了卖身契，喝了迷魂药，糊里糊涂地被装装入船，“昏昏沉沉，也不知走了多少天，到了一处，把一众人赶上岸。到了一处房屋，把我们一个个用麻布袋装起来，便有人来讲论价钱，逐个磅过，又在袋外用脚乱踢一会儿，便又把我放了出来……此时便有两个外国人，把我们当猪羊般驱赶出去。又到了一个轮船上，行驶了三天，才到了一个地方。重复驱赶上岸，到了一所烟园里，叫我们给他种烟……总共五百人做工，每日受他那拳脚交下，鞭挞横施，捱饥受渴的苦，一个月里面，少说点，也要磨折死二三十个人”。^⑨可见，为了发财致富，有些粤人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这当然是粤商当中的败类。

对于经商的理念与方法，粤商也颇为讲求。徐珂《清稗类钞》记载：“粤人之设肆贸易者，于营业之方法颇能讲求。如国货、绸缎、洋货诸肆，均任人观览，不问为谁，皆可径入，肆人绝不加以白眼也。故著名之洋货公司，自晨至夜，终日喧阗，游人极夥。盖舶来品皆为奇技淫巧之物，必使人详观之，方足以引起其购买之兴趣。苟珍裘棣中，不令他人浏览，则人且不知某肆之有某物，又何论于购买也。吾

① 郭启祚：《番禺末业志》卷四《工商业第四》，广州：南村草堂丛书本，民国年间刻本，第4页。

② 丘良任等编：《中华竹枝词全编》（上海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276、268页。

③ 钟山、潘超、孙忠铨编：《广东竹枝词》，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3页。

④ [清]庾岭劳人：《蜃楼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页。

⑤ [清]彭养鸥：《黑籍冤魂》，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8-119页。

⑥ [清]黄小配（黄世仲）：《廿载繁华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4页。

⑦ [宋]朱彧：《萍洲可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90-291页。

⑧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第234页。

⑨ [清]吴趼人：《吴趼人全集》第5卷，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95页。

国侨商之旅外贸易者，以粤人为最多，势力亦以粤人为最盛。粤人之营业思想，固较胜于他省人也。”^①另外，粤商一般多持薄利多销的经营策略，即使利润微薄，也愿意与人贸易。明叶权在《贤博编》中写道：“广城人家大小俱有生意，人柔和，物价平，不但土产如铜锡俱去自外江，制为器，若吴中非倍利不鬻者，广城人得一二分息成市矣。以故商贾骤集，兼有夷市，货物堆积，行人肩相击，虽小巷亦喧填，固不减吴阊门、杭清河坊一带也。”粤人经商务实，重信誉，较少贪图一时小利而置长远利益于不顾。叶权《贤博编》又说：“广城货物市与外江人，有弊恶者，五七日持来皆易与之。非若苏杭间转身即不认矣。”^②这种讲信誉的做法，就使得外省人比较放心与粤商交易。粤人对商业信誉的看重，就连外国人也交口称赞，如约翰·斯塔德在《1897年的中国》中就特意提及粤商的诚信，他说：“我还是很高兴提及一点我仔细调查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在商业交往中的诚信。在每年元旦的时候结清所有的往来账目，几乎是中国商人固定不变的习俗，这样在来年就不会遗留任何问题。而且我听说，如果哪个商家在那个时间没有偿清自己的债务，他就会被视为违约者，而且他的信誉也就此彻底丧失了。英国和德国的商人告诉我们说，中国的商业信誉是最高等级的。”^③

粤商的务实精神还反映在平易近人、低调本色上。如《发财秘诀》中的区丙，虽然一年比一年富起来了，“然而他还是乡人本色，平日只穿的是蓝布短打、黑布裤，脚上穿的一双细蓝布袜，除了拜年、贺节、赴席之外，轻易不穿长衣白袜，所以上中下三等人都都交处得来。那上等人虽然见他穿了短衣，然而人家都知道他是个发财人，就和他招呼，也不失了自己体面。那下等人见他，虽是财主，却是打扮朴素和气迎人，乐得亲近亲近他，不定从中还想叨他点光呢”。^④而粤商对待顾客，也常常是春风满面，不会因为贸易不成就翻脸恶色。徐珂《清稗类钞》写道：“京师、广州各肆，凡值交易而不成者，亦怡悦其颜色以对之。如交易已成，则于买主临行时，必致声道谢，虽数十钱之微，亦然。其意殆谓吾既设肆以求利，则无论买者出钱购物之多寡，皆为我获利之源，衣食之本，故虽一钱之贸易，亦不可不谢也。”^⑤清末游历港穗的英国人约翰·汤姆森曾回忆道：“我一走进一家广东人的商店，就受到店主本人——一个讲英语的广东绅士的欢迎；他身穿一件汕头绸布上衣，黑色绉绸马裤；脚登一双天鹅绒镶面的精致布鞋，白色的长袜像绑腿一样。他的谈吐显示了中国人特有的深思熟虑和落落大方。他的助手穿着也很得体，站在带有玻璃柜橱的乌木柜台后面，明净透亮的玻璃上映照着他充满好奇神色的脸庞。商店的一边放满了成卷绸布和草编织品，所有的商品上都标明价钱；地板上摆着精心布置的各种青铜器、瓷器、乌木家具和漆器制品。这些人通常来说是他们本民族的典范，买卖公平，哪怕你只买一件很便宜的玩具，他们也视同你订了一整船绸子那样彬彬有礼地对待你。”他还说：“当你走进广州的商店，经常可以看见店主一手拿着书，另一只手拿着烟袋或扇子，在全神贯注地读书。如果你期望他们会马上站起来，面带微笑地迎上前来，摩挲着双手，一面猜测着，一面拿出你可能想要的东西，根据判断来决定对你是否卑躬逢迎，还是粗蛮无礼的话，那你肯定会大失所望。恰恰相反，你的出现不会引起他的注意，除非你正巧拿起什么东西；那么你会听到扇子折起来的声音，同时感到店主那犀利的目光始终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但是，一直要等到你开口询问商品，那位先生确知你是要买货的时候，他才会不慌不忙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介绍他的商品，非常有礼貌但又漫不经心地说出售价；那分明是在说：‘如果你觉得合适，那咱们就成交。’”^⑥粤商之热情好客、有礼有节、善于经营，于此可见一斑。

总之，正是在长期对外商贸实践中，沿海商民尤其是粤商逐渐形成了对外开拓冒险、贸易务实功利、重视商业诚信、讲究经营之道等商贸文化精神。

①[清]徐珂编撰：《清稗类钞·农商类》，第2331页。

②[明]叶权等：《贤博编 粤剑编 原李耳载》，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3-44、46页。

③[美]约翰·斯塔德：《1897年的中国》，李涛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79页。

④[清]吴趸人：《发财秘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页。

⑤[清]徐珂：《清稗类钞》，第2291页。

⑥[英]约翰·汤姆森：《镜头前的旧中国：约翰·汤姆森游记》，第18-19、58-59页。

四、海丝之路的重要门户：广州十三行

清代沿海商人对外开展商业贸易，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门户，就是广州十三行。十三行，是清政府指定的带有半官半商性质的中西贸易商行，因其专门负责对外贸易业务，故又称洋行。在“一口通商”时期，“十三行”的发展臻于鼎盛，成为与亚洲、欧美主要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门户。

清初屈大均曾撰《广州竹枝词》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①据此诗，可知“当时十三行行商称为‘官商’，外舶之停驻地为澳门内之十字门，贸易货物之大宗为五丝、八丝之牛郎、云光广缎，而堆积于十三行者累累皆黄白物云”。^②乾隆时刘世馨在《粤屑》卷八中记载：“省城西关外十三行，承接外洋佛兰西、英吉利、大小西洋、荷兰、花旗各国货物，其吕宋、暹罗、安南、伽拉巴各内洋货，则别有行主之。”^③十三行由此进入全盛时期。朱树轩《广州十三行竹枝词》云：“番舶来时集贾胡，紫髯碧眼语喑呜。十三行畔搬洋货，如看波斯进宝图。”鲍钐《广州竹枝词》云：“海珠寺前江水奔，诸洋估舶如云屯。十三行里居奇货，刺绣何如倚市门。”江仲瑜《羊城竹枝词》云：“夷商交易用洋钱，万里来瞻上国天。货物到关齐纳税，海珠湾泊火轮船。”徐振《珠江竹枝词》云：“十三行货总堪夸，新到东洋漂海艚。奇货独推英吉利，争先挑取贡官家。”^④这些诗歌形象地再现了清中后期洋商不远万里舶着奇货，络绎不绝地来到海珠湾十三行，纳税之后用洋钱与中国人交易的热闹情景。清代嘉庆时，庾岭劳人的小说《蜃楼志》开篇也这样写道：“广东洋行生理在太平门外，一切货物都是鬼子船载来，听凭行家报税，发卖三江两湖及各省客商，是粤中绝大的生意。”^⑤太平门是广州新城的八个城门之一，位于城西，门外有太平桥，通往西关太平街。十三行便位于太平门外西关一带，“行家”即行商。从这段话可知十三行行商负责为外国夷商报纳关税，并承接进口的洋货再发卖到全国各地。因垄断了外贸往来，所以是“粤中绝大的生意”。

十三行行商还在河边修建夷馆，租给外商居住。沈复在《浮生六记》卷四《浪游记快》中说：“十三洋行在幽兰门之西，结构与洋画同。”^⑥说十三洋行的建筑和西洋画里画的一样，即西式风格。清人李斗也到过广州，他在《扬州画舫录》里写道：“盖西洋人好碧，广州十三行有碧堂，其制皆以联房广厦，蔽日透月为工。”^⑦乐钧在游历广州后也作有《岭南乐府·十三行》，云：“楼兰粉白旗杆长，楼窗悬镜望重洋。”^⑧说的是蓝色洋楼与白色旗杆相映生辉，洋楼窗前还悬置望远镜，人们可以凭此远眺重洋。叶詹岩《广州杂咏·十三行诗》亦云：“十三行外水西头，粉壁犀帘鬼子楼。风荡彩旗飘五色，辨他日本与琉球。”^⑨由此可知，夷馆前的旗杆上飘扬着各国国旗。张九铨《番行篇》则对十三行夷馆作了更为细致生动的描述：“广州舶市十三行，雁翅排城蜂缀房。珠海珠江前浩淼，锦帆锦缆日翱翔。蜃衔珊瑚移瑶岛，蛟织冰绡画白洋。别起危楼濠镜仿，别营奥室贾胡藏。危楼奥市多殊式，瑰卉奇葩非一色。鞞鞫丹穿箔对园，琉璃绿嵌窗斜勒。莎罗彩矗天中袅，碧玉栏干云外直。”^⑩

除了对十三行的贸易及其夷馆等进行摹绘外，还有的小说对十三行行商有真实的描写。如《蜃楼志》第一回说：“这洋商都是有体面人，向来见督抚司道，不过打千请安，垂手侍立，着紧处大人们还要留茶赏饭，府厅州县看花边钱面上，都十分礼貌。”书中介绍：“一人姓苏名万魁，号占村，口齿利便，人才出众，当了商总，竟成了绝顶的富翁”，“他有五十往外年纪，捐纳从五品职衔，家中花边番钱整

①[清]屈大均：《广东新语》，第427页。

②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9页。

③[清]刘世馨：《粤屑》，[清]关涵等：《岭南随笔》（外五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2页。

④钟山、潘超、孙忠铨编：《广东竹枝词》，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47、87、103、173页。

⑤[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1-2页。

⑥[清]沈复：《浮生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8页。

⑦[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85页。

⑧[清]张应昌：《清诗铎》（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23页。

⑨[清]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二，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第26页。

⑩[清]张九铨：《番行篇》，陈永正编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第293-294页。

屋堆砌，取用时都以箩装带捆”。不过，这些行商又常常受到粤海关官员的勒索。苏万魁就被关部勒索了三十万两银子。当时有人作诗讥刺此事云：“新来关部本姓赫，既爱花边又贪色。送了银仔献阿姑，十三洋行只剩七。”^①可见，粤海关衙门大肆敲诈勒索，也是十三行衰落的原因之一。《蜃楼志》中所写的十三行行商，还有真实可考的人物，这就是伍怡和家族。“怡和”指的是怡和行，由行商伍国莹在乾隆年间创立。伍国莹之子伍秉鉴接手怡和行后，扩展业务，把怡和行经营得越发成功，其后更跃居行商第一位。据伍家自己估计，至道光十四年（1834），伍秉鉴积累的财产已达26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廷近半年的财政收入，俨然是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黄世仲《洪秀全演义》第二回说：“且说当时海禁初开，洋货运进内地，已日多一日，因此以洋务起家的还自不少。就中单说一家字号，名唤怡和。这‘怡和行’三个字，妇孺通统知得，确算得岭南天字第一家的字号！”^②吴沃尧《发财秘诀》第三回也写区丙发了一注大财后，“就有那一班发财人和他往来，所以他就得了门路，把二、三万现银存放在十三行第一家字号‘伍怡和’里生息。顺便就托他带点洋货来，自己却在藩台衙门前开了一家‘丙记’洋货字号，又到香港中环地方开了一家‘丙记’杂货店”。^③

鸦片战争后，由于海禁被迫大开，沿海主要城市陆续变成了对外自由通商口岸，十三行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其对外贸易的辉煌景象已不复存在。1857年1月12日，英军一把火烧了十三行商馆区，十三行由此消逝在历史的长河里。

五、海丝之路影响下的城市生活

基于对外商贸而形成的商业文化，也在日常生活层面深刻地塑造了滨海的城市文化。以千年商都广州为例，其衣食住行就融入了不少西洋文化元素。清邓蓉镜《广州杂咏》云：“繁华世界绮罗身，花样于今又一新。短短汗衫窄窄袖，时装争效泰西人。”朱子夷《续羊城竹枝词》云：“手表项链镜双眸，闲步长提逐队游。郎发髹髹依髻耸，笑他一样是风兜。”诗后注云：“女饰近日喜用手表、项链并金丝眼镜。妇女近尚高髻，俗呼风兜髻。男子卷发于额，亦似风兜。”可见，在服饰打扮方面广州市民对西人的争相效仿。不仅如此，清末女子结婚也改穿白色的婚纱，而嫌穿红着锦俗气。崔海帆《续羊城竹枝词》即云：“碧藤轿子簇鲜花，婚礼文明半世家。吉服却嫌红锦俗，新人头罩白轻纱。”而女子新婚后回娘家，也不再坐轿子，而是与新郎携手同行。清末南海人胡子晋《广州竹枝词》云：“近来女子半风骚，旧俗拘墟笑尔曹。新妇归宁无用轿，两人携手更时髦。”注云：“粤俗，新嫁娘归宁向用桥，帘幕低垂，羞人见也。近日新嫁娘七朝以后，有偕夫婿仿西派，两人携手归宁者矣。”^④

至于饮食，广州人也喜欢博采西洋之长，为己所用。清佚名《舟车闻见录》记载：“外洋有葡萄酒，味甘而淡。红毛酒色红，味辛烈。广人传其法，亦酿之，与洋酒无异……又有黑酒，番鬼饭后饮之，云此酒可消食也。番人药物，多蒸为露，或榨为油，如蔷薇露、桂花露、荷花露、丁香油、肉桂油、薄荷油、檀香油，今广人皆能为之。”^⑤清末蓬园在《负曝闲谈》第二十一回中甚至说：“我们广东菜竟有些像外国大餐了。外国大餐有些都是兼著甜咸两味的。譬如一盆烤猪肉，他旁边摆上了玫瑰沙士或是苹果沙士，就是这个道理。”^⑥

在商业建筑和城市景观方面，清代中叶以后广州相继出现了不少西方酒店与百货公司等。胡子晋《广州竹枝词》即云：“大东东亚又西濠，酒店趋时竞俊髦。建筑谁家夸第一，层楼还让大新高。”注云：“大东、东亚、西濠均为酒店名。大新公司高十二层，当时为最高楼房。”其咏百货公司，则云：“大洋货铺好销场，拆白联群猎粉香。毕竟西关人尚侈，食完午饭去真光。”注云：“十八甫真光公司百物俱

① [清] 庾岭劳人：《蜃楼志》，第1-2、22页。

② 黄世仲：《洪秀全演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4页。

③ [清] 吴趼人：《发财秘诀》，第21页。

④ 钟山、潘超、孙忠铨编：《广东竹枝词》，第152、139、136、170页。

⑤ [清] 佚名：《舟车闻见录》，《明清广东稀见笔记七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8页。

⑥ [清] 蓬园：《负曝闲谈》，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95页。

备，又以地点热闹，生意大佳，但洋货比国货销路较多，可慨耳！”而洋人居住的洋楼，也成为广州令人瞩目的城市景观。清末田间桑者《羊城竹枝词》云：“石堤广袤认新基，绿树如云傍海湄。倏忽楼台疑蜃化，占风高插异邦旗。”史善长《珠江竹枝词》亦云：“金碧洋楼耀眼鲜，旗杆猎猎彩云边。隔江人望灯初上，星斗都疑落九天。”^①与此同时，广州人的家居生活也在不同程度上和舶来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如《廿载繁华梦》写清末广州富商周庸祐建造的洋楼，内部摆设如餐台、波台、弹弓床子、花晒床子、花旗国各式藤椅、夏天用的电气风扇、款待宾客用的金银刀叉、自鸣钟等，色色齐备。《蜃楼志》写赫广大被抄家，还有意罗列了大量的舶来品：“自鸣钟廿八座，洋表大小一百八十二个，洋玻璃屏廿四架，洋玻璃床十六张，洋玻璃灯一百二十对，各色玻璃灯一百八十对，四寸厚水晶桌一张，四寸厚水晶椅八把，洋玻璃挂屏一百零四件，大红、大青、元青哆啰呢各八百张……洋毯、氍毹、地毯共四百八十铺……洋玻璃盏大小八十个。”^②

在对外文化交往中，广州人产生了不少文化观念上的变化。这从新式学校林立、女学兴起、女子就业以及医药卫生、新闻出版等方面均可窥见一斑。孔沛然《羊城竹枝词》慨叹：“罢行科举到而今，学校居然立似林。漫说新荫桃李好，已无城阙见青衿。”胡子晋《广州竹枝词》也慨叹广州人“醉心美日与欧罗，授课分班各学科”。与此相应，英文开始受到重视与追捧。张国康《续羊城竹枝词》云：“学堂风气重英文，风度新充志士群。学得唉啤斯几句，居在蛮语傲参军。”甚至就连在珠江水面从业的蛋妇，也会说几句英语。这让胡子晋颇为吃惊，他在《广州竹枝词》中说：“香江接近五羊城，洋派由来说大英。蛋妇咕哩亦洋话，此间风气令人惊。”对于女子就业，他也感到很新潮：“夫纲打破渐开明，女子相矜执业鸣。铁路职员留纪念，群雌咸颂夏先生。”并注云：“花县夏重民任广三铁路局长，提倡女子职业，故车上收票亦用女子，风气为之一变，可志也。”至于西医的流行、医院的兴建，也自然颇受人关注。胡子晋在《广州竹枝词》中又写道：“西医门市百余家，广告宣传未免夸。儿妇两科谁妙手？肯堂王氏太平沙。”“试出东门南北行，学堂医院两恢宏。西人好与鬼争地，地有洋楼便卫生。”自注云：“东门外南如东山、北如望冈等处，西人购用坟地改建医学校、医院等。”另外，城市报业的勃兴，以及由此带来的报纸连载小说的流行，也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景观。胡子晋《广州竹枝词》云：“气象文明喜不禁，西关报馆盛如林。郑声靡荡成风尚，小说趋时半海淫。”自注云：“西关第七八甫太平街，约计报馆二十余家。某某报盛行一时，长短篇小说多是海淫资料。”^③总之，伴随海上贸易而传入的西洋文明，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深刻地影响了沿海的城市文化，极大地改变了市民们的日常生活面貌。

以上，我们主要借助于文学作品中有海上丝绸之路的描述，揆诸其他一些历史文献记载，勾勒了敢于破浪逐梦的沿海商人形象，展现了文学作品中的岛国想象，揭示了海丝之路孕育的商业文化精神，并对海丝之路的重要门户——广州十三行以及受濒海商贸文化浸润的城市生活等作了简要描述。不难看出，中国沿海地区的文化精神气质，诸如开放、冒险、兼容、变通、务实、功利、诚信、公平等，正是由两千多年来的商贸文化传统孕育、熏陶、生长起来的。而这也正是沿海地区自清中叶以后，受西洋文明冲击，率先策动维新变革，将中国文化引向近代化，后来更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前沿地的主要精神动因。历来文学作品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粗描细绘，不仅为我们了解“海丝之路”保留了一份珍贵的文化记忆，而且为我们观照沿海城市文化精神风貌提供了一个生动可感的视角。这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更好地传承发展“海丝之路”的文化精神，与海外各国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王法敏

① 钟山、潘超、孙忠铨编：《广东竹枝词》，第164、131、133、175页。

② [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227页。

③ 钟山、潘超、孙忠铨编：《广东竹枝词》，第136、169、137、163、165、166、171、167页。

中国文学研究的图像史学实践及趋势^{*}

龙其林

[摘要]中国文学研究界近年发掘文学史料的兴趣益增,图像史料的搜集与研究也得到一定的发展。从20世纪20年代郑振铎编写《文学大纲》开始,中国文学研究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图像史学的实践,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读图传统复兴后迎来了发展契机,图像史料进入文学研究著作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常见现象。中国文学研究的图像史学实践,吸收了古代左图右史传统以及西方的互文性理论,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建构了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同时图史互证方法的使用对于恢复文学史著的生命维度,以图像揭示文化史、文明史的绵延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文学 图像史学 实践与理论 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2)12-0175-09

文学史料学是近些年学术界的热点现象,其持续发展对于厘定史料讹误、还原文学史现场、沉淀学科底蕴、升华文学研究的历史性质等具有重要意义,更为深远的意义或许还在于建立自身的知识建构与价值标准。然而,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中尝试纳入图像史料,不断拓展观照的对象范围,出版社也为使用图像史料著作的出版推波助澜,一些学者也注意到文学研究中图文互文现象,却少有学者对图像史料进入中国文学研究著作的基本类型和发展轨迹进行梳理,并进一步对图像史料所推动的文学研究观念的转型进行把握。本文拟对中国文学研究著作中图像史学观念的演进进行分期研究,在此基础上展望发展趋势,以期理解图像史料在中国文学研究著作中的发展脉络提供新的认识。

一、图像史学的价值和中国学界的早期实践

图像史料作为文学发生过程的历史见证与遗存,反映了彼时文学生产中的丰富信息,是后世理解和解释作家作品及文学历史的客观依据。图像史料的形象性及记录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历史场景的局部环境与细节,这也是图史互证在学术界得到认可的重要原因。虽然文学具有想象的属性,文学图像史料某种程度上也带有创作者的审美想象,但图像史料仍然或多或少地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信息。即便是一些看似无关的图像史料,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留存着时代的丰富信息量,如图像的体例、作家的绘画及书法、纸张的使用、著作的版权等,从而为理解同一时代的文学现象、作家心态、社会心理等提供视觉见证。中国有着左图右史的悠久互文传统,为中国文学图像史料学研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图像史料。近代以降,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思想纷纷被引介到中国,中西交融的时代铸造了纵跨中西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文艺理论基本问题研究”(18VXK00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域外思想资源整理与研究(1907—1949)”(21&ZD258)、2022年度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创新团队培育计划项目”(WKCX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龙其林,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40)。

的文化语境。受惠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双重滋养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纷纷进行思想文化的现代融汇与再造。在大转型的历史时期，一批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承担了文化转型的职责。如果说王国维、陈寅恪、胡适等学者运用西方理论、方法探究中国文化问题，为中国学术创造了广阔的学术平台和国际文化视野的话，那么郑振铎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的重要意义则在于其吸收中西文化的润泽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图文互文方法，并惠泽此后近百年的中国文学研究。

郑振铎既是中国现代出色的作家、诗人、翻译家、艺术史家，又是优秀的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1924年1月，《小说月报》开始连载郑振铎编写的《文学大纲》，至1927年4月，《文学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四册。《文学大纲》是郑振铎编写的一部古今中外文学的综合论著，上溯古希腊罗马、《诗经》《楚辞》，下及20世纪初叶，纵横数千年。《文学大纲》全书共四十六章，其价值不仅在于按照时间顺序将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及各国名著进行介绍，打破了一般意义上的国别文学史，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还在于其在文学研究著作中使用了七百余幅图像史料，为以后的中国文学研究著作的图像史料实践开创了一方新天地。有学者认为1932年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出版是郑振铎从事文学研究图像史料实践的开始，其实早在五年前他已经开始了这一意义深远的研究著作编撰模式。在《文学大纲》的编撰过程中，郑振铎参考了许多学者尤其是约翰·德林瓦特的图文互文著作，这对于该书的写作提供了直接帮助与启发。正如郑振铎所言，“编者的这部分工作，除了一小部分中国的东西外，受到他们的恩惠真不少。要没有他们的工作，本书乃至一切同类的书，其出现恐怕都不可能”。^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郑振铎在该书的署名方式为“编”而非“著”，这和后来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有着根本的区别。尽管如此，《文学大纲》对于中国文学研究著作图文互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全书的《叙言》中，郑振铎介绍了《文学大纲》中插图的构成及由来：“本书的插图颇多，其中从J. Drinkwater的《文学大纲》里引用者不少，此外是编者自己搜集的结果。这些插图可以使本书的读者增加不少兴趣。关于中国的一部分，有许多未注明作者及所从出的书之名者，皆为引用三才图会者，这部图的书很有趣，是明人绘的，什么都有，从天文地理以至生物，器用，历代明人的图像也占了十几卷。因为未能一幅一幅的注明，故在此总注一下。”^②约翰·德林瓦特（John Drinkwater，1882—1937）是英国著名诗人、剧作家、评论家和演员，还编辑过文学史和多种文学选集，并为许多书籍撰写过导读。约翰·德林瓦特的《文学大纲》反映了20世纪早期英国学者的世界文学研究水平和当时的学术特点，史料丰富，插图精美，其运用图像史料从事文学研究著作的编撰方法深刻地影响了郑振铎的治学方式与出版策略，使他意识到图像史料对于提高读者学习兴趣、了解作家生平与形象、还原历史景观具有重要价值。不仅如此，郑振铎在书中附录了几百幅彩色和黑白插图，这些插图都是名家所作，显示出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著作与世界接轨的程度，这为其后来编撰《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奠定了基础。

1932年，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横空出世。此书图文并茂，史料丰富，充分肯定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既是文化大交流、大碰撞时代对于新型中国文学史的呼唤，又是学者合理的知识结构、开阔的文化视野、丰富的图像史料积累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中国文学研究著作中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第一次将唐、五代的“变文”，金、元的“诸宫调”以及明清的弹词、宝卷等内容加以评述，而且还创造性地使用了百余幅各类图像史料，使图像史料成为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例言中，郑振铎阐述了自己的写作动机，其中有三个涉及图像史料学的方面值得关注。第一，郑振铎认为使用图像史料的目的不仅在于提高读者的兴趣，更重要的在于通过图像史料再现不同时代真实的社会生活情态。“作者以为插图的作用，一方面固在于把许多署名作家的面目，或把许多我们所爱读的书本的最原来的式样，或把各书里所写的动人心肺的人物或其行事显现在我们面前；这当然是大足以增高读者的兴趣的。但他方面却更

① 郑振铎编：《文学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4页。

② 郑振铎编：《文学大纲》，第4页。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使我们需要那些插图的，那便是，在那些可靠的来源的插图里，意外的可以使我们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的生活的情态。故本书所附插图，于作家造像、书版式样，书中人物图像等之外，并尽量搜罗各文学书里足以表现时代生活的插图，复制加入。”^①在郑振铎看来，图像史料的加入固然有助于作家形象与文学作品产生直接关联，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但图像史料不能停留于此，而应为还原文学现场提供切实可信的生活情态。第二，郑振铎强调图像史料的来源应该广泛，须选择真实可信的材料进行复制，同时应尽力寻找稀见的珍籍。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例言中，他说明该书图像多以宋代以来书籍附录的木版画为主，同时还包括写本，其中有许多是难得一见的孤本，因此图像史料具有足够的新意。第三，郑振铎认为应注意图像史料使用的学术规范，尽可能地注明详细出处，以便于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郑振铎为每一幅图像史料注明出处，对于珍贵书籍则尽量注出收藏者的姓名或图书馆名，以便感兴趣者可以查找原始材料。郑振铎关于文学图像史料的辑录经验、选择标准及学术规范的论述，为后世文学研究图像史料学著作提供了范例。除此之外，郑振铎还编选过《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中国版画史图录》等图像史料选本，显示出其深厚的图像鉴赏技巧与丰富的编撰经验。

二、读图传统的复兴和以图出史思路的兴起

在郑振铎的《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之后的数十年间，除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50至80年代多次再版两书外，大陆长期无文学研究图文互文著作出版。直到1987年，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编的《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才姗姗来迟，宣告文学研究使用图像史料方法的回归。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和文化消费需求的增加，山东画报出版社陆续推出了一共137辑的《老照片》图书，各类杂志、报纸也大量刊登彩色照片，从而带动了出版行业读图热潮的到来。图像史料也重新进入中国文学研究著作，出版了一些使用图像史料、影响广泛的研究著作（如杨义主笔的《中国新文学图志》、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为读图时代的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编纂方式。图像史料重新进入文学研究著作不应看作是读图时代文学研究对于市场的屈服与视觉霸权的胜利，而是中国文学研究还原历史语境、修复文化景观与激活文学感悟的必然选择，读图热潮的兴起对于推动中国文学研究的思维转向具有重要价值。

1995年7月，冰心任主编，董乃斌、钱理群任副主编的《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由祥云（美国）出版公司以繁体字版出版发行，同年12月又由中国和平出版社与祥云（美国）出版公司推出该书的简体字版。《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图像史料精美，文字解说生动凝练，给人以强烈的审美视觉冲击。这部文学史在谈起编撰缘由时提到了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并指出其图像史料的编辑与使用方面存在的不足：“1932年郑振铎先生编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问世，为中国文学史提供了一种新式样，但限于资料和科技条件，他用的插图主要是黑白人物图像或资料的影印，而且数量有限。”在编辑看来，由于当时科技和出版条件的限制，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只使用了少量三色插图，大部分的图像史料还是黑白的，影响了著作的图像感染力。作为矫正，《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希望改变《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大量使用黑白图像、叙述以文字为主的编撰方式，转而以全篇彩色图像及其叙述以图像为主的新模式。由于《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对于图像的理解与使用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也使得该书的编撰体例、写法、编法及内容上都与之前的文学史编撰有了不同的追求。《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是彩色插图中国文化历史书系中的一本，该书的一个特点就是通过大量精美的彩色图像史料再现中国文学现场，彰显文学之于社会历史和民族文化品格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姿彩纷呈的图片（600余幅）和信息丰富的说明文字，再现中国文学生存和发展的人文环境，也显示文学对社会历史和民族文化品格的渗透和影响。”^②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出版方在后记中说明“本书的图片采用了部分当代画家已经发表的作

^①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例言》（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页。

^② 王好立、何川江：《后记》，冰心主编，董乃斌、钱理群副主编：《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祥云（美国）出版公司，1995年，第243页。

品,未能一一通知本人,我们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实际上该著作中的图像史料大多已经标明了图像的拍摄者或来源,显示出对于图像版权的尊重。

1996年,由杨义主笔,杨义、中井政喜、张中良合著的《中国新文学图志》出版,该书出版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学术影响。作为新时期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文学研究图文互文著作之一,《中国新文学图志》为图像史料研究提供了许多值得仔细研究的图像学思想。在《中国新文学图志》中,杨义总结了自己广泛阅读中国现代文学期刊以及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经验,提出了一些影响广泛的图像史料学研究观点。第一,杨义将属于方志学的图志概念运用于中国文学研究,开创了文学图志研究的先河。在杨义看来,将图像史料当作文学史的点缀是不可取的,而应该以图志的眼光统摄图像史料,使之成为文学史的一种形式。在分析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优缺点时,杨义有过这样的评价:“郑振铎四十年代在上海编选《中国版画史图录》五函二十册,从唐代到清代的典籍、佛经、小说、戏曲的插图,以及画谱、笺谱中,收录一千数百种,可谓皇皇大观。但其眼光专注于图,没有超越和透过图,去考察和体悟文学史,因而并未建构‘文学图志’的模式。三十年代他曾出版过《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日后修订,收图一百七十四幅。但眼光注重于史,图只是衬托,也没有形成按图索史的透视性眼光。可以说,虽然前人的杰出建树功不可没,但至今尚未有‘文学图志’这种文学史形式,以图出史,以史统图,便是本图志独特的思路了。”^①杨义在这里强调的是图志本研究著作与一般常见的插图本研究著作的差异,突出了“互动”在图志本中的重要意义。第二,杨义认为若要将图像史料学融入文学研究,学者需要完善跨学科的知识结构。在杨义看来,“文学史模式的建构,首先是研究者知识构成和操作规范的建构。由于要选择、鉴赏和阐释一些装帧插图,我们在熟悉文学史的同时,当务之急是充实自己对二十世纪中国书刊装帧史和绘画史的知识。缺乏这种跨学科的知识,面对装帧插图就会产生隔膜感,就难以产生真切的心的交流。”^②第三,杨义提出了图像史料的语言说,认为在选图用图时应根据文学史的历史语境、研究著作的叙述情境以及图像本身具有的文化语境等因素进行匹配:“作家选作装帧插图的画面也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一种以线条、色彩、构图、情调为符号的‘无语言’的心灵语言。它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信息量,从中可以窥见文化心态、文学气氛,窥见文学史。”^③

与《中国新文学图志》大致同一时期及随后,陆续出版了一些文学研究图文互文著作,如迟轲主编的《插图本文学欣赏教程》、廖奔的《中国古代剧场史》、杨昊成的《东方的曙光——新文化运动中的人格追寻》、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扬之水的《诗经名物新证》等。陈平原、夏晓虹主编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一书于1999年出版,在这本图像史料十分丰富的著作中,陈平原确立了取舍图像史料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选择吻合历史现场的图像史料:“我们曾确定了一个原则,不纯从审美角度‘插图’,对历史图像的选择,尽可能贴近五四运动这一规定情景;人物照片则大致不出事件前后十年。”第二,选择反映历史细节的图像史料:“没有‘具体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号和旗帜,也就很难让一代代青年人真正记忆。这么说来,提供足以帮助读者‘回到现场’的细节与画面,对于‘五四’研究来说,并非可有可无。因而,本书之选择图像与文字相配合的表述方式,不全是为了愉悦读者——也包括对历史研究方法的反省。”^④陈平原意识到,真正的历史已经逝去,回到现场也只是借助各种手段创造一个模拟现场,绝对真实的历史现场已经无法还原。《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在选择图像史料时呈现开放性的态度,将可能显示不同历史细节的图像与不同人士的回忆加以并置,由读者进行判断及思考。同样是在1999年,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以作品解读为主的文学史著作中,陈思和“打破以往文学史一元化的整合视

① 杨义主笔,中井政喜、张中良合著:《中国新文学图志·序言》(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2页。

② 杨义主笔,中井政喜、张中良合著:《中国新文学图志·序言》(上),第8-9页。

③ 杨义主笔,中井政喜、张中良合著:《中国新文学图志·序言》(上),第5页。

④ 陈平原、夏晓虹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年,第351、51-52页。

角，以共时性的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观”，^① 为了追求共时性的时代场景，《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将同一时期内的文学创作进行并置，努力从看似并无关联的文学作品、电影、音乐中找到精神纽带。在分析新中国成立前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转型时，将胡风以胜利者自居的政治抒情诗《时间开始了》、巴金抒发无政府主义及人道主义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与沈从文陷入癫狂状态写作的《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纳入迎接新时代到来的时代氛围中，从三个不同阵营作家的精神状态及其作品中捕捉到了大时代来临之前微妙的身份意识。相应地，该著为不同身份的作家选择了富于深意的图像史料：胡风的图像选择了1949年春在北京华文学校所摄的半身照，他在年底或第二年初以革命胜利者的姿态写作了激情洋溢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图像中的胡风右手握笔，身板挺直，眼视远方，一派踌躇满志之态。谁能预料，仅仅两年多之后的政治批判运动即将降临在胡风及其拥护者的身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49年5月的沈从文处境则压抑得多，在察觉自己与新时代文化主流的落差后，沈从文陷入了精神的惶惑与恐惧之中。该著选择了一幅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合影，沈从文当年的心境越是恬淡悠然，那么他在1949年的惶恐就越有了难以摆脱的宿命之感。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短短数年间，虽然出版的中国文学研究图像史料著作数量上并不算多，却出现了《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图志》《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诗经名物新证》《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等图像特点鲜明的著作，同时还涌现了钱理群、杨义、陈平原、陈思和等后来持续从事文学研究图文互文著作编撰的学者，为以后图像史料作为一种观念与方法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三、文化史、文明史视野下的图像史料与观念拓展

进入21世纪，信息经济时代的大幕开启，宣告人类社会正式进入读图时代。在读图时代，图像已经成为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覆盖全面的文化景观。数码电子产品如照相机、拍照手机、扫描仪、摄像机等的广泛使用，积累了大量的图片资源，而网络技术的普及为媒介配置最优图像资料、追求身临其境的现场资讯、获得最大的受众提供了可能。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图文互文著作的图像史料还显得较为单一，多以书影、插图、作家照片等简单图像嵌入文学研究著作的话，那么到了21世纪之后文学研究图文互文著作则呈现出更多的个性。新世纪以来20年的中国文学研究图文互文实践中，出现了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新版图志本）》《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中国现代文学图志》、陈平原的《晚清图像——〈点石斋画报〉》（与夏晓虹共同编注）《晚清图像——〈点石斋画报〉之外》《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范伯群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钱理群总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程光炜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贺绍俊和巫晓燕的《中国当代文学图志》、谭桂林的《转型与整合——现代中国小说精神现象史》等一系列大量使用图像史料、异彩纷呈的著作，图像史料观念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21世纪以来，从文化史、文明史的角度重新看待文学成为图像史学实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更强调文化的绵延，以文化、文明的概念去扩展以往正史叙述的局限，在更加多元、原生的坐标中考察图像的存在与价值。为此，杨义提出了“文化原我意识”概念，他说：“文化原我意识的确立，要求我们的研究策略在博览世界文化风光的同时，潜心静气地返回中国文化的原点，以此为逻辑起点，逐一地激活中国文化资源及其内蕴之经验和智慧的活力。”^② 文化原我意识，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一种文化自信。进入21世纪，杨义的图志思路更加开阔，他不断突破学科的壁垒、融汇不同学科的知识结构，努力挣脱固有学科背景导致的研究观念、研究视域的偏狭，将图像史料放置于文化史、文明史的框架中进行考察，在不断的图文著作编撰实践中对于图志学的认识越来越清晰。第一，从文化通观的层面认识

^①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9页。

^②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新版图志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图志学，在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整体认识基础上强调图像史料的价值。在他看来，“文图合观互动的图志方式，沟通了文学史、艺术史、文明史的多种知识领域，可以有效地诱发、刺激文化整体性的体验和思维”。^①第二，指出了图志本与插图本文学史的区别：“图志与一般的插图本文学史的区别，在于它的图画采用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那里已存在一个文学史整体而把图插进去，形成版本学上的变化，而是与文学史文字表述组成一个互渗互释的生命整体，具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学上的意义。”^②第三，认为应该扩大图像史料的考察范围，尽可能地将更多与文学研究互证互动的图像纳入进来：“这些图画包括古籍木刻插图、图谱画像、文人绘图、书法图章、石刻拓片、壁画、年画、游戏叶子，以及文物照片、流散到海外的画卷和译本插图。只要运用悟性，运用心灵的眼睛去解读，它们就是一部文学接受史，一部历代文人和各阶层人士从文坛佳事和名家名作中寻找精神源头的历史，一座文学史与艺术史，以及整个文明史气息相应的回音壁。”^③第四，认为应寻找与文学史现象具有精神关联的图像史料。运用图像史料的目的是为了还原文化自我，在分析图像的过程中应始终瞄准目标，将图像史料的发展演变与文学文本结合起来，通过对分布广泛、内容涵盖广阔的图像的考察来分析那些意义、审美已经发生变化的文化话题。第五，主张将空间图像史料纳入文学研究视野，这不仅是文学研究局部材料构成的更新，而且是一种新的文学研究理念的创造。在为中国文学研究著作选择图像史料时，不应局限于书籍、档案、画卷等图书馆资料，而应将博物馆和田野调查采集到的空间图像史料纳入进来，在作家旧居、历代书院、人物塑像、人文园林、古迹遗址、作家墓碑、山水胜景等史料中发现丰富的作家生命体验和思想信息。由于历史现场在漫长的时光中不断地被侵蚀，通过昔日地理空间的图像还原，有助于空间补缺与新意义的生成：“当图书馆、博物馆以书画文物收藏着时间的时候，田野调查把飘拂着历史精灵的时间衍化为地理。文学由此借助图志与地理学结缘。”^④经过多年的中国文学研究图文互文著作的编撰后，杨义积累了丰富的图像史料运用经验，他提出的图志学概念、图文互动、以图证史、图史互证等观念深入到文学发生学的层面，以开放性的思维对中国文学史进行了新的阐释。

这一时期，随着市民文化迅速发展，通俗文学地位上升，通俗文学图像史料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内容。范伯群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杨义的《京派海派综论（图志本）》《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插图本）》、陈平原和夏晓红编著的《图像晚清》、陈平原的《看图说书：小说绣像阅读札记》《千古文人侠客梦（插图珍藏本）》等较为典型地反映了这一趋势。在范伯群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中，作者不仅勾勒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发展轨迹，而且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搜集几近湮没的通俗文学作家作品的图像史料，书中的三百余幅图片前后花费25年时间才得以陆续搜集完毕。《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既有现代著名通俗作家的合影、通俗文学作品中的插图和书影，又有上海小报对于妓界新闻所作的配图，还有对于文学作品相关历史人物真实照片的找寻、作品所反映的城市生活场景的插图，从城市环境、市民趣味、作家生活、人物原型、报刊定位等方面对现代通俗文学的发展作了宏观的把握和微观的分析。范伯群总结自己多年来的图像史料搜集、整理与运用的经验，提出了一些富于启发性的图像史料运用观念。第一，在图像与文字的侧重方面，强调“史”即文字叙事的重要性，注重文学历史脉络的呈现。他花费时间搜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图像史料，根本目的在于为长期被主流文学史遗漏甚至排斥的通俗作家争取与精英作家同等的图像地位。第二，提出了如何区别“图志”与“插图”的标准。与杨义推崇图志本文学研究著作强调图志中的图史互动互证不同，范伯群认为图志过于强调图而使文字沦为陪衬，文学研究应以文字为主：“我认为这本书不宜称‘图志’。‘图志’应以图为主，

①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新版图志本）》，第12页。

②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新版图志本）》，第15页。

③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新版图志本）》，第18页。

④ 杨义：《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9、543页。

图是‘系统的’，文字只是为图‘立志’，为系统的图片作精彩的说明。而我是以史为主，图只是史的陪衬，因此称作插图本为好。我是想在梳理出现代通俗文学发展的历史之后，再通过 300 多幅图片，为这部专业断代文学史提供一份图像资料。”^①第三，对于搜集哪些图像史料，范伯群形成了明确的目标。“我所关注的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资料：一是重要作家或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小像，二是他们的原稿与手迹，三是他们代表作的封面及有一定艺术水准的插图，四是他们所编发的报章杂志的创刊号，五是与通俗文学有关的社会背景资料，包括当时有关民俗民风图片等等。”^②范伯群的图像史料选择强调对于通俗文学作家小像、原稿、手迹及代表作封面、插图、杂志创刊号、社会背景资料等客观史料的搜集，突出的是文学历史的客观存在。同时，范伯群详细介绍了自己在长期的图像史料搜集过程中如何以及于何处搜集图像的丰富经验，在长期的图像资料搜集过程中，范伯群与许多现代通俗作家的家属及后代取得了联系，如周瘦鹃、程小青、向恺然、叶小凤的家属等，因此而获得了许多作家的小像、手稿等史料。

进入 21 世纪，陈平原陆续新出版或重新修订一系列图文互文著作，对图文互文著作的编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陈平原的图像史料观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强调运用图像史料时应注意图像与文字之间可以形成对话，也可能存在缝隙。“《点石斋画报》的图文之间，本就构成一种对话关系，其间的缝隙，不完全是使用媒介不同造成的，更包括制作者视角及立场的差异。如今再‘从天而降’各种相关史料，对具体图像的解读，很可能不是更清晰，而是更复杂，更丰富。”^③第二，认为为保持图像史料内在的逻辑关系，可以采用互见的编撰策略。第三，不强调图像与文字叙述的一一对应，而认为在保持图像史料独立性的同时，应让古代画家之图像与新武侠作品形成互动关系，在古今不同的文化语境及图像理解中形成富于意义的新状态。第四，对于如何寻找图像史料，最主要的还是通过对国内外收藏晚清报刊的大型图书馆或研究所图书馆进行涸泽而渔的搜集，以便尽可能了解画报的全貌。

另外，文学地图这一图像史料也不断进入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视野。文学地图同时具有地图、文学信息两个方面的内容，可以通过一定的图文顺序和标记使二者融合一体，其组合目标在于引导读者一目了然地宏观把握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空间存在及其分布，将零散排列在文学研究著作中的某一地域、某一时期的文学信息进行提炼。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曹卫东主编的《彩图版中国文学》、林庚的《中国文学简史（插图本）》、朱大可的《记忆的红皮书》、曾大兴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等著作都选择或制作了文学地图这一图像史料。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是大量实践文学地图这一图像史料的著作，其中的图文实践理念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设计了文学地图这一较为新颖的图像形式。该书为揭示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不同文学要素的分布情况，专门绘制了十幅文学地图，包括“全国白话报分布图（一、二、三）”“中国最初话剧剧场图”“上海话剧演出场所地图（部分示意）”“‘五四’主要文学社团表”“《雷雨》三四十年代演出表”“三十年外国文学经典翻译一览（欧洲部分和美国、印度、日本部分）”“抗战时期部分作家流徙图”等。第二，倡导“合力型”的文学史，努力寻找能够给于文学史多元阐释的图像史料：“将一切与文学作品、作家发生关联的现象，均置于历史‘变动’的长河之中。文学作品的发表、出版、传播、接受、演变，得到特别的关注。文学形成的人文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重视。文学中心的变迁，作家的生存条件，他们的迁徙、流动，物质生活方式和写作生活方式，也在一定的关节点得到尽情展开。社团、流派的叙述，与文学报刊、副刊、丛书等现代出版媒体的联系，紧密结合，更接近文学发生的原生态。”^④

众多学者在中国文学研究图文互文著作的编纂实践中，总结出不少值得借鉴的图像史料辑录、考辨、选择的经验，提出了一些富于创见的观念。这些图像史料学研究的观念超越了中国文学的现有学科疆域，

①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596 页。

②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第 587-588 页。

③ 陈平原、夏晓虹编注：《图像晚清·导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年，第 4 页。

④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5 页。

以大文学观的立场和视野对图文研究著作的得失进行了反思。这些观念为此后的图像史料运用及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涉及的一些基本命题值得学术界重视。

四、中国文学研究图像史学实践的趋势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开始,中国文学研究界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图像史料著作的编撰历程。只是由于民族危机与条件限制,这一使用图像史料进入著作的编撰方式并没有延续多久,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传统才得以恢复。得益于科技条件的发展和人文学术的复苏,中国文学研究界对于图像史料的运用表现出了强烈而持久的兴趣,涌现了如钱理群、杨义、陈平原、吴福辉、范伯群等知名学者及其使用图像史料进行文学研究的著作,从而使得运用图像史料进行研究的方法得到广泛重视。在前后近百年的中国文学研究图像史学实践中,中国学者努力拓展学术视野,钩沉图像史料,逐渐呈现出图像史学实践的几个趋势。

第一,中国文学研究图文互文著作的编撰由最初对图谱画像、文人绘画、书法图章、石刻拓片、书影、壁画等史料的使用逐渐发展至漫画、摄影、书信、书影、剧照,然后又蔓延至金石文物、塑像模型、楼台亭阁、故居祠堂、城市地标、世俗生活以及文学地图、影视表演、当代艺术等各个领域,呈现出立体式、全方位拓展的趋势。图像史料由少到多、由纸质材料到实物材料、从直观材料到抽象材料的转变,反映出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影响,中国传统的杂文学观念逐步让位于西方的纯文学观。在很长时期内,中国的文学研究者按照西方文学样式剪裁中国文学,使之符合现代纯文学规范。但是忽略中国文学实际情况、一味推崇西方理论的实践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一些具有敏锐触觉和文化自觉意识的学者,在西方理论盛行时便有意地朝着文化原我的方向努力。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图文互文著作中,可以发现图像史料的来源渠道越来越广泛,从纸质、档案材料慢慢地向田野、空间材料渗透,同时还朝着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出版编辑学等学科拓展,由此形成了图像史料搜集与整理上的大文学观。正是由于具有了这种大文学观,它在吸收纯文学观学科知识的同时,又还原了中国传统文学庞杂斑驳的形态与各学科相互贯通的存在,从而使文学与文化、作品与社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文学研究有可能摆脱异域理论的简单分析而朝着博大、深厚、会通的方向发展。正是由于具备了大文学观、大文学史观,钱理群总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杨义的《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中国现代文学图志》《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新版图志本)》、陈平原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图像研究》、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何绍俊和巫晓燕的《中国当代文学图志》等著作才会在文学图像之外大规模地使用漫画、广告、电影、音乐、绘画等图像史料,从而给文学研究和图文互证带来了重要突破。

第二,在长期的中国文学研究图文互文著作的编撰中,学术界对于图像史料的选择呈现出由关注客观实物、历史事实到聚焦作品内容、作家精神状态及社会文化生态的转变。无论是在郑振铎的《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还是在杨义《新中国文学图志》、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廖奔的《中国古代剧场史》等著作中,学者们普遍使用的还是实物图像、书影、插图、漫画、小像等客观性较强的图像史料。但是到了新世纪之后,文学研究著作使用的图像史料已经逐渐地偏向于富于一定精神含义、阐释空间较大的材料。在李泽厚的《美学四讲(修订插图本)》、于润琦主编的《插图本百年中国文学史》、杨义的《京派海派综论(图志本)》《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中国现代文学图志》、谭桂林的《转型与整合——现代中国小说精神现象史》、曹卫东的《彩图版中国文学》等众多著作中,图像史料常选择具有隐喻、象征、审美意义的图片,读者阅读这些使用图像史料的著作获得的不仅是对于文学历史和基本过程的认知,而且还获得了对于作家精神状态、社会文化环境、时代政治氛围的体认,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文学历史的动态过程。“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用文学的方式去书写文学史,写有着浓郁的生命气息、

活生生的文学故事，而与当下盛行的知识化与技术化、理论先行的文学史区别开来。”^①

第三，随着中国文学研究界对于图像史料的重视，不少学术著作出现了由文字为主、图像为辅到注重图文并茂、图文互证的转变。从郑振铎编撰《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中国文学研究图像史料著作多是先有文字叙述然后再找图像史料进行配置，先文后图的顺序天然地反映了图像在这些著作中的地位。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迅速进入读图时代，图像信息几乎占据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学术界，读图时代的来临也给中国文学研究图像史料著作的编撰及出版带来重要影响，那种将图像视为文字点缀的观念迅速为如何大量使用图像的实践所抛弃。不过应该看到的是，在一些著作中也出现了图像史料泛滥的问题。有的学者、出版社或编纂者为了赢得市场占有率，一味大量使用图像史料，追求多多益善，却忽略了作为一部中国文学研究著作所能承受的图像史料极限。有些著作大篇幅地使用图像史料，翻开后映入眼帘的是各种花花绿绿、具有冲击力的图像，但过多的图像史料同时也在削弱学术著作的文字著述篇幅及深度，从而造成图像史料堆砌、图文关系散漫、文字叙述不深等系列问题。当然，新世纪以来图像史料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地位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学者们都认可图像在文学研究著作中的重要性高于文字。在陈平原看来，文字叙述也具有图像所无法替代的价值，有时候为了更好地展开深度研究，有必要遮蔽图像史料带来的视觉冲击。^②范伯群花了25年时间搜集各类通俗文学图像史料，但在出版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却认为这部著作只能称为插图本文学史，而非图志本文学史，他的理由是该书以史（文字）为主，图像只是文字的陪衬，更适合称为插图本。

第四，中国文学研究图文互文著作对于图像的版权使用时有规范意识，但并不统一，21世纪之后仍然存在各种不太注重保护图像史料版权的问题。凡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均应知晓及遵循基本的学术规范，凡所引用观点、资料需注明出处，以便读者按图索骥核对原文。这一点，早在郑振铎编撰《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时就已经明确提出并得到落实。郑振铎在《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已经开始注明图像史料收藏者的姓名、图书馆名，这是关于图像史料出处的学术规范，尽管在那个时期并没有形成关于学术研究的系统规范。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版的系列中国文学研究图像史料著作中，尽管也有著作会标注图像史料的名称、刊名或图像史料内容的名称、实物馆藏地点，但是几乎没有著作会留意图像史料的拍摄者并进行标注，以保护图像史料所有人的合法权益。这种情况在近些年有所转变，原因一方面在于随着中国社会法制程度的提高，学者的法律意识和版权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图像史料的所有者对于自己作品的保护。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经过学者的精心编撰与锐意创造，中国文学研究图文互文著作已经蔚为大观，不仅出版了一批图文互证、图史互动的精美著作，而且还涌现一批具有学术个性的学者，形成了关于中国文学研究著作的图像史学观念。这些图像史学观念的形成既与社会发展、科技水平有着密切关系，更与研究者的学术个性、研究兴趣、思想认识有着内在联系。回顾中国文学研究图文互文著作编撰观念的历史演变，有助于当代学人更好地理解图像史料在中国文学研究著作中的运用、规律及趋势。

责任编辑：王法敏

^① 钱理群：《总序》，《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2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5页。

^② 参见龙其林、聂淑芬：《陈平原图文互文思想的特质及意义刍议》，《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17—19世纪欧洲中国戏曲题材画的“真”与“失真”^{*}

陈雅新

〔摘要〕在17至19世纪“中国风”盛行的欧洲，戏曲成为欧洲画家笔下常见的中国文化题材。这些戏曲题材画有着不同的材源和纪实性，用作戏曲史料需区别对待、具体而论。或以西方已有图像为据，例如尼霍夫游记中《戏剧演员》插图，乃游记的荷兰文版本编辑者从尼霍夫原始画稿不同画作中提取元素，根据一定的构图范式，可能参考了其他资料并加以想象构制而成。或以中国本土图像为据，例如小德金书中《中国戏剧》插图，乃将《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图》中两个画面拆分捏合。或主要来源于纪实，例如额勒桑德的戏曲题材画，能够作为研究清代戏曲的图像证据，但也存在少许失真。画家对中国文化的陌生、受其熟知的西方事物误导、对构图审美的考虑，特别是对异文化“本真性”的追求等因素，是造成图像“失真”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戏曲 中国风 异文化图像 材源考 纪实性

〔中图分类号〕J8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2)12-0184-09

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由来已久。起源于17世纪中期的欧洲，至18世纪中期达到顶峰的“中国风”(chinoiserie)，是最充分的例证。^①中国题材画，因能直观反映中国面貌而大受欢迎，特别是有旅华经历画家的作品，被视为了解中国的一手资料，也成为“中国风”艺术的重要源泉。19世纪初期，法国神父古伯察(Abbé Huc, 1813—1860)感叹道：“或许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对戏剧有如此强烈的爱好和热情。”^②中国戏曲给予西方人深刻印象，成为西方画家笔下常见的中国文化题材。我们不得不就此追问，这些西方画中的戏曲纪实程度如何？是否存在“失真”，有意还是无意为之？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为何？^③为探明这些问题，以“材源考”的方法考镜图像内容之取材至为关键。在诸多绘制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珍稀中国民俗文献与文物数据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16ZDA163)、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外销艺术品中的戏曲史料辑录与研究”(21CZW02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欧洲藏清代戏曲图像史料辑录与研究”(2021M69104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雅新，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助理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广东深圳，518060)。

① 关于欧洲“中国风”艺术，参见 Hugh Honour: *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 London: John Murray, 1973。中译本见[英]休·昂纳：《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刘爱英、秦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② 转引自 David Johnson,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Ritual Opera”, in *Ritual Opera, Operatic Ritual: “Mu-lien Rescues His Mother” in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ed., David Johns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EAS Publications, 1989, p.1。

③ 17至19世纪西方中国题材画的研究，参见 Susan Legoux, *Image of China*, William Alexander, London: Jupiter Books Limited, 1980；陆文雪：《阅读和理解：17世纪—19世纪中期欧洲的中国图像》，香港中文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Paola Dematte and Marcia Reed, *China on Paper*, Los Angeles: Getty Museum, 2007；Sun Jing, *The Illusion of Verisimilitude: Johan Nieuhof’s Images of China*,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Leiden University, 2013；Chen Yushu, *From Imagination to Impression: The Macartney Embassy’s Image of China*, Thesis for Doctor of Philosoph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7等。

中国题材画的西方画家，使团画家负有如实记录中国的职责，其画作内容尤被西方人信任，影响广泛，具有代表性，故我们以之为主要例证。

一、以西方画为材源的戏曲图像

此类图像乃以有旅华经历的画家之作为据，再创造而成，我们以尼霍夫（John Nieuhof，1618—1672）中国游记中的插图《戏剧演员》为例。1655年，为请求准许荷兰人在广州自由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高级商务官侯叶尔（Peter de Goyer）和凯塞尔（Jacob de Keyser）率领使团出访中国，晋謁了顺治皇帝。待他们从北京回到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在的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时，前后经历了两年时间。^①尼霍夫是使团的画师。

在研究此画之前，首先需要明了尼霍夫中国游记的版本。此游记的原始手稿已佚或下落不明，今可见有三个版本系统。其一为尼霍夫本人编写、于1658年呈交给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局的手稿，应据其原始手稿的部分内容编写，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②第二种版本为德弗诺（Melchisédech Thévenot，1620—1692）整理出版的法文本；^③第三种是由尼霍夫的哥哥亨利·尼霍夫（Hendrik Nieuhof）编辑、由出版商范默斯（Jacob van Meurs）出版的荷兰文本。^④两种出版本均以尼霍夫已佚的原始手稿为依据，但篇幅和内容差别较大，一般认为德弗诺本更忠实于原稿，而亨利、范默斯本则流传更广、影响更大。^⑤

我们要探讨的名为《戏剧演员》（*Toneel-Speelder*）的插图（图1），只见于亨利、范默斯版本系统中。画中左一男子戴冠、挂髯、佩腰刀，肩上所扛似乎为一长柄大刀；右有二穿袍、束裤脚、持扇女子。画的背景似乎为城墙外的村庄。有一个临时搭建的简易戏台，伸出式，由木柱支撑起的露天舞台，后台则搭起了帐篷。舞台上正在上演激烈的“打戏”，似乎还有拟兽表演。这幅插图之下，有一段关于中国戏剧的文字，涉及中国人对戏剧的喜爱程度、演员的年龄和数量、演员的生存方式和演出场合、戏剧的风格与看点、戏剧的题材与承袭、堂会戏的情况等方面，都概括得准确精炼。^⑥如果这段文字是出自自己佚的尼霍夫原始手稿，则可见他对中国戏剧有相当深入的认识。无需质疑的是，尼霍夫在中国的两年看了不少戏，在他呈交给东印度公司董事局的报告中，可见一斑。报告中提到，荷使在被广州藩王府、南雄地方长官宴请时，以及在济宁州的客栈和茶馆中都欣赏了戏乐。^⑦



图1 戏剧演员（亨利、范默斯本）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画中内容并不逼真，人物的样貌与服饰、舞台形制等都经不起仔细推敲，明显处例如两女子的发式，更似欧洲而非中国；以“帐篷”作为后台，并非中国戏台哪怕是临时戏台之常情；

① [荷]包乐史、[中]庄国土：《〈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12页。

② 此手稿有中译本，见[荷]包乐史、[中]庄国土：《〈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

③ Thévenot Melchisédech, *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 qui n'ont point esté publiées ou qui ont esté traduites d'Hachuyt, de Purchas, et d'autres voyageurs Anglois, Hollandais, Portugais, Allemands, Espagnols, et quelques Persans, Arabes et autres orientaux*, Paris, 1666.

④ Joan Nieuhof, *Het Gezantschap Der Neerlandtsch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Aan Den Grooten Tartarischen Cham Den Tegenwoordigen Keizer Van China, Waarin De ... Geschiedenissen Die Onder Het Reizen Door De Sincische Landtschappen ... Sedert Den Jare 1655 Tot 1657 Zijn Voorgevallen ... Verhandelt Worden*, Etc., Amsterdam, 1665.

⑤ Sun Jing, *The Illusion of Verisimilitude: Johan Nieuhof's Images of China*, pp.19-39.

⑥ 这段文字的英文版见 John Nieuhoff,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Emperour of China*, Englished by John Ogilby, London, 1669, p.167.

⑦ [荷]包乐史、[中]庄国土：《〈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第51、53、57、74页。

让三位穿戴整齐的演员，站在离舞台遥远的高处，也似构图者主观为之。在确知为尼霍夫所绘的众多人物画中（图2），可见其较好的纪实能力。若此《戏剧演员》出自他之手，应不至于如此走样。此画又不见于尼霍夫呈交给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手稿和德弗诺整理本，这就让其是否为尼霍夫所绘成为疑问。

亨利、范默斯的整理本除利用尼霍夫的原稿外，还把取自其他作者的一些材料添加其中。亨利本人便是画家，范默斯则擅长镌刻版画，而在17世纪的荷兰，随意取他人游记中的插图为己所用，是常见现象。因此，亨利、范默斯版本中，很多不见于其他两版本的画作，可能是他们或范默斯的员工根据其他材料制作。^①我们带着这一认识，试对《戏剧演员》一画的材源进行考辨。

从画的构图来看，将三个或四个人物置于画的前景，而将能够代表中国的景物作为远景，是亨利、范默斯版本中很多人物画的共同构图方式。例如在《喇嘛使节》（*Gezant van de Lammas*）一画中（图3），喇嘛站在一块空地上，而远处的背景则是城墙、宝塔和望塔。之所以如此设置，一方面由于在17至19世纪欧洲的“中国风”艺术中，宝塔、城墙、堡垒等元素已成为中国的标志，增加之，能够使画作内容更像欧洲读者心中的中国，从而增加画的“可信度”，有助于书的畅销。另一方面，将人物安排在特定



图2 老藩王尚可喜（尼霍夫呈交东印度公司手稿）



图3 喇嘛使节（亨利、范默斯本）



图4 通州（尼霍夫呈交东印度公司手稿）



图5 中国女子（亨利、范默斯本）



图6 中国男子（亨利、范默斯本）



图7 中国人物（德弗诺本）

^① Sun Jing, *The Illusion of Verisimilitude: Johan Nieuhof's Images of China*, pp.249-252.

的地理空间下，是为了与他们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画中的中国人穿着奇特的风俗服饰，置身于奇异的环境中，反映了欧洲人对异域风情的猎奇之心。^① 因此，画中远景与近景，乃出于亨利、范默斯版本插图编辑者的“搭配”，而非写实；所绘演员人数为三位，也并非对应某一戏剧场景，不过是遵从此版本中人物画的构图惯例。

那么，画中人物、事物的形象从何而来？画中作为远景的城墙、望楼，在可确定为尼霍夫的画中十分常见（图4）；人物形象也可通过版本比较，推断主要来源于已佚尼霍夫原始画稿中的其他人物。《中国女子》（*Sineese Urouwen*）（图5）和《中国男子》（*Sineese Mannen*）（图6）两画，出自亨利、范默斯版本，《中国人物》（图7）一画则出自德弗诺版本。《中国女子》画中右前方女子与《中国人物》中的女子，除方向上呈镜像外，形象如出一辙；《中国男子》中左一男子与《中国人物》中男子的形象也基本一致。可见，亨利、范默斯版本和德弗诺版本，虽然都以已佚的尼霍夫原始画稿作为依据，却对其中的诸多人物形象进行了不同搭配组合，从而形成各异的画面。再加之德弗诺版本一般认为比较忠实于尼霍夫原稿，因此可以判断，两个出版本中出现的相同人物形象，应源于尼霍夫的原始画稿，而非编辑者杜撰。均出现在两版本中的女子，盘发、着袍裙、束裤脚、持折扇，应即《戏剧演员》画中女子的原型，只不过经过模仿和改造后，《戏剧演员》中的人物尤其是发式，离中国人的实际形象差距更大了。均出现在两版本中的男子配有一腰刀，与《戏剧演员》中男演员的腰刀完全一致。可见，《戏剧演员》一画，乃亨利、范默斯版本的插图编辑者，从尼霍夫原始画稿的不同画作中提取元素，根据一定的构图范式，或参考了其他资料，或加以想象构制而成，与真正的中国戏曲关系甚远。

二、来源于纪实的戏曲图像

此类图像为画家主要依据自身在华的观剧经验而绘，我们以额勒桑德（William Alexander, 1767—1816）之作为例。1793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使团觐见乾隆皇帝。额勒桑德是使团的画师之一，绘制了大量中国题材画，包括多幅戏曲题材。^② 其中《一部中国戏剧》（图8）的创作时间、地点明确，适合作为来源于纪实之戏曲图像的例证。《一部中国戏剧》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画上角写有“A Chinese Theatre - Canton. 21 Decr. 1793”（一部中国戏剧，1793年12月21日于广州）。1793年12月19日，大使返航之船抵达广州，当地政府给予了高规格接待，戏剧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大使男仆安德森（Aeneas Anderson）21日的日记提及演戏，^③ 可见是日仍有戏剧演出。



图8 一部中国戏剧（No.168, WD961: 1792—1794）

因为画作的纪实性较强，让我们得以对画中所绘剧目试做判断。使团副使斯当东（George Staunton, 1737—1801）对此剧的记述颇富价值，因为他直接描述了画中戏剧的故事和演出情形。^④ 斯当东中国游记，流传最广的中文本为叶笃义译本。叶本没有译“主要场景之一见图30”一句，也将书中的图像删去了。^⑤ 该书中的图30即詹姆斯（Heath James, 1757—1834）镌刻的额勒桑德《一部中国戏剧》。笔

① Sun Jing, *The Illusion of Verisimilitude: Johan Nieuwhof's Images of China*, p.254.

② 笔者曾对额勒桑德的戏曲题材画做过整体探讨，包括剧场建筑画、舞台人物画和演出场景画，涉及画的创制过程、目的、纪实程度和史料价值等。参见陈雅新：《清代外销画中的戏曲史料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0-75页。

③ Aeneas Anderson, *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s 1792, 1793, and 1794*, London, 1795, p.259.

④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vol. II, London: Printed by W. Bulmer and CO. For C. Nicol, Bookseller to His Majesty, Pall-Mall, 1797, pp.31-32.

⑤ [英]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年，第301页。

者翻检多部剧目辞典，未找到与斯当东所描述剧情完全对应之剧目。李惠称斯当东描绘的很可能是《铁冠图》，恩爱的帝王夫妻、叛乱弑君的臣民都与此剧相符，“皇后，可能是冒名保护公主的费贞娥，她所嫁之人也不是叛乱的首领，而是首领义子李过。费贞娥假意与李过成婚，在洞房花烛夜将其刺死。”^①考虑到此时清代剧坛折子戏流行，而少演全本戏，故斯当东看到的应只是全剧的部分内容，再加上外国人对剧情理解的困难，难免出现记述的误差，这一猜测不无可取处。可惜李惠所据为叶译本，没能看到文本与额勒桑德画作的对应。

我们再从人物、服饰方面加以对比、印证。《铁冠图》传奇，无名氏作，在顺治年间已经出现，后有多种改编本。《撞钟》《分宫》两出为此最早的无名氏《铁冠图》所独有，至今仍为昆剧常演剧目。无名氏《铁冠图》全本未见流传，此两出剧本可见于《昆曲粹存》。^②《撞钟》一出，讲述崇祯皇帝向后感叹明朝气数将尽，皇后请求令太子出奔，于是皇帝带着司礼监太监王承恩，亲赴国丈周奎家，请周保护太子出逃。谁知周竟在饮酒作乐，拒不相见。王承恩建议撞响景阳钟，聚集群臣，共商退兵之策。但二更撞响钟后，直到四更只有襄城伯李国贞一人骑马见驾。随后又有太监杜之秩假意来见，其实他早已暗通李自成。《分宫》一出，讲述监军杜之秩打开城门，李自成攻入京城。太子与崇祯帝惜别后出逃，公主被崇祯剑杀，皇后自刎，崇祯帝向煤山走去。我们先将画中人物与《撞钟》《分宫》做大致对应。左侧伞盖下所立男子，即崇祯帝；其身边之小儿，即太子；崇祯前之女子，即公主；伏于地上者为王承恩；画右侧，扎硬靠者，即李国贞。可见，从主要人物上，此画可与两出戏相符。

《昆剧穿戴》记载了早年苏州“全福班”“昆曲传习所”常演剧目，^③我们且将画中能够辨识的戏服，与此书中所记这两出的戏服做一比较。画中立于伞盖下之人，无疑身份高贵，头戴之冠，前戴垂旒，冠的形制虽不似《昆剧穿戴》所说的文唐，但二者都是皇冠，故此人身份为皇帝无疑。更具辨识度的，他所着蓝蟒，与《昆剧穿戴》中的崇祯帝正符合。而据研究者称，崇祯帝只在《撞钟》一出才穿宝蓝色线绣团龙蟒，^④印证了我们的判断。跪于崇祯膝下者，为即将出逃的太子。他似乎正抱着崇祯的腿，作依依不舍状。太子因为易装而逃，故此时头戴苦生巾，身穿素褶子，与《昆剧穿戴》中的太子基本相符。公主立于崇祯面前，在叛军入城之际，她要求皇帝杀了她，以保全节。她头戴凤冠，衣着披风，与《昆剧穿戴》的规定也很接近。伏于地上者，为忠诚于崇祯帝的太监王承恩，此刻他可能正在跪报叛军入城的消息，请皇帝决断。他头戴太监帽，身穿黄箭衣，与《昆剧穿戴》的规定类似。当然画中最显眼的要属右侧扎硬靠之人，此人正是忠臣李国贞。此时的他，听到皇帝撞响景阳钟后，快马加鞭从前线赶来。他面挂白满髯，身扎白靠，手执马鞭，与《昆剧穿戴》完全吻合。因此我们判断，画中所绘为《铁冠图》之《撞钟》《分宫》两出的演出场景。笔者观看今人蔡正仁等主演的《铁冠图》，人物、服饰与画中所绘仍非常相似。画中还能看到，伴奏乐师坐于台上后方，观众完全可见的地方，与斯当东游记中8月11日记载的情况相同，反映了当时演出的实际面貌。

画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失真之处。李国贞所戴之冠颇特别，左右有两方翅。方翅用于文官所戴的纱帽，非武将之盔。在舞台背景方面，极为夸大的柱基和立柱，显然不是中国而是西方的；而在本该留有上、下场门的隔墙所在处，却是一片蓝天白云。武将的帅盔配以文官纱帽之方翅，体现了额勒桑德对中国文化了解并不深入。而对于剧场和戏台，他或用西方同类事物代替，或以西画常见的构图方式加以增补。此类情况颇多，例如在其所绘乾隆画像中，乾隆所坐并非清宫之龙椅，而是欧洲的王座。^⑤这种例子，也见于其他西方画家之作，例如荷兰使团尼霍夫所绘的观音塑像，庙中柱子的外观与位置，如同当时荷

① 李惠：《16—18世纪欧人著述中的中国戏剧》，中山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69页。

② 关于《铁冠图》的流传情况，参见华玮：《谁是主角？谁在观看？——论清代戏曲中的崇祯之死》，《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华玮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

③ 苏州市戏曲研究室编印：《昆剧穿戴》第二集，内部刊行，1963年，第70-72页。

④ 刘月美：《中国昆曲装扮艺术》，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328页。

⑤ Chen Yushu, *From Imagination to Impression: The Macartney Embassy's Image of China*, pp.122-125.

兰画中教堂内部一般，使观音庙的空间更像欧洲而非中国。对于未到过中国的欧洲人来说，用他们熟悉的事物来填补画中的欠缺，反而更会让他们确信画中所绘是可信的。^①

三、以中国画为材源的戏曲图像

此类图像乃对中国本土已有图像加以改造而成，我们以小德金（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 1759—1845）书中之画为例。紧继马戛尔尼使团之后，荷兰德胜（Isaac Titsingh, 1745—1812）使团于1794年访问中国，晋謁了乾隆皇帝。小德金任使团的翻译，他是法国汉学家德金（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之子，1784年与遣使会士罗广祥（Nicolas-Joseph Raux, 1754—1801）同船来华，曾任法王驻广州代表。^②其所著《1784—1801，北京、马尼拉、毛里西亚游记》一书，包含了这次访华始末，以及对中各方面情况的介绍。其中有一幅名为《中国戏剧》（*Comédie Chinoise*）的版画（图9）。



图9 中国戏剧

在《1784—1801，北京、马尼拉、毛里西亚游记》一书中，与此画相对应，有一篇关于中国戏剧的短文。^③文中介绍了戏台的形制，称台面高六七法尺，即约1.95至2.27米，从画中人与戏台的高度对比可见，这一尺寸描述是较准确的。文中称戏台为竹构造，以草席封顶。竹质戏台，多见于我国南方；下文又说，戏剧“用官话演出，有时用些古代或现在极少用的表达方式，四分之三的观众都看不懂”，说的也像南方民众不懂官话的情况。因此，小德金文中描述的，可能是中国南方戏台，也许是在曾长期居住的广州所见。文中说“戏剧所描绘的主题取自中国历史”。我们在画中可见演员七人，中间一人左脚抬起，正欲迈台步，穿靠，戴盔，手托降魔杵，像是舞台上韦陀常见的形象。例如成书于嘉庆二十五年的《穿戴题纲》记载，在《水斗》一出中，韦陀的装扮为“帅盔、靠、杵”，《佛国赞扬》中韦陀的装扮为“帅盔、黄靠、杵”，^④因此这一人物可能是韦陀。文中详细介绍了小德金观赏过的《西湖塔》即《雷锋塔·水斗》。但没说明此剧是否即画中所绘。若此剧与画中所绘是对应的，便可将画中剧目确定为《雷锋塔·水斗》。后来韦陀所着之服发展为专门的“韦陀铠”，^⑤画中演员所着，可能便是韦陀铠的早期形制。舞台两侧各立二人，皆穿铠，为四神将。上下场门各有一人掀帘向前台窥视。舞台左后方立一敲锣乐师。耳房中可见伴奏乐师四人，左一击鼓，左二吹笛，左三吹大铜角，左四不甚清晰。

行文至此，似乎可以让我们确信小德金书中戏曲图像的纪实性。然而书中又存在着图文不符之处。书中称戏台“由一大间和一小间组成”，与画中戏台并不相符。双幢竖联式和三幢并联耳房式，都是明

① Sun Jing, *The Illusion of Verisimilitude: Johan Nieuhof's Images of China*, p.216. 对额勒桑德《一部中国戏剧》的全面探讨，参见陈雅新：《清代外销画中的戏曲史料研究》，第59-70页。

② 郑天挺、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221页。

③ M. de Guignes, *Voyage à Péking, Manille et l'île de France, Faits Dans l'intervalle des années 1784 à 1801*, vol.2. Paris: L'imprimerie Impériale, 1808, pp.321-325. 感谢上海大学宋鸽老师在法文翻译上给予的帮助。

④ 傅谨主编：《京剧历史文献汇编》第3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380、458页。

⑤ 齐如山：《国剧艺术汇考》，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6页。

清常见的戏台形式。前者即前后连接两重建筑，前一重为台口，后一重为戏房；后者即把竖联式双幢建筑，改为横联式三幢建筑，把通常放在后部的戏房挪到台口两侧。^① 画中戏台则是以上两种形制的变通。它首先由前后两重建筑组成，前幢为表演区，后幢为戏房，中间留上下场门。其右又有一耳房，为乐房。可能由于舞台深度不足，面积较小，不能容纳全部乐师，故又建一耳房为权宜之计。书中谓戏台“三面封闭”，也不准确。画中戏台本应为三面敞开，只因右侧权加了耳房，变成了两面敞开。画中在戏台左侧的平台上，还有或坐或立的观众。可见戏台搭建的本意并非形成“镜框式”；“三面封闭”，盖由于作者对西方剧场的固有观念而造成了错记。

若图文都出自同一作者之手，怎么会出现这些不符之处呢？其实，此画并非来自写实，其材源为《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图》。画中戏台上所演的韦陀戏，与《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图》中“古北口大粮庄头戏台”上所演如出一辙，韦陀、四神将、上下场门窥视的人物都无二致（图 10）。而戏台的形制，则见于庆典图中的另一戏台，连乐房中吹奏的大铜角等乐器也一并照搬（图 11）。可知，小德金书中之画所绘，并非中国南方竹质戏台上的民间演戏场景，而是将《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图》中两个画面捏合，不过是把庆典戏台的华丽风格变为朴素，增加了一些民间生活的情景，并误将戏台右后侧的耳房，前移到与前台平齐的位置，形成了两面敞开的奇怪样貌。笔者在此无意细究此画作者是如何看到《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图》或其摹的，因为画的材源已然明确。^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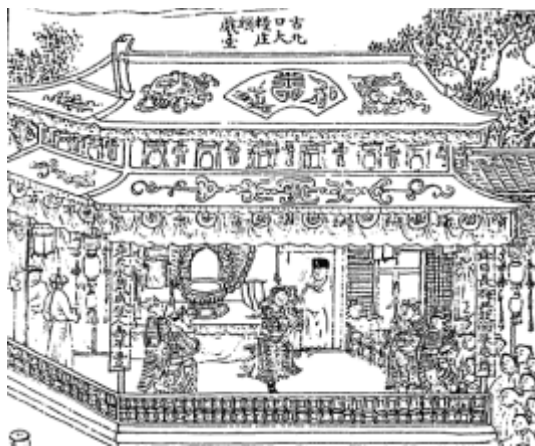


图 10 《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图》局部



图 11 《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图》局部

《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图》有较高的纪实性，来自于异文化的小德金利用当地图像，本无可厚非。然而他却将不同的画面拆分捏合，以区别于原画，更将之勉强与南方竹质戏台上的演剧相匹配。这种“失真”出现在有着汉学家学、并有长期旅华经历的小德金的著作中，是耐人寻味的。也许他料定，以欧洲读者对中国的熟悉程度，定然看不出其中的不妥。也许即便对于他自己，利用本土材料已足够严谨，拆分改造或图文不符，都不会影响他所需要的“真实”。

四、画作“失真”的成因

综上可见，17 至 19 世纪欧洲使团画家所绘中国戏曲题材画，有着不同的材源和纪实程度。有的据欧洲已有图像构制，例如尼霍夫游记中《戏剧演员》一画，乃游记的亨利、范默斯荷兰文版本编辑者，从尼霍夫原始画稿不同画作中提取元素，根据一定的构图范式，或参考其他资料，或加以想象制成，与

① 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24-25 页。

② 图 10、11 见清康熙朝王掇、王原祁、王奕等编《万寿盛典初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53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474、477 页。两图所绘内容，也见于故宫博物院藏绢本彩画《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图》，此彩画乃嘉庆年间据《万寿盛典初集》复制，详参王幼敏：《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万寿图〉非原本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 年第 4 期。图 10 所绘演戏场景，还见于描绘乾隆皇帝八十寿诞的《八旬万寿盛典》（《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61 册，第 59 页），乃沿袭《万寿盛典初集》。

真正的中国戏曲关系甚远。有的来源于中国本土图像，例如小德金书中《中国戏剧》一画，所绘并非书中所述中国南方竹质戏台上的演剧，而是将《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图》中两个画面拆分捏合，把庆典戏台的华丽风格变为朴素，再增加一些民间生活情景。有的主要来源于纪实，例如英使团额勒桑德之作，画中剧目可考，甚至能够作为研究清代戏曲穿戴、表演和剧目等方面的图像证据，但也存在一些失真成分。可见，将这些画用作“记录历史”的戏曲史料，需考辨其材源，排除非纪实之作；即便是纪实之作，也要对其不同部分区别对待，具体而论。

造成失真的原因是多重的，包括画家对中国文化的陌生，例如将武将帅盔绘以文官纱帽才有的方翅；画家易受其熟知的西方事物误导，例如将剧院的柱基与立柱绘成西式；画家的审美考虑，例如将三个人物放在画的前景乃统一之构图范式，用蓝天白云取代戏台前后台隔墙，以形成层次分明的构图。^①此外，这些失真也与彼时欧洲人对异文化的态度有关。

这些画在彼时的欧洲大受欢迎。例如尼霍夫游记中的《戏剧演员》一画，因尼霍夫游记为欧洲第一部配有作者实地制作之插图的中国游记，^②并一度是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重要来源，而颇受关注；特别因为游记的亨利·范默斯荷兰文版本迅速被译为法语、德语、英语、拉丁语出版，并多次再版，此画随之流播甚广。此画还被单独收入《新航海与旅行集》、^③《中国：生活与历史，战争与胜利》^④等著作中，英国镌版师巴齐尔（Isaac Basire, 1704—1768）又将之刻为设色石版画（香港艺术馆，编号 AH1967.0016）。此画还成为其后欧洲人创制中国人物形象的来源。大英图书馆所藏《各国服饰集》（*Collections of Costumes of Various Nations*）中的《中国演员的装扮》（*The Habit of a Chinese Comedain*），便是将画中的男演员单独成画（图 12），^⑤但所绘细节比《戏剧演员》更加离奇，人物肩上所扛，由刀变成了无法辨认之物。荷兰代尔夫特陶器工厂，更于 17 世纪末将画中的男子形象置于一个全新的画面中，拼凑成另一幅“中国”风情画（图 13）。德国画家普罗斯特（Georg Balthasar Probst, 1732—1801）则取画中戏台部分，置于其《中国皇宫内景》一画中（图 14）。^⑥又如额勒桑德的戏曲题材画，作为中英第一次通使的产



图 12 中国演员的装扮



图 13 “中国风”彩陶板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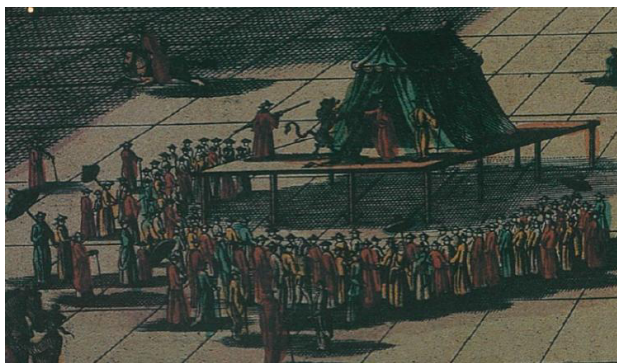


图 14 《中国皇宫内景》局部

① 笔者曾就额勒桑德的戏曲题材画，对此三方面原因做过一定的归纳，参见陈雅新：《清代外销画中的戏曲史料研究》，第 73-74 页。

② [荷]包乐史：《中荷交往史》，庄国土、程绍刚译，阿姆斯特丹：路口店出版社，北京 1999 年修订版，第 78 页。

③ John Green, *A New General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vol.4, London, 1747.

④ Joseph Kürschner, *China: Schilderungen aus Leben und Geschichte, Krieg und Sieg, ein Denkmal den Streikern und der Weltpolitik*, Leipzig: Verlag von Hermann Bieger, 1901.

⑤ 关于《各国服饰集》的详细讨论，参见 Antony Griffiths, “The Print Collection of Cassiano dal Pozzo”, *Print Quarterly*, vol.6, 1989.

⑥ 《中国皇宫内景》一画，参见 Paola Dematte and Marcia Reed, *China on Paper*, pp.12-14.

物，影响深远。本文所举的《一部中国戏剧》一画，1796 年被詹姆斯镌刻为版画。^①此版画除被斯当东作为其中国游记的插图外，还被英国画家阿罗姆（Thomas Allom，1804—1872）《中国官员的宴会》所模仿。在阿罗姆的画中，官员们一边宴饮，一边赏戏，而戏剧人物的形象，显然是模仿额勒桑德之作并加以发挥而来。^②

这些画作何以能够产生如此影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中国风”盛行的欧洲，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想象中的中国，渴望看到真实的中国形象，而使团画师之作恰逢其时。画师及其游记的编辑出版者，无不早已明了这些画有巨大的出版市场，富于商业价值。尼霍夫游记的编辑者亨利，鼓吹书中之画“来自写生”（na het leven）。额勒桑德不但往往注明其画作的时间、地点，也在画集的命名上用心良苦，例如以《中国服饰》而非诸如《额勒桑德集》作为画集之名，体现了对画作纪实性的强调超过审美性。^③这些，都迎合了欧洲读者和市场。使团画师和编辑出版者，充当着异文化的转译和售卖者，他们努力为西方人呈现“真实”的中国，即中国的本真性（Authenticity）。

然而，异文化艺术品的本真性“不只与真实性和表面意义的可靠性有关，还与对真实性的解释和我们对它的欲求有关”。^④质言之，异文化艺术品的“本真性”不同于真实，既要包含艺术品客观属性之“真”，也要包含观赏者主观认为之“真”；对异文化本真性的追求包含着人们鲜明的主观投射。故此，画师和编辑出版者不但要考虑实际的中国是何形象，还要考虑西方人心中固有和期待的中国是何形象，为迎合西方人对本真性的欲求，不惜对异文化之形象加以调适。尼霍夫游记中的《戏剧演员》一画，将城墙、望楼等“中国风”艺术中已形成的中国标志物作为远景；额勒桑德将中国的戏院、戏台，或用西方同类事物替代，或以西画常见的构图方式加以修饰改造。这样做，不但不会引起欧洲读者的怀疑，反而更加确信了画中内容的真实。这种现象，也普遍见诸 18 至 20 世纪初专为出口西方而制的中国外销画。中国外销画家为了绘制在西方人看来具有本真性的中国图像，甚至不惜扭曲本国文化。即便如小德金这样的汉学家，也不愿在画作内容是否可靠问题上多费心力，如萨义德所称：“东方学家所做的是进一步确认读者眼中的东方；他既没有也不想扰乱已经定型的信念。”^⑤人们所能看到的异文化，很大程度上是想要看到的样貌。对本真性的追求，恰恰是造成异文化图像失真的一个深层原因。

责任编辑：王法敏

① 香港艺术馆（编号：AH1964.0431.027）和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编号：S307-2009）均有收藏。

② Thomas Allom, *The Rev G. N Wright, M. A., The Chinese Empire Illustrated*, vol.4, The London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Company, 1858. 另参见陈雅新：《清代外销画中的戏曲史料研究》，第 70-71 页。

③ Chen Yushu, *From Imagination to Impression: The Macartney Embassy's Image of China*, p.63.

④ Brian Spooner, “Weavers and Dealers: The Authenticity of an Oriental Carpet”, in A.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00. 中译本见孟悦、罗钢主编：《物质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42 页。

⑤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Pantheon Books, 2003, p.65. 中译本见 [美]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第 86 页。

朱熹《诗集传》的阐释思想^{*}

刘思宇

[摘要]通过研究朱熹《诗集传》的阐释方式,可见其对《诗经》的阐释以“感物道情”为线索,其阐释思路为“物—感—导—情”。朱熹以《诗经》名物和文字为“物”进行“语境还原”,以赋比兴等文学阐释手法探讨《诗经》中的“感”,进行“存在还原”,以期实现审美体验的共鸣。在此基础上,朱熹将理学观念导入阐释过程,分别以“前理解的意义设定”和“对诗意的自然升华”为方式,实现了“由情见性”,将读者引向“情性合一”的人格境界。朱熹的《诗经》阐释体现出情本体之于理性共识的重要意义,也因理学本体的统摄而不同于传统注疏,突破了方法的局限,成为与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相契应的本体论的阐释思想。

[关键词]朱熹 《诗集传》 “感物道情” 中国阐释学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2) 12-0193-08

朱熹的经学阐释极具代表性,阐释成果之丰富毋庸赘言,其阐释思想也独具特色。其中朱熹为阐释《诗经》而作的《诗集传》,乃积四十年心血精力而成。由《诗集解》到《诗集传》,先后经过六次修改删订,二次雠校,五次刊刻,始成今本《诗集传》之貌。夏传才在《诗经学史》中将《诗集传》誉为宋代批判汉学和宋代考据学兴起基础上宋学《诗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是《毛诗传笺》《毛诗正义》之后《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①对这本令朱子皓首穷之的《诗集传》阐释方式进行研究,我们无疑能够收获对朱子经学阐释体系及其整体阐释思想更为深入的理解。

朱熹将诗人写诗的创作动机归结为“感物道情,吟咏情性”,^②这既是对诗人创作动机的精准把握,也可看作朱熹对《诗经》文本形成机制的整体认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认识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对《诗集传》阐释思路的理解。《诗经》作为上古诗人对宇宙和人生的理解、感发,相对于原初世界而言,也是一种文学化了的阐释文本。《诗集传》作为阐释之阐释,只有与被阐释者具有相应的阐释方式,其阐释行为才可能具有合法性和说服力。受朱熹“感物道情”的启发,本文认为《诗集传》的阐释也可以相适应地被归结为由“物—感—导—情”四个主要部分组成的意义建构。

一、“物”的语境还原

朱熹对诗歌文本所进行的第一重阐释即在“物”的层面,主要任务在于解决名物训诂、章句音韵等方面的问题。相比《毛诗正义》“繁章以正名”、欧阳修《诗本义》“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的训释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理学语境中诗的话语力量以及朱子诗的美学境界赏析”(18CZW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思宇,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5)。

^① 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4页。

^②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80,[宋]朱熹撰,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748页。

方式更为进步的是,朱熹对于“物”的阐释不仅在于求得甚解,更是着力于对诗歌创作的特定语境进行还原,以求使读者与被阐释者达成存在境域的一致,从而形成对诗歌本义更为贴切的理解。正如李清良《中国阐释学》所提到的,理解之所以能够发生,即理解的根据,正在于理解者与被理解者拥有相一致的语境,亦即俗话所说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解发生的过程也就是“以心会心”的过程。^①还原诗歌文本的必要语境要素以重建“以心会心”的理解前提也正是朱熹《诗集传》阐释的起点:主要体现在对名物的形态还原、对字词的情态还原、对句意的情境还原以及对诗歌韵律、风雅颂之文体形式的整体性还原。

在公认训释传疏颇为简明的《诗集传》中,对名物之属性、状貌的详细训释可谓一大特色。凡在诗中出现重要的名物概念,尤其年代久远而生僻之物,朱熹必不惜笔墨对其进行形态还原,以达到真切再现的效果:如《周南·汉广》,整篇义理阐释非常简单,而名物训释则着墨颇多。“繁章以正名”的《毛诗正义》对“乔”字只依《毛传》阐释,训“乔,上竦也”,朱熹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乔木属性:“上竦无枝曰乔”。此外,朱熹还在有限的篇幅内对《正义》中只字未提的汉水、江水的地理位置,水流形势以及江汉风俗进行了整体还原:“汉水,出兴元府嶓冢山,至汉阳军大别山入江。江汉之俗,其女好游,汉魏以后犹然,如大堤之曲可见也。……江水出永康军岷山,东流与汉水合,东北入海”云云。对于第三章的“菱”,《毛传》也只简单提及,朱熹的训释则细致周全:“菱,菱蒿也,叶似艾,青白色,长数寸,生水泽中。”^②纵观全书,朱熹不遗余力进行名物训释,语句虽然简洁,却不亚于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精准和全面。诗人感物而道情,接受者则因为阐释者的形态还原而得以对引发诗人所感之物有了真切且形象的体会,诗人之所见与读者之所见在名物层面契合,这对诗歌形成之原初状态的语境还原具有重要意义。

《诗集传》的字词注疏颇具特色。除了简洁精准,其对于特定的表示状态的字词往往基于日常生活的体验进行情态还原,有利于读者更为细腻、深刻地体会诗人的纸背之情。例如释《周南·关雎》,朱熹提道:“窈窕,悠闲之意”;“輶者,转之半;转者,輶之周;反者,輶之过;侧者,转之留,皆卧不安席之意”;“友者,亲爱之意也”。^③通过简单贴切的词义训释将作者当时的情感心态还原,这在整部阐释文本中颇为常见。《诗集传》对《诗经》句意的疏释秉承还原语境的阐释原则,将句意置于诗歌整体情境中,为读者创造一种“身临其境”的理解境域。正如洪湛侯论《大雅·常武》:“《大雅·常武》是赞美周宣王平定徐国叛乱的诗,正面写战争,文势磅礴,尤其第五章……连用六个比喻,把宣王亲征的神武气概渲染得色彩缤纷、淋漓尽致。……对于此章,《诗集传》的串解,也极其精炼得体:‘如飞如翰,疾也。如江如汉,众也。如山,不可动也。如川,不可御也。绵绵,不可绝也。翼翼,不可乱也。不测,不可知也。不克,不可胜也。’像这样准确、精练的解说,在前人的经解中,是不多见的。”^④朱熹的经解,字字句句以情境还原为目的,将彼时的战争场面真实生动地再现在读者眼前。

较之宋代理学家注解《诗经》普遍存在的重视论道而不重注疏的阐释状况,朱熹《诗集传》对注疏的用力之深、笔墨之多在有宋一代可以说是罕见的,而这一点,朱熹恰是自觉的。他说:“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⑤“二苏直是要论道,但注疏如何弃得。”^⑥重视注疏是阐释的有效性得以建立的先决条件。要真正理解一首诗,基本前提在于对其所绘对象、情景有相应的认识。李清良《中国阐释学》提出“理解根据论”,也正是此意。^⑦

① 李清良:《中国阐释学》,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7-48页。

② [宋]朱熹注:《诗集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7页。

③ [宋]朱熹注:《诗集传》,第2、3页。

④ 洪湛侯:《诗经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73页。

⑤ 《语孟集义序》,《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5,[宋]朱熹撰,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31页。

⑥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29,[宋]朱熹撰,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4028页。

⑦ 李清良:《中国阐释学》,第283-247页。

另外,朱熹对于《风》《雅》《颂》之文体性质的发现和论述也可视为对诗歌性质的语境还原:“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①类似观点在《诗集传》具体阐释中也时有体现。它还原了诗歌配乐演奏的产生环境,更利于读者对诗歌本义以及诗歌情感的体会和接受,较之汉唐诗经学无疑是一大进步。在此基础上,要想实现进一步的语境还原,使得“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理解成为可能,理解者与被理解者所具有的意义方式是否一致也是决定因素之一。^②汉唐诗经阐释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出发,多采用牵强附会的意义设定方式,曲折引申,将诗歌主旨导向严苛的教化,感发和体会更是无从谈起。欧阳修在对字词名物章句进行考释的基础上据文求意,一方面拨弃汨乱,一方面求文意之相属,重在批驳和立论,也还没有形成对语境还原的自觉阐释;而朱熹《诗集传》一反前代逻辑、历史、人情等线性的意义建构方式,表现出对《诗经》文学属性的充分尊重,以文学作品抒发情感的客观规律分析诗歌,通过对文本中赋、比、兴等艺术手法和虚实相生等艺术意境的仔细辨析、梳理,建立从文学角度对其进行整体观照的意义方式。《毛传》标“兴”,多将“兴”做“比”用,本句源自诗歌本身,而兴意则隶属于外在的诗教系统,对“兴”意的阐发成为一种曲折诗意的手段。郑玄对赋、比、兴的阐释则更为功利:“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也”;“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善,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③这种穿凿附会的意义方式往往使得所释诗意离题万里。欧阳修多次意识到毛郑对“兴”解释的错误,采用“因时感事”“因物托意”等基于情感体验的阐释,对毛郑形成了有力的批驳。《诗集传》则臻于完善,其对赋、比、兴的创作手法直接从文学的客观规律入手进行细致分析:“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④“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⑤“赋者,敷陈其事以直言之也”。^⑥朱熹对赋、比、兴的判断基本脱离了政治教化,为由“物”的还原到文学感兴进行了恰当的意义设定。不仅如此,在《诗集传》文本中,每章章末都无一例外地标明“兴也”“比也”“赋也”,或者更为细腻地区分出“赋而比”“比而兴”“赋而兴”“赋而兴又比”等几种微观形式,将蕴蓄于诗歌之中的情感表达方式和情感走向辨析得尽可能细致,这对于读者在“感”的阶段深味其情、感同身受的接受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感”的核心意义

经过对“物”的语境还原,时空境域与精神境域的重合,使得《诗集传》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对作者和读者所思所感的自由阐释,亦即朱熹所谓“通悟”大意的整体性把握。^⑦这便进入了对于“感”的阐释和言说空间,是在对诗歌文本进行语境还原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诗歌内在情感的感发和体认。

1、存在还原意义上的“感”。李清良总结出作为中国阐释学基本方法之一的存在还原法,^⑧同样地,在《诗集传》中,通过还原具体情境,使读者回归到领会与理解的原初状态,进而唤起读者自身的存在体验,以此来理解抽象的性理命题和道德命题,是一种极为重要的阐释方式。由此,读者所得,并非如汉唐模式那样通过外在强加以达到“被领会”的状态,而是由读者主动领会体悟,理解之深、体会之切,

①《诗集传序》,〔宋〕朱熹撰,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册,第351页。

②根据李清良《中国阐释学》,意义承担者与语境要素之联系的意义设定方式被称为“意义方式”。例如在庄子与惠子濠梁之辩的典故中,庄子看到鱼在其周围环境中“出游从容”,就说“是鱼之乐也”。这就是说,作为意义承担者的“鱼”与诸语境要素发生关系,共同形成了“出游从容”此种联系,庄子将此种联系的意义方式设定为“乐”。如果他将“出游从容”设定为“苦”,则必说:“是鱼之苦也!”同样的意义承担者,同样的语境要素,如果意义方式不同,将形成不同的语境。参见李清良:《中国阐释学》,第52页。

③《周礼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10页。

④〔宋〕朱熹注:《诗集传》,第2页。

⑤〔宋〕朱熹注:《诗集传》,第5页。

⑥〔宋〕朱熹注:《诗集传》,第3页。

⑦语出《朱子语类》卷80:“诗中头项多,一项是音韵,一项是训诂名件,一项是文体。若逐一根究然后讨得些道理,则殊不济事,须是通悟者方看得。”参见〔宋〕朱熹撰,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2754页。

⑧李清良:《中国阐释学》,第28页。

自是将阐释的功能发挥到极致。此种阐释思路在朱子论《诗》中多有体现：“今欲观《诗》，不若且置《小序》及旧说，只将元诗虚心熟读，徐徐玩味。侯仿佛见个诗人本意，却从此推寻将去，方有感发。”“伊川解诗，亦说得义理多了。诗本恁地说话，一章言了，次章又从而叹咏之，虽别无义，而意味深长，不可于名物上寻义理。后人往往见其言只如此平淡，只管添上义理，却窒塞了他。”^①显然，在朱子看来，《诗》是“感物道情”的，对诗的阐释则切忌僵化，应抛却《小序》及旧说“以理说诗”的桎梏，把诗当作与读者“以感相通”的文学作品，虚心熟读、徐徐玩味，感发情感以求其深长之韵味。“晓得文义”即是在“物”的层面对客观语境进行本真还原之所得，而“识得意思好处”则要求体会诗歌的“言外之意”，进入“感”的神会境界。只有这样，读者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和作者产生共鸣，进而获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审美愉悦。正如《朱子语类》中记载《小雅·小宛》：“这个看时，也只是恁地，但里面意思却有说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却在说不得底里面。”^②这里所谓在“说不得底”里面“解不得底意思”正是读者由诗歌文本切己体认而获得感发的生活和情感体验，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之诗的意味也正在于此。朱熹的阐释正是通过其深厚的涵咏之功细致体会，曲尽人情，帮助读者发现“此诗之辞最为明白，而意极恳至。说着必欲为刺王之言，故其说穿凿破碎，无理尤甚”。^③这便是朱熹“以心会心”以“感”说诗所实现的存在还原。

2、以“感”说诗的文本呈现。《诗集传》鲜明直白地以“感”说诗，所叙之情涵盖了悲怨、危苦、欢爱、思念、和乐、相恋等方方面面，包罗人生百态。《秦风·无衣》之《序》言“刺用兵也”，《诗集传》一字未取，在还原民俗风情的基础上兴发情感，叙“其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④《邶风·击鼓》之《序》言：“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⑤《诗集传》不但未取序意，甚至也将传统阐释中的“以史论诗”抛到一边，取消了局促诗意的限制，从始至终只是烘托渲染忧苦之情，感人至深，“从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为室家之时，期以死生契阔，不相忘弃，又相与执手，而期以偕老也”，^⑥以生离死别之悲情感发读者出于对幸福生活之向往和对生命之热爱而共同具有的生命体验，使人伤痛，以至潸然。朱熹对于诗歌中的男女之思、夫妇之情，更是采取了与既定模式完全相反的阐释方式，令人读之清新自然、爱不释手。《邶风·谷风》之《序》言“刺夫妇失道”，朱熹则解为“叙其悲怨之情”；^⑦《邶风·雄雉》之《序》言“刺卫宣公也”，朱熹则视其为妇人见雄雉之飞舒缓自得而思念远行在外的君子之诗；《小序》以《王风·君子于役》为刺平王之诗，《诗集传》则直白简易地以“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赋之”^⑧作解，贴近人心。还有一些则更为直白，充分反映出朱熹对元文本“感”的渲染不遗余力，例如释《陈风·月出》：“男女相悦而相念之辞。言月出则皎然矣，佼人则僚然矣，安得见之而舒窈纠之情乎？是以为之劳心而悄然也。”^⑨情趣十足，韵味十足。这样一种与前人大相径庭的阐释方式毫无疑问拉近了严肃的经典与人心感触的距离，激发起读者对于涵咏讽诵以求至理的兴趣和愉悦。

当然，《诗集传》中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承继前人，以《小序》为核心的政教原则说诗的情况。例如朱熹对于《周南·汝坟》的阐释，仍从《小序》之说，认为“汝旁之国亦先被文王之化”，但他在此

①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80、卷117，[宋]朱熹撰，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7、18册，第2758、3683页。

②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80，[宋]朱熹撰，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2761页。

③ [宋]朱熹注：《诗集传》，第161页。

④ [宋]朱熹注：《诗集传》，第90页。

⑤ 《毛诗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128页。

⑥ [宋]朱熹注：《诗集传》，第23页。

⑦ [宋]朱熹注：《诗集传》，第25页。

⑧ [宋]朱熹注：《诗集传》，第50页。

⑨ [宋]朱熹注：《诗集传》，第96页。

大前提下所呈现出的对情感的发挥却是独具特色的：“妇人喜其君子行役而归，因记其未归之时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赋之也。”^① 尽管由于《周南》《召南》在历代阐释传统中的重要地位，朱熹对于前世所定伦理政教诗旨未敢轻易移易，但仍然只是将它放置于“物—感—导—情”之主体模式的建构之下，择善而从，并不妨碍读者通过对“感”的体认而达到一个至为宏大的理解的生命境域。张杰认为：“人类之所以需要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因为诗具有唤起人类的集体无意识记忆的独特魅力。每当一种集体无意识在诗的意境创造中‘复活’，人类（作者与读者）也就以这种审美方式‘回归’对于原型情境的体验。”^② 荣格则更进一步指出：“一旦原型的情境发生，我们会突然获得一种不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或超度。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③ 在朱熹的阐释思想中，“感”正是这样一种激发共鸣的审美体验：通过对情境、情感的还原，诗中所蕴含的集体无意识在意境的再创造中复活，读者得以通过审美的体验回归对于原型情境的体验。这种原型体验可以使人获得超越现实、个体的精神愉悦，同时在读者与作者、读者与阐释者之间产生基于集体经验的心灵相通、情感相合的强烈审美共鸣效应，最终使人在对人类生命本真的回归中实现心灵的净化，亦即实现朱熹所谓《诗》之“兴发善意”的功能。^④

三、理学观念的引“导”

朱子解《诗》虽以对“感”的阐发为鲜明特色，却并非以“感”（领悟作者之感、激发读者之感）为终结。作为“诗教”传统的继承者，朱熹阐释方式仍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诗经》教人向善的道德功能为终极目的。

朱熹说：“今必曰彼以无邪之思铺陈淫乱之事，而悯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则曷若曰：‘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耶？’而况曲为训说而求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得之于我之易也。”^⑤ 由此可见：第一，对于铺陈淫乱之事的诗歌，朱熹的阐释目的与往圣先贤并无二志，都希望通过对诗歌的阐释达到“悯惜惩创”“警惧惩创”的目的。第二，朱子的阐释方式与前人截然相反，前人“曲为训说而求其无邪于彼”，而“我”则“不若反而得之于我之易也”，整体阐释模式由外而内地进行了转换，由外在的强加与灌输转换为内在的感化与提升。这与朱子理学校之先秦儒学发生由“外王”到“内圣”的回转是相契应的。^⑥ 第三，由个人所感上升到情性之正，这中间最重要的在于“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即是需要以根据理学观念所确认的无邪之思作为内在升华的引导。在《诗集传》中，朱熹理学观念的引导多是巧妙隐藏于对诗意的阐释之中。读者在涵咏讽诵之际，不自觉地接受其观点与态度，从而接受了理学的诗教影响。其引导主要通过前理解的意义设定和对诗意的自然升华这两种方式来实现。

1、前理解的意义设定。前理解问题由海德格尔在讨论“此在”的解释学时提出。在他看来，由于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等方面面对人类思维和认知方式的影响和制约，接受者在理解任何一个文本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其独特的理解前见。伽达默尔继承这一观点，并进一步认为尽管这种偏见可能影响理解结果的客观性，却是真实的、合法的，因为这正说明了人类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物。^⑦

① [宋]朱熹注：《诗集传》，第8页。

② 张杰：《心灵之约：中国传统诗学的文化心理阐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5页。

③ [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21页。

④ 参见朱熹对于《论语》“兴于诗”的解释：“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是而得之。”载《论语集注》，[宋]朱熹撰，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6册，第133页。

⑤ 《读吕氏诗记桑中篇》，《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0，[宋]朱熹撰，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3371页。

⑥ 参见余英时：《“抽离”“回转”与“内圣外王”——答刘述先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867-877页。

⑦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修订译本）》，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76-377页。

朱熹在《诗集传》中所进行的前理解的意义设定主要表现在对“淫诗”的阐释当中。在漫长的阐释传统中先秦汉唐以及同时代人都有对所谓“淫诗”的阐释，读者早在接受《诗集传》之前就已经形成所谓“郑风淫”的前理解，这便是伽达默尔所说的“真偏见”，它构成了接受者阅读、理解卫风、郑风等诗歌的前提。朱熹正是利用了读者的这种偏见，在阐释过程中稍加引导，使其思维由作者立场转为读者立场，发挥读者自身的无邪之思，由读者之内心修养出发形成对“淫诗”的前理解。以《郑风》为例，该卷共21篇，其中被朱熹冠以“淫”字的计有13篇。按照《诗集传》的阐释方式，仅在“物”与“感”的阐释之间加入一“淫”字，便足以设定对于诗旨的前理解，使得后期的涵咏讽诵（感→情）都沿着已然介入的理学观念的既定轨迹进行，从而达到引导、劝诫以“导”性情之正的教化目的。例如《郑风·遵大路》首章末：“赋也。遵，循；掺，揽；祛，袂；寢，速；故，旧也。淫妇为人所弃，故于其去也，揽其祛而留之曰：子无恶我而不留，故旧不可以遽绝也。宋玉赋有‘遵大路兮揽子祛’之句，亦男女相说之辞也。”^①朱熹释文没有价值观念的介入，只是在对字义训诂的还原和艺术手法的分析之后、整体情境还原以引发感慨之前，将其抒情主人公指为“淫妇”，便使接受者的理解视阈发生偏离，从而引发其戒惕之心和观风知政的自觉。正如伽达默尔所强调的：“构成我们存在的与其说是我们的判断，不如说是我们的前见。……前见构成了我们整个经验能力的先行指向。”^②正是“前见”使得与传统相联系的意义得以实现，同时有助于读者实现以理学观念为引导的人格的升华，使诗歌在以心会心的基础上起到劝惩之用。

2、诗意的自然升华。除前理解的意义设定之外，朱熹在《诗集传》中由“情”及“性”的引导主要体现在对于诗意的自然升华，亦即按照人们常规的理解领会步骤，在对诗人所感之“物”、由物所发之“感”进行双重还原，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之后，以体认“天理”为目标对诗意加以引导和提炼，以起到在浑融复杂的生命体验中去粗取精、存理灭欲、存善去恶的协助作用。

首先是基于章节的适时引导，主要是指出现在《诗集传》各章章末的价值观念介入。这种引导方式极不固定，时有时无，若隐若现并且语句短小精悍，贯穿于各章的阐释之中，虽不起眼，却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以《周南·汉广》为例，第二章章末，朱熹由对“物”的本质还原进入对“感”的存在还原，并在此基础上将理学观念介入其中，形成对诗意的引导：“以错薪起兴而欲秣其马，则悦之至；以江汉为比而叹其终不可求，则敬之深。”^③“悦之至”显然是对抒情主人公与读者共同情感体验的存在还原，以期读者形成心灵的共鸣。而在此基础上，由出游之女终不可求到“敬之深”虽然貌似自然顺畅，细想之下却不难发现这其中并无必然的意义关联。由求之不得引发的意义方式可以是思念、是痛苦、甚至是怨恨，而朱熹则貌似不经意地将其设定为深深的敬佩。暂不论这种设定是否客观准确，就其阐释方式而言，确是高明。一个“敬”字，既合情合理，又能将读者的感悟水到渠成地导向“乐而不淫”“发乎情，止乎礼”的谆谆教导。

其次是基于全篇的议论教导，这主要表现为全篇的阐释之后加以直接的议论教导以体现作者未竟之意或提示读者获得应有的感悟和启发。《卫风·伯兮》篇末：“范氏曰：‘居而相离则思，期而不至则忧，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劳归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闵之，故其民悦而忘死。圣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务。兵者，毒民于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伤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故圣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则告以归期，念其勤劳，哀伤惨怛，不啻在己。是以治世之诗，则言其君上悯恤之情，乱世之诗，则录其室家怨思之苦，以为人情不出乎此也。”^④该段议论具有逐层递进的四层意思，表达出阐释者在四个方面的引导教化。首先，朱子引人深味人情，引范氏之言，由前文

① [宋]朱熹注：《诗集传》，第59页。

②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修订译本）》，洪汉鼎译，第267-268页。

③ [宋]朱熹注：《诗集传》，第7页。

④ [宋]朱熹注：《诗集传》，第47页。

所释个体的忧思之苦到引人关注普遍意义上的人之常情，并以此作为立论的出发点。第二，朱子教导为政者善导人情以“成天下之务”。只有对人之常情善加引导，使其基本的“室家之情、男女之思”得以宣泄，才能使人心悦诚服；只有对“天下之志”善加引导，实行仁政，才能天下归心，无往而不利。第三，朱子引人从为政者的视角体贴人情。对于战争所带来的伤害，圣王必须表现出由衷的体恤，才不至于“伤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为王者尚且如此，更何况无时无刻处在人情包围之中的普通读者。充分体贴人情，才能由衷感发善意，达性情之正。第四，朱子教导为政者正确看待由人情观风知政的诗歌功能，认为为政者应深味其情，引以为戒。整篇阐述，由微观到宏观、由为人到为政、由内圣到外王，一气呵成，自然而恳切，相当具有说服力。

四、“情”与“性”的诗学统合

朱子阐释的最后一环：“情”，与诗人有感而发之情有很大不同，主要偏重“情之出于性而善者”的部分。换言之，“物—感—导—情”模式中的情即性也，性即理也，理即无所不包的道之本体，乃理学修养的终极境域。朱熹《诗经》阐释的最终目的即是希望通过《诗集传》呈现出情性合一的人格境界。

在大多数情况下，“性”的呈现简洁自然，点到即止，教人于无形。这便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深入体会，玩味推敲，“沉潜讽诵”。这不仅对“感”的深入体验至关重要，也是存善去恶的重要途径：“诗，如今恁地注解了，自是分晓，易理会。但须是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古人说‘诗可以兴’，须是读了有兴起处，方是读诗。”^①这里的“兴”，与《诗集传》文本中出现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的“兴”有很大不同，它已经超越了文本层面的艺术手法而泛化为一种触发善意、明心见性的契机，更为突出其在浑融的生命体验之中所发挥的对于不正之气的净化作用。具体来说，经过一番“沉潜讽诵”、玩味推敲，读者得以在涵咏诗意、充分体贴人情的基础上深味四端（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情”，而又因此“情”出于性而所发为善，由此“情”上便可进一步得见心之本体。正如朱熹所言：“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恻隐、辞逊四端之善则可以见其性之善，如见水流之清，则知源头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则理也。发者，情也，其本则性也，如见影知形之意。”^②以《邶风·击鼓》为例，朱子的阐释几乎所有笔墨都集中在对离家兵士危苦、悲伤之情的阐发而并无一字理学观念的直接呈现。这样，读者的涵咏讽诵就显得至关重要。由对诗中生死离别之至悲之情的“感”同身受，读者的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反复玩味，则离仁之实理不远矣。此亦即“由讽诵中见义理”之谓也。而较之理学观念的引导教化，读者自行涵咏所得当更为深刻切己，更能实现自觉的人格提升。

除了在具体诗篇中的体现，对“情性之正”的全面阐释主要出现在每卷卷末的系统论述中。《周南》卷末，朱子站在理的制高点上俯视全局，极其精练地分别从整体和局部道出后妃之德的方方面面，性之本体已然明晰，进而系统阐述由各篇诗旨的渐次演变而可见由身修到家齐，由家齐到国治，由国治到“天下已有可平之渐矣”这样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式的内圣外王之路，理学系统的核心理念在此得到了无遗的展现。与此同时，由“妻道之成”到“王者之治”的一系列演绎也无不是天道至理的终极体现。《召南》卷末亦是如此。朱子系统地将该卷所录之诗按照教义的关联串联起来，直陈其修身齐家治国之功效，继而明确提出“天下之治，正家为先”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朱子认为“陈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家一也。故使邦国至于乡党皆用之。自朝廷至于委巷，莫不讴吟讽诵，所以风化天下”，^③将具体篇中所陈之“性”，与宏观视野下风化天下的“理”有机地结合起来，里应外合，教人见性明理，由衷践行《诗》之教化。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80，收于[宋]朱熹撰，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2759-2760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5，收于[宋]朱熹撰，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24页。

③[宋]朱熹注：《诗集传》，第17页。

五、结语

总的来说,《诗集传》着意于对诗人情感的阐发,先从客观存在之“物”出发,从形态、情态、情境、艺术特点、产生背景等方面对《诗经》文本进行全方位的语境还原,使读者与被阐释者站在同样的境域层次上感受诗歌,以期在“感”抑或“情”的层面上产生共鸣,使得读者通过审美的方式回归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体验和生命体验,从而满足人们在特定时代语境中对于个体生命最终价值依据的探寻。在这样一种以心会心、主动探索的基础上再由阐释者加以理学观念的引导,亦即是通过“前理解的意义设定”和“对诗意的自然升华”这样几乎不着痕迹的劝导方式使人在诗歌阅读中由衷地“兴发善意”,最终达成经典阐释的目的,即在人心与道心的相通中呈现情性合一的人格境界,从而使得整套理学价值体系在根基牢靠和深入人心的基础上得到广泛的践行,最终实现“内圣外王”的社会理想。这种独特阐释模式的形成也正与表面深奥严谨而内在富于生动情感的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一脉相承。朱子学术体系的主要特色在于不再坚持以仅有冷峻、严肃的说教面孔为儒学的价值取向张目,而是以重视“直指人心”的诗教方式来传达其伦理观念。这在已成公论的朱熹“援禅入儒”和他极高的文学造诣上都可以看出来。他一方面将客观世界与至高的理想世界联系起来,以“理一分殊”的体用论解决了前辈儒家无法弥合的理论矛盾;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人心的“感兴”作用,同时倡导“持敬”“涵泳”以规范人们的思想意识。更为重要的是,朱熹对人心的规范绝不是教条式的禁欲,而是充满人性情趣的“寻乐”,并由此进一步引导人们去体会“万物一体”的崇高境界。

就当代中国阐释学的建构而言,《诗集传》的阐释思想回应了张江所提出的重方法论还是本体论的难题。张江在《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若干难题》中提到,“当下国内阐释学研究,仍以西方阐释学主要是德国现代阐释学为主导,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本体论阐释学,长期左右着中国本土阐释学研究方向”,“以至在当下中国学界,主张方法论的阐释学,被视为倒退”。^①《诗集传》的阐释则让我们看到了此种西方思维范式之于中国传统阐释思想的方枘圆凿。就“物—感—导—情”的阐释模式而言,这无疑是在朱熹针对传统的曲折附会的诗旨建构方式所采取的更为圆融自然、更能引起共鸣的阐释策略,属于较前人更为有效的方法论阐释学;而对其阐释逻辑和阐释思想进行探究,我们发现对深层的生命体验的阐发和对审美的情感共鸣的营造一直占据其阐释的核心,存在论的视角和本体论的思维无处不在。实际上,正如张江所言:“在哲学意义上,本体论与方法论是统一的,两者不可能截然分开。”^②《诗集传》的阐释兼具方法论和本体论意义。在朱熹的哲学和诗学实践中,诗歌在本源上就是外在世界与内在心性相勾连的具体呈现,是“感物而动”的情之已发的艺术表达,诗歌创作本身就是具有哲学意义的。而对诗歌的阐释则不仅仅是曲折附会的教化说理或个体化的情感抒发,而是对天地万物所共有之本心天理的审美呈现。通过对审美境界的营造而唤起读者基于生命之深层存在体验的感性共识,比之理性逻辑的建构更具有沟通天人的哲学意义。这种审美的感性共识是对合内外之道的理学本体的共识,也是内在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本体性精神内涵,^③“物—感—导—情”则是朱熹基于对情本体的认识,以情本体来协调、统筹《诗经》文本的训释,以本体性审美为旨归而采用的独特的阐释方法。而朱熹也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充沛情感与审美智慧的理性哲学家。

责任编辑:刘青

① 张江:《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若干难题》,《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期。

② 张江:《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若干难题》,《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期。

③ 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独特审美思维的详细探讨,参见刘思宇:《审美的感性共识:从语录与诗话看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特内涵》,《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学术与教育

清末民初报刊对美育的关注与介入

——以《时事画报》和《真相画报》为中心*

许洪林

[摘要]清末民初中国报刊业迅速发展,作为当时极具代表性的综合性美术期刊——《时事画报》和《真相画报》,以其图像叙事和美育普及的突出特征,在建构“国民意识”的过程中,与其他报刊一起,催生了一个以民众、报刊和出版为中心的美育时代。本文紧扣两份画报的栏目设置及其内容,阐释“二高一陈”如何以画报为阵地开展美育实践及其介入方式,进而呈现清末民初岭南知识分子的美育理想和时代担当。

[关键词]清末民初 《时事画报》 《真相画报》 二高一陈 美育普及

[中图分类号] G40-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2) 12-0201-05

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背景

从1894年至1912年的十几年间,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具有时代特征、地域特色且体裁多样的报刊。其中,以高剑父、陈树人与潘达微等人于1905年8月在广东最早创办的石印画报《时事画报》,以及1912年6月高剑父、高奇峰兄弟4人在上海出版发行的《真相画报》尤为突出。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两份画报的主要创办人与撰稿者——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以下简称“二高一陈”)为何热衷于办报普教,又是如何在清末民初报刊业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以画报为阵地关注并介入美育教育?近年来,有学者对《时事画报》《平民日报》《广州时事画报》和《真相画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关注画报的历史文献、图像叙事、社会启蒙、革命特征、绘画水平及其文辞的文人趣味等方面内容。如果从两份画报的栏目设置和内容进行全面归纳、总结和分析,不难发现两份画报对美育的关注与介入等相关问题不能忽视。

甲午之后(1894),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等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以报刊为阵地,传播真知、发表政论,报刊自此成为了清末民初重要的学术平台。报刊给人们带来了阅读的兴趣和开眼看世界的窗口。同时,报刊作为开民智、树民德、鼓民力的坚车利器,亦需要以化雅为俗、浅显易懂的报馆之文,推动文化知识的传播与下移,更好地向社会大众宣传相应的思想主张和制造必要的社会舆论。20世纪初以“时事”命名的画报,先后有广州的《时事画报》、上海的《时事画报》、北京的《时事画报》和《燕都时事画报》。

1912年,高剑父曾对高冠天、高奇峰和高剑僧三位兄弟说:“我们到达上海以后,就可以办画报,开画馆。须知夺取政权,还只是革命的第一步,要真正开启民智,拯救民众的精神,就必须推广教育,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项目“百年社会美育发展历程与中国经验研究”(BLA2102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许洪林,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006)。

弘扬艺术。”^①不言自明,推广教育是岭南画派践行艺术理想、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举措,更是回答他们为何热衷于办报普教及其开展美育活动的最佳注脚。特别是由于《时事画报》和《真相画报》有着刊行时间和参与人员的同构性,以及倡导美育教育的同向性,因而通过这两份画报思考清末民初岭南地区乃至全国报刊的美育实践及其相关先行性问题有着特殊的意义。

与其说革命性是《时事画报》和《真相画报》的共同特征,不如说启蒙性和美育性是两份画报的重要特色。从创刊伊始,《时事画报》就十分强调“图画”的意义,画报指出要“俱用图画”“图画纪事为首”,认为“然其感触最速、印脑最深者,厥惟图画”“以缮警醒图为最初目的,以深入人心为最后希望”,“热望开明社会”“唤起梦魂”。^②《真相画报》第17期目录页的“审美书馆广告”更是直接指明“欲观一国文化,先观其美术,诚以国家之文野所系于美术者大也。”纵观两份画报刊载的相关内容可以发现,很多美术类的理论文章和倡导普及美育教育的内容都是出自“二高一陈”之手,如果说在《时事画报》还受到局限的话,那么在《真相画报》他们则可以大显身手。有学者指出,高剑父和高奇峰兄弟“不甘心当配角,更强调画家的主体性”“而到了《真相画报》,‘画报’基本上变成了‘画册’”。^③

无论是从报刊对美育普及的重视程度上论,抑或是从社会民众对美育的需求方面来看,清末民初报刊为此所开辟的美育专栏之普遍性,足可引发我们的注意。此时,广州的《建国日报》《中山日报》《前锋报》《环球报》《公评报》都开辟了美育专栏,其他各报虽然没有特辟专栏,却也无不刊载这类文字。^④它们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充当着社会发展和艺术进步的摇篮,孕育美育教育事业。

二、《时事画报》与《真相画报》的栏目设置及其内容比较

(一) 两份画报的栏目设置反映出美育普及的价值取向

两份画报皆以“图画”为办报特色,配以通俗易懂、诙谐幽默的语言,旗帜鲜明地宣扬新思想、倡导女权主义,并以喜闻乐见的形式积极继承和传播美育思想。画报还不惜重金聘请美术名家专司绘事,通过介绍世界各国的美术史和美育形式,以及美术学科的教学新方法、新理论等,补充了学校教育的不足,在美育普及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时事画报》的栏目设置从起初以图画纪事、论事为主,逐渐改良格式,增补内容。在1907年第2期《文画一览表》可以看到详细分类:(画类)电画、喻言、时谐、大事图纪,(文类)庄部、论说、时评,(画类)故事丛、采风录、专件,(文类)谐部、小说、谐文、歌谣。^⑤如果以美育的视角比较,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博物馆编录的《时事画报》专辑来看,与美育相关的主要内容有:“谈屑/画苑谈屑”栏目(1905年第1—9期),其内容为介绍徐熙、金农、郑板桥、赵孟頫、八大山人、宋徽宗等传统画家;“电画”栏目(1905年第4—9期),介绍“各种线式”“各种三角形”,即线条用法和几何形的教学图,以及透视、明暗、构图等;“图画纪事”栏目(从1905年第6期—1913年第12期,陆续刊登约有28期,并以1908年最为集中,该年度一共刊登了15期),内容以介绍工艺美术、瓷业制造、图画作品选登和各式博览会,以及女学和女子实业为主。

《真相画报》的栏目设置包括:美术画、论说、滑稽画、漫画、纪事画、时评、文苑、译述、谈丛、词林、学术、小说等。需要指出的是,专栏的名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每期的不同稿件内容而时有变化,或有增删。其中与美育直接相关的内容有:“学术”栏目(第1—17期,陆续刊登15期),刊登了陈树人《新画法》(14期)《图画教授法》(1期)等内容,论述绘画和水彩的画法,倡导“图画为普通教育之必要”等意义和价值;“论说”栏目(第3—17期,陆续刊登11期),刊载了顾厂、(日)汤浅吉郎、兼葭、剑父等人文章;此外还有“文艺”“美术画”“时评”“中国古今名画选”“滑稽画”“各国比较画”“谭

① 潘智彪、邹璟菲等:《高剑父传》,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3年,第88页。

②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博物馆:《时事画报》第1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5-31页。

③ 陈平原:《鼓动风潮与书写革命——从〈时事画报〉到〈真相画报〉》,《文艺研究》2013年第4期。

④ 黄小虞、吴瑾:《广东现代画坛实录》,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349页。

⑤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博物馆:《时事画报》第4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5页。

丛”“陶器图案”“世界美术”等24类84项内容。其中，“铅笔画范本”为高等小学及中学提供了范例指导；“闺秀画选”介绍了广州缤华女校、香港实践女校、广州洁芳女校以及无锡等地女画家作品；“工艺指南”则论说了美育普及和各式学校的奇事怪闻。

至于画报各栏目的美育主张，《真相画报》创刊号阐明，在“历史画、美术画、地势写真画、滑稽画、时事写真画、名胜写真画、时事画”等7个栏目中，“历史画”的内容是“以古为鉴，籍资观感”；“美术画”则是“合种种家法为一手，洵为美术界别开生面，而对于学堂教科亦足资参考而增学识”；“地势写真画”的特色是摄影山水地理全图的作品“编山川关塞”，让读者“千里咫尺，如在目前”；“滑稽画”的特色即以具有深意的滑稽图画提供“茶余酒后之谈判”“晨钟暮鼓之孟醒”；“时事写真画”的特色是以摄影制图留作纪念，记录新立的民国政府百变时局；“名胜写真画”的特色是从“保存古物”的角度为历史保存记忆；“时事画”则是从美术的社会功能角度指出了图画相对于文字的某些方面优势。^①简言之，该内容阐述了画报创办人对于美育普及的全面关注，以及对学校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深入思考。

（二）两份画报的栏目内容各有特色及侧重

如果将《时事画报》和《真相画报》的图画作品数量比例进行比较的话，不论是从画报的栏目设置上，还是从连载数量上看，《真相画报》的图画作品数量比例远远多于《时事画报》。其中《时事画报》具有影响力的文章为高剑父的《论画》、陈树人的《美术概论》和潘达微的《小儿滑稽习画帖》等内容；《真相画报》在17期的出版历史中就有14期连续刊载了陈树人的《新画法》；连续11期刊载美术理论文章，同时刊登《古今名画选》《美术画》《陶器图案》《铅笔画范本》《世界美术》《图画教授法》等美术知识，特别是附有西方美术史料信息的《各国比较画》《世界美术》《世界大观》等，更是开阔了读者的视野；另外，《真相画报》刊登的《长寿昆虫生长地下十七年至第一次重见天日》内容，则是科普式地介绍了昆虫（蝉）的成长过程并带有一定的政治意味。从这一点上看，《真相画报》的栏目设置和内容数量，以及美育普及方面的意义更为突出。

关于美育普及的内容形式还表现为：《时事画报》包括服饰用品的广告、学校的招生广告、介绍国外学校信息，以及关注儿童和女子教育的问题等。读者可以在“怡经号”“华纶号”“四牌楼”“启新号”等服饰用品广告中了解到学校礼服袖章各等级的区别与样式，还有图画专修科等学校的招生广告等。^②还可以看到日本“早稻田学生之大运动”“日本留学界之大风潮”和“俄禁女学”，以及“虐待学童”事件、“劝女仔入女学堂读书”“保护女学生”“开通女智”“女学展览会”等内容。在《真相画报》刊登的内容中，陈树人的《新画法》《图画教授法》和高剑父的《铅笔画范本》值得重点关注，《新画法》的内容分为“绘画三大要素”“铅笔画法”“景物写生（室内写生）”“郊外写生”“写生实验”“用品”等内容。其中每个章节都是先以简短的关键词概括了内容要点，方便读者学习，内容亦以史论与技艺结合，教法与学法相得益彰的形式进行论述。《图画新授法》一文可以直观了解到陈树人对图画教育的深刻认识。连续刊载4期的《铅笔画范本》，是高剑父为高等小学及中学校等学习对象绘制的示范画，从作品来看，以明暗和线条的形式来表现物体，具有强烈的立体感，注重造型、透视和虚实的表达，符合对物写生的现代西方绘画特征。这样的绘画形式与1912年同时期国家图画课程教学大纲的内容极为相近。陈树人认为，“图画与时势国运，有密接关系。”^③在他们看来，图画教育既是学校教育之必要，也是人们基本素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顺应了画报“对于学堂教科亦足资参考而增学识”^④的办报特色。

三、《时事画报》与《真相画报》的美育实践及其介入方式分析

（一）《时事画报》的美育实践及其介入方式

① 审美书馆：《本报图画之特色》，《真相画报》1912年第1期。

②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博物馆：《时事画报》第3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0页。

③ 审美书馆：《图画教授法》，《真相画报》1913年第17期。

④ 审美书馆：《本报图画之特色》，《真相画报》1912年第1期。

第一,以“图画救世”作为办报特色,进而开通群智,振发精神。陈树人在创刊号发表《〈时事画报〉出世感言》:“热望开明社会,此《时事画报》所由设也。原夫报纸,职司喉舌,唤起梦魂,实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①1905年第4期,高剑父在《论画》中写道:“盖诚以画之入人深而感人于不觉也,故近日文明之国多殆于此,欧美则以画报开民心,法国则以图画励民耻,而东洋新国,则尤以美术为科学之大宗,故彼国之人,虽三尺之童,亦无不溺毛笔,抚仿尽致者。”^②从上述文字可知《时事画报》的办报宗旨,也能够感知画报创始人高剑父、陈树人希冀以图画语言唤醒民众的初衷。

第二,积极渲染全社会关注美育的氛围。画报集合了一大批有成就的岭南籍画家,在创刊号便刊登了《本报约章》《介绍书画》《画报招登告白》等告示,介绍了该报的宗旨、办法、记者、篇章,以及向社会发出招聘美术人员和约稿的邀请。1905年第7期《本报美术同人表》列出了伍德彝、刘鸾翔、吴英萼等24名美术同人,1906年第1期又增加了黄惠承等4人,此后的美术人员名单也时有变化。列表中简要地列举了他们的美术专长,如山水花卉、翎毛花卉、花卉石、人物铅笔等,同时注明“诸君如欲求美术者请到本报取阅,各润格、画金先惠,自必代为转致,如期奉复,堪称周妥。”^③1906年第25期中更是列出了“书画同人润格一览表”的信息。换言之,招聘美术人员既为画报画图创作的同时,亦代为美术人员销售美术作品,进而广泛地推广和普及了美育的社会影响力。

第三,以普及美育为己任。1905年第4期,高剑父在《论画》中写道:“兹者本报特设一研究画学科,美册先绘其初级画稿数篇,俾同志所揣摩以刻划情趣,大发我国人之感情,而补各学校图画教科之不及,此则鄙人职任所不敢不尽者也。”^④画报开设的“研究画学科”专栏,包括“谈屑/画苑谈屑”“电画”“广育画课”等栏目设置,这大概可以看作是岭南美育普及最早的媒体传播方式。1909年,《时事画报》同人更是在广州连元大街组织开办“工艺义学院”,为贫困家庭子弟免费提供学习机会;并创办缤华女艺院,在画报美术会陈列图片中专门刊登缤华女艺院图画绣品展区,宣传教学成果。^⑤

第四,印刷发行教科书扩大美育普及范围。在1909年第18期和1910年第2—4期“时事画报发行书籍印刷文件代理药品”图表中可以看到,出版发行的书籍有84种之多,其中绝大部分是有关教育的书籍,涉及美术教育方面的书籍有《初等小学习字帖》《童儿教育画》《历代名人手札》等,还有关于女子教育和家庭美育的相关书籍。

(二)《真相画报》的美育实践及其介入方式

第一,具有普及美育的使命感。这在目录栏“审美书馆广告”中明确指出,“今世界各国美术之发展日盛,故人民知识亦日趋高尚”,“美术乃工业之母也,我国美术发达最早,日就衰落于今为极,岂我国人审美思想独缺乎?抑亦灌输美术之机关不备,后进者少参考资料,乏精良用具,未由得门径以研究耳。”^⑥它概括性地分析了美育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了我国美术衰落的直接原因。李怀霜在《真相画报序》中同样论述了美育的重要性,指出“教育普及厥候,犹濡智识平等……番禺高君奇峰久留海外,学识渊懿,与其诸同志凭藉丹青神技,开悟国人……遁身于美术以救世可唏也已。”^⑦序词表达了《真相画报》同人的办报初心与使命,以及作者对借以美术救世所寄予的期盼。

第二,具有普及美育的系统性。从创刊号第1期关于《本报图画之特色》的综合性叙述和各期的栏目设置及其刊登的内容分析,《真相画报》美育普及的系统性特征突出。其中美术画、中国古今名画

①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博物馆:《时事画报》第1册,第26页。

②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博物馆:《时事画报》第1册,第136页。

③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博物馆:《时事画报》第1册,第245页。

④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博物馆:《时事画报》第1册,第136页。

⑤ 据1909年第2期《时事画报》信息,该工艺义学院由尹燿、郑游组织并邀集画报同人参与,专收贫困家庭子弟,亦不收取任何学杂费,所有费用由画报同人承担,1909年2月时已有数十人入读。

⑥ 审美书馆:《审美书馆广告》,《真相画报》1913年第17期。

⑦ 审美书馆:《真相画报序》,《真相画报》1912年第1期。

选、各国比较画、铅笔画范本、陶器图案、世界美术、传记和工艺指南等专栏的开设具有明显的承续性特点。画报重要的内容，除了陈树人的《新画法》《图画新授法》和高剑父的《铅笔画范本》之外，还有由黄宾虹撰写的《论上古三代图画之本原》《论两汉之石刻图画》《论魏晋六朝记载之名画》《论画法之宗唐上、下》，以及古今中外名家作品和写生作品等内容。另外，标注为“工业参考品”的陶器图案专栏和高剑父撰写的《论瓷》《论古瓷原始于陶器》，以及工艺指南专栏论述了工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指向美术的实用功能。第11—14期的“陶器图案”，画报重点介绍了棕叶瓶、梅瓶、蟠螭碟、茶壶、兰盘、筒箭、水盂的设计图样，表现出高剑父隐忧于我国陶器的衰落，因此“兹将平日搜集东西洋之图器新案数百种，及仆所构思而成者逐期登出。”^①同样不可忽视的还有《野外写生之趣画》《闺秀画选》《工艺指南》等内容和专题，都可以看到《真相画报》对于普及美育的系统性思考。

第三，具有普及美育的广义性和国际化。《真相画报》一是积极倡导舆论监督、美术救世的思想；二是诞生在倡导国民教育的社会氛围中，成为了探索美育普及的一处重要实践平台，画报因而更加强调美育的现实性和开放性特点；三是具有国际化视野，其栏目内容兼具中国传统绘画和西方现代绘画，还常常介绍现代学校的游艺会、图书馆等信息，它的销售范围广及新加坡等南洋各埠，以及美国檀香山等地，特别是在第3期的封面开始出现了“The True Record”英文字样和英文通讯地址；四是注重以真实图像和艺术表现反映都市新文化内容，形式多样地再现都市文化百态，传播美育信息，在普及美育所倾注的心力显而易见。

四、结语

清末民初的中国内忧外患，教育成为“作新民”“唤起民众”以及实现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之希望所在。作为《时事画报》和《真相画报》主要创办者和撰稿人——“二高一陈”，既参与政治革命又倡导艺术革新，在互为表里和相互辅翼的双重身份中实现对美育普及的深度关注与有效介入，他们既有政治思想的敏感度，又能够通过办报传播与美育相关的社会思想、世界思潮和学术思想，有效地补充了这个时期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困境，扩大了美育的价值功能，使美育在与社会的联系中，找到了新的契合点与实践途径。

责任编辑：王冰 许磊

^① 审美书馆：《陶器图案》，《真相画报》1912年第12期。

“艺术生命”理论视域下儿童艺术教育的内涵与特征^{*}

包玉姣

[摘要]当下我国所面临的“物化”的儿童艺术教育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艺术生命、艺术家的生命以及儿童的生命三者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刻而准确的认识，这种困境的本质是对艺术生命及其背后的艺术家生命和儿童生命的漠视和遮蔽，是一种“生命缺席”的艺术教育。在“艺术生命”理论视域下，儿童艺术教育的核心精神就是回归艺术生命和儿童生命的本质。转向儿童生命体验的自然表达以及儿童生命与艺术生命的对话和互动，在此过程中实现儿童生命与艺术生命的双向丰盈和成长。

[关键词]艺术生命 艺术创作 艺术欣赏 艺术教育

〔中图分类号〕G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22)12-0206-05

为什么我们能在艺术品中感受到“情感”“生命”“活力”或“生机”？为什么艺术形式能超越其自身的物质属性，具有类似有机生命体一样的“生命力”？这种艺术生命力的具体内容及获得机制又是什么？对于上述关于艺术生命的问题，西方的艺术生命理论和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中的“气韵生动”思想，分别以“艺术是具有生命意味的形式”和“艺术是一种气韵生动的形式”的论断予以了回答。二者虽诞生于中西不同的文化土壤，并各具不同的表述形式，但对艺术形式之生命属性的认识却不谋而合。20世纪美国当代哲学家、艺术理论家苏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在其艺术哲学中明确提出“艺术是一种生命形式”这一命题，强调艺术是人类情感与内在生命的表现与投射，肯定了艺术作为人类生命的表现形式这一本质属性，在此基础上，将艺术视为一种有机的“生命形式”，从有机性、运动性、节奏性、生长性四个方面阐述了艺术作品的生命特征，关注艺术形式的独立价值。苏珊·朗格的艺术生命理论为本文考察儿童艺术教育的现状提供了理论视角。

一、“物化”的儿童艺术教育现状

当下，通过艺术教育提高儿童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趣味，并最终实现儿童的人格完整，已成为新时代艺术教育最为重要的目标。然而，纵观我国儿童艺术教育，仍长期囿于技术取向、认知取向等艺术工具主义泥潭，多年来得不到根本的改善。2022年5月，笔者对G市10所幼儿园的183位教师进行了儿童艺术教育现状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儿童艺术教育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

第一，儿童的艺术创作偏重对艺术形式的机械模仿和训练。调查发现，大部分幼儿园的艺术教学都是以预设性的课程为主，幼儿在教师呈现的“范画”和“范唱”中进行对艺术形式的模仿。65%的教师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项目“教育人类学视野下的广府童谣审美文化及审美教育研究”（BLA20022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包玉姣，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006）。

选择了教师预设课程，儿童通过模仿和练习来开展艺术教学，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一种极端的艺术本位论教育观，将艺术视为“物化”的艺术形式，亦被称为“技艺论”艺术教育观。这种“物化”的艺术教育中，只重视对艺术形式的模仿和艺术技能的训练，忽视了艺术形式也是一种生命的形式，并且是由艺术家的生命倾注而成，儿童艺术创作被“异化”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复制过程，其真实的生命感受得不到关注和彰显，无法在艺术创作中自发地表达内在情感世界。长此以往，艺术教育儿童生命渐行渐远，无法实现艺术教育帮助儿童生命成长的育人功能。

第二，儿童的艺术欣赏倾向于儿童对艺术作品知识的单向认知。从表 1 可知，目前我国儿童艺术欣赏仍然沿袭着以艺术作品的知识传授为主，是儿童在老师的带领下对作品进行艺术知识的理解和认知的赏析过程。此时的艺术作品被“物化”为艺术家生平、创作背景以及艺术流派等“艺术知识”。这种以确定的艺术知识为目标的艺术欣赏，物化了艺术形式的生命属性，忽视儿童生命体验在欣赏过程中的主动性，无法实现儿童生命与艺术生命的对话，既不能充分发挥艺术作品的教育价值，更无法养成儿童良好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趣味。

表 1 艺术欣赏的基本方式（单选）

内容	数量	百分比
教师先详细介绍艺术作品的相关知识，幼儿在老师的带领下对作品赏析	88	48.1%
教师简单介绍艺术作品，幼儿自主欣赏作品	72	39.3%
教师不做介绍，直接让幼儿欣赏作品	23	12.6%
其他	0	0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83	

当下我国所面临的“物化”的儿童艺术教育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艺术生命、艺术家的生命以及儿童的生命三者之间的关系缺乏准确的认识，其本质是对艺术生命及其背后的艺术家生命和儿童生命的漠视，是一种“生命缺席”的艺术教育。在“艺术生命”理论语境中，“艺术创作”被视为一种“艺术生命”的孕育生成过程，艺术欣赏则是“生命”与“生命”的“对话”过程。这一理论对当下儿童艺术教育中存在的“生命缺席”现状有着启示意义。在儿童艺术教育中，应从儿童的生命立场出发，从艺术形式训练转向儿童生命体验的自然表达，以及儿童生命与艺术生命的对话和互动。

二、“艺术生命”理论视域下儿童艺术教育的内涵与特征

（一）儿童的艺术创作：由对艺术形式的机械模仿转为儿童生命体验的自然表达

苏珊·朗格认为，人类语言符号重在逻辑推理，对于人类丰富细腻的内在生命无能为力，难以名状的情感表达只能借由艺术才能实现。为人类内在生命情感赋予形式是艺术创作的天然使命，艺术创作是满足人类内在生命表达需求和散发生命情感的必然选择。艺术创作的过程就是为情感赋形的过程。生命情感的积累、迸发和形成表达需求是艺术创作的前提，此即创作冲动，在此基础上，艺术创作才成为可能。艺术家反复体味和摩挲人类内在的情感暗涌，顺着创作冲动，将内在情感物化为艺术形式。这种创作冲动也是“有感而发”的艺术作品和“无病呻吟”的艺术作品之间的区别所在。刻意追求艺术形式的新奇，而非重视艺术生命的内在动力的艺术创作，是对艺术与人类生命关系的漠视和背离。“艺术生命”理论将艺术形式视为一种“生命形式”，艺术创作的过程就是“艺术生命”的孕育和生成过程。在艺术生命视野下，儿童艺术创作是儿童自我表达和情感抒发的方式和途径，是儿童的基本生活方式。由此，艺术形式创作不是目的，儿童生命的表达和实现才是儿童艺术创作的使命，其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 即兴性。即兴为儿童艺术创作过程中最为直观的外在特点，在“艺术生命”视野下的儿童艺术创作是儿童生命的即兴表达。生活与艺术在儿童艺术中并无清晰的界限。相比成人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儿童艺术创作是自然生成、即兴表达的过程。其奥秘在于，儿童是艺术化的存在，艺术是儿童认识外在世界和表达内在世界的方式。儿童将内在的创作冲动外化为艺术作品的过程，是一个儿童释放和表达内在生命的过程。

强调艺术创作的即兴性，就是强调艺术对生命情感的自然表达，也是对艺术生命“自然生成”属性的肯定。及时、准确而通畅地表达内在生命是人类的本能，表达在本质上就具有即兴的属性。儿童的感受和表达的关系相较于成人更为密切和顺畅，即兴的表达当下内在情感是儿童生活的常态。丰富、细腻而深入的内在感受和体验是儿童进行艺术创作的源泉，儿童艺术教育的实质是让儿童的内在生命与外在感性世界相遇，以获得充分的内在感受经验，产生艺术创作的冲动，在此基础上的儿童艺术创作必然是一种鲜活而自然的即兴表达。因此，儿童艺术教育应该弱化艺术形式的知识和技能传授，关注儿童内在感受和体验的丰盈，弱化艺术作品的结果评价，关注儿童在艺术活动过程中的生命参与，养成儿童从“生命情感”出发的艺术表达习惯。艺术来自生活，儿童艺术教育也应根植于儿童的真实生活及内在生命土壤，将儿童艺术教育从艺术技能的训练场回归儿童生命表达的原点。在艺术生命视野下的儿童艺术创作，重点关注儿童生命情感的激发和儿童艺术表达的环境创设，不过度“指导”和干预儿童艺术生命自然生成的过程，而是鼓励儿童依据生命的体验和创作冲动，创作生成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

2. 整体性。艺术创作的整体性，首先是指儿童艺术创作与儿童生命活动的一体性，强调儿童生命与儿童艺术的交融状态。对于儿童来说，艺术创作并非一种专业化的艺术行为，而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更确切地说，儿童就是一种艺术化的存在，艺术是儿童的生活方式。原生态艺术亦是一种典型的生活与艺术交融的整体性样态，艺术与生活之间没有明显的边界，原生态艺术传承融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人际交往、节日庆典、风俗仪式等真实的生活情境中，没有“教”与“学”的痕迹，只有真实生活的习染与熏陶。大量的原生态艺术田野研究表明，“音乐”“舞蹈”等词汇常常与当地人的各种生活场景和“仪式”纠缠在一起。例如，斯瓦希里语中的“恩戈麦”，就是非洲地区一个与音乐有关的概念，其原始意义是“鼓”“舞蹈”和“节日欢庆”。^①可以看出，在非洲人的生活中，“音乐”并非一个专业词汇，而是一个与生活紧密相依、交融一体的概念。艺术生命理论视野下的儿童艺术教育与原生态艺术传承有着相通之处，都主张儿童的艺术创作以整个儿童生活为土壤，以生命体验的表达为内在动力，回归儿童真实生命表达的本质。

其次，整体性指儿童艺术作品的有机整体特征，强调儿童艺术作品是一种有机整体的生命形式。艺术作品的有机性是指艺术形式的各个部分都以某种难以说明的内在复杂性、严格性和深奥性结合在一起，有机体的各成分相互依存、相互补充、血脉贯通，生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儿童艺术创作由于其丰富的想象力和表现力，更呈现出一种浑然天成的童真之趣，在儿童一气呵成的艺术创作中，艺术的内在结构呈现出一种有机形式，各构成要素之间存在一种神圣的契合。

儿童艺术创作无法精确区分具体的艺术形态和艺术门类。然而，现实的儿童艺术教育实践仍然是“各自为阵”。调查发现，儿童的生命整体被分裂成了认知、情感、操作行为等领域，儿童艺术教育也被分裂成专门化的分科教学。在这种专门化、分科化的艺术教育中，儿童完整的生命体验变成了艺术知识和技能碎片，儿童的艺术灵性也被日益僵化和物化。

霍尔的“复演论”提出儿童的生命历程复演人类发展阶段，从这一角度来看儿童的艺术发展和人类艺术发展的关系，也具有复演的痕迹。人类原始阶段的艺术是一种“整体”的艺术状态，艺术与生活融于一体，艺术尚未从生活中独立出来，艺术形式内部尚未完全分离，是人类艺术发展的混沌时期。儿童艺术也呈现出人类艺术原始时期的整体形态，整体性是儿童艺术教育的本然属性。生命初期的儿童生命与艺术之间水乳交融、浑然合一，那是一种质朴自然的生命表达过程，因此儿童艺术教育也应是一种融合和联通儿童生命各个领域经验的整体艺术生态系统。儿童艺术教育唯有在儿童真实的生活经验基础上，利用艺术形式之间的同构性和感官之间联通性，重新联通和融合各艺术要素，营造综合生发的艺术生态环境，实现儿童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儿童音乐、儿童舞蹈、儿童绘画等艺术形式之间的相互转化、相互融合，才是抵达儿童艺术教育的关键。

^① [挪威] 让·罗尔·布约克沃尔德：《本能的缪斯》，王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2页。

（二）儿童的艺术欣赏——由单向的艺术知识认知转为双向的身心合一的生命对话

艺术生命理论认为，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的过程，就是主观情感的客观化与客观世界的主观化的过程。^① 艺术家将人类的生命情感转化为可感的物质形式，在艺术作品中安放无法言说的内在生命，在欣赏过程中，艺术生命向审美主体的生命世界敞开，照见和确证审美主体的生命情感，同时，审美主体在欣赏过程中向艺术形式投射自己的生命情感，赋予艺术作品新的生命。

20 世纪 70 年代德国美学家尧斯所倡导的“接受美学”提出，文学或者艺术作品只有在欣赏者能动的接受活动中，才能获得现实的生命。如同人之生命机体的生存与延续，艺术生命机体的保存与延续也需要不断地摄取其自身之外的生命能量，不断保持和焕发新的艺术生命。接受美学关注的是欣赏者的能动性在欣赏过程中的价值，强调欣赏者的参与互动建构了艺术作品的艺术生命。在“艺术生命”理论视域下，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的生命灌注与投射，因此，艺术作品也具有“有机生命”的特点，被称为“生命的形式”。欣赏者与艺术作品之间不再是“人”和“物”的关系，而是人之“生命”与艺术“生命”之间的关系，艺术欣赏的过程是“生命”与“生命”之间“对话”的过程，是欣赏者与艺术家及其建构出的“生命世界”进行对话的过程。在艺术活动中，艺术家通过艺术作品对欣赏者诉说，欣赏者亦对艺术作品敞开自我。在此语境下的儿童艺术欣赏是儿童在其生命体验基础上，与艺术生命对话和互动的交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艺术的生命得到激发和成全，儿童的生命得以丰富和生长，于此，艺术教育生命场域建构并运转。回归儿童生命立场的儿童艺术欣赏是儿童与艺术作品之间双向“生命对话”的过程，也是儿童“身心合一”体验艺术生命之美、实现艺术生命与儿童生命链接和双向生长的过程。

1. 对话性。儿童与艺术作品的对话是儿童在其生命体验的基础上，与作品的多通道互动，而并非仅语言形式的沟通。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指出，语言符号是一种概念体系，通过语言概念体系来认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而艺术符号是感觉、直觉的“形式”，通过艺术符号来认识人类内在生命。语言是思维的外壳，以解释逻辑推理过程见长，艺术是表现性符号，在表达复杂、变幻的人类内在生命情感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这一特点使艺术欣赏中的对话与日常生活中的对话区分开来。由于儿童生活经验以及语言能力发展的限制，在艺术赏析中，非常规语言信息甚至是非语言信息的交流和互动就尤为重要和突出。因此，在儿童最初的艺术欣赏过程中，教育者要为他们与作品的互动和对话搭建多感官、多形式的通道，引领儿童将其生活与作品连接，用其生命体验去感受和理解艺术作品。

在艺术欣赏过程中，在儿童经历了艺术作品与自我生命最初的连接后，老师要引领儿童感知生活情感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关联，即情感或情景与艺术语言的转化。对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的认识是加深审美体验、提高审美理解能力，并最终提高儿童欣赏能力的必经之路。在打开儿童生命与艺术生命连接的基本通道之后，教育者需要为儿童高品质的艺术体验奠定基础——帮助儿童建立情感与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的关系。比如在儿童绘画的学习过程中，当儿童从早期的涂鸦和表达逐渐过渡到写实表征的阶段时，教师需要让儿童体验到形状、线条、色彩与生活中各种事物和情感的关联，帮助儿童在有了创作冲动后，能够找到合适的艺术语言来将创作冲动转化为艺术形式，也能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在感受艺术形象的同时，捕获艺术语言与艺术情感之间的奥秘。掌握了这种奥秘之后，艺术欣赏中的儿童生命与艺术生命之间的对话将会超越对艺术形象的揣摩与想象而进入一个更高的对话阶段。

2. 具身性。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中“身”和“心”就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格局。^② 朗格认为这种现象与人类确证“人之为人”的命题有关，“心”成为了人和动物的界限，^③ 也是“人之为人”的确证。在此理论背景下，情感和身体被割裂，情感被视为高于身体的命题。^④ 朗格认为，这种片面的认识是人类哲学研究的绊脚石。于是，朗格重新界定了情感与生命、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关系，认为生命与情感、

① Susanne K. Langer, *Mind: An Essay on Human Feeling*, vol. I,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7, p.87.

② Susanne K. Langer, *Philosophical Sketch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1.

③ 湛衡：《从“人禽之辨”到“人机之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成“人”属性》，《全球教育展望》2021 年第 10 期。

④ Susanne K. Langer, *Philosophical Sketches*, p.16.

心灵与身体之间是联通一致的，“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情感是生命的最为重要的形式，任何表现了情感的艺术品，都折射出生命的内在秘密，所以，生命和情感、身体与心灵之间其实并没有区别。”^①也就是说，情感和身体之间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通过生命机体的纽带紧密相连，甚至互相转化，以“具身化”的哲思实现身与心、情感与生命的整合，复归身心交融的生命状态。^②

表 2 艺术欣赏的方式（多选）

内容	数量	百分比
在艺术欣赏活动中，您会鼓励幼儿用语言去理解和表达对艺术作品的感受和体验吗？	179	97.8%
在艺术活动中，您会鼓励幼儿用身体的方式去感受和表达对艺术作品的感受吗？	87	47.5%
其他方式	20	10.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83	

表 2 的数据表明，儿童艺术欣赏过程中，绝大多数教师鼓励儿童用语言的方式去理解和表达对作品的感受，而较少鼓励儿童用身体或其他的方式理解和表达艺术感受。长期以来，我国的艺术欣赏一直沿着聆听或观摩—联想—理解的静态赏析模式，艺术作品是端坐在神坛的客体，学生（欣赏者）在老师的带领下，感知和吸收有关艺术作品的信息，进行想象和理解，生成对于艺术作品的经验。这种艺术经验是一种单向的认知抵达。在艺术生命理论视野下，艺术作为一种表现性符号，它不同于“语言”逻辑符号，不能进行思辨认知，只能通过欣赏者和艺术作品之间情感的对话和互动，才能真正实现艺术欣赏中的“相看两不厌”。身体动作是人类情感表达最原始和本能的方式，在语言产生之前，人类就掌握了身体与情感表达之间的秘密。于是，用身体的方式去感受和理解艺术作品中的情感，体验艺术作品中的内在生命，成为艺术欣赏的必然选择。在朗格的艺术生命哲学中，情感与身体、心灵与生命是相互转化，具有一致性的。当然，这里所说的身体并非单纯的物质身体，而是一个充满了情感和灵性的生命整体。

对于理性与逻辑尚未发展成熟的儿童而言，身体便成为链接其内在生命与外在世界的桥梁，通过身体动作使内在生命情感得以表达，亦透过身体认知外在世界。儿童用“全身心”来感受、体验生活的世界。他们的“经验”，是一种既包括了“身体”也包括了“情感”的“身心合一”的经验。艺术的意味只有当与人的生命体验尤其是身体体验直接相连时，才能被理解。在引领儿童进行艺术作品赏析时，若是从身体感知开始，让儿童用身体去体验艺术家在创作时的运动轨迹及用力方式，通过反复的身体感受和体验走进艺术作品，艺术作品亦更深入地进入儿童的生命世界，儿童生命与艺术生命形成连接对话，如此一来，艺术欣赏的过程不再是静态的艺术知识和技能的认知过程，而是儿童身心合一的艺术体验与互动过程。

三、结语

在“艺术生命”视野下，艺术是人类生命的表现形式，艺术与人类生命之间血脉相连。儿童艺术创作的过程是儿童生命即兴而发的表达过程，充满了鲜活的儿童生命感受与体验；艺术欣赏则是儿童生命与艺术生命对话交往的过程，彰显生命之间的流动与激发。艺术教育不能仅停留在艺术形式的“物质”层面，而应回归艺术的生命立场，认识艺术与生命之间的关联，找到艺术教育的“定位”。儿童艺术教育深植于儿童的生命体验，也指向儿童的生命成长，生命才是艺术教育的本位，儿童艺术教育需安置于儿童的整个生命体验中，回归儿童认知与情感合一、身体和心灵合一的生命状态，以儿童“生命整体”体验艺术“生命整体”，二者交融合一，如此方能实现艺术教育之生命旨归。

责任编辑：许 磊 王 冰

^① Susanne K. Langer, *Mind: An Essay on Human Feeling*, vol.I,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Introduction XIX.
^②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

Main Abstracts

A Blueprint for “Exegetical Hermeneutics”

Zhang Jiang 17

“Exegetical hermeneutics” is a new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ts aim is to fully tap into the advantages of both exegesis and hermeneutics by letting the two be the basis of each other, and support and motivate each other, which offer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ermeneutics and to open up a vast space for the growth of exegesis. “Exegetical hermeneutics” takes the practice of exegesis as its starting point, the interpretation as its destination and the academic discipline as its form. More specifically, “exegetical hermeneutics” takes the practice of exegesis as its beginning and methodology, and truth-seeking, reli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ness as its principle. It sticks to the appropriate path featuring going back and forth between exegesis and interpretation in loops which go upward in a spiral form, and will reach a meaning-oriented interpretation with a solid foundation and an ability to create new knowledge. In terms of discipline direction, “exegetical hermeneutics” advocates that the practice of exegesis comes first, and the aim of interpretation should be to reach Meaning & Principle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its essence and application. In terms of system and methodology, “exegetical hermeneutics” stresses both the practice of exegesis and Meaning & Principle. On top of this, it attaches utmost importance to the deep integr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two methods. In terms of scientific literacy, “exegetical hermeneutics” promotes the orientation of exegesis, public self-awareness and paradigm consciousness. Through dedication to the aspects mentioned above, “exegetical hermeneutics” will find its place in the fields of humanities as a systematic, complete and new academic discipline, providing an innovative paradigm for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various disciplines such as literary studies, history and philosophy.

Text Mining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Smart City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olicies

Cai Lihui, Dai Shengli and Ma Wangrong 64

It uses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mine the policy text of smart city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subject words of the policy text designs the policy evaluation variable system. It is used the PMC index model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policy effect of smart city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the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smart city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olicies are explor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smart city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olicies. The study found that among the evaluation result of 38 policies, one policy was excellent, 30 policies were good and 7 policies were acceptable. Policy release, policy audience and policy timeliness becom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licy. Policy instruments need to be combined and effective.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policy content and policy incentive measures need to be optimization and refinement.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ment,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and Export Pric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a

Sheng Bin and Lv Yunlong 107

This paper first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on export product pric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value chain, then conducts an empirical test using the combined data of China firm-Product level Customs Trade Database and China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from 2000 to 2013.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 price of China’s export products are less affected by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which means that the export pass-through effect of exchange rate is close to complete. GVC embedment can raise export prices of exchange rate flexibility. With the expansion of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GVC embedment on the exchange rate elasticity of export prices is increasing. After controlling for other factors influencing exchange rate transmission and variable measurement error, the empirical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means that the deeper of GVC embedment, the weaker trade respond to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luence mechanism, GVC embedment mainly improves the elasticity of export product prices to exchange rate changes by improving the elasticity of enterprises’ markup to exchange rate. Finally, the effect of GVC embedding on the exchange rate elasticity of export prices of heterogeneous products and consumer goods are greater.

Effect of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Chen Weiping, Yu Le and Liang Shupeí 115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from the aspects of Internet development and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combines it with the microdata of China Labor Dynamics Survey (CLDS),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and its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and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true after the robustness test of selecting historical post office data as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and replacing key variables. The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further activates th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of farmers by promoting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borrowing by relatives and friends,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reduces institutional lending, which has a masking effect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Finall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opportunistic entrepreneurship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survival entrepreneurship. Compared with the high human capital, high social capital and the peasant groups located in the central c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is particularly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vulnerable peasant groups with low human capital, low social capital and vulnerable peasant groups located in peripheral cities, thus promoting the inclusive growth of China's rural areas.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Ego-Histoire

Chen Maohua 145

The "Ego-Histoire" term drives from *Essais d'ego-histoire* which Pierre Nora initiated and edited. Originally, It specifically pointed to postwar seven French historians who writing personal history in a way of self-reflection, in order to rediscovery the historians' subjectivity. From the situation of a certain number of Ego-Histoire texts which have published in some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and Italy, Ego-Histoire integrates three different histories: Personal life history which a historian has lived through and felt; the history of social-times which he or she has witnessed and thought about; and the professional history which he or she has chosen and d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strategy, for one thing, on the subject of individual self, by narrating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 and society-times, then constructs the history of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For another thing, on the subject of historian's self, by narrating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aking history as career,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historian's subjectivity.

The Practice and Trend of Image Historiography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ong Qilin 175

In recent years, the interest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research community in exploring literary historical materials has increased, and the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images has also been developed to a certain extent. Since Zheng Zhenduo wrote 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 in the 1920s, the Chinese literary research community has actually started the practice of image historiography, and ushered in a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after the revival of the tradition of reading picture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1990s. The introduction of image historical materials into literary research works has become a common phenomenon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literary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The practice of pictorial historiography in Chinese literary research has absorbed the ancient tradition of having maps on the left and history books on the right and the western intertextuality theory, expanded the vision of literary research, and constructed the spatial dimension of literary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the use of the method of pictorial and historical mutual verifi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restoring the life dimension of literary historical works and revealing the continuity of cultural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history with images.

"Truth" and "Untruth" of the European *Xiqu* Theme Paintings in the 17th-19th Century

Chen Yaxín 184

During the 17th to 19th century, when *chinoiserie* was prevalent in Europe, *xiqu* became a common Chinese cultural object in the European paintings. These *xiqu* paintings have different material sources and *fidelities*, used as historical data of *xiqu* should be treated differently and concretely. Some of the paintings are based on existed western images, some are based on Chinese local images, and some are sketched from lif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distortion of these paintings include that the painters are unfamiliar with Chinese culture and easily misled by the western things, they prioritize the aesthetic of composition over documentary sometimes and pursuit the "authenticity" of different culture intentionally.

《学术研究》2022年1—12期总目录

(前一数字是期数,后一数字是页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第三个历史决议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阐释 谢迪斌 范若冰 9.1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

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方式 陈金龙 李 丹 11.1
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变革逻辑与实践图谱

赵中源 黄 罡 11.7

中国式现代化的宪法保障 吴家清 向金波 12.1
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形态的建构与创新 冉 杰 12.12

学习研究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内在逻辑 韩喜平 刘一帆 1.1

立何德 树何人

——对习近平立德树人教育重要论述的思考

程广云 张子夏 2.1

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演进、主要特质与时代价值 宋友文 黄文燕 3.1

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逻辑进路 杨 冰 王京跃 3.9

特 稿

“训诂阐释学”构想 张 江 12.17

学术聚焦

• 阐释学研究 •

理解、阐释与阐释的本质

——兼论强制阐释 傅永军 1.7

如何理解客观性:对象、意义和世界 梅剑华 1.17

“新格义”阐释: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问题

谷鹏飞 3.13

强制阐释的理论缺席与在场 段吉方 陈王青 3.21

试论强制阐释论的哲学与心理学基础 李忠伟 7.1

古典学术何以成为阐释学的资源

——以儒学阐释意识和阐释行为为中心 郑 伟 9.8

从“卜史易”到“士易学”再到“儒门易”

——先秦易学阐释分期断代刍议 窦可阳 9.16

兴起方是读诗:中国阐释学视域下的“比兴”说诗与多元理解研究 李有光 10.1

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

岭南人文精神与人文湾区 田 丰 2.43

国家善治与公共文化治理的互动机理与路径统合 张 波 丁晓洋 4.35

对外新闻话语编译的理论、原则与策略

史亭玉 张平功 10.43

汉英中医药词典编撰和翻译的缘起

——以欧明中医药翻译原则为例 苏 红 王银泉 11.49

语言景观治理的问题与路径 巫喜丽 梁加丽 11.54

国际化社区基础设施与文化适应的互动机制 李俊良 12.59

岭南文化研究

岭南文化的现代性阐扬

——以广东为例 李宗桂 6.36

文化共同体视野中的南粤古驿道与文化遗产

——以潮州古驿道与民间布马舞为例 张 霖 李志刚 6.48

学术与教育

清末民初报刊对美育的关注与介入

——以《时事画报》和《真相画报》为中心 许洪林 12.201

“艺术生命”理论视域下儿童艺术教育的内涵与特征

包玉姣 12.206

哲 学

•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理解 •

历史特殊性与唯物史观的具体化路径

——从普殊同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再阐释谈起

唐正东 1.26

“现实抽象”概念的“康德式结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重审

孙 亮 1.34

如何理解政治经济学走过的“两条道路”

——就马克思《导言》的论述与吴猛教授商榷

王峰明 王璐源 3.29

从经验具体、历史具体到具体总体

——马克思具体总体观的生成路径及哲学内涵 章 衍 3.36

恩格斯自然哲学与马克思自然哲学之关系 鲁克俭 4.1

恩格斯关于资本逻辑的批判及其哲学意蕴 张 当 4.9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建构政治主体的三重逻辑	王晓放	4.14	理解“存在”的三个维度	严春友	5.1
对劳动的第一哲学思考			正义幻相中的人类心灵图景	马万东 卢林萍	5.8
——兼论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	曹孟勤	6.1	论休谟的道德动机及其与道德感的关联	李 薇	5.15
经济生活的哲学批判史			现代逻辑关于辩证思维现象的思考	邹崇理 姚从军	5.2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精神现象学问题			论证研究的修辞化		
	高惠芳	6.9	——从语用论辩术到规范语用学	陈彦瑾	5.30
恩格斯与康德自在之物论断	盈 俐	6.16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态哲学意蕴	刘秦民	6.23
“异化”“物化”“人道主义”概念辨析			论新达尔文主义意识研究的哲学基础	安 晖	6.30
——从肉体和精神矛盾的视角看	王晓升	7.14	低成本认识世界的技术实现：数字孪生的认识论探讨		
马克思主义观探赜				徐瑞萍 吴选红	7.29
——基于 MEGA2 三阶段论文和原始手稿的考察			模态逻辑与真理论	李 晟 胡泽洪	7.36
	陈长安	7.21	价值理性共识与公共性优存的新文明叙事		
蒲鲁东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的不同理论面相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及其世界性意义	袁祖社	8.8
——马克思从政治哲学走向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意义探析			道德是什么：发现与发明	魏则胜 苗存龙	8.15
	文 兵	8.1	超越结构主义：普兰查斯方法论辨析	石德金	8.22
城市问题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空间化的逻辑进路			晚明耶佛之辩		
	林 密 杨丽京	9.24	——以蒲益智旭《辟邪集》为中心	刘 峰	8.30
媒介智能化转型中的资本逻辑及其批判			同感：直接的抑或间接的	郑辟瑞	9.43
	葛彬超 王立泽	9.31	论胡塞尔第一哲学与伦理学的统一性	曾 云	9.52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生产力的资本属性与社会本性之辩证认识	戴圣鹏	9.38	存在与否定的辩证法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学向度	王虎学 凌伟强	11.13	——黑格尔《逻辑学》“映现”章的逻辑进路	吴 猛	10.8
利益与革命：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建构逻辑	周 霞	11.21	论“自我意识”概念的本真结构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基本问题			——对黑格尔“承认”概念的存在论分析	徐广垠	10.17
——重读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	王荫庭	12.24	乐治：儒家的理想化善治模式		
马克思关于特殊性—普遍性的辩证法			——以《乐记》为中心的探讨	冯 兵 张晓丹	10.23
——兼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	陈广思	12.30	张载责任思想的义理脉络	雷 静	10.30
朱王工夫论的结构差异			论证研究的新修辞学路径及其合理性		
——兼谈朱陆之争	傅锡洪	1.41	——从广义论证的观点看	陈清泚	10.37
视差分裂、减法政治与共产主义			关于问题研究与哲学史研究的思考		
——齐泽克复兴共产主义的批判性反思	王福生 郭晓岩	2.6	——王路教授访谈	张娟娟 王 路	11.28
现代性最高的主观原则及其两条思想出路			论贝叶斯条件化和杰弗里条件化之关系		
——以康德哲学的基础问题为分析起点	尚文华	2.12	——评休伯对贝叶斯主义的批评	袁继红 陈晓平	11.35
广延、运动与力：笛卡尔的自然哲学与莱布尼茨的批评			《成实论》译出时间考论		
	林逸云	2.23	——兼论鸠摩罗什卒年问题	李 云	11.43
海德格尔与易之道：存在论形上视域下的唯变所适与大成之序			从道德无序到美德统一：麦金太尔道德叙事的构思逻辑		
	黄 琳	2.30		张永刚	12.38
朱熹《家礼》以理格俗的有效阐释	毛国民	2.37	STS 视角下逻辑研究的三种进路	臧艳雨	12.44
人工智能传播的信任维度及其机制建构研究			经验世界中交互主体性的本原性思考		
	杨先顺 莫 莉	3.43	——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阿伦特	高 燕 李美娟	12.51
形式与意象：中西方说服逻辑差异研究	宣长春 林升栋	3.51	政 法 社会学		
现象学、法律与政治			• 中国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研究 •		
——对第一人称研究、规范秩序与行动的方法论反思			内生与外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防贫治理	朱冬亮 殷文梅	1.48
[奥]索菲·路易道特[文] 韩立俊[译] 张浩军[校]		4.20	乡村振兴的现实考量与理性思考	陆益龙 董惊乔	8.45
法律人工智能概率推理的困境与破解	杜文静	4.29	从“谋生”到“乐生”：中国贫困治理到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演进	刘海春 李昭昕	8.52

双重嵌入：一个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新分析框架	熊 彩	8.60
多重机制协同减贫模式：政策工具与逻辑机理		
——广东减贫治理成功的一种解释范式	张开云 邓永超	12.84
乡村振兴背景下韧性乡村的影响因素与示范带耦合分析	曲 霞 文晓巍	12.90
• 网络与社会 •		
现代化视角下的数字难民：一个批判性审视	颜昌武 叶倩思	2.51
“失声的主角”：新冠疫情下中老年人的防疫行为逻辑与风险应对策略	曹博林	2.59
数字人大建设何以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创新路径与前景展望	宋菁菁 王金红	2.67
双重驯化与人技混合：驯化视角下的算法再定义	唐 铮 段景文 严云依	4.56
“互联网 + 政务服务”改革法治化的价值平衡与规范进路		
——以营商环境建设为视角	陈可翔	4.61
网络消费者行踪轨迹信息交换的规制困境及路径优化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	刘 恒 吴易泽	5.46
数字媒介依赖的新表征与伦理反思	林爱珺 何艳明	5.54
• 社会组织研究 •		
第三方治理：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组织跨区域协作治理研究		
——以 Y 青年总会为例	吴巧瑜 黄 颖	3.57
社区感：社区组织的新媒体形式与关系连接		
——基于慈善组织义工微信群的研究	罗坤瑾 郑裕琳	3.64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		
——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赵 琼 徐建牛	3.71
• 农地制度改革与基层治理 •		
从“圈地”到“文放”：民生视角下清朝土地制度变迁研究	郑雄飞 高依萌	4.41
渐进式政策调适的内生动力与制度路径：以 N 区历史问题和化解为例	管 兵	4.49
• 治理现代化与区域治理创新 •		
制度执行的统筹治理逻辑：基于河长制案例的研究	吕志奎 钟小霞	6.72
社会组织党建中的借力逻辑：以广州 D 社工机构为例	张紧跟 庄少英	6.78
• 健康中国与社会发展 •		
促进病患线上观察学习的信息特质及机制探究		
——基于“糖尿病妈妈”线上论坛的虚拟民族志研究	聂静虹 瞿 垚	7.67
医患沟通的互动实践及影响因素		
——基于某三甲医院医生视角的分析	唐佳梅 陈 杨	9.79

高质量发展中邻避治理的尺度策略：基于城市更新个案的考察	王佃利 于 棋	1.56
清晰与模糊的张力及其调适		
——以城市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为中心	韩志明 马 敏	1.63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政府责任论	蒋银华 陈湘林	1.71
民法典时代未成年人乘坐城市轨道交通法律问题研究	王荣珍 潘美娟	3.78
论自然垄断行业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成因与治理	朱凌珂	4.66
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本地化社会网络分析	张文宏 韦淑珍	5.37
论国家适当顾及义务在新型私人公海活动中的适用	黄 瑶 杨文澜	5.61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的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	刘耀东 杜雅君	5.69
落单的批判		
——从马克思《资本论》到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	任剑涛	6.52
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范式	刘顺峰	6.63
避免全球卫生治理变革“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因应	殷 峻	6.68
制度与行动者网络：新加坡环境精细化治理的实践及其启示	余敏江 邹 丰	7.44
越南民众眼中的中美国家形象认知		
——基于建构主义视角的分析	夏梦真 郝雨凡	7.52
我国《海洋基本法》的性质定位与制度路径	古小东	7.60
算法自动化决策的属性、场域与风险规制	侯东德 张可法	8.36
赶超型国家中个体公共性的演变		
——以消费生活为例	王 宁	9.60
高校科研诚信的协同治理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潘启亮 杨梦婷	9.70
算法推荐新闻的运作困境与优化逻辑：基于建构主义技术观视角	刘 星	9.75
亟待“国际转向”的新时代社会学		
——兼论全球社会中社会学研究的关键议题	范和生 武政宇	10.49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治理中的包容性府际关系	杨爱平	10.59
绩效反馈、风险应对与自贸区的制度创新		
——以前海为个案的研究	郑崇明 倪 星	10.67
国际刑法参与全球深海治理的适用范围及影响		
——以生态灭绝罪为视角	李韵依	10.75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公共治理的有效性研究	程波辉 叶金宝	11.59
工业社会学视域下“矿区社会”的变迁与社区重建		
——以 S 市岭东、岭西矿区为例	田毅鹏 郝子仪	11.68

粤港澳大湾区居民粤方言传承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单韵鸣	茹靖雯	11.78
个人数据交易的法律基础	刘颖	郝晓慧	11.85
集体土地空间权利配置研究		于凤瑞	11.95
智慧城市环境治理政策文本挖掘及量化评估	蔡立辉	戴胜利	12.64
人口结构变化对美国政治格局的潜在影响探究		马王荣	12.64
——基于多数据源的考察	陆杰华	王笑非	12.72
流动人口医疗卫生服务利用影响因素研究			
——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李燕	12.79

经济学 管理学

• 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研究 •

从制度经济学到行为经济学：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探析		周业安	3.85
行为经济学：发展前景与路径		叶航	3.92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实验经济学未来展望		王云	3.99

• 乡村治理研究 •

乡村治理：社会保障如何影响农民集体行动			
	王亚华	张鹏龙	7.75
公共物品供给：村干部“一肩挑”的制度绩效考察		胡新艳	7.84
	陈文晖		
农民幸福感：来自村庄选举投票的证据		罗必良	7.91
	吕姝颖		

• 现代货币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笔谈 •

现代货币理论的核心观点及政策启示			
	[美] L. 兰德尔·雷		8.66
关于现代货币理论的四个观点		刘尚希	8.71
现代货币理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适用性考察		杨瑞龙	8.74
现代货币理论的澄清及其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意义		贾根良	8.77
主权货币政府支出的约束：财政还是真实资源			
	[美] 耶娃·纳斯岩		9.87
现代货币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及其经济政策建议			
	[美] 梁燕		9.92
现代货币理论关于当前美欧通货膨胀的探讨		贾诗玥	9.96

• 弱势群体与共同富裕 •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与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郑功成	王海漪	9.99
风险流转下弱势群体的共同富裕之路		杨方方	9.107
以高质量社会救助制度筑牢共同富裕底板		张浩森	9.115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的金融发展	王国刚	罗煜	1.79
构建新发展格局：基于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的逻辑			
	陈伟光	聂世坤	1.88

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

——效率与公平的互促性分析	朱富强	1.96
---------------	-----	------

新冠肺炎疫情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来自招聘网站数据的经验证据	毛宇飞	曾湘泉	1.104
-----------------	-----	-----	-------

中国共产党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宏大视野、使命担当和核心理念

	周文	李超	2.75
--	----	----	------

经济循环中的循环数字化与数字循环化

——信息、物质及资金等流转视角的分析	蔡跃洲		2.84
--------------------	-----	--	------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财政工具的能源扶贫效果研究

——基于多维贫困的视角	李军林	张黎阳	董亮	2.91
-------------	-----	-----	----	------

民族村寨旅游价值引导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曾韬			2.98
--	----	--	--	------

文化距离、海外移民网络与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 OECD 和 RCEP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	李晓峰	李土华	3.109
------------------------------------	-----	-----	-------

理解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经济：成就、挑战与政策展望

	余森杰	陈新禹	4.70
--	-----	-----	------

现代化视域下的共同富裕：理论逻辑与物质基础

	胡怀国		4.78
--	-----	--	------

乡村振兴中防止低收入人口返贫的战略构想

	孙久文	张皓	4.87
--	-----	----	------

数字贸易壁垒的界定与评估：标准、结果和驱动因素

	沈洁		4.96
--	----	--	------

制造强国进程中我国制造业优势生产能力的空间布局

	李金华		5.73
--	-----	--	------

新就业形态中的劳动者权益维护与工会工作模式选择

	唐镛	郑琪	5.82
--	----	----	------

新的消费习惯催生巨大市场

——简论近代中国的卷烟工业	杜恂诚		5.90
---------------	-----	--	------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地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冯锐	郑伟钢	张少华	5.98
--	----	-----	-----	------

福利国家模式、增长悖论与再平衡：对中国现代化及共同富裕的启示

	袁富华	吴湛	6.85
--	-----	----	------

经济发展变迁中的国家工业理解能力

	姜子莹	封凯栋	6.96
--	-----	-----	------

资本下乡的本地嵌入机制与效应

——基于 S 生态农业公司的案例研究	许悦	陈卫平	6.106
--------------------	----	-----	-------

领导沉默与员工主动性行为关系研究

——基于信任主管和权力距离导向的作用	黄桂	朱晓琼	李玲玲	付春光	7.98
--------------------	----	-----	-----	-----	------

乡村振兴下土地流转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基于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视角	刘志忠	张浩然	欧阳慧	8.83
------------------	-----	-----	-----	------

通过 ESG 投资助推经济结构转型：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陈骁	张明	8.92
--	----	----	------

经济学研究的功底建构与科研方法论

	常修泽		10.81
--	-----	--	-------

健全分类分层的社会救助体系问题研究

	韩克庆	郑林如	秦嘉	10.90
--	-----	-----	----	-------

元宇宙概念及其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李直 刘越 10.101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中国企业高质量出口

林峰 秦佳慧 10.110

存款保险介入与村镇银行的监管路径优化

何平 傅竞驰 11.100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中国的探索与理论创新

马 璐 11.109

经济追赶、创新水平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基于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的比较分析

郑艳婷 李智贤 张可云 11.116

中国就业结构演变的动力因素、作用机理与政策进路

李志明 11.124

制造业升级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作用与推动途径

张 杰 宋宜航 12.96

全球价值链嵌入、汇率变动与出口产品价格

——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盛 斌 吕云龙 12.107

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研究

陈卫平 余 乐 梁舒培 12.115

近代中国财政分权的历史框架与当代启示

毕学进 马金华 许 晖 12.124

历史学

• 环境史 •

19 世纪伦敦空气污染对儿童的影响及时人应对举措

严玉芳 4.122

环境史视野下的澳大利亚弗拉格造雨试验

李星皓 4.131

企业家的自然保育理念与实践

——论洛克菲勒家族对美国国家公园体系建设的贡献

张瑞胜 梅雪芹 8.122

菲律宾内格罗斯与邦板牙糖业发展差异的原因分析(1855—1934)

肖艺伟 8.132

• 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 •

清末国粹思潮与“文学”的流播

李 敏 5.131

经学与经学史研究旨趣

桑 兵 1.111

振祖制以行君道：南宋高宗朝转对制的重建与运行

陈 晔 1.119

袁崇焕与明天启朝党争

王荣煌 1.131

颜之推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及其思想感悟

张艳国 2.105

宋代三佛齐与广州的佛教文化交流考述

何方耀 2.114

英国近代早期的戏剧与政治

柴 彬 许 晋 2.123

新西兰学派论历史中的个体和普遍

杨 璇 2.131

困顿的守护者：庚子国难中的“京师团练大臣”王懿荣

崔 岷 吕书颖 3.116

清前中期进京效力西洋“技艺之人”荐举方式之嬗变

伍玉西 3.129

《良友》画报与蒋介石形象的变化(1926—1931)

马守丽 3.138

从万木草堂到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

蒋 明 3.145

实践理论：历史学的最新转向？

【美】迈克尔·波利亚科夫[文] 程利伟[译] 顾晓伟[校] 4.105

社会史视域下《春秋》价值新探

——以婚姻家庭领域为中心的考察

张淑一 4.114

卢沟桥事变与读者读报反响

蒋建国 5.106

“问责”：宣统二年弹劾军机风潮与清廷中枢改制

杨 猛 5.118

章学诚学术成就析论

陈其泰 6.116

开明的心智，不凡的史书

——评苏克拉提及其《教会史》

林中泽 6.124

张文彬领导广东党组织对余汉谋部统战工作的历史考察(1937—1942)

王英俊 6.136

从无到有的基业：近代特殊教育国家治理体系的初构

郭卫东 7.108

北宋前期吏职的“流内官”身份与免役权

——以《天圣赋役令》宋 6 条为中心的考察

张亦冰 7.117

由“随奏随行”到“动辄纷争”：明代解盐行销区的调整

夏 强 7.128

殖民医学史：术语内涵、核心争论与多元视角

杨祥银 8.99

汤斌两次入仕辞官考论

赵秀红 8.113

粤人黎兆棠与晚清海防船政

孙 锋 关晓红 9.123

废约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体制的调整

刘利民 9.132

2019—2021 年明清史研究的进展、热点与趋势

——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为基础

张 敏 9.143

“葡萄牙人大传播”：辣椒入印及入华史考略

——欧洲史料视角下的新论

金国平 叶 农 10.117

史禄国在中西学界的回响

王 传 10.132

日伪新闻势力的统合与扩张

——以 1941 年东亚新闻记者大会为中心

李 龙 10.145

德皇密宴袁克定：洪宪帝制酝酿之初一个虚构的故事

尚小明 11.132

高、武“旧将”与南齐晚期政局

李 磊 11.141

清季的“世界史”认知与文明力较量

余 露 11.149

变革“半殖民地工业特质”与中华制伞厂的创设

熊元彬 11.157

晚清官员印章散论

——以《杜凤治日记》的记载为中心

冷 东 邢思琳 沈晓鸣 12.133

“自我史”初探

陈茂华 12.145

内藤湖南的中国古史研究

——兼论内藤湖南古史观念与同时期中日疑古思想之异同

郭露凝 12.154

文学语言学

论袁行霈中国诗学体系建构	徐正英	李延欣	1.142
纯文学观念与现当代散文的体类概念系统	黄开发		1.150
1925—1926：新文化群体的分化及其人文困境			
——以《语丝》与《现代评论》关系为考察中心	姚玳玖		1.161
香港、澳门语言生态重建的使命与机遇	徐真华		1.172
中日文献互证的理路和方法			
——张志和止作《渔歌》一首考	戴伟华		2.142
内闾与外乡：清代女性诗歌中的寄外书写	张宏生		2.150
转动电影的历史时刻：维多利亚女王钻禧庆典与早期境况电影	陈涛		2.160
凝视的双重性及其功能			
——让·吕克·南希论基督教绘画的本质	王琦		2.169
介入现实 化为现实			
——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两点思考	贺仲明		3.152
艺术参与和生态公民的重塑			
——后 / 疫情时代的艺术功能思考	赵奎英		3.158
敦煌文学对中国文学史的重大贡献	伏俊殊		3.168
论马克思对德国古典美育思想的批判与超越			
——基于历史哲学逻辑下的考察	朱立元		4.142
“科学的世纪”与“小说的世纪”			
——自然科学与现实主义小说之关系考论	蒋承勇		4.154
艺术学独立的学理性奠基			
——论费德勒对艺术学学科的开拓	李诗男		4.162
半图式性构式“X手”的时间用法及其产生与发展	董正存	张飘	4.169
论艺术形式创制的有体和无体			
——中西艺术范式差异再辨析	王才勇		5.142
从雕塑精神到音乐精神			
——跨媒介视角中的西方绘画变迁	卢文超		5.152
宫体诗与宫廷	杨东林		5.163
汉晋六朝岭南诗考述	陆路		5.170
看见她，歌谣中的理想美人			
——董作宾歌谣研究的百年对话	施爱东		6.146
知识与趣味的内在张力			
——以五本梅谱为例	薛富兴		6.155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传统的建构	朱寿桐		6.164
论“风人之致”	徐国荣	郭亚超	6.171

从人类主义美学转向人工智能美学

——基于康德美学架构的批判性考察	王 峰	7.139
人工智能能否成为审美主体		
——基于康德美学的一种扩展性探讨	陈海静	7.149
论英国战争叙事中创伤的表征之流变	刘胡敏	杨 康 7.158
汉语字词发展论纲	王贵元	李洁琼 7.166
现代主义艺术的文化逻辑		
——以蒙克奇异美学为例	周 宪	8.141
作者“死”后理论往何处去		
——布朗肖的“域外思想”及其书写	吴子林	8.150
“朦胧诗”论争中的学院权力		
——以“南宁诗会”为例	李建立	8.160
论宋人对唐传奇的文体定位	王庆华	8.167
空间性与场所意识：再论罗伯特·塔利的空间批评		
	陆 扬	9.160
纯有、中性与他者：再论列维纳斯与布朗肖的文学观差异		
	王嘉军	9.167
傀儡艺人的“幻术”表演		
——南宋李嵩《骷髅幻戏图》解义兼及戏剧图像的研究方法	陈志勇	9.177
论“平声赅缓”	卢盛江	10.154
元明清诗学中以参悟为主的创作论	蔡宗齐	10.164
文学母题：含义分化与本土应用	汪正龙	10.170
跨文化自觉与民族电影的主体性问题	周安华	11.167
“经营位置”与中国电影的空间意识及其视觉经验		
	陈林侠	11.173
“旧事重提”与意义发现		
——论《朝花夕拾》的记忆改写	哈迎飞	11.181
“谴责小说”及其批评史效应	王 今	11.189
中国古代“海丝之路”的文学镜像	纪德君	12.165
中国文学研究的图像史学实践及趋势	龙其林	12.175
17—19 世纪欧洲中国戏曲题材画的“真”与“失真”		
	陈雅新	12.184
朱熹《诗集传》的阐释思想	刘思宇	12.193
学术动态		
乡村振兴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左康华	8.177